前沿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研究专题 ·

新时代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的重大成就、基本特征和主要经验　王大广　吴华英（ 1 ）

历史·实践·价值：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人学意蕴　彭冰冰　黄文心（ 10 ）

· 思政课建设研究专题 ·

思政课建设与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同步推进策略　杨　玢（ 21 ）

习近平关于高校思政课建设重要论述的出场逻辑、核心要义及实践要旨

张利涛　黎　昊（ 29 ）

【中国式现代化与民族地区发展】

2024年的中国边疆安全研究：历史、文化与国家立场　袁　剑　刘　磊（ 41 ）

民族地区社区服务现代化发展路径探析

——以内蒙古自治区为例　李　娟（ 50 ）

【传统文化与现代性】

对中华文明现代转型之“形”与“态”的当代审视　栾　林　战立群（ 64 ）

2025 年第 1 期(总第 453 期)
2025 年 2 月 10 日出版(双月刊)

· 古代礼学及其现代价值研究专题 ·

桐城派礼学研究发微　林存阳　罗　刚(75)

礼乐文明的传统及其现代化　顾　涛(88)

《仪礼节略》与朱轼的家礼学建构　李文昌(103)

【治理研究】

政策能有效保障机会平等吗?　黄爱教(118)

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内在逻辑、现实梗阻与路径优化

赵美荣　尹江霞　孙天舒　李昕怡(126)

【声明】

本刊已许可中国知网数据库、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维普网)、超星数据库等数字资源平台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本刊支付的稿酬已包括上述平台著作权使用费,所有署名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之行为视为同意上述声明。如作者不同意文章被收录,请在投稿时说明,本刊将按作者说明处理。

本刊已与哲学社会科学预印本平台(https://zsyyb.cn)合作共建。

期刊基本参数:CN15-1142/C * 1979 * b * A4 * 136 * zh * P * ¥12.00 * 800 * 12 * 2025-02

FORWARD POSITION

No.1 2025(Sum No.453)

CONTENTS

Major Achievements, Basic Characteristics, and Key Experiences of Deepening the Institutional Reform of Party Building in the New Era ····· WANG Daguang, WU Huaying(1)

History, Practice, and Value: The Humanistic Implications of Further Deepening Reform Comprehensively ····· PENG Bingbing, HUANG Wenxin(10)

Synchronized Advancement Strategi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and the Party's Innovation theories ····· YANG Bin(21)

The Emergence Logic, Core Essence, and Practical Tenets of Xi Jinping's Important Discourse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Universities ····· ZHANG Litao, LI Hao(29)

Chinese Frontier Security Studies in 2024: History, Culture, and National Stance ····· YUAN Jian, LIU Lei(41)

Exploring Pathways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Community Services in Ethnic Regions: A Case Study of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 LI Juan(50)

A Contemporary Examination of the "Form" and "State" in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 LUAN Lin, ZHAN Liqun(64)

An Exploration of the Ritual Studies of the Tongcheng School ····· LIN Cunyang, LUO Gang(75)

The Tradition of Ritual-Musical Civilization and Its Modernization ····· GU Tao(88)

Yili Jielue and Zhu Shi's Construction of Family Ritual Studies ····· LI Wenchang(103)

Can Policies Effectively Guarantee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 HUANG Aijiao(118)

Empowering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rough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Communities: Internal Logic, Practical Challenges, and Path Optimization ····· ZHAO Meirong, YIN Jiangxia, SUN Tianshu, LI Xinyi(126)

新时代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的重大成就、基本特征和主要经验

王大广　吴华英
（首都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9）

[摘　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实现历史性变革、取得重大成就，特别是在党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干部人事制度、人才发展体制机制和监督制度等多个关键领域成效显著。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呈现突出改革主线、落实从严要求、注重整体建构、坚持守正创新、确保科学规范的鲜明特征。立足新时代新征程，党通过一系列改革实践，积累了宝贵经验，具体包括：必须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必须以提升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为目标，必须把人民群众满意度作为根本衡量标准，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必须以调动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着力点。这些经验为进一步推进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提供了重要依据，为不断推进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提供了基本遵循。

[关键词] 党的建设；制度改革；自我革命；深化改革；中国式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 D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267（2025）01－0001－09
DOI：10.14129/j.cnki.forwordposition.2025.01.001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的概念，明确要求“紧紧围绕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1]。2014年，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实施方案》，明确指出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主要针对不适应党的建设规律和改革总体进程及重大问题的范畴，突出强调要深化党的组织制度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制度改革和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明确了改革的方向和任务要求。[2]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强调，“党的领导制度是我国的根本领导制度”[3]305，“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重要制度保障”[3]295，需要进一步完善全面从严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历史、成就与经验”（24JD710018）。
[作者简介] 王大广，博士，首都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党的建设。
[通信作者] 吴华英，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党的建设。

治党制度，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稳步推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提出“以调动全党抓改革、促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着力点，完善党的建设制度机制”[4]，进一步将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摆在重要位置。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障。系统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的重大成就，明确其特征，梳理其经验，对进一步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具有重大意义。

一、新时代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的重大成就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经过十余年的改革与发展，党的建设各项制度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这些成就集中体现于党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干部人事制度、人才发展体制机制以及监督制度等领域。通过制度的完善与机制的创新，党的建设更加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不仅提升了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也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提供了政治保障。

（一）党的领导制度愈加完备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积极谋划、统筹部署并大力推动，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5]199，明确了党的领导制度的基本框架。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为确保对党和国家各机构、各领域及全体人民实现全面领导，我们逐步构建起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这一体系牢固确立了“两个维护”是党的最高政治原则和根本政治规矩，健全并完善了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和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为党的长期执政和自我革命提供了坚实保障。同时，进一步完善了党对人大工作的领导制度以及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运行机制，进一步健全了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从六个方面总结了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党的全面领导制度，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各项制度，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制度，全面从严治党制度。[5]199这六个方面体现了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制度精神、制度势能、制度半径、制度力量、制度增量和制度内核。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建立，是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的标志性成果，为巩固党的领导核心地位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二）党的组织制度日臻完善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组织建设，党的组织制度体系日臻完善。一是党的组织路线更加明晰。2018年，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阐述了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即“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组织体系建设为重点，着力培养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着力集聚爱国奉献的各方面优秀人才，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任人唯贤，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坚强组织保证”[6]11。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为党的组织工作提供了行动纲领。二是党内生活制度持续健全。《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进一步明确党的组织生活的具体要求，坚持“三会一课”制度，认真召开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推进“两

学一做”学习教育制度化、常态化、长效化，建立健全党内生活制度。三是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和党内选举制度更加完善。《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明确了党的地方委员会的组成、任期和选举程序，为地方党组织的选举工作提供了制度保障。《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选举工作条例》进一步规范了党的地方组织的选举工作。这些法规的施行不仅提高了选举制度的规范化水平，也为实现党内民主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四是党组、地方党委、党的工作机关、党支部的工作制度不断健全。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工作机关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这些条例的施行，不仅规范了党的工作机关的运行规则，而且显著提高了其工作效率和执行度。五是基层党组织的制度体系不断完善。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党和国家机关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规范了党和国家机关基层党组织工作，加强和改进了基层党的建设，推动了党的全面领导在基层组织的落实，推进了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层党组织逐步完善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新机制，推行“六治融合”的治理模式，初步构建起共建共治共享的组织体系和运行机制，充分发挥了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

（三）党的干部人事制度日益优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高度重视干部队伍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明确了新时期好干部的标准，即“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7]86，为培养高素质干部提供了有力遵循。首先，干部选拔任用更加严谨规范。新时代的干部选拔逐步破除“唯票”“唯分”“唯GDP”“唯年龄”的“四唯”问题，更加注重干部的能力和综合素质。中共中央印发《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作条例》，进一步规范了干部的选拔任用和考核工作。同时，在干部选拔上，注重拓宽干部来源，优化干部队伍的人员结构。其次，干部考核评价制度更加完善。新时代干部考核评价制度通过分层与分类结合、定量与定性结合的方式，进一步提高了评价的准确性和权威性。在考核理念上更加注重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为重要标准，建立奖惩结合的激励制度，积极落实“三个区分开来”，提升党员干部的管理实效。最后，干部培训和教育机制更加健全。各级党组织健全了常态化培训机制，完善了党的理论学习制度和思想汇报制度。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规则》，要求充分发挥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的带头示范作用，提高领导干部专业素质和实践能力。党中央先后组织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和党纪学习教育等七次集中性学习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在学习教育过程中不断夯实理论知识，持续深化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认识，从而使全党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

（四）党的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日益健全

中国共产党始终将人才的培养和发展置于重要位置，人才被视为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第一资源。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已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围绕时代发展需要，人才发展的体制机制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一是党管人才的机制不断健全。国家始终“坚持党管人才原则，加强政治引领和政治吸纳，落实党委联系服务专家制度”[8]。我国已逐步形成了党委统一领导、组织部门牵头抓总、有关部门各司其职与密切配合、用人单位发挥主体作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党管人才工作格局。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要求，为人才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二是人才选拔任用机制更加科学规范。选拔人才始终坚持事业发展和岗位需求导向，将新时期好干部标准特别是政治标准作为首要标准，实行政治品德不过关一票否决制。2023年6月，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提出："要树立鲜明用人导向"，进一步规范人才选拔任用标准，完善了选拔用人机制。[9]三是人才流动机制持续优化。国家通过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为各类人才落户提供政策支持，促进了人才在区域间、行业间的有序流动；同时，还加大了党政人才与企事业单位管理人才交流的力度，畅通了企业和社会组织人员进入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的渠道，充分发挥各类人才的作用。

（五）党的监督制度建设日趋严密

监督制度建设是保障党的建设顺利进行的重要基础。新时代背景下，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挑战，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监督体制的健全和完善，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取得显著成效。首先，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实现历史性突破。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国各地推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构建起对所有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的新体系；201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的颁布使监察工作进一步法治化、规范化，标志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迈入新的阶段。其次，党的巡视制度不断走向成熟。2013年，《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2013—2017年）》发布，其中对巡视工作进行了全面规划，明确了发展的重点和目标。2015年，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对巡视工作的程序、内容及规范作出系统规定。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要求："深化政治巡视，坚持发现问题、形成震慑不动摇，建立巡视巡察上下联动的监督网。"[10]通过不断地完善，巡视制度作为党内监督制度体系的重要支柱，在加强党的建设与国家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最后，党内监督制度体系已基本形成。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先后三次印发党内法规工作五年规划，包括《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2013—2017年）》《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第二个五年规划（2018—2022年）》《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规划纲要（2023—2027年）》，推动了党内法规建设的稳步发展。2016年，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和《关于新形势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为加强和规范党内监督提供了基本遵循，强调"党内监督必须贯彻民主集中制，依规依纪进行，强化自上而下的组织监督，改进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发挥同级相互监督作用"[11]440。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宣布，我党已经"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12]7。党内监督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为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提供了坚强保障。

二、新时代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的基本特征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始终以突出改革主线、落实从严要求、注重整体建构、坚持守正创新、确保科学规范为基本特征，全面推进党的建设高质量发展，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

（一）始终突出改革主线，坚持在改革中完善党的建设制度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伴随全面深化改革的步伐不断推进，以改革为主线，确保取得实效。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全面深化改革，打响改革攻坚战，加强改革顶层设计。"[13]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以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为根本遵循，贯穿于党的建设全过程和各环节。一方面，改革内容不断丰富和深化。改革内容从单一领域党内制度改革延伸至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和监督建设等多维度制度体系，实现从聚焦党的组织制度到覆盖党的建设全流程的制度创新，改革成果显著：一是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确立，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二是干部人事制

度更加健全，制度笼子的约束力和保障作用显著增强。另一方面，改革方式更加多元化和科学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实现了从中央到基层的全主体覆盖，从原则性要求到具体化制度设计的全要素覆盖，从战略规划到方案制定的全链条覆盖，从单一条例逐步完善到党内法规体系构建的全领域覆盖。改革方式的多元化体现了制度建设的规范性与严密性，更体现了党对执政规律的深刻把握，彰显了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提升治理能力的政治智慧与战略定力。

（二）始终落实从严要求，以严的标准、严的措施确保党的建设取得成效

新时代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以严的标准贯穿始终，覆盖党的建设全过程和各领域。一方面，党的建设制度改革集中体现了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严的标准贯穿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的各领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建设推进到哪里，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就要构建到哪里，无论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还是制度建设、反腐败斗争，都要自觉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14]具体来说，在思想建设上，全党持续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武装，强化党员理想信念，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组织作风上，持续深化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严厉整治“四风”问题，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在纪律制度建设上，系统完善党内法律法规体系和责任追究制度，对于腐败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以永远在路上的决心和恒心，坚定不移推进标本兼治”[15]474，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总之，严的标准贯穿各级党员干部，从领导干部到基层党员，从中央机关到基层组织，均纳入制度管理范围，实现监督无死角、无盲区。另一方面，从严监督贯穿权力运行全链条。具体来说，在事前环节，通过明晰权力行使范围和流程，从源头上防止权力滥用；在事中环节，对权力运行进行实时监督和动态监管，确保权力运行规范化和透明化；在事后环节，完善中央与地方巡视巡察联动机制，严肃查处权力运行中的腐败问题和失职行为，构建权力运行的责任追究体系。总体而言，严的标准贯穿党的建设各领域和权力运行全过程，是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的主基调。

（三）始终注重整体建构，坚持顶层设计和系统推进

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具有鲜明的整体性建构特征。“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要求，也是推进改革的重要方法。”[16]109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党的建设制度改革进行了全面设计和整体推进。首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充分体现了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的全局性谋划。党中央从战略高度出发，加强顶层设计，对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作出系统性战略部署，明确改革时间表和路线图，构建涵盖各领域的制度框架，确保改革方向清晰、重点突出。其次，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注重系统推进与同向发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等各领域协同推进，形成目标一致、逻辑严密的闭环管理体系，通过制度体系化建设实现各领域改革的有机衔接。此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领域改革协同推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强大制度支撑。最后，通过建立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组织体系，形成中央与地方、部门间高效协同的运行机制。巡视巡察上下联动格局的深化，不仅强化了权力运行的全链条监督，还有效打通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确保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在不同层级、各领域的整体性推进，彰显了制度设计的科学性与实践效能。

（四）始终坚持守正创新，把牢改革的方向和节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守正创新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牢牢把握、始终坚守的重大原则。守正和创新是辩证统一的，只有守正才能保证创新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只有持续创新才能更好地守正。”[17]党的建设

制度改革始终坚持守正创新这一重大原则，精准把握改革的方向和节奏。守正，即坚守根本方向、政治原则与制度根基。新时代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定维护党的全面领导、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及人民民主专政，确保改革不偏航、不逾矩。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等基本原则在新时代持续焕发活力。创新，即与时俱进地回应时代需要。在理论上，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围绕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提出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在制度上，系统完善党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干部人事制度、人才发展体制机制和监督制度，不仅补齐了制度短板，也拓展了党的建设发展新空间。此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还特别注重技术赋能，推动党建与现代信息技术深度融合，积极探索智慧党建模式，构建党建大数据平台，利用最新技术成果提升党建管理精细化水平。

（五）始终确保科学规范，遵循党的建设客观规律

科学规范是使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的关键。一方面，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注重理论指导与实践探索相结合。在改革方案制定过程中，党坚持“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相结合，达到了回答应然性问题与回答实然性问题的双效结合”[18]，深入调查研究，科学全面分析党的建设面临的难点，精准把握制度改革的目标和方向，确保改革既有明确的目标，又具有可行性，使党的建设制度成果具有强大生命力。另一方面，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以规范程序为保障，以强大执行力为支撑。每一项制度改革均按照严格的程序推进，确保改革决策制定科学合理、执行严谨高效。在制度出台与实施过程中，具体执行标准和操作细则得以明确，确保中央与地方各级党组织上下联动。同时，结合新时代党的建设实际，强化执行责任机制，明确改革任务的权责分工，将具体任务落实到岗、责任到人。科学的理论指导与规范的程序步骤相结合，推动改革稳步推进，制度体系建设更加科学系统。

三、新时代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的主要经验

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也是推进党和国家事业蓬勃发展的重要保障。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实践，党不断巩固和加强自身建设，全面提升党的领导水平和长期执政能力，形成了宝贵经验，这些经验不仅彰显了党的治理智慧，也体现了党对新时代执政规律和时代使命的深刻把握，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一）必须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是大脑和中枢，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重大工作实行集中统一领导，必须有定于一尊的权威。”[5]22在推进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中，必须牢牢把握、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这一重大原则。首先，要坚持并完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机制，系统部署改革的目标、方向和路径，确保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的目标更加聚焦、路径选择更加精准，不断完善顶层设计。其次，要建立健全党中央重大决策落实机制，确保改革方案高效推进。只有通过构建上下联动、执行高效的工作体系，将顶层设计转化为具体任务，才能推动改革方案有效落实。正是基于这一考虑，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完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提出了新的要求。最后，要不断完善监督机制，保障改革成果落地。党中央对改革过程实现全过程监督管理，这是确保改革执行不偏离、不走样的关键。只有把各项改革置于党中央的严格监督下，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才能不断取得新的成就。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党的领导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4]，在未来改革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通

过科学部署、落实和监督，推动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不断取得新的更大突破。

（二）必须以提升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为目标

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直接决定国家治理效能，因此，必须深入推进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为提升党的执政能力筑牢坚实基础。一是在党的领导制度方面，要通过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切实增强党统筹全局和协调各方的能力，确保党的领导在各领域有效落实。二是在党的组织制度方面，持续推动组织生活制度化、规范化，增强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认真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必须不断强化各级各类党组织的政治属性和政治功能，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强化政治引领”[19]。同时，创新基层治理模式，健全基层组织制度，使党在基层治理中的政治功能和服务功能持续优化。三是在干部人才发展方面，进一步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和人才培养考核机制，着力建设新时代高素质干部队伍，为提升党的长期执政能力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四是在监督机制方面，要健全监督体系，防止权力滥用，整治腐败问题，从而有效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公信力。总体而言，“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就要注重创新和改进领导方式、执政方式，不断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提高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推动高质量发展本领、服务群众本领、防范化解风险本领”[20]，进一步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基础，提升党应对复杂局势的能力。

（三）必须把人民群众的满意度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人民权益是否真正得到了保障。”[21]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的深入推进，党加强了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各领域的全面领导，推动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继续向更高质量迈进。具体来看，在政治领域，健全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制度体系，持续强化“两个维护”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保证全党团结统一并增强党的生机活力；在经济社会发展领域，完善党领导经济建设的制度改革，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在民生领域，进一步聚焦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强化民生领域改革措施的精准性和有效性；在文化发展领域，完善保障人民文化权益和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政策体系，不断满足人民多元化的精神文化需要，增强文化自信；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在改革过程中，必须以人民福祉和国家长治久安为目标，使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始终根植于人民群众的沃土之中，最终实现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目标。

（四）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

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既提升了党的执政能力，也为全面依法治国提供了坚实保障。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应从三方面着力。一是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强化权威性和执行力。各级党组织要依据《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的党内法规体系，确保依规治党有章可循。二是健全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的制度和工作机制，推动法治中国建设。“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22]157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突出党在全面依法治国中的领导地位，健全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的制度和工作机制，将党的领导贯穿全面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三是推动党内监督和其他各类监督贯通协调，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

约和监督，提升监督效能。党通过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形成了纪律监督、监察监督、巡视监督、派驻监督‘四个全覆盖’的权力监督格局”[23]。推进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必须坚持法治化发展道路，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必须进一步推进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衔接互补、同向发力，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党自身建设规范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不断完善。

（五）必须以调动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着力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通过科学完善的制度设计和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实践，充分激发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热情，持续增强开拓创新活力，为新时代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注入动力。“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充分调动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需要从我们党在新形势下所面临的重大挑战和需要完成的重大使命出发，以总体性思维理解和把握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的要求。”[24]一是要深刻认识到积极性是党员干部履职尽责的基础动力。一方面，必须健全以实绩为导向的干部选拔机制，注重政治素质考察，强化正向激励；另一方面，完善多维度激励制度，如绩效考核奖励，引导党员在工作中对标更高的标准履职尽责。与此同时，还要加强教育培训，增强党员的身份认同感和历史使命感，激发担当作为的内生动力。二是要深刻认识到主动性是党员干部履职尽责的重要支撑。一方面，必须进一步健全党内民主制度，通过党的代表大会制度、民主生活会和党内选举制度等，拓宽党员参与事务的渠道，让党员干部有更多机会建言献策，增强其主人翁意识；另一方面，进一步明晰权责体系，明确的职责分工会使党员能够精准定位、主动担责。三是要深刻认识到创造性是党员干部履职尽责的核心动力。各级党组织要构建多层次的制度创新机制，进一步增强党组织的生机与活力；通过持续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引导党员干部将科学理论转化为实践动能。实践证明，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必须通过调动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将全党力量凝聚起来，激发全体党员干部的主人翁意识，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四、结语

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要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引领，紧紧围绕党的建设面临的新任务、新挑战，持续探索符合时代要求的新举措。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在充分汲取和借鉴以往改革成效的基础上发出了深化改革新号角，为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指明了前进方向。同时，全会聚焦“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长期执政能力，创新和改进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4]这一目标，进一步明确了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的核心任务和重点领域，特别是对进一步强化理论武装、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完善党员教育管理机制、实施更加积极开放人才政策等方面提出了新要求。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落实全会部署的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任务的关键时期，我们要把党的十八大以来推进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积累的宝贵经验充分运用到之后的改革之中，坚持守正创新，确保各项改革措施落地生效，推动党的建设制度改革迈上新台阶，不断推进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以中国共产党之治引领保障中国之治。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3-11-16.

[2] 盛若蔚.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N].人民日报,2014-09-02.

[3]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4]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N].人民日报,2024-07-22.

[5]《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

的决定》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6] 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7] 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8] 仲祖文.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论贯彻落实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精神[J].党建研究,2023(7):10-11.
[9]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的重要指示和蔡奇、李干杰同志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J].党建研究,2023(8):4-25.
[10]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
[11]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12]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13]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22-10-26.
[14] 习近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 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向纵深发展[J].奋斗,2023(12):6-9.
[15] 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1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17] 习近平.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的几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J].奋斗,2025(2):4-9.
[18] 洪向华,张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探究[J].理论学刊,2024(5):21-28.
[19] 刘志明.科学把握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的重大意义和实践要求[J].红旗文稿,2024(17):14-17.
[20] 李干杰.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N].人民日报,2024-08-12.
[21]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3-12-27.
[22]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23] 朱旭东.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执政党自我监督之路[N].中国纪检监察报,2021-06-10.
[24] 王大广.牢牢把握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的着力点[N].光明日报,2024-09-18.

Major Achievements, Basic Characteristics, and Key Experiences of Deepening the Institutional Reform of Party Building in the New Era

WANG Daguang, WU Huaying

(*School of Marxism,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historic transformations and significant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in the institutional reform of Party building, particularly in areas such as the Party's leadership system,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cadre and personnel systems, talent development systems, and supervision frameworks. The institutional reform of Party building has demonstrated distinctive features, including a clear focus on reform priorities, strict implementation of disciplinary requirements, emphasis on holistic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adherence to principles while pursuing innovation, and commitment to scientific standardization. In the new era and on the new journey, the Party has accumulated valuable experience through reform practices, including upholding the centralized and unified leadership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prioritizing the enhancement of the Party's long-term governance capacity; taking public satisfaction as the fundamental criterion; ensuring the unity of law-based governance and rule-based Party governance; and mobilizing the enthusiasm, initiative, and creativity of the entire Party. These provide critical guidance for further advancing the institutional reform of Party building and serve as fundamental principles for strengthening the Party's capacity for self-purification, self-improvement, self-renewal, and self-enhancement.

Key words: party building; institutional reform; self-revolution; deepening reform; Chinese modernization

(责任编辑:米雪)

历史·实践·价值：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人学意蕴

彭冰冰　黄文心
（嘉兴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嘉兴　314001）

[摘　要]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蕴含着丰富的人学意蕴。从历史观视角看，改革的根本动因根植于满足人的多元需求，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的物质、社会及精神需要不断得到满足，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仍需以此为基础，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发展需求。从实践观来看，人民群众是改革实践的主体，党始终坚守人民群众主体地位，激发其创造力与能动性，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还须坚持此原则，确保人民群众在改革实践中发挥主体作用。从价值观出发，人的全面发展是改革的终极价值，改革开放为其奠定坚实基础并提供广阔空间，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应以中国式现代化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关键词]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人学理论；中国式现代化；人的全面发展
[中图分类号] D61；A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267（2025）01－0010－11
DOI：10.14129/j.cnki.forwordposition.2025.01.002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总结和运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宝贵经验。”[1]6其中，“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进一步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牢牢把握的原则，这一原则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精髓与要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以满足人民群众的现实需要作为改革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始终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始终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改革的根本价值取向，这既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具体实践，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生动体现。从改革开放的初步探索，到全面深化改革的深入推进，再到当前提出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始终如一地贯穿于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中，为改革的不断深化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观蕴含的人学意蕴

改革就是通过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来推动社会发展，从而更好满足人民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的物质性需要、社会性需要、精神性需要不断得到满足。进一

[基金项目]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常规课题“中国共产党历史主动精神的生成机理与实践指向研究”（24NDJCO3YB）。
[作者简介] 彭冰冰，博士，嘉兴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嘉兴大学基地研究员，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黄文心，嘉兴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步全面深化改革，仍然要围绕满足人民群众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来推进，要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加有价值、有尊严、有意义。

（一）满足人的需要是社会改革与发展的根本动因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改革是更好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必然要求。”[2]3马克思深刻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3]32-33这一论断不仅揭示了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内在逻辑和规律，而且为社会改革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提供了深层的理论支撑。从历史观的角度来看，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而生产关系作为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形式，必须适时调整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同时，经济基础的变化也必然要求上层建筑作出相应的变革，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社会主要矛盾，作为社会基本矛盾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具体表现，是推动社会改革和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改革的直接目标，在于有效解决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涌现的主要矛盾，从而释放被束缚的社会生产力，激发社会的活力和创造力。从马克思主义人学角度看，社会主要矛盾实质上反映了社会发展水平与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之间的矛盾。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就是人民为了满足自身多样化需要而不断奋斗和实践的历史过程。在此进程中，人作为生产力构成中最活跃的因素，同时也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人的需要的产生与演变决定了社会主要矛盾的形成与变迁，也即人的需要具有社会历史性。马克思指出：“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4]592这表明，人的需要是一个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历史范畴，它随着历史时期的更迭而展现出差异性。这是因为人的需要是在后天的劳动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劳动实践的社会历史性决定了人的需要的社会历史性。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升，人的需要表现出上升的规律，从而引发社会主要矛盾的变更，进而催生新一轮的社会变革。因此，从历史观的角度来看，改革不仅是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社会历史进步和发展的必然途径。

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精准把握，也体现了其对人的需要变化规律的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一个历史性的动态过程，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升而不断演变，反映了我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阶段性特征与人民群众需求层次的多元化变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还未得到满足。新中国成立之初，社会主要矛盾是中国人民与“三座大山”残余势力之间的矛盾。随着革命遗留任务及土地改革在全国的完成，国内主要矛盾便转变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一化三改”应运而生。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党的八大依据“生产”与“满足人民需要”这一逻辑理路正确指明了“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5]293。经过五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后，我国建立起独立且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得到改善。

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社会主要矛盾表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6]54，后续得到历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确认和发展完

善。正是因为对社会主要矛盾的精准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得以快速发展，人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显著改善，物质和文化需要得到基本满足。然而，人作为全面发展的个体，其需要不仅限于物质和文化层面，还包括自身发展、生态环境、公平正义等多维度的追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中国共产党适时提出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7]11作为新的社会主要矛盾，这一论断不仅准确把握了新时代人民需求的多元化与高层次特征，也深刻揭示了我国社会发展面临的新挑战与新机遇，体现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与历史趋势的深刻理解与科学把握。

（二）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的物质、社会及精神需要不断得到满足

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需要不断得到满足与实现。改革的进程深刻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了改革对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的重要作用。

人民群众的物质性需要得到满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升。一方面，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我国经济总量于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不变价格计算，1979年至2023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8.9%，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3.0%的增速水平。[8]另一方面，到2020年底现行标准下9 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171元增加到2023年的3.92万元，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加。[9]

人民群众的社会性需要得到满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举世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社会安全方面，我国持续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违法犯罪案件逐年下降，持续围绕网络安全、食品安全、环境安全等领域开展专项打击整治行动，平安中国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国家统计局调查显示，全国群众安全感逐年上升，2023年全国群众安全指数达98.2%，连续4年保持98%以上的高水平。[10]社会保障方面，我国多层次社会保障制度和多元化救助体系逐步建立并不断完善，已形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网。截至2024年9月，全国基本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4亿人、2.45亿人、3.01亿人，社会保障实现应保尽保。[11]

人民群众的精神性需要得到满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建设呈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局面，人民文化生活日益丰富。文化事业建设方面，财政投入持续增加，公共文化服务效能不断提升。1978年我国文化事业费仅为4.4亿元，2023年全国文化和旅游事业费增长至1 280.4亿元；1978年全国群众文化机构仅有6 893个，2023年末增长至43 752个。文化产业方面，居民用于文化娱乐的人均消费支出由2013年的577元增加到2023年的823元，居民文化消费总体水平持续提升；2004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为3 440亿元，2022年增加到53 782亿元，增长14.6倍，年均增长16.5%。我国文化产业整体规模稳步扩大，居民文化消费潜力持续释放，文化市场建设有序推进。[12]

（三）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立足于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更好满足人民共同富裕的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共产党始终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需要作为生产目的，把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要求。一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以激发市场和社会活力，让人民群众有切实收益；二是健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人民群众提供更高质量、更精细化的民生服务；三是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始终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进行顶层设计，完善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和政策统筹协调机制，健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制度体系；四是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健全推进新型城镇化体

制机制，完善乡村振兴投入与管理机制，不断弥补制约我国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最大短板[13]；五是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深化外贸体制、外商投资体制和对外投资体制改革，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持续增强外贸外资扩就业、惠民生的带动效应，着力推动打造高质量消费供给体系[14]，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更好满足人民当家作主的美好生活需要。一是健全民主制度，坚持用人民民主制度体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保证人民有序参与政治生活，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二是丰富民主形式，形成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的统一、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的统一、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的统一、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的统一等多元民主的复合形态[15]；三是拓宽民主渠道，坚持深入推进基层立法联系点建设，积极探索形式多样的数字化民主平台，不断提升民主参与的广度、深度及有效性；四是拓展民主主体，“统筹推进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以及社会组织协商”[16]177，广泛吸纳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及各方面的意见建议，切实保证人民利益。

更好满足人民精神充实的美好生活需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社会与动物界的最大区别就是人是有精神需求的，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时时刻刻都存在。”[17]14为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我们一方面要深化文化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准确剖析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现状，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鼓励新形式、新特点、新形态、新类型的优秀文艺作品不断涌现，以高质量文化供给充实人民精神生活；另一方面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针对现实问题及时调整抑制文化创造活力的体制机制，建立健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发展体制机制，坚持破立并举，不断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

更好满足人民共建共享的美好生活需要。一方面，我们要坚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统筹推进经济安全、政治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生态安全等各领域国家安全工作，注重数字技术在社会治理中的应用，健全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形成居民自治、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相得益彰的高水平平安中国治理体系。另一方面，我们还要直面民生改革领域中的“硬骨头”，紧紧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具体来说，要加大收入分配改革力度，不断缩小收入差距；强化就业优先战略，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构建多层次保障网络；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提升健康保障水平；健全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

更好满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生活需要。一是坚持生态优先发展理念，始终将生态保护放在首位，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绿色生活方式，提高公众的生态文明意识；二是完善生态文明基础体制，不断加强包括生态资源产权制度、生态环境监测和评价制度、生态保护责任制度、生态安全工作协调机制以及生态环境法律法规在内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保障；三是健全生态环境防治体系，包括责任体系、监管体系、信用体系、市场体系及法律法规政策体系等，推动形成多主体、多部门、多地区的协同机制，一体化推进源头预防、过程管控、损害赔偿、责任追究，构建全方位全过程防治体系；四是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实施鼓励绿色低碳发展的政策措施，大力发展绿色生产力，加强绿色技术研发和产业应用，以创新为驱动推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升级。

二、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观体现的人学意蕴

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是凝聚改革强大动力的关键所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群众在改革事业中的利

益主体地位、实践主体地位和认识主体地位。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继续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让人民群众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领域都成为改革的主体和推动者。

（一）人民群众作为改革实践主体的理论基础

从“历史主体”理解人民群众是改革的主体。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唯心主义与旧唯物主义的基础上，立足现实的、有生命的、社会化的人，从“人的感性活动”出发深刻揭示了社会历史的主体及发展规律。马克思认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8]501。人，作为在一定社会生活中从事实践活动的主体，构成了社会历史分析的基石。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3]169，通过有意识、有目的的物质生产活动使得“纯粹自然”不断转化为“人化自然”，从而不断满足自身对物质资料的追求。因此，物质生产活动构成了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但社会发展不是自发实现的，而是通过人的实践活动来实现的。人的实践内在包含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我的关系，这些关系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动力源泉。社会发展正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中不断推进的。在这一动态过程中，人作为生产力诸要素中最为活跃且具有决定性力量的存在，自然而然地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主体力量与核心承担者。

从“社会合力”理解人民群众是改革的主体。恩格斯用“平行四边形”法则精妙地展示了个体意志与群体合力的统一，他指出，历史的发展并非由单一意志所决定，而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19]605。这些单个意志，如同物理学中的力矢量，各自独立却又相互作用，形成了“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19]605。在这一错综复杂的力的交织中，“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19]605。这一合力，是诸多个体意志在冲突与交融中达成的某种动态平衡，是历史进程中人民群众集体意志与行动的集中体现。每一个个体的意志，无论其大小、强弱，都对这一合力有所贡献，因而都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19]606。这深刻揭示了历史发展并非由个别英雄或精英所主导，而是由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意志与行动所推动。这种“群体合力”，作为无数个体意志相互冲突、交融之后产生的总体效应，正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源泉。因此，作为社会历史发展前进动力的改革，并不是少数精英的独角戏，而是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参与的伟大实践。

从“群众路线”理解人民群众是改革的主体。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特征。人民群众作为实践的主体，使马克思主义从本体论前提的意义上就蕴含着群众路线的诉求。“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一群众路线的理论构建，不仅牢牢扎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人民立场，而且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逻辑必然与理论延伸。群众路线，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基本工作方法和领导原则，不仅确立了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更为改革的推进提供了根本遵循。在改革的决策过程中，我们必须从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汲取智慧和力量，确保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和可行性；同时，还要激发人民群众的创造力，让人民群众在改革实践中发挥主体作用。

（二）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得到切实保障

始终坚持人民群众在改革中的利益主体地位，明确“为了谁”。人民群众是利益主体，是利益的追求者、创造者、享有者。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制定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作为改革成效的评价标准。邓小平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把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衡量发展的三个重要标准之一；江泽民提出了“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指明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胡锦涛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就是要“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20]84；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提出了将“是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是否给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21]作为改革成效的评价标准。这些一以贯之的主张无不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始终将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始终将党的主张与人民意志相统一、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认识自觉和责任担当。

始终坚持人民群众在改革中的实践主体地位，明确“依靠谁”。人民群众的劳动创造是推进改革事业发展的伟大力量。只有人民群众理解、支持、贯彻党的主张，将党的主张变为自身的自觉行动，将改革事业变为亿万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改革开放才能取得成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各领域、各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都是由人民群众的辛勤劳动和拼搏精神所创造的。从私人雇工的合法化到私营企业的快速发展，从农村社队企业的“副业”角色到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从非公经济的补充地位到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每一项重大改革举措都深深植根于人民群众的实践之中，都是人民群众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创造的结果，无不凝结着人民群众的智慧。

始终坚持人民群众在改革中的认识主体地位，明确“相信谁”。人既是实践的主体，也是认识的主体。人的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共同构成统一的人类活动。从“莱西经验”的一村之计、“枫桥经验”的一镇之计、“浦江经验”的一县之计、“三明医改”的一市之计、“千万工程”的一省之计到向全国推行的“一国之计”，都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从实际出发，深入调查研究，总结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并将之提升为理论从而进一步指导实践的生动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22]37-38四十多年来，改革始终坚持扎根基层、深入群众，科学总结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充分汲取人民群众的实践智慧。

（三）确保人民群众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各领域发挥主体作用

发挥人民群众在经济领域的主体作用。一是以人民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追求作为坚持和完善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在动力，及时将人民的利益诉求反映到经济领域的理论创新和政策制定中。二是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完善分配制度，促使劳动者摆脱资本对劳动的控制，以个性独立、自主自为的主体身份积极地参与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使人的发展与经济发展双向统一。三是要完善就业制度和就业优先政策，健全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机制，依靠人民群众大力发展生产力，不断创造物质财富。四是要保障人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构建互帮互助和利益共享的劳动关系，以保障人民权益，充分激发每个人的主体性自觉。

发挥人民群众在政治领域的主体作用。一是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完善人大对政府机关的监督制度、加强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自身建设、丰富人大代表联系人民群众的内容和形式，保证人民依法行使政治权利，为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法治保障。二是健全协商民主机制，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充分表达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三是健全基层民主制度，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完善基层民主制度体系和工作体系，拓宽基层各类组织和群众有序参与基层治理渠道，确保人民当家作主落到实处。一系列举措的实施让人民真正成为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各环节的主人。

发挥人民群众在文化领域的主体作用。一方面，要发挥人民群众在文化工作中的主体作用，充分发扬“文化民主”[23]，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改进文艺创作生产

服务、引导、组织工作机制，充分挖掘人民的创作才能，发挥人民群众在继承、创新与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文化建设活动中的主体作用，让人民群众成为书写社会主义文化新篇章的核心角色。另一方面，要实现文化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协调文化产品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保障人民公共文化基本权益，为人民提供丰富优质的精神食粮；加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推动乡村文化振兴，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发挥人民群众在社会领域的主体作用。社会治理的核心原则是保障人民的主体地位，实现这一原则必须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一方面，人民群众既是社会治理的客体也是社会治理的主体，要倡导以“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价值理念为指导的协同治理理念，培育自觉自治的组织机构，发挥人民主体的自主性、自觉性、创造性，让人民群众真正成为社会治理的参与者和监督者。另一方面，社会治理的根本目标是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实现共享主体的广泛性、共享过程的公平性以及共享成果的全面性，让人民群众成为社会治理的受益者。

发挥人民群众在生态领域的主体作用。一方面，人民群众的一切实践活动必须尊重自然法则。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每个人都是生态环境的保护者和建设者。我们要通过宣传教育在全社会形成珍惜生态、保护资源、爱护环境的良好风尚，积极推动绿色生产方式和绿色生活方式，不仅从思想上促使人民群众重视生态建设，更应从实际行动上鼓励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做到“知行合一”，共创美好家园。另一方面，生态环境建设要服务人民群众。每个人都是保护生态环境的受益者。我们要将良好生态环境视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牢固树立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导向，促使人民群众在优美的生态环境中提升生命境界。

三、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价值观彰显的人学意蕴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改革的价值根基。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社会关系及综合素质得到了全面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推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而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现代化。

（一）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终极价值目标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追求的最高价值命题。这一理念贯穿了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各个阶段，并构成了其哲学理论和革命实践的核心。通过对经济生活的深入剖析，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异化现象，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共产主义是对这种异化的积极扬弃，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马克思通过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入考察，不断深化和完善了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马克思指出，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不仅决定了社会的经济形态，更决定了人的存在方式和发展状况。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人的发展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人的依赖关系”，即个人依附于集体或家族；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发展则转变为“物的依赖关系”，即个人通过追求物质财富来实现自我价值；而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人的发展将达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境界，即个人能够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实现自我价值的最大化。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忠实践行者，始终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标。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将人的全面发展视为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是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区别。在社会主义的理论框架与实践体系中，人被视为社会发展的核心目的，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先进的社会制度，其存在意义在于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提供路径与保障。

相较之下，资本主义社会则将物质财富的积累作为发展的最终目标，人被工具化，降格为实现经济增长的手段。社会主义社会超越了资本逻辑，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及自由平等的新型社会关系，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物质前提和时间空间，使每个人均能成为社会实践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与创造者，个体的潜能与价值得以充分释放与实现。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中国共产党的不懈追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强调将个人的解放、阶级的解放和民族的独立统一起来，通过革命斗争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从而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条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完成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废除私有制、实现生产资料集体占有，为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制度基础和物质保障；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强调要解决人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就必须注重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新的革命”中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强调将国家、社会、个人的发展统一起来，把“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24]

（二）改革开放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与有利条件

改革开放促进人的实践活动的全面发展。一方面，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尤其是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与运用，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更多的自由时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农业领域不断通过发展生物育种技术和农业机械化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和品质，在信息通信领域实现了从2G技术跟随到6G技术引领的跨越，在制造业领域实现了传统手工操作到自动化操作的蜕变，各行各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使人们有更多的时间参与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等活动，充分发展自身的个性。另一方面，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促使人的活动的丰富性和可变动性不断增强。新科技催生新职业，互联网、智能制造、物联网等新的职业群体不断形成，非全日制、临时性、弹性工作制等多种灵活就业形势蓬勃发展。人们不再仅仅只能从事贫乏、狭隘、固定的职业，每个人都能自由地选择生产活动领域。在此过程中，人的个体能力和集体能力、体力和智力、自然力和社会力、潜力和现实能力等得到充分发挥和全面发展。

改革开放促进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丰富。一方面是人的现实社会关系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垂直流动程度不断加强，我国代际总流动率从20世纪70年代的0.38提升至当前的0.71，自致性因素成为影响社会阶层流动的首要因素[25]；社会水平流动也在不断加强，1982年我国流动人口仅600多万人，人口流动参与度仅0.7%，而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20年我国流动人口规模已近3.8亿人[26]。与此同时，我国对外开放水平持续提高，世界性交往不断加深。另一方面是人的虚拟社会关系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移动通信技术、虚拟现实（VR）技术、人工智能（AI）技术、3D建模与渲染技术、增强现实（AR）技术、云计算与大数据技术等数字网络技术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催生出丰富的数字化应用场景，消除了现实世界的人际障碍和时空障碍，人的社会交往范围成倍扩大。

改革开放促进人的综合素质的全面提高。一是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从《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到《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再到《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不同时期针对不同现实情况所出台的文件推动我国公民思想道德素质不断提升。二是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2023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1.05年，比1982年增加3年；我国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4年，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达到2.5亿人。[27]我国教育事业取得辉煌成就，科学文化素质显著提升。三是身体素质的提高。2023年，公共体育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向公众

开放2 491个，覆盖全国近1 400个县级行政区域，受益人次超4亿。全国体育社会组织近6.59万个，全国社会体育指导员累计超320万人。[28]群众体育不断发展，为人口体质素质的提高提供了更完备的条件与基础。

（三）以中国式现代化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以经济现代化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经济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抓手，为人的全面发展奠定了丰厚的物质基础，为“人的自由联合”的形成提供条件。马克思认为“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29]200，这深刻启示我们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坚持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为首要任务，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同时，要加快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规避资本逻辑带来的种种弊端，推动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对西方式经济现代化的全方位超越。

以政治现代化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政治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保障，一是通过实现制度现代化、法治现代化、政党现代化等政治领域的现代化构建人的全面发展的现代秩序，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安定、团结、有序的政治环境。二是通过培育参与型政治文化，加强民主法治建设，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形成扩大有序的政治参与，促进国家社会化与社会国家化，进而唤醒人的主体意识。三是通过培养参政意识，提升参政能力，提高政治素养，实现人的自主权利，使人真正成为“政治人”和“公共人”。

以文化现代化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一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人、中国共产党精神激励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培育人。二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优秀的传统文化涵养品格、启迪智慧、规范行为。三是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化改革，不断提高科学文化素养。四是辩证把握中华文化与世界文明的关系，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提升人民群众的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

以社会现代化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一是要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突出公众参与和居民自治的重要作用，为培育人的主体性和提升创造性能力构筑实践基地[30]，也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安全可靠的社会环境。二是要推动包括社会基础结构、社会空间结构、社会经济活动结构、社会权力—利益关系结构、社会规范结构在内的社会结构现代化以及包括社会利益分配机制、社会控制机制、社会沟通机制、社会流动机制和社会保障机制在内的社会机制现代化。[31]社会结构和机制现代化能够有效推动社会关系的和谐发展，为每个个体提供充分发展的空间，保障人的全面发展的机会平等、过程平等、结果平等，实现人民群众认可的公平正义。

以生态现代化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生态自然的现代化，并非仅指对自在自然状态的现代化改造，而是指在人类活动的影响下，自然与人之间形成的互动关系的现代化，即人化自然的现代化。生态环境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其质量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与健康福祉。因此，充分保障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权益，不仅是对人民基本权利的尊重，也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必然要求。在推进生态文明现代化的过程中，人对自然及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逐步加深，人改造自然的能力和实践品性不断提高。

四、结语

综上所述，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观、实践观与价值观蕴含着丰富的人学意蕴。从历史观视角审视，改革的动因深深根植于满足人民多元需求的内在逻辑之中，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在实践观维度下，人民群众作为改革的主体力量，其创造力与能动性是推动改革不断前进的不竭动力。在价值观导向下，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改革的终极价值目标，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不仅要关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改革成效，更要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关注人的自由、尊严、价值和幸福。在制定改革政策、设计改革路径、评估改革效果时，都要充分考虑人的因素，尊重人的发展规律，确保改革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要进一步加强对改革实践中人的因素的研究，积极探索更加符合人的发展规律的改革路径和措施，努力构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制度体系和社会环境。

［参考文献］

[1]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

[2]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M].北京: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6]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7]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8] 七十五载长歌奋进 赓续前行再奏华章:新中国75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一[EB/OL].(2024-09-09)[2025-01-15].https://www.stats.gov.cn/sj/sjjd/202409/t20240909_1956313.html.

[9] 陈炜伟,申铖,邹多为.总量连上台阶结构优化升级[N].新华每日电讯,2024-09-09.

[10] 张天培.人民群众安全感不断提升[N].人民日报,2024-08-28.

[11] 敖蓉.从49.7元到39218元[N].经济日报,2024-09-27.

[12] 人民文化生活日益丰富 文化强国建设加力提速:新中国75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二十一[EB/OL].(2024-09-24)[2024-11-12].https://www.stats.gov.cn/sj/sjjd/202409/t20240923_1956632.html.

[13] 彭五堂.城乡协调发展:新时代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优先选项[J].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2(10):50-59+118.

[14] 王德蓉.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空间的实现路径[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3(6):1-9.

[15] 张明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主观论析[J].思想理论教育,2024(7):37-44.

[16] 习近平.论坚持人民当家作主[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17]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1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0]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21]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一次会议强调:深入扎实抓好改革落实工作盯着抓反复抓直到抓出成效[N].人民日报,2016-02-24.

[22] 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23] 龚雄亭,龚平.文化建设视域下的人民主体地位探析[J].云南社会科学,2020(5):56-62.

[24] 熊晓琳,马超林.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在当代中国的发展与实践[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7(10):4-9.

[25] 李友梅.当代中国繁荣发展的重要密码[N].人民日报,2019-07-26.

[26] “乡土中国”是如何变成“流动中国”的?[EB/OL].(2023-04-17)[2024-10-31].http://www.news.cn/local/2023-04/17/c_1129529616.htm.

[27] 教育改革发展扎实推进 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中国75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二十[EB/OL].(2024-09-24)[2024-10-29].https://www.stats.gov.cn/sj/sjjd/202409/t20240923_1956631.html.

[28] 全民健身谱写“体育强则中国强”新篇章[N].中国体育报,2024-09-23.

[2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0] 王婷,李少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人的全面发展[J].理论视野,2022(6):50-56.

[31] 唐亚林,周昊.走自己的路: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演进、路径选择与价值追求[J].理论探讨,2022(5):29-38.

History, Practice, and Value: The Humanistic Implications of Further Deepening Reform Comprehensively

PENG Bingbing, HUANG Wenxin

(*School of Marxism*, *Jiaxing University*, *Jiaxing* 314001, *China*)

Abstract: Further deepening reform comprehensively embodies profound humanistic implic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vision of history, the fundamental motivation for reform lies in meeting the diverse needs of people. Since the initiation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the material, social, and spiritual needs of the people have been continuously fulfilled. Further deepening reform comprehensively must still be grounded in this foundation to satisfy people's evolving developmental demands. From a practical standpoint, the people serve as the subject of reform practices. The Party has consistently upheld the people's principal status, stimulating their creativity and initiative. Further deepening reform comprehensively must adhere to this principle, ensuring the people's central role in reform practices. From a value-oriented perspective,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constitutes the ultimate value of reform. Reform and opening-up have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and created expansive opportunities for this. Further deepening reform comprehensively should advance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through Chinese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further deepening reform comprehensively; human theories; Chinese modernization;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责任编辑：李楠）

思政课建设与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同步推进策略

杨玢
（青海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青海 西宁 810016）

[摘 要] 新时代新征程，思政课被赋予新的历史使命。坚持思政课建设与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同步推进，不仅是对党领导思政课建设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推动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的基本遵循。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始终坚持把学校思政课建设放在教育工作的重要位置，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提出思政课建设必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深化对党的创新理论的规律性认识。据此，应通过明确教学内容时代指向、创新多元化教学方式、建设高标准课程教材体系、深化学理化理论研究、打造高水平师资队伍、构建全方位育人格局等策略推动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及时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这是坚持思政课建设与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同步推进的应然之义。

[关键词] 高校思政课；思政课建设；党的创新理论；教育强国；立德树人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267（2025）01－0021－08
DOI：10.14129/j.cnki.forwordposition.2025.01.003

思政课是立德树人、铸魂育人的关键课程。新时代新征程，推动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充分发挥思政引领力成为教育领域的重大命题之一。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对思政课建设作出明确要求：“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思政课建设与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同步推进。”[1]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党的创新理论对统一全党思想认识、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具有重要意义。坚持思政课建设与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同步推进，不断深化青少年学生对党的创新理论的规律性认识，尤其增强其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价值认同和行动自觉，既是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的必然要求，也是对“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教育根本问题的深刻回应。

一、思政课建设与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同步推进何以必然

坚持思政课建设与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同步推进，不仅是对党领导思政课建设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新时代推动思政课建设

[基金项目] 青海省“十四五”教育科学规划项目“青海省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研究”（23QJG48）；青海大学青年基金重点项目“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现代化新青海建设的实践研究”（2023-QSY-9）。
[作者简介] 杨玢，博士，青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

内涵式发展的基本遵循。“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是党的思想建设的根本任务”[2]53，广大青少年学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生力军和接班人，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学生头脑、培养堪当强国建设重任和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是坚持教育必须要为党和人民培养人的生动应答。充分发挥思政课作为意识形态教育的主渠道作用，将党的创新理论有效融入思政课教学，深入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三进”工作，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青少年学生头脑、最大程度凝聚思想共识是推动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充分发挥思政课育人功能的关键所在。

坚持思政课建设与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同步推进，是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的应然之义。思政课是意识形态教育的核心阵地，坚持思政课建设与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同步推进应重在强化思政课的政治引领与价值导向的功能意旨。据此，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学生头脑、增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体系的价值认同是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的主旨目标，因为“办好思政课，就是要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3]。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是实施意识形态教育的根本原则，更是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的核心原则。通过思政课深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时代指向，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凝聚广大青少年学生的思想共识、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价值指向。通过青少年学生对党的创新理论的系统化学习和规律性认识、促进其形成价值性认同，进而内化为行为性自觉。坚持思政课建设与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同步推进，以党的创新理论为主线推动新时代大中小学思政课建设一体化、贯通式建设，在思政课堂上帮助学生深化对党的创新理论的规律性认识，从价值自觉上坚定“四个自信”、增强“五个认同”，通过思政课教学实现理论廓清与实践澄明的有机统一，加强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深刻理解与认同，引导学生将人生发展规划主动融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伟业的奋进征程中。这一举措既是思政课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实践要义，也是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实施教育强国战略、确保教育沿着正确方向前行的关键所在。

坚持思政课建设与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同步推进是培养时代新人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教育必须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4]195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思政课指引着培养时代新人的基本方向，唯有与时俱进地将党的创新理论有效融入思政课教学，以党的创新理论科学指导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明晰思政课教学目标导向的时代意旨，才能坚持时代新人培养的正确方向。坚持理论创新是中国共产党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和时代责任。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百年奋斗历程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懈追求理论创新、引领时代发展的辉煌篇章。在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奋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党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紧密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始终坚持“两个结合”的原则，特别是将“第二个结合”提升到新一轮思想解放的高度，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理论创新的成果，成为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的科学理论指导和根本行动指南。新时代新征程，我们

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迫切地需要用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来武装头脑、凝聚共识、团结人心，更加“需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一行动，为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任何风险挑战提供根本思想保证”[5]。鉴于此，我们必须持之以恒并不断强化思政课建设与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同步推进。确保党的创新理论不仅是学校思政课体系化教学的主线，更是引领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的根本指南，我们将培养出更多勇担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重任、堪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当前阶段，坚持思政课建设与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同步推进得到了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特别是在党的创新理论融入思政课教学创新与改革、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协同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等方面已取得显著成效。但在具体实践中，坚持思政课建设与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同步推进工作仍面临诸多痛点、难点问题亟待解决。其一，思政课政治引领功能亟待加强。政治性是思政课的根本属性，政治引领不仅是思政课的核心功能所在，也是其独特作用的体现。在坚持思政课建设与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同步推进的过程中，我们必须突出思政课教学的政治导向，持续增强思政课在政治引领方面的功能。当前，在推进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具体实践中，我们往往过于强调模式与理念的创新，而对将党的创新理论及时且有效地融入思政课教学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这种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思政课教学内容在学理性深度和系统性推进方面存在短板。因此，使得一些仅停留在表面教学改革，如翻转课堂、虚拟仿真、场景体验、实践研修等，纷纷出现在课堂上，较大程度影响了思政课在政治引领作用上的充分发挥，并弱化了思政课教学的政治导向性。其二，思政课教学改革实效亟待增强。教学改革是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的重要抓手，但实际情况是，五花八门的教学改革大多流于形式，如集体备课走走过场、实践教学“喧嚣一时”、数字赋能往往重建设轻实践等，思政课教学改革的针对性相对不足、实效性有待强化。其三，思政课评价机制亟待健全。目前，思政课建设得到了广泛重视和大力支持，但与此同时，其学科建设、理论研究、教学评估、人才考核等评价机制方面仍欠缺科学性和可行性，有待进一步健全与完善。其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水平亟待提升，各学段课程目标的有效衔接、教材内容的与时俱进以及教师对跨学段教材的熟悉程度等方面仍需加强。鉴于此，思政课建设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立足思政课所承载的“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重大使命和责任。我们要不断提升对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重要性的认识水平，增强对其实践的重视程度，同时不断提升对坚持思政课建设与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同步推进的自觉性与执行力。

二、思政课建设与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同步推进的意义指向

坚持思政课建设与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同步推进，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是落实新时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所在，其目的在于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学生“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信心，立报国强国大志向、做挺膺担当奋斗者”[6]。坚持思政课建设与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同步推进，有助于从根本上坚定“四个自信”的主体自觉。思政课建设与党的创新理论密切相关。思政课是意识形态教育的关键环节，办好思政课就必须注重引导学生厚植爱国主义情怀，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自觉融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中。[7]思政课建设与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同步推进，不仅能够有效保障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在国民教育体系的各个层面得到全面而系统的传播，还能帮助学生深刻体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及其在实践中取得的成果。这一过程将极大深化广大青少年学生对新时代党的创新

理论及其实践逻辑和历史必然性的规律性认识，从而在思想和行动上更加坚定“四个自信”的自觉性。

坚持思政课建设与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同步推进，有助于实现课程目标、课程设置、教材内容等方面的全方位衔接，从而确保思政课实施链条的完整性和统一性。首先，课程目标的贯通确保了思政课课程在不同教育阶段的设置都能围绕党的创新理论的核心内容进行精心设计，并在具体教学实践中得以有效实施。其次，课程设置的连贯性使得各学段的思政课程在逻辑上紧密衔接、结构上相互支撑，构建起一个纵向递进、横向协同的课程体系，这有助于学生逐步深化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增强理论学习的系统化、学理化。最后，教材内容的连贯性保障了思政课教学要旨的连续性和发展性，有助于增强学生对党的创新理论学习的连贯性和一致性。教材是思政课教学的基础，其内容主题的连贯性直接关系到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接受与理解，只有将党的创新理论有机融入大中小学各学段的思政课教材之中，才能确保学生在每个教育阶段都能接触到党的理论创新成果，从而能够较为系统、全面地理解和把握国家的发展脉络[8]，进一步明确理论学习的实践导向。

坚持思政课建设与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同步推进，不仅有助于进一步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与学理性，而且能够提高其针对性，使思政课教学更加贴近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从而构建起有深度、有温度、有力度的思政课教学体系。当前阶段，推动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指导，聚焦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民生福祉的持续改善、民族团结进步的生动实践等关键内容，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丰富资源，构筑坚实的精神育人根基。同时，思政课要紧密贴合人民群众生活实际，构建接地气的、深入基层的、通俗易懂的思政课话语叙事体系。要重点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故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故事等；要大力弘扬好中华文化、传播好中华文明，不仅要把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讲深讲透讲活，而且要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讲生动、讲明白、讲通俗；要不断提升思政课的思想引领力和理论深度，同时也要着重提升其吸引力和感染力，致力于提高思政课教学的亲和力及其具体内容的现实针对性，从而全面提高思政课的教学水平。

坚持思政课建设与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同步推进，能够从思想层面引导青少年学生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形塑“五个认同”的价值自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引导学生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永远听党话、跟党走，矢志奉献国家和人民。”[9]推进党的创新理论成果及时融入思政课建设，确保思政课内容与国家的发展目标、战略需求紧密对接，帮助青少年学生深刻认识到个人的责任担当、人生发展规划与国家建设目标、民族复兴愿景之间紧密相连、高度一致的关系。通过思政课的学习，帮助青少年学生深刻感知到自身肩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重任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任，从而激发他们内心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三、思政课建设与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同步推进的策略应对

坚持思政课建设与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同步推进，旨在以科学的理论武装头脑、铸魂育人，其核心在于大力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关键在于推动理论廓清和实践澄明的有机统一。据此，我们必须坚持教师主导、以学生为中心的基本原则，在顺应不同学段学生认知规律的基础上，重点从教学内容指向、教学方式创新、课程教材建设、理论研究深化、评价机制健全、育人机制构建等多维度发力，实现思政课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一）明确教学内容时代指向

明确思政课教学内容时代指向是坚持思政课建设与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同步推进的首要前提。作为意识形态教育的重要环节，思政课的任务是引导主流意识形态，“无论是通过讲故事、讲历史还是讲理论的方式讲思政课，都要体现思政课的政治引导功能”[3]。阐释好、宣传好、传播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既是充分发挥思政课政治引导功能的应然指向，也是推动当前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的重要任务。立足于“两个结合”的原则遵循，在百年奋斗征程中，中国共产党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规律性认识、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创立了既在逻辑脉络上衔接紧密、又在科学内涵上一脉相承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体系。在科学理论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力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努力谱写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华丽篇章，聚力开启了新时代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为推动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新时代新征程，强化思政课建设与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同步推进必须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为内容主线，明确思政课教学内容的时代指向。据此，思政课教学必须在党的创新理论的指导下，立足国家建设、社会发展、民族复兴的战略导向和实际需求，系统讲好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交融形塑、中华文化一体走向的价值体认、中华文明绵延发展的意义所指、文明大国多重建构的历史境遇等，重点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中国的故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故事、民族团结进步的故事，尤其要讲好包括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乡村振兴、提升民生福祉、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加强对口支援帮扶、促进文化传承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的新时代主题故事，在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中讲深讲透讲活思政课的道理、哲理、学理，以贴近生活的、感人的、暖心的、生动的故事深化青少年学生对党的创新理论的理解感悟，增强青少年学生对党的创新理论的主体认同，这是推动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的应然所指。

（二）创新多元化教学方式

立足“理论＋实践”教学理念导向，推动教学方式多元化创新改革，是坚持思政课建设与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同步推进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有机结合起来，充分运用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紧密联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奋斗历程，深刻领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道理，深刻领悟为什么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10]思政课既是党的创新理论有效传播的重要渠道，更是以党的创新理论引导青少年学生行为自觉的实践指引。因此，思政课教学必须推动理论廓清与实践澄明的有机统一，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引领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强化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百年奋斗历程所取得的巨大实践成就证明党的创新理论的科学性、合理性和现实性。与此同时，在重视深化思政课理论教学的同时，必须高度关切其社会性和实践性特质，要将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联系起来，推动思政课走出校园、走向社会、走进实践。在此过程中，学校要充分依托红色文化资源、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乡村振兴示范点、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等生动内容积极搭建思政课研修研学基地，拓展思政课实践教学平台，有效开展实施行走的“大思政课”；善于利用“大思政课”建设推动构建大思政格局。教师要在理论讲授和实践体验的紧密结合中，强化学生的认知理解和感悟，有效引导学生将人生发展规划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紧密相连。在数字化引领现代化社会变革的时代境遇中，要积极利用数字技术不断丰富思政课教学方式，积极利用智慧课堂、虚拟仿真、VR技术等打造思政课“云课堂”“云课程”“云互动”，通过共享数字资源、数字化平台、数字化场景、数字图书馆、数字化教研室等，构建立体化、开放式的思政课

教学平台与资源图谱，强化思政课交互式、沉浸式、共享化的学习与交流方式。由于数字赋能具有虚拟化、复杂性、多样性等特点，在思政课数智化改革创新实践中必须坚守价值性和工具性相统一原则，确保数智技术赋能思政课教学的具体实践必须遵循基本的应用逻辑和原则底线，有针对性地提升思政课教学成效。

（三）建设高标准课程教材体系

推动建设充分体现党和国家意志的高标准课程教材体系，是坚持思政课建设与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同步推进的必然要求。课程与教材是思政课的根本依托，思政课程必须紧跟时代发展，思政教材体系也必须与时俱进，要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成果为核心内容推动思政课课程教材体系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诠释好世界之变、阐释好当代中国实践，“思政课教师在教学中要把统编教材作为依据，确保教学的规范性、科学性、权威性，同时也不能简单照本宣科”[3]，方能科学回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立足思政课一体化、贯通式建设的目标导向，其课程教学体系建设必须贯穿教育各学段、联动大中小学各阶段，在教育目标、教育内容等方面形成系统化、学理化的课程教材体系。据此，要着力打造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内容的大中小学思政课课程群一贯式建设。与此同时，各地区应结合地域社会发展实际，充分挖掘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进程中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生动案例，科学合理地开发汇编与中央马工程教材体系相契合的思政课教学课例，并以此为依托进一步丰富思政课课程资源和教学素材，切实增强思政课教学的成效。我们还要从政策、经费、项目等方面加大对思政课课程教材体系建设以及队伍建设的扶持力度，确保党的创新理论能够真正及时有效地融入思政课教学，推动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

（四）深化学理化理论研究

作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基础工程、战略工程，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是坚持思政课建设与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同步推进的核心要义。新时代新征程，要着力深化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着力增强学习宣传的针对性、实效性，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更加深入人心。[11]思政课是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的重要抓手，要让党的创新理论切实有效地融入思政课教学，就必然要求进一步开展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体系的系统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我们要立足“两个结合”基本原则，把研究阐释好、学习贯彻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核心任务，致力于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据此，结合思政课建设与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同步推进具体实际，把握好党的创新理论指导作用，积极营造良好的学术生态和学术氛围，与时俱进地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不断加强和深化对“两个结合”视域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创新的规律性认识和把握，以体系化、学理化的理论研究体系来提升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水平，切实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三进”工作。

（五）打造高水平师资队伍

“办好思政课关键在教师。”[3]努力打造师德高尚、业务精湛、潜心育人的高水平思政课师资队伍对于思政课建设与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同步推进具有重大意义。高水平师资队伍不仅是开设好思政课的基本条件，也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依托，还是推动实施教育强国、人才强国战略的核心内容。因此，必须坚持从顶层设计的战略高度谋划推进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一是要健全组织领导机制，科学规划思政课队伍整体性建设，将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的核心内容，在相关政策、人才项目、激励机制等方面加大对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的支持力度，探索将思政课

教师队伍建设纳入相关部门党建和业务工作考核。二是要创新思政课教师多元化评价体系，紧密围绕“六个要”的根本要求，严格遵守“八个相统一”，努力引导思政课教师成为大先生。我们要不断完善思政课教师队伍考核办法与职称评审制度，积极探索思政课人才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相关制度政策的出台既要充分考虑思政课教师的发展实际，也不能放低要求和标准。与此同时，酌情考量当前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的现实需求，勇于探索试行科学合理的思政课教师退出机制，对现有队伍中不满足思政课教师基本素质与相应能力要求或不能够胜任思政课教师岗位的相关人员应准予其退出或转岗。三是要积极推动思政课教师教学改革团队与创新科研团队的协同化建设，以攻克课堂教学过程中遇到的重点、难点问题来强化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的针对性、现实性，以党的创新理论的系统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来提升思政课教学的理论高度与实践力度，切实以教学带动科研、以科研增强教学，推动教研相长，持续为思政课建设与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同步推进注入动力。

（六）构建全方位育人格局

构建高效能的“大思政课”全方位育人格局是坚持思政课建设同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同步推进的重要实践指向。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思政课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为主线，用科学理论武装青少年学生头脑，致力于帮助学生深化对党的创新理论的规律性认识、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认同，只有这样，教育才能从根本上回应“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时代命题。当前，以思政课为主要抓手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三进”工作，绝不能仅围绕思政课建设本身做文章，必须着眼于大思政育人格局，加强“大思政课”一体化、体系化建设。因此，我们要努力打破思政课课堂化、校园化、形式化等现实局限，持续推进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的协同性建设，积极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切实贯通思政课各学段教学体系，有效联动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等，真正打通思政课全方位、各层级的育人环节；我们还要加大思政课实践研修研学的拓展实施力度，重点打造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乡村振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文化、生态文明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大思政课”系列主题化建设，以生动活泼、特色鲜明的方式将思政课广泛开设于生产生活、网络空间等，融入人们日常生活、社会实践，坚持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努力构建高效能、整体性的思政课全方位育人机制。

四、结语

“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思政课作用不可替代，思政课教师队伍责任重大。”[3]立足任务指向和使命承载，思政课旨在以高尚的道德塑有用之才、用科学的理论铸魂育人，致力于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培养堪当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重任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必须坚持并持续深入加强思政课建设与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同步推进，要在明晰课程目标、构建课程体系、深化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深入理论研究、提升师资队伍水平、建设“大思政课”等维度齐发力，努力健全并完善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内容的思政课教学内容体系；我们要积极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最新成果能够及时、广泛、有效地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切实以党的创新理论引领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确保思政课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强化思政课的政治导向。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思政课有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实现铸魂育人目标旨归。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对学校思政课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不断开创新时代思政教育新局面 努力培养更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N].人民日

报，2024-05-12.
[2]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3] 习近平.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J].奋斗，2020(17)：4-16.
[4]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5] 肖贵清，叶新璐.新时代高校思政课建设与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同步推进的基本途径[J].中国高等教育，2024(Z3)：38-43.
[6] 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 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朝着建成教育强国战略目标扎实迈进[N].人民日报，2024-09-11.
[7] 习近平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强调 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N].人民日报，2019-03-19.
[8] 金国峰.思政课建设与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同步推进的理论蕴涵与实现路径[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4(9)：83-89.
[9]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快建设教育强国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N].人民日报，2023-05-30.
[10] 习近平在湖南考察时强调 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闯出新路子 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湖南新篇章[N].人民日报，2020-09-19.
[11] 习近平对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扎根中国大地赓续中华文脉厚植学术根基 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作出更大贡献[N].人民日报，2024-11-30.

Synchronized Advancement Strategi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and the Party's Innovation theories

YANG Bin

(*School of Marxism*, *Qinghai University*, *Xining* 810016, *China*)

Abstract: In the new era,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have been endowed with new historical missions. Adhering to the synchronized advance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construction and the Party's innovation theories not only represents a profound summary of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in the Party-led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but also serves as a fundamental guideline for promoting the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of such courses.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has consistently prioritized the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schools, strategically positioning it within the broader context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ause of the Party and country. It emphasizes tha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must implement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fostering virtue through education while deepening a systematic understanding of the Party's innovation theories. Accordingly, strategies should include: clarifying the orientation of teaching content, innovating diversified pedagogical approaches, constructing high-standard curriculum systems, intensifying theoretical research, cultivating high-caliber faculty teams, and establishing comprehensive educational frameworks. These measures will facilitate the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and effectively integrate the Party's innovation theories into textbooks, classrooms, and students' cognition—an inherent requirement for synchronized advancemen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and the Party's innovation theories.

Key word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universities;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the Party's innovation theories; education-powered nation; building up strength in education

（责任编辑：米雪）

习近平关于高校思政课建设重要论述的出场逻辑、核心要义及实践要旨

张利涛 黎 昊
（青海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青海 西宁 810016）

[摘 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校思政课建设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体现了新时代党中央对高校思政课建设的高度重视，为新时代高校思政课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这些重要论述的出场逻辑包括：对当今世界发展格局的准确把握，对中国共产党探索思政课建设历史经验的传承赓续，对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继承发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核心要义包括：坚持党对思政课建设的全面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守正创新推动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实践要旨包括：坚持思政课建设与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同步推进，以新时代伟大成就丰富思政课教学内容，以“大思政课”拓展“三全育人”新格局，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坚持多措并举提升高校思政引领力。新时代新征程，要着力推动高校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不断提高思政课的针对性、吸引力和实效性，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关键词] 高校思政课；思政课建设；立德树人；时代新人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267（2025）01－0029－12
DOI：10.14129/j.cnki.forwordposition.2025.01.004

思政课建设是党和国家教育事业的重中之重，不仅关乎个人理想信念塑造，而且关乎党和国家事业的兴衰成败。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优良传统、鲜明特色和突出政治优势，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思政课建设是做好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关键。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高校思政课建设，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并于2024年5月对学校思政课建设作出指示，强调“新时代新征程上，思政课建设面临新形势新任务，必须有新气象新作为”[1]。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政课建设的重要论述，不仅传承赓续了我们党百余年来探索思想政治工作的历史经验，而且体现了新时代党中央对思政课建设的宏观布局。从根本上看，这些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成果，也是新时代加强思政课建设的根本遵循。

本文聚焦于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校思政课的重要论述，从现实、历史、思想和文化等方面阐释其出场逻辑，从根本保证、

[基金项目] 青海大学2024年度教育教学研究重点项目“落实习近平关于思政课建设重要论述的路径研究”（JY202403）；青海省2025年度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青年骨干项目。
[作者简介] 张利涛，青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的建设；黎昊，青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

鲜亮底色、目标导向等方面阐释其核心要义，从理论要求、教学内容、育人格局、规律遵循等方面探索其实践进路。全面分析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校思政课建设重要论述的出场逻辑、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旨，深入理解其中的丰富内涵和实践指向，有助于守正创新地推进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打造思政金课，更好地发挥其立德树人关键课程的作用，不断开创新时代高校思政课建设新局面，努力培养更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校思政课建设重要论述的出场逻辑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校思政课建设的重要论述，不仅准确把握了当今世界发展对人才素质的要求，深刻总结了我们党思政工作发展的历史经验，而且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辩证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刻分析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校思政课建设重要论述的出场逻辑，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党中央对新时代思政课建设的重大要求，更好地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一）现实逻辑：对当今世界发展格局的准确把握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校思政课建设的重要论述立足于当前世界发展格局，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实践经验出发，对当前思政课建设作出了重要指示，彰显了理论智慧和时代回应。一方面，当今时代，两个大局相互激荡，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人才培养与引进成为国际竞争的焦点，教育成为各国高度重视的战略问题。另一方面，世界局势动荡、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意识形态风险加剧，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向我国输出虚无主义、西方“普世价值”等错误社会思潮，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构成巨大威胁。鉴于当今世界发展格局的现实境遇，我国更需要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并坚决捍卫意识形态安全。因此，作为立德树人关键课程的思政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从历史与现实来看，教育事业和国家安全、政治安定息息相关。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我们的教育绝不能培养社会主义破坏者和掘墓人，绝不能培养出一些‘长着中国脸，不是中国心，没有中国情，缺少中国味’的人”[2]170。在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上，绝不能含糊不清，只有明确这一点，才能更好地培养服务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有用人才。“当前形势下，办好思政课，要放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来看待，要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来对待。”[3]185-186

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思政课的战略地位愈发重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认识到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为此紧密围绕教育的根本任务进行了战略部署，深刻揭示了思政教育在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中的战略地位，强调办好思政课是增强“五个认同”、培养青年学生社会责任感的重要途径。在当今世界格局下，思政课不仅是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意识形态斗争的前沿阵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校思政课建设的重要论述，立足国家战略需要和国际形势发展变化，从理论和实践层面探讨教育的根本问题，要求增强思政课的亲和力、针对性和实效性，旨在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二）历史逻辑：对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百年发展的规律性认识

理论的产生源于对实践经验的总结。“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思政课建设。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对思政课建设都作出过重要部署。”[3]184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校思政课建设的重要论述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对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发展经验的全面总结，也是对我们党思想政治工作百年历史深厚积淀的创新发展。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思想政治工作作为中国共产党传播革命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途径，对革命的胜利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开设以马克思主义为主要内容的课程，我们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理论教育体系，有效提高了党员干部的理论水平和道德素质，培养了大批能够担当历史使命的革命人才，他们致力于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这一时期，思政课建设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主要教育内容，并致力于将其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种教育模式促进了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对革命目标的深刻认同与热烈追求，使他们在革命斗争中铸就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历史使命感，同时还强化了思想政治工作在解放思想、动员社会资源方面的重要作用。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逐步建立，我国社会结构和人民生活发生了深刻变化。面对新的历史任务，党对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特别是在提高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方面，强调大学生要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掌握先进科学技术，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同时，鼓励和支持大学生参与农村合作社、社会服务等活动，在实践中感悟社会主义科学内涵，理解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性和复杂性。毛泽东指出："要使全体青年们懂得，我们的国家现在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并且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根本改变这种状态，全靠青年和全体人民在几十年时间内，团结奋斗，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一个富强的国家。"[4]226教育引导青年团结一致，为建设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努力奋斗，构成了这一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价值和崇高目标。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经济体制改革有力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环境和思想观念也随之发生了显著变化，各种社会思潮开始涌现。思政课建设面临诸多挑战，特别是在教学内容和形式上，迫切需要紧跟时代发展，实现与时俱进。这一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坚持以四项基本原则为指引，对大学生系统开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等理论教育；针对错误思潮的侵袭，广泛深入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1984年，思想政治教育正式成为专业学科，标志着思想政治教育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思政课建设也由此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历经四十多年发展，如今，思想政治教育已经成为一门重要学科。

党的十八大以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环境和整体生态空前优越。"思想政治工作领域也取得了重大成就：理论创新、理论创造结出硕果，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论述。"[5]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科学指南，推动了思政课教学内容的丰富与发展。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根本目的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6]28，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力地推动了思想政治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紧密结合。这一时期，思政课的教学内容、形式和方法不断创新，不仅关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教育，而且更加注重提高思政课的亲和力和针对性，着力培养学生的历史责任感、社会使命感和价值判断力。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校思政课建设的重要论述，是对我们党思想政治工作百年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和对未来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创新的根本指引，体现了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的有机统一。

（三）思想逻辑：对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遵循和发展

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要跟进一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中，理论武装历来是重要范畴，其意蕴丰富，现实意义重大，深刻影响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校思政课建设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和价值指向。

一是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鲜明特征。社会性和阶级性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鲜明特征。教育作为社会再生产的重要

环节，必然受到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深刻影响。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而你们的教育不也是由社会决定的吗？不也是由你们进行教育时所处的那种社会关系决定的吗？不也是由社会通过学校等等进行的直接的或间接的干涉决定的吗？”[7]418教育的内容和形式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反映着特定阶级的利益和意识形态。习近平总书记正是基于政治立场和教育特征对教育的根本问题作出了科学回答，指出思政课的任务是传导主流意识形态，强调思政课教师要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和使命。[2]192

二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基本方法。马克思主义不仅指出了教育的鲜明特征，也阐明了教育的基本方法。“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7]9在此意义上，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努力培养更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就是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要使思政课成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的重要阵地，思政课教师要讲深、讲透、讲活思政课中蕴含的道理、哲理、学理。[8]

三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基本原则。梳理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发展轨迹，马克思主义灌输论对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至关重要。列宁指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确信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对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律，如此等等。”[9]29理论学习不仅是提高工人阶级理论素养的重要渠道，也是提高青年学生的理论素养、加强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举措。高校思政课作为对青年进行党的创新理论教育的主阵地和主渠道，它与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大事业紧密相连、有机融合。

（四）文化逻辑：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辩证汲取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校思政课建设的重要论述，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中国古代教育不是刻板的说教，而是师生从游与春风化雨。”[10]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思政课要坚持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11]我国传统教育理论和实践不仅丰富了思政课的内容与形式，而且为其发展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滋养。

一是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规范了思政课建设的价值取向。仁、义、礼、智、信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在契合、相辅相成，成为培养学生道德情操和社会责任感的重要价值基础。传统文化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注重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共进，注重思想道德修养和社会责任感的培养，这与新时代对人民基本素质的要求相呼应。高校教育者要通过传承和弘扬传统价值观念，引导青年学生深入历史长河，深刻理解和全面掌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其内化为个体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

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为思政课教育方式和方法创新提供了宝贵借鉴。因材施教、有教无类、寓教于乐等传统教育思想不仅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而且在教育方法上重视启发式和引导式教育，符合思政课隐性教育的要求。通过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教育精髓，思政课能够更好满足学生个性化发展需要，在潜移默化中完成思想启迪和价值引领。

三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倡导的家国情怀、天下为公等核心理念，深刻塑造着青年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下一家”理念，不仅体现在对家庭、家人的爱与责任，而且进一步延伸到对国家、民族乃至全人类的认同与关怀，

这一理念为培养青年学生的国际视野和社会责任感提供了文化坐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帮助青年学生在多元文化发展和全球化进程中，坚定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认同；在培养青年学生的世界格局和国际视野时，教育引导他们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

四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助力青年学生坚定文化自信，增强对中华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12]350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思政课建设提供了丰厚的文化滋养，帮助学生增强民族自豪感、文化自信心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情感认同，凝聚起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质言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精华在高校思政课建设实践中被不断激活，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构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校思政课建设重要论述的坚实的文化基石。

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校思政课建设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校思政课建设的重要论述，明确了新时代思政课在教育体系中的战略地位，并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新时代学校思政课、培养担当民族复兴重任时代新人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从根本保证、鲜亮底色、目标导向、基本路径等多个方面，深刻理解和科学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政课建设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把牢办好新时代高校思政课的正确方向。

（一）根本保证：坚持党对思政课建设的全面领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各级党委要把思政课建设摆上重要议程，抓住制约思政课建设的突出问题，在工作格局、队伍建设、支持保障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11]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办好新时代思政课的根本保证，必须牢牢掌握党对思政课建设工作的领导权，把握好思政课建设的正确方向。在实践过程中，只有坚持党对思政课建设的全面领导，才能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和育人导向，保证思政课建设不变质、不变色，确保我们培养的人才都有中国心、中国情。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12]17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构成了党对思政课建设全面领导的核心要义和实践路径。增强“四个意识”是党对思政课全面领导的重要体现，是确保思政课方向正确、内容鲜明、目标明确的重要基础。“四个意识”不仅是党员干部应当坚守的政治素养底线，同时也是思政课教师必须具备的核心素质要求。我们要通过增强“四个意识”，确保思政课教学内容始终紧跟党的创新理论发展，牢牢把握思想政治工作的正确方向。坚定“四个自信”是党对思政课全面领导的关键内容，体现了党对思政课建设的政治指引和理论支撑。“四个自信”为思政课教学提供深厚的思想根基和明确的价值导向，帮助学生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先进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独特性，以增强国家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激发青年学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做到“两个维护”是坚持党对思政课全面领导的重大要求。在思政课建设中，做到“两个维护”就是要求教师和学生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定政治信仰和政治立场，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同频共振、同心同德。思政课教师不仅要传授科学文化知识，还应在课堂教学中积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决做到不偏离党的政治路线、不脱离党和国家的战略目标，教育引导学生听党话、跟党走，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思政课教师要坚持党对思政课建设的全

面领导，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和使命。坚持党对思政课建设的全面领导，实质上是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政课建设的重要论述，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政治性、理论性和时代性，确保思政课与党的教育方针高度契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办好思政课，最根本的是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11]教育要服务党和国家事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思政课作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关键课程，肩负着不可替代的使命与责任。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思政课教师需引导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对学生加强家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教育。同时，教师要结合时代要求，及时更新完善教学内容，保证其政治性和学理性相统一，聚焦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的时代新人。

（二）鲜亮底色：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

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是发展好我国教育事业的根本方向。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是我国教育事业最鲜亮的底色。思政课建设必须始终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着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学生头脑是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旗帜鲜明地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根本指导思想，要求党员始终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始终坚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并通过思想政治工作使之薪火相传。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我们的理想信念之基和精神之钙。思政课的作用不仅是传授理论知识，更肩负着以理论为引擎，激发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蓬勃发展，致力于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思政课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主要授课内容，使学生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历史必然性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同时，通过理论学习，教育引导学生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理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战略布局及其背后的逻辑，自觉将个人奋斗融入民族复兴伟业。思政课在此过程中要发挥铸魂育人的重要作用，激励学生成长为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注入生机活力。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任务，也是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具体体现。思政课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肩负着培养担当民族复兴重任时代新人的历史使命。通过思政课程教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实质得以融入学生的思想和行为中，帮助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成为塑造学生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思想指引。无论是课堂教学，还是课外实践，思政课都能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激发学生的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并以实际行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之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使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无时不有”[13]10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融入，使思政课教学从单一的知识传授转向道德教育、价值引领和人格塑造的有机结合，不仅极大地促进了学生个人的成长成才，而且有助于社会整体文明程度的提高。总之，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我们必须不断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坚定不移地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推进思政课建设提供思想指导和价值引领。

（三）目标导向：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思政课作用不可替代，思政课教师队伍责任重大。”[2]181青年学生正处于人生中的“拔节孕穗期”，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生力军，正因如

此，更需要充分发挥思政课的价值引领和人格塑造功能。“蒙以养正，圣功也。”建设教育强国，培养时代新人，必须始终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

思政课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其基本任务之一就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里面，会讲故事、讲好故事十分重要，思政课就要讲好中华民族的故事、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故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故事、改革开放的故事，特别是要讲好新时代的故事。”[3]196中国故事不仅是对历史的回顾和对现实的叙事，更是当代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生动体现，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社会主义道德观念和精神品质，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宝贵题材。与理论灌输相比，讲故事往往更能激发学生的情感共鸣，使抽象的理论变得生动形象、易于接受。思政课要通过讲好中国故事，为学生提供思想认知框架，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培育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道德观念，使学生在思想认知和道德情感层面理解我国公民道德基本规范，从而为其行为实践提供价值引导。同时，思想政治教育不仅是对学生思想道德的规范，更是对其理性认知的积极引导。要让学生更深刻地理解个体与社会、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不仅要获得科学文化知识，更要增强政治认同和情感认同，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办好思政课，关键在教师。思政课教师是推动思政课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力量。思政课教师作为知识的传授者和学生成长成才的引路人，肩负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重任，其自身的政治素质、道德素养直接影响立德树人成效。因此，“要持续强化师德，坚持从政治上思想上把好选聘第一道关”[14]。教育家精神作为思政课教师的价值追求，蕴含着“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道德情操，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弘道追求”[15]。思政课教师是否具有教育家精神，不仅影响思政课建设的质量和立德树人的成效，而且也影响着整个社会的文化传承与价值塑造。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思政课教师政治要强、情怀要深、思维要新、视野要广、自律要严、人格要正，在讲授思政课过程中要做到“八个相统一”[16]，这成为推进新时代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的根本遵循。总之，思政课教师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办好新时代学校思政课一定要充分发挥思政课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四）基本路径：坚持守正创新推动思政课内涵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对学校思政课建设作出重要指示：“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为内容支撑，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力量根基，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守正创新推动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不断提高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1]思政课要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必须在守正与创新的辩证统一中实现内涵式发展，即既要坚持思政课的本质，确保其内容的思想性、政治性和理论性，又要不断创新思政课教学的方式、方法，使思政课更具亲和力、吸引力和针对性，推动思政课改革创新，从而更好地满足培养时代新人的现实需要。

守正就是要立足思政教育本质，充分发挥思政课作为立德树人关键课程的积极作用。我们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必须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思政教育的核心在于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坚定理想信念。思政课必须聚焦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任务，保持其独特的思想性和政治性。守正还要求思政课建设必须始终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不动摇，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从培养担当民族复兴重任时代新人的战略高度出发，立足新时代伟大实践，教育引导学

生深刻理解和精准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通过坚定正确政治立场，弘扬主旋律、凝聚正能量，思政课能够帮助学生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中坚定政治立场，增强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培养家国情怀、塑造正确价值导向，全面提升学生的思想政治理论素养，教育引导学生立鸿鹄志、成为时代的奋斗者，实现知、情、意、行的有机统一。

“创新是守正的目的，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推动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本身就意味着创新，就要求创新。”[17]面对转型期学生思维方式的变化和复杂多样的社会环境，思政课要不断丰富教学内容、创新教育方式，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新时代以来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为思政课铸魂育人提供了鲜活素材。首先，创新体现在课程内容的丰富性和时代性上。高校教育者应通过不断融入国家发展的最新成就、改革实践的成功经验和社会进步的生动案例，将新时代取得的伟大成就作为生动教材，使理论更具现实感和吸引力。其次，创新体现在教学方式方法上。高校教育者应通过融媒体、虚拟仿真、人工智能等手段，探索在线课程、视频学习、互动式教学等形式，让学生在多样化的教育场景中体验思政课的生动性和参与感。最后，创新还体现在思政课教师教育观念的与时俱进上。高校要坚持“大思政课”理念，将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建立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完善思政课实践教学机制，有效实现学校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的互联互通、一体联动。总之，守正创新是推进新时代高校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的关键路径。通过坚守正确的政治立场和教育目标，思政课建设始终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通过不断创新教学内容和方式方法，思政课建设将会更加符合大学生成长成才规律。

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校思政课建设重要论述的实践要旨

新时代新征程，思想政治工作面临新形势新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校思政课建设的重要论述为推进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指明了方向。一方面，办好思政课关键在教师。“教师是教育的第一资源，教师的育人理念和水平，直接影响思政课的效果。”[18]思政课教师要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政课建设的重要论述，从理论要求、教学内容、育人格局、教育规律等方面入手，推进思政课改革创新，更好地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另一方面，必须坚持在学校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各级党组织共同参与、齐心协力推进思政课建设，形成立体、系统、联动的思政课建设工作格局，切实增强思政课建设的工作合力，不断提升高校在思想政治领域的引领力和影响力。

（一）坚持思政课建设与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同步推进

党的理论创新步履铿锵，高校思政课建设亦应同频共振。思政课建设与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同步推进，就要构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内容的课程教材体系。“教学内容是完成思政课目标任务的核心要素，思政课的目标和任务都是通过教学内容的实施来完成的。”[19]首先，在思政课教学内容上需要突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导学生深入理解并掌握其核心内容。“办好思政课，就是要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2]18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涉及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方方面面，教师应将这一思想理论深刻融入思政课教学，让学生从宏观层面理解党的执政理念，获得贴近自身成长的价值指引，从而增强其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其次，将党的创新理论同步融入思政课建设中，需要不断更新教材和教学内容，保证理论的鲜活性。教材应注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内在逻辑和实践价值，突出其时代性与实践伟力。教材编写要贴近青年学生生活实际，从家国情怀、社会责任等角度切入，推动学

生在日常生活中感悟新思想、践行新理论，并将理论内化为政治认同和行为引导。最后，作为思政课教学的主导者，思政课教师的理论水平和教学能力直接决定了党的创新理论能否有效地被学生接受和掌握。因此，思政课教师要不断学习掌握党的创新理论，准确理解其核心要义和内在逻辑，并在教学中以清晰的逻辑和生动的讲解让学生真正做到入脑入心。思政课教师还应通过创新教学方式方法，有效增强思政课堂教学的针对性和吸引力，着力将思政课打造成为引领青年学生成长成才的“金课”。

（二）坚持以新时代伟大成就丰富思政课教学内容

新时代以来取得的伟大成就为充实思政课教学内容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使思政课更加贴近时代发展，进一步增强了学生对国家发展成就的政治认同和情感认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抓好青少年学习教育，着力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让红色基因、革命薪火代代传承。”[2]101首先，新时代科技创新成果为思政课提供了极为宝贵的教学资源。我国在航空航天、高铁、人工智能、量子信息、5G通信等领域取得的一系列突破性成就，展示出强大的科技实力。思政课教学让学生深入了解我国在科技领域的战略布局和历史性成就，引导学生树立创新意识，激发为实现科技强国而努力奋斗的热情。其次，新时代的社会变革和民生改善为思政课教学注入新的生机活力。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等战略的实施，我国在提升人民生活质量、缩小城乡差距、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通过对这些伟大成就的阐释，思政课教学可以帮助学生深刻理解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激发他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而努力奋斗的责任感。最后，坚定文化自信、激活中华文明的现代力量为思政课建设提供重要价值引领。随着中华文化影响力的显著提升，我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不断增强。通过讲述中华文化传承发展、对外交流合作的故事，思政课帮助学生进一步增强文化自信，理解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和历史价值，激励他们在全球化背景下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贡献智慧和力量。

（三）坚持以“大思政课”拓展“三全育人”新格局

以“大思政课”拓展“三全育人”新格局，将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有机结合，为推动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提供广阔空间。思政课不仅是学校教育体系中的一个科目，更是引导学生认识社会、走向社会的实践平台。通过“大思政课”实践教学，思政课不再局限于课堂教学，而是通过组织学生参加社会实践、实地调研、志愿服务等多种形式，帮助学生更好融入社会，从而使思政教育更具生命力和现实感。首先，“大思政课”打破了传统课堂的空间界限，带领学生走出校园、走进社会，通过体验式学习增强其对国情民情的认识，从实际生活中加深对社会结构、人民生活和国家发展的认识。无论是对乡村振兴的调研、社区服务的参与，还是对贫困地区的实地走访，都能让学生直接接触到不同地域、不同人群的实际生活，亲身感受高质量发展成果，从而更好地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厚植家国情怀。其次，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的结合，使思政教育更具实践导向，帮助学生在真实情境中内化理想信念。传统思政课堂往往注重理论灌输，而“大思政课”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引导学生将书本知识转化为信仰和行动。例如，通过志愿服务，教育引导学生服务他人、奉献社会，从而深刻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类实践体验活动使得学生更加坚定理想信念，深刻认识到个人价值与社会发展紧密相关。最后，“大思政课”使学生在面对复杂的社会环境时具备更加成熟的价值判断力。通过课内外结合、校内外互动，学生得以在多元信息的碰撞中形成对问题的独立思考能力。在社会实践中，学生不仅提高了辨别信息、理性

思考的能力，而且能够逐渐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使学生在未来面对人生挑战时能够更加坚定理想信念、勇于担当使命。

（四）坚持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

遵循教育规律，深入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循序渐进、螺旋上升地开设思政课，是新时代思政课建设的重要方向。守正创新地推进思政课教学改革，一定要遵循教育教学规律、学科发展规律和人才培养规律，建立健全贯穿不同学段、层层递进、螺旋上升的思政教育体系，使学生从小到大接受的思政教育更具连续性和科学性，从而有效提升思政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首先，思政课教师要遵循教育教学规律，根据学生的认知发展规律和身心特点来设计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大中小学学生在认知水平和思维能力上各有不同，思政课应当分阶段设置各学段教学目标。小学阶段注重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和认知能力，中学阶段强化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意识，而大学阶段则应进一步深化理论教育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循序渐进、螺旋上升地开设思政课，使学生在不同阶段逐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加深对党的理论的理解，使思政教育效果达到最大化。其次，思政课内容要贴近学生的生活实际和思想特点。针对学生实际情况和成长需求，在课程设计中融入学生身边的案例和社会热点，促使学生产生情感共鸣，激发学习兴趣。例如，在小学阶段通过讲述生活中的故事，帮助学生理解公民道德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大学阶段则应通过案例分析和社会实践，教育引导学生理解和运用党的理论。最后，遵循人才培养规律，螺旋上升地进行课程设计。学习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要通过螺旋上升的课程设计帮助学生不断提高思辨能力和理论素养。在不同的学段，不仅让学生建立完善知识体系，而且要帮助他们获得不同的认知体验和成长感悟，在潜移默化中内化理想信念和价值观念。

（五）坚持多措并举提升高校思政引领力

高校思政课建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抓手，是引领青年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的重要途径。面对社会多元价值观的冲击和技术变革带来的挑战，高校需要综合施策、多措并举，全面提升思政引领力。首先，要加强学科引领。高校要优化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体系，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突出时代性。在课程内容方面，围绕国家发展需求与社会热点问题设计教学模块，增强思政课教学的现实感；在教学方式上，充分利用现代技术手段，如虚拟仿真、思政微课等，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还要推进思政教育与专业课程深度融合，实现课程思政全覆盖，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将思政教育贯穿于学生学习生活的各个方面。其次，要加强队伍建设。高校要建立专兼职相结合的思政课教师队伍，加强思政课教师培养与管理，提升其思想政治素养和教育教学能力。一方面，要完善思政课教师选聘、培养培训与评价机制，增强专职思政课教师的教学水平和科研能力。另一方面，要加强辅导员、班主任等思政工作队伍的建设，增强其在学生日常管理和思想引领中的作用。高校要建立多元化的激励机制，为思政工作者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和晋升渠道，使其全身心投入到学生成长与发展中。最后，要强化评价导向。高校要建立健全思政工作评价体系，将学生思想政治素质提升纳入教育质量评估的核心指标。高校不仅要通过学生问卷调查、个案研究等方式，收集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反馈意见，及时调整工作方法与内容，同时也要注重思想政治工作实际成效的评价，“除了学生评价之外，适当增加其他相关主体的评价及其在评价体系中的比重。”[20]在评价体系构建中，高校要考虑多维度、多层次的评价，全面涵盖学生、教师、辅导员及教辅人员意见，确保全面掌握思政工作成效。建立动态评价与反馈机制，注重对思政工作的持续性追踪和长期性评价。改进措施要与评价结果紧密结

合，确保其有效指导具体实践，切实增强思政工作实效。

四、结语

思政课是立德树人的关键课程，要通过提高课程质量、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构建科学话语体系、丰富教学模式等塑造新时代高校思政课形象。[21]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校思政课建设的重要论述，深刻回应了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明确了新时代高校思政课建设的新方向、新任务，为高校思政课建设提供了科学指引和理论支撑。从出场逻辑、核心要义、实践要旨等维度出发，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校思政课建设重要论述的学理化阐释和体系化研究，有助于更好把握新时代高校思政课建设的根本遵循，切实增强思政课的立德树人成效。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推进新时代高校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不仅要始终坚持党对思政课建设的全面领导，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而且要在守正创新中不断丰富思政课内容和教育方式方法，增强思政课教学的针对性、亲和力和吸引力。迈上新征程，思政课发展环境和整体生态发生全局性、根本性变化，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校思政课建设的重要论述，推动我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更加成熟，更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青春力量。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对学校思政课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不断开创新时代思政教育新局面 努力培养更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N].人民日报,2024-05-12.

[2] 习近平.论党的青年工作[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

[3] 习近平.论教育[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4.

[4]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5] 王树荫,王君.党的十八大以来思想政治工作的历史性成就[J].思想理论教育,2022(9):4-11.

[6]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8] 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 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 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N].人民日报,2022-04-26.

[9] 列宁全集:第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10] 李立国.中国式现代化与大学的文化自觉[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22(6):1-6.

[11] 习近平.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J].求是,2020(17):4-16.

[12]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13]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述摘编[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

[14] 靳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大力加强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J].思想教育研究,2024(6):3-6.

[15] 习近平致信全国优秀教师代表强调 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 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N].人民日报,2023-09-10.

[16] 张利涛,侯子婵.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教师胜任力:意涵、症候与擢升[J].创新,2023(5):73-81.

[17] 颜晓峰.论守正创新推动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J].思想理论教育,2024(7):14-21.

[18] 蓝晓霞.守正创新推动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N].人民日报,2024-05-30.

[19] 石书臣.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理念与路径[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2(1):27-31+45.

[20] 崔友平,吕增奎,刘仁胜,等.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教学情况调研报告[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3(5):123-129.

[21] 冯刚,李亚美.新时代高校思政课公众形象塑造的基本条件探究[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5):1-8.

The Emergence Logic, Core Essence, and Practical Tenets of Xi Jinping's Important Discourse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Universities

ZHANG Litao, LI Hao

(*School of Marxism, Qinghai University, Xining* 810016,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has had a series of important discourse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universities. These discourses reflect the high priority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place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universities and provide fundamental guidance for advancing such efforts in the new era. The emergence logic of these discourses includes: an accurate grasp of the evolving global landscape, the inheritance and continuation of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the CPC in explo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Marxist educational principles, and the preservation and advancement of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e essence encompasses: upholding the Party's comprehensive leadership over the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maintaining the socialist orientation in education, fulfilling the fundamental mission of fostering virtue through education, and promoting the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through integrity and innovation. Practical tenets involve: synchronizing the develop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with the dissemination of the Party's innovative theories, enriching teaching content with the great achievements of the new era, expanding the "three-wide education" pattern through the "gr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itiative, advancing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across primary, secondary, and tertiary education, and enhancing the ideological influence of universities through multifaceted measures. In the new era and on the new journey, efforts must focus on deepening the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continuously improving their relevance, appeal, and effectiveness, and cultivating a new generation of the times to shoulder the mission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Key word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universities;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fostering virtue through education; new generation of the times

(责任编辑:米雪)

2024年的中国边疆安全研究：历史、文化与国家立场

袁 剑 刘 磊
（中央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 100081）

［摘 要］2024年的中国边疆安全研究立足中国国情，从我国的国家立场出发，结合中国历史中的边疆安全经验、边疆地区文化的发展与挑战，以推进国家安全建设为主线，围绕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要求，在学理和实践层面不断深化研究。与此同时，在学术探讨与共识形成方面也取得显著进展，产生了诸多新的研究成果。本文从总体国家安全观相关会议与论著、边疆安全与治理相关会议及论著等方面，对2024年的中国边疆安全研究作了初步的综述，并在此基础上对本年度边疆安全研究在历史、文化、国家立场等方面呈现的突出特征进行归纳与总结。

［关键词］边疆安全；边疆治理；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国家立场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267（2025）01－0041－09
DOI：10.14129/j.cnki.forwordposition.2025.01.005

2024年是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十周年。在过去的十年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带领全国人民在新时代国家安全建设上取得了卓越成就。在“两个大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在努力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进程中，随着大国竞争态势的日趋明朗，我国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愈发突显。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广袤的边疆地区在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区域协调中占有特殊地位，并扮演着十分关键的角色，边疆安全也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的交叉学科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的正式设立，为边疆安全研究的进一步推进提供了重要契机。在此基础上，如何更好地界定边疆安全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梳理边疆安全的具体研究内容，以及探讨边疆安全研究与传统范畴的边疆研究、国家安全研究之间的关联与区别，就成为需要关注的重要议题。此外，如何从边疆安全视域下理解和认识中国边疆与周边的热点问题，并进行具有学理性和阐释力的分析，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四部差徭摊派档案》翻译与研究”（21AZS018）；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近代边疆学术史资料整理与研究”（22JZD035）。
［作者简介］袁剑，博士，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中央民族大学期刊社社长，博士生导师，国家安全研究院研究员，研究方向：边疆安全、边疆思想史；刘磊，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边疆安全。

成为体现边疆安全研究必要性与前瞻性的重要方面。而如何在统筹边疆发展和安全方面持续发力，如何整合现有资源以更好地推进国家安全学科下的边疆安全研究，亟待学界深入探讨和研究。

2024年12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我国历史上的边疆治理进行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坚持把党的全面领导落实到边疆治理各方面全过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边疆地区一个都不能少"；"要坚持把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作为边疆民族地区工作的主线"；"要坚持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作为边疆治理的底线要求"；"要加强边疆史和边疆治理相关的多学科研究，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1]以此为指引，作为围绕边疆展开的安全研究，既涉及我国历史上边疆治理的相关内容，又与当代边疆治理密不可分。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随着边疆地区的进一步发展，边疆安全也成为其中的重要内容。在具体实践中，维护边疆地区的政治安全与社会稳定，需要学术界的共同努力。推进中国边疆安全研究，我们需要在充分总结中国历史经验和智慧的基础上，关注世界范围内各国边疆治理与安全领域的经验与教训，从而理解特定地缘时空阶段的边疆安全重心及其呈现的区域特征，进而更好地认识和理解中国边疆安全的历史传统与当代实践。此外，边疆安全研究的涵盖面，随着历史的发展和议题的扩展，逐渐涉及有关国家安全的各个领域和区域，有效推进边疆安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有利于国家安全学研究和边疆地区的发展。

2024年的中国边疆安全研究，以中国为立场，以边疆和安全为关键词，在领域和深度方面都有所增进，各类相关会议相继召开，相关学科建设进一步拓展，并在诸多方面形成了新的趋势与特色。与此同时，随着学术成果的持续产出，该研究领域在议题和内容方面不断深化，学术界关于边疆安全的共识基础也日益形成。本文以收集到的部分公开信息为例，对上述内容进行初步的梳理与评述，挂一漏万之处，敬请专家不吝赐教。

一、总体国家安全观相关会议

2024年是"总体国家安全观"进一步推进与深化的一年，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在我国社会发展各层面突显出来。习近平总书记在本年度历次重大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全面涵盖了各领域的国家安全，例如经济安全、政治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社会安全、军事安全、能源安全、海外利益安全等传统、非传统以及新型安全问题。这些重要论述，为推进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认识与研究提供了方向与指引。本年度举行的各类相关会议，围绕总体国家安全观各方面的内容，在不同层面不断丰富与深化了对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解与认识。

1月3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

2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时强调，要进一步提升基层应急管理能力，推动应急管理工作力量下沉、保障下倾、关口前移，有效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及时有力有效处置各类灾害事故，筑牢安全底板，守牢安全底线。

2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新能源技术与我国的能源安全进行第十二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能源安全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要顺势而为、乘势而上，以更大力度推动我国新能源高质量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安全可靠的能源保障，为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作出更大贡献。

3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时强调，新兴领域战略能力是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重要组成部分，关系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关系国家安全和军事斗争主动，对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要意义。会议强调要强化使命担当，深化改革创新，全面提升新兴领域战略能力。

4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要坚持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升能源资源等重点领域安全保障能力；要坚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切实维护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

6月28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70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纪念大会并发表题为《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实现和平安全的愿景。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各国必须共担维护和平责任，同走和平发展道路，共谋和平、共护和平、共享和平。中方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就是倡导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以合作促发展、以合作促安全，构建起更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

7月15—18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京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作重要讲话。全会提出，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必须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完善维护国家安全体制机制，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切实保障国家长治久安；要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完善公共安全治理机制，健全社会治理体系，完善涉外国家安全机制。

9月5日，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发表主旨讲话。习近平提出，中非要携手推进和平安全的现代化。现代化离不开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中方愿帮助非洲提升自主维护和平稳定的能力，推动全球安全倡议率先在非洲落地，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

9月13日，第十一届北京香山论坛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信。习近平指出，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世界人民对安全稳定的期盼，中国践行全球安全倡议，不断凝聚各方共识，推动消弭国际冲突根源、完善全球安全治理，为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世界作出不懈努力。希望本届论坛继续秉持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精神，凝聚共识、深化互信，为共同应对全球性安全挑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12月2日，第四次“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近年来，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在此背景下，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必须妥善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有效克服地缘冲突影响，正确处理增强共建国家获得感和坚持于我有利的关系，切实保障我国海外利益安全。

12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我国历史上的边疆治理进行第十八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坚持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作为边疆治理的底线要求；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不断夯实基层基础，提升边疆地区社会治理效能；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强化科技赋能，提高卫国戍边整体能力。

二、学术研讨会与学科建设

2024年，相关学术研讨会在推进中国边疆安全研究和学科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相关讨论围绕边疆安全研究展开，聚焦于边疆治理的历史实践、制度设计与效用、相关国家边疆治理经验比较、边疆安全保障机制及基层实践等主要议题，在研究方法上尝试整合各学科的相关研究路径。与此同时，在建设边疆地区的国家安全学科、统筹边疆发展与安全、建设研究实体等方面，本年度也有进一步的推进。一些有影响力的研究机构和研究团队的形成，为边疆安全研究在深度和广度层面的拓展提供了必要的机构支撑与政策准备。以下作简要梳理。

4月15日，内蒙古财经大学召开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中心成立暨国家安全学学科建

设研讨会，来自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医科大学、内蒙古财经大学、呼和浩特民族学院等高校的专家学者和新华网、人民网内蒙古频道、内蒙古日报等媒体的140余人参加会议。

4月18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语言应用研究室陈国庆研究员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2024年度国情调研重大项目“边疆民族地区语言文字使用与语言安全状况调研”开题会在本所召开。项目负责人陈国庆对项目的申报情况、实施的必要性及意义，以及调研方案的设计进行了陈述。由戴庆厦教授为组长的评议组专家分别对该项目方案进行了评议。

5月25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边疆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安全与发展研究中心、新疆智库主办的“第十一届中国边疆研究青年学者论坛”在中国历史研究院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山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北京社会科学院等30多家高校和科研院所的90余人参加了本次论坛。论坛设“历史上的边疆治理与民族融合”“边疆民族、海疆物质文化史”“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合作与挑战”“我国边疆民族地区发展与安全研究”四个分论坛。与会学者围绕边疆安全、兴边富民、新质生产力、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国共产党治边方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重要论题展开深入探讨。

6月6—7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边疆研究所）主办，新疆智库、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安全与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突厥研究中心承办的第十一届中国边疆学论坛在中国历史研究院举办。论坛以“新形势、新问题：时代发展中的边疆研究”为主题，来自国内30余所科研机构和高校的90余位学者围绕边疆视域下的中华文明的突出特征、历代边疆治理与疆域统合、边疆地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及当代边疆治理、边疆安全稳定发展与周边国际环境、边疆学科建设与学术平台建设等议题分享研究成果，展开深入研讨。

6月12日，由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大学和喀什大学联合主办的“中国新疆的历史与未来”国际论坛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市召开。论坛旨在通过考古、历史领域的国际交流，推动新疆历史人文的多元一体研究，深化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来自中国、哈萨克斯坦、澳大利亚、埃及、德国、匈牙利、美国等国家的百余名专家学者，围绕新疆考古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新疆历史与中华文化的多元通和、西域丝路与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互鉴、新疆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等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7月14—15日，由暨南大学主办，石河子大学文学艺术学院协办的第三届传播与边疆治理论坛在博乐市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130余位中外专家围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边疆治理：理论探索与实践创新”展开深入讨论。与会学者聚焦“中华民族共同体与边疆治理”“边疆地区稳定、发展与安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话语与叙事体系”“涉疆国家传播理论与实践”“边疆地区各民族交流交融理论与实践”“历代西部边疆治理的政策与实践”等议题展开充分研讨。论坛还安排了“涉疆国际传播能力提升媒体专场”，邀请来自清华大学、暨南大学、石河子大学等学界代表，与新华社新疆分社、环球时报和新疆日报（天山网）的资深媒体人共同为这一主题建言献策。

10月26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关系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安全交叉学科平台、新疆大学国家安全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新疆大学国家安全研究院主办，新疆理工学院承办的首届边疆国际安全论坛暨“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与边疆稳定发展”研讨会在新疆阿克苏召开。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新疆大学、新疆理工学院、国防大学、国防科技大学、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国际关系学院等高校和相关机构的9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与边疆稳定发展进行深入探讨，并分享交流了各自的认识与思考。

11月18日，中央民族大学国家安全研究院召开国家安全学博士点高质量建设专题研讨会。会议由国家安全研究院执行院长李俊清教授主持。会议就学位点建设定位、建设目标、培养方案、拟设置课程、人才培养模式和拟设置二级学科方向等进行探讨。与会的校外专家就进一步加强和优化中央民族大学的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进行了深入研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程琳教授建议将“边疆安全”融入现有二级学科结构，并探索边疆生态安全、网络信息安全及少数民族语言识别技术等领域。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傅小强教授建议加强人才创新能力的培养，特别是在二级学科创立的基础上，探索例如边疆安全等领域的创新发展。他指出，培养目标应侧重人才培养与国家需求的结合、特色与领域的紧密结合、教学与科研的紧密结合、课程与田野的结合。

11月30日，由中央民族大学国家安全研究院主办、内蒙古师范大学民族学人类学学院、政府管理学院承办的“中国式现代化与国家安全”学术研讨会在呼和浩特召开。与会学者针对如何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聚焦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强化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增强维护国家安全能力、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和手段、有效构建新安全格局等关键议题，展开深入交流和研讨。

12月7日，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新疆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中国（新疆）与中亚区域经济合作研究中心、新疆财经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承办的首届统筹发展与安全边疆论坛在新疆财经大学召开。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新疆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辽宁大学经济学院、云南大学经济学院、广西大学经济学院、西藏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内蒙古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和中国（新疆）与中亚区域经济合作研究中心共同发起。论坛秉持“统筹边疆发展与安全，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与实践研究”的理念，邀请政产学研社会各界共同参与，旨在为祖国边疆地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建言献策。

12月16日，石河子大学国家安全治理主题研讨会在北京兵团大厦召开。石河子大学国家安全研究院院长高卉围绕石河子大学国家安全研究工作现状，以及推动兵团高校国家安全研究发展的必要性和优势发言，提出坚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遵循“安全—发展”一体两翼的逻辑，以“边疆、边境、周边”的边疆安全和国民安全为研究对象，关注边疆安全、新疆（兵团）可预见的或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防范、健全兵团国家安全保障体系的“五位一体”建设，推动石河子大学国家安全研究工作发展的构想。与会专家充分肯定了石河子大学国家安全研究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并围绕“构建中国自主的边疆安全学知识体系”“构建具有兵团特色的国家安全保障体系”“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国家安全人才”等议题展开研讨，以期更好地推动石河子大学国家安全研究工作发展。

三、研究论文产出

2024年，国内学界在边疆安全研究领域着力推进，形成了一批丰硕的研究成果。一方面，使边疆安全研究能够契合当下的社会发展需求，思考如何在现有的学科体系和资源分布中更好地推进边疆安全研究。另一方面，在遵循“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基础上，立足当下边疆社会现状，为解决边疆地区的安全问题建言献策。纵观相关成果，涉及地域范围较广，包含国内各个边疆区域和国外边疆区域；研究领域也较为多元，诸如边疆能源安全、边疆经济安全、边疆生态安全、边疆意识形态安全、边疆文化安全、边疆人口安全等，且对于统筹边疆地区的发展和安全的讨论也比较充分。以下围绕边疆安全研究方面的相关论文进行简要评述。

例如，张高原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多元学科路径探析——以边疆安全学为例》[2]一文中认为，在国家安全学已成为交叉学科门类中独立一级学科的背景下，可尝试结合中华民族维护边疆安全的历史，特别是党带领各民族群众稳边固边、兴边富民的

实践，建设独具特色的边疆安全学，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多元学科路径之一。基于边疆安全学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价值与意义，他建议从明确边疆安全学分支方向体系、建设边疆安全学学术共同体、打造边疆安全学研究力量、提升边疆安全学相关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四个方面推动国家安全学学科体系下的边疆安全学建设。

吕文利、张玲的《国家安全视阈下中国沿边地区人口最新实态及其类型化研究——基于140个边境县的人口样本考察》[3]一文指出，在边疆安全中边境地区的人口安全是重中之重。文章基于对我国陆地边疆9省区140个边境县人口样本的研究，发现当下我国陆地边疆人口存在着新的发展态势。针对边疆人口类型化研究中发现的安全问题，文章提出“戍边人口”“经济人口”“文化人口”等概念，以期为提升中国的边疆治理与边疆安全水平提供可行的理论与实践路径。

汪洪亮的《以文化之名：民国时期政学两界对“中国式边疆”现代化的思考》[4]一文指出，民国时期政学两界对“边疆”的界定除了基于政治与地理意义外，更多考察其“文化”元素，普遍认为如不从“文化”着眼，无法道尽“边疆的涵义”。这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式边疆”，形成了“中国边疆”独特的“边疆性”。“边疆性”之形成，既然主要来自“文化”因素，那么边疆现代化的实质就是要消除“边疆性”，让其失去“文化上的意义”。所谓“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消除“边疆性”并非抹杀文化，而是通过发展经济和增进认同，按李安宅的观点，就是要通过物质和精神的“区域分工”，也就是要实现边疆现代化及其与内地的一体化。

袁剑、王坤焱的《边疆人类学：源流、对象与中国语境》[5]一文认为，现代世界通过边界划定各国的领土范围，随之产生的边疆成为诸多国家内部文明空间的重要区域。在现实中，边界不仅明确区隔两个国家的地理空间，还影响了特定空间中的人文社会，以及相应的文明生成。因此，对边疆区域相关实践的关注，成为边疆人类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从学科源流来看，随着中国周边与世界格局的深刻变化，国内学界对于边疆的关注，从边疆社会面临外部冲击时的救亡图存意识及行动，开始转向主动开拓关于国家整体性的认知。在这个过程中，边疆研究与人类学理论与研究方法在应用中不断结合，具有自身本位的中国边疆人类学开始形成。进入新时代，中国边疆人类学的发展，一方面通过记录并客观呈现边疆社会丰富的文化内涵，致力于中华民族文化的整体性表达；另一方面，则具有回应国家建设与决策的重大实践意义。以此为基础，创造丰富的边疆田野民族志、思考边疆治理现代化的人文路径、挖掘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层内涵，在理解中华文明空间的基础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金家新的《边疆的概念属性、问题语境及其现代性治理》[6]一文认为，处于自然地理与治理结构双重“边缘”的边疆对民族国家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一些问题语境的反向作用将可能导致边疆成为民族国家的问题所在。因此，要努力实现国家治理、边疆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维护边疆安全与国家利益。

吴刚的博士学位论文《我国陆地边疆安全问题的空间差异及其治理》[7]结合实践调研，分析了不同陆地边疆地区影响边疆安全的各类矛盾问题，发现边疆安全的内容指向在边疆空间内并非均质化分布。他认为要在现代公共治理的视角下，统筹区域差异和安全内容差异，对不同边疆空间内的不同安全问题提出差异化治理思路对策。

胡佳、谭薇的《数字赋能边境安全精细化管理的过程机理和实践路径》[8]一文指出，边境地区肩负着国家边疆安全和发展的重要任务，边境安全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通过数字化、信息化方式开展边境安全精细化管理是实现边境安全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全文在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阈下，基于广西边境安全管理实践案例，指出当下的数字赋能边境安全精细化管理存在着资源匹配不足、机制不顺畅、建设不充分的困境，并提出以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行动遵循、以健全数字边境安全基础设施提供硬件保障、以完善多元主体参与协同机制提供体系支持等举措完善该项管理工作。

王垚的《统筹发展和安全视角下边疆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9]一文认为，边疆地区的发展直接影响国家边境安全与总体稳定，应积极推动边疆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因此，她针对性地提出构建安全导向的经济体系、改善居民生活质量、优化治理体系以及推动对外开放与合作四条具体路径来推动边疆地区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高质量发展。

戴庆厦、尹朋灯的《新时代边疆语言研究的新任务——以边疆语言景颇语为例》[10]一文指出，边疆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边疆语言状况如何，直接关系到边疆的安全和发展。由此，文章以边疆语言景颇语为个案，依据边疆语言、边疆社会文化的客观事实，论述新时代边疆语言研究必须做好正确估量边疆语言使用现状及其演变、科学估量边疆语言在新时代的作用、充分调查边疆少数民族习得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状况、调查研究边疆语言的语言适应和语言发展、调查研究边疆语言中蕴含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因素等五项工作。

马元喜、张欣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的边疆生态安全治理：态势感知、战略转型与共生治理》[11]一文从边疆地区的社会发展现状出发，指出近年来边疆地区因忽视有效的生态保护举措而预埋了多重风险，导致边疆生态安全风险感知出现重大变化，因而，应当投射更多的注意力到边疆生态安全治理中去。文章从学理上剖析了边疆生态安全风险态势感知状态、边疆生态安全治理为何需要实现从“生态支边”向“生态护边”的战略转型、为何需要通过共生治理形态来有效提升边疆生态安全治理质量等问题。

熊英的《“一带一路”倡议下边疆文化安全治理的表征、挑战与路径》[12]一文认为，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边疆传统文化原有的封闭状态逐渐被打破，边疆的文化面临传承和发展的困扰，边疆的宗教文化与意识形态领域也存在安全隐患，需要切实维护边疆的文化安全，形成拱卫国家安全的文化屏障。由此，她提出从建构“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文化安全治理新模式、边疆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性发展、增强边疆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筑牢边疆文化安全防线等路径来切实维护边疆的文化安全。

张才圣、艾子林的《西方传媒的渗透与我国边疆民族地区文化安全研究》[13]一文指出，西方国家凭借发达的传媒技术，控制着国际传媒的话语权，这势必严重威胁我国的文化安全，尤其是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的文化安全。因此，我国传媒需要突破美西方的议程设置，把握国内外舆论导向，符合国际受众心理，加强原创新闻竞争力，并把自身打造成符合时代特征的现代传媒，从而全面提升中国国际形象和维护边疆民族地区的文化安全。

梅英、杨斐的《西南边疆民族地区抵缅城市收缩问题研究》[14]一文认为，近年来西南边疆民族地区抵缅城市在人口老龄化、经济全球化、新型城镇化以及缅北战乱等因素综合作用下，收缩趋势凸显，边境安全面临极大风险，社会发展也面临巨大挑战。作者认为，应该遵循精明收缩、定向治理、融合发展等原则，对西南边疆民族地区抵缅城市收缩问题进行治理。

李永芳的《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安全体系构建研究》[15]一文指出，随着全球化程度的日益加深，西方国家对我国西南地区文化渗透加剧、敌对势力制造动乱的威胁不断增高，云南边境民族地区文化安全面临着极大的风险。他提出通过完善应对国家安全风险综合体建设、建立民众广泛参与的预警机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思想根基、大力发展边境文化经济、加快构建“国门教育”体系、壮大边境地区民族文化产业体系、掌控好网络文化阵地的主动权、丰富边疆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打好跨境文化安全主动战等路径来构建边境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安全体系。

李超的《“一带一路”背景下西南边疆地区意识形态安全机制的构建》[16]一文认为，边疆民族地区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安全的一道“隐秘防线”，关乎国家文化安全、政治安全等多方面。文章指出，西南边疆地区意识形态安全存在着马克思主义主导地位面临严峻考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受到一定程度的干扰、区域发展不平衡影响共同价值判断、主流价值观念传导阻滞落后等潜在风险，并针对这些风险提出从文化浸润、民生保障、法制约束、风险防控等路径构建意识形态安全机制。

张仕荣、刘金鹏的《共同体视域下筑牢北疆安全稳定屏障的理论与实践》[17]一文指出，内蒙古作为传统的边疆民族地区，肩负着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的重要政治责任，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为筑牢北疆安全稳定屏障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方法指引。

周振晖、拓俊杰的《北疆安全视阈下建设北疆文化品牌的意义研究》[18]一文认为，文化建设在守护祖国北疆的安全稳定中起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北疆文化品牌建设为北疆安全稳定筑牢屏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思想文化力量。

四、结语：历史、文化与国家立场

2024年的国际安全局势愈发动荡，边疆安全成为热点议题，即便像美国这样身处新大陆的移民国家，边疆安全问题也成为其国内政治竞争的重要议题。中国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传统与实践经验的国家，如何在“两个变局”中确保边疆安全与稳定，总结边疆安全与治理实践的历史智慧，并结合新时代的新背景加以提炼和升华，进而形成中国边疆安全研究的路径与理念，已成为当下学术界共同努力的研究目标。边疆对于我国而言，具有历史性的意义，它超越了近现代国家“核心—边缘”结构组成部分的简单定位，更在于其对于理解中华文明与历史连续性和疆域版图统一性之间的关系所具有的粘结价值。正是这种粘结价值，超越了被结构化和边缘化的历史场景与叙事，使我国边疆地区获得了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新定位。以此为突破口，如何将中国历史中的边疆安全经验运用到当下的边疆安全建设中，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提供中国智慧，成为当前边疆安全研究的关键使命之一。2024年的中国边疆安全研究为进行这方面的历史挖掘和经验转化提供了新的讨论空间。

与此同时，如何在文明互鉴与区域互动的整体格局中，更好地理解边疆文化在中华文明中的价值，也成为本年度边疆安全研究的一大关键议题。我国边疆地区与周边国家山水相接、人文相近，形成了特有的人文与地缘环境。这些特质使边疆地区一方面成为中国对外开放和展示自身实力的窗口，另一方面也成为抵御外部威胁、稳边固边的重要前沿阵地。如何在充分理解当地文化传统的前提下，传承好作为中华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边疆文化，构建边疆文化安全防控体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思想根基，仍需学界不断努力。

明确边疆安全在国家安全建设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是新时代边疆安全研究的根本遵循。随着国家安全内涵与外延的不断拓展，2024年的边疆安全研究在细化边疆安全研究内容、统筹边疆发展和安全、积极探索边疆安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等方面不断推进，为今后的边疆安全研究提供了充分的思想基础与知识资源。在坚持国家立场的基础上，通过学术界同仁的共同努力，边疆安全研究将为进一步确立契合时代需求和国家利益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提供学理和实践层面的有力支撑，并提供更多基于中国经验与中国场景的边疆安全研究案例，造福我们的国家以及交往合作的外部世界。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深入做好边疆治理各项工作 推动边疆地区高质量发展[EB/OL].(2024-12-10)[2025-01-21].https://www.qov.cn/yaowen/liebiao/202412/content_6991784.htm.

[2] 张高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多元学科路径探析：以边疆安全学为例[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

社会科学版),2024(6):8-14.
[3]吕文利,张玲.国家安全视阈下中国沿边地区人口最新实态及其类型化研究:基于140个边境县的人口样本考查[J].思想战线,2024(5):115-125.
[4]汪洪亮.以文化之名:民国时期政学两界对"中国式边疆"现代化的思考[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1):10-18.
[5]袁剑,王坤焱.边疆人类学:源流、对象与中国语境[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2):126-136.
[6]金家新.边疆的概念属性、问题语境及其现代性治理[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6):1-9.
[7]吴刚.我国陆地边疆安全问题的空间差异及其治理[D].南宁:广西大学,2024.
[8]胡佳,谭薇.数字赋能边境安全精细化管理的过程机理和实践路径[J].广西民族研究,2024(1):9-18.
[9]王垚.统筹发展和安全视角下边疆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J].区域经济评论,2024(6):65-74.
[10]戴庆厦,尹朋灯.新时代边疆语言研究的新任务:以边疆语言景颇语为例[J].民族语文,2024(4):3-9.
[11]马元喜,张欣.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的边疆生态安全治理:态势感知、战略转型与共生治理[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24(4):68-78.
[12]熊英."一带一路"倡议下边疆文化安全治理的表征、挑战与路径[J].中国应急管理科学,2024(4):46-54.
[13]张才圣,艾子林.西方传媒的渗透与我国边疆民族地区文化安全研究[J].南阳理工学院学报,2024(3):1-4.
[14]梅英,杨斐.西南边疆民族地区抵缅城市收缩问题研究[J].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24(6):25-34.
[15]李永芳.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安全体系构建研究[J].云南开放大学学报,2024(3):110-117.
[16]李超."一带一路"背景下西南边疆地区意识形态安全机制的构建[J].新丝路,2024(13):1-3.
[17]张仕荣,刘金鹏.共同体视域下筑牢北疆安全稳定屏障的理论与实践[J].北疆文化研究,2024(3):25-32+2.
[18]周振晖,拓俊杰.北疆安全视阈下建设北疆文化品牌的意义研究[J].集宁师范学院学报,2024(4):27-32.

Chinese Frontier Security Studies in 2024: History, Culture, and National Stance

YUAN Jian, LIU Lei

(*School of Ethnology and Sociology, Central Minzu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In 2024, Chinese frontier security studies, grounded in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guided by China's national stance, integrate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frontier security, 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challenges in frontier regions. Centered on advancing national security construction and aligned with the overarching goal of modernizing frontier governance systems and capacities, these studies have deepened both theoretically and practically. Significant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fostering academic dialogue and consensus, yielding numerous research outcomes. This paper provides a preliminary review of China's frontier security studies in 2024, focusing on conferences and publications related to a holistic approach to national security, frontier security, and governance. It further summarizes the features of this year's research in terms of history, culture, and national stance.

Key words: frontier security; frontier governance; holistic approach to national security; coordinating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national stance

(责任编辑:李楠)

民族地区社区服务现代化发展路径探析

——以内蒙古自治区为例

李 娟
（内蒙古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摘 要] 本研究以内蒙古自治区为例，通过对12个盟市及其下属旗县的9 642份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分析，考察了民族地区社区服务现代化发展状况。研究从居民对社区服务现代化认知、社区服务政策措施现代化、社区服务体系规划现代化、社区服务基础设施现代化、社区服务工作队伍现代化五个维度展开分析。研究发现，内蒙古自治区社区服务现代化建设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存在社区服务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社区整合资源能力差、服务供给多样性和精细化水平有待提升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四条优化路径：健全社区服务体制机制，建立监管评估机制；加强社区服务专业化、信息化建设，提高社区服务水平；明确政府和社区职能定位，提高社区服务社会参与度；对农村社区和牧区社区进行专项扶持，推进公共服务社区全覆盖。

[关键词] 民族地区；民族地区现代化；基层治理；社区服务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 D669.3;D6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267（2025）01－0050－14
DOI：10.14129/j.cnki.forwordposition.2025.01.006

一、研究背景及文献综述

（一）研究背景与现实意义

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了深刻变迁。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高度重视社区治理与服务，颁布了《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1－2015年）》《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6－2020年）》《“十四五”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等多个文件，对提高社区服务水平提出了明确要求。“社区服务关系民生、连着民心，不断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是落实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1]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为：“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社区作为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石。社区服务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要前提，这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铸牢专项项目“基层社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边疆社会治理耦合与互构研究”（21VMZ016）。
[作者简介] 李娟，博士，内蒙古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基层社区治理、社区社会工作。

也是党和国家多次强调提升社区服务水平的原因所在。可见，促进社区服务现代化发展是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

学术界对于社区服务的概念基本形成了一致看法，即社区服务是以政府指导为前提，依靠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动员广大社区居民，开发和利用社区资源，以满足社区成员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需求为目标而开展的社会服务活动。[3]社区服务的目的在于满足居民各种需求，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其性质是具有福利性和公益性的社会服务活动。[4]“现代化是一系列现代要素以及组织方式连续发生的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化或变革的过程。”[5]在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长期探索和实践的基础上，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理论和实践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基于此，社区服务的现代化便意味着在新的历史方位上不断向前发展，因时制宜地持续调整发展方向，解决社区问题，服务社区居民。

因此，为了更好地满足新形势下社区老年人、残疾人、困难群众等不同人群的利益诉求和多样化需求，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研究并探索实现社区服务现代化势在必行。由于我国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本着因地制宜的原则，本研究聚焦于探析民族地区的社区服务现代化发展路径。

（二）文献回顾

梳理学界已有研究发现，国外相关研究起步较早，主要集中在治理主体与社区治理之间的关系、实际问题及应对策略等方面。[6]国内相关研究的起步相对较晚，主要进行了以下三方面的研究探索。

首先，从理论层面分析社区服务现代化的路径，包括协同治理理论、共同体理论、马克思“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社会系统理论等。任雅兰基于社会系统理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等理论，分析了太原市的本土化实践——“双工一社”的社区治理模式，揭示了其高度的文化包容性、社区资源的有效整合与链接、内部居民的高度自治等优势。[7]马晓玲认为，协同治理理论为城市民族互嵌式社区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撑，通过大量的实证及案例资料，梳理出成都市民族互嵌式社区建设过程中的协同机理以及面临的困境，为提升城市民族互嵌式社区建设提出多方面的建议，为城市民族互嵌式社区建设提供了有益补充。[8]黄晓星等从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角度，阐释了加快社区志愿服务专业化建设能实现社区服务与志愿服务的高效衔接，以及社会服务的精准供给。[9]

其次，实践层面以某地或多地案例切入，阐述多种社区服务现代化模式。如民政部发布了2021年度27个全国基层治理创新典型案例，总结社区治理实践的创新做法，包括完善社区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工作队伍建设及利用网络提高社区服务效率等措施。[10]孟志强等对湖北省“五社联动”特色社区治理机制进行了总结与梳理，反映出不同主体的联动对于社区服务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11]郭青等认为，在城市社区服务场域中要以数字技术支持社区治理现代化，用社区数字微服务赋能社区治理。[12]

最后，在不同主体参与社区治理层面，学者们也给出了不同建议。万广明认为社区治理的核心是以人为本，社区公共服务应吸引多元主体参与其中，从而保证社区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13]陈友华等提出，目前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社区治理应由党委领导、政府负责，依靠社区、单位、市场与社会四方力量实现社区服务与治理。[14]彭宗峰倡导构建服务型政府，提出通过革新传统的管理、自治、情谊与合作等理念来理解社区治理现代化中的服务型政府建构。[15]在社会工作介入社区服务问题上，有学者则认为在城乡社区差异、社区所处地域、社区规模等因素的影响下，社会工作介入社区服务将面临不同困难，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对策分析。[16]

总体来说，既有研究对于社区服务现代化建设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但少有基于大规模地区的社区服务现代化建设情况进行定量分析

的研究。因此，本研究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内蒙古自治区12个盟市及其下属旗县的社区服务现代化建设情况进行抽样调查并展开定量描述性分析，以求全面、客观地分析内蒙古自治区的社区服务现代化建设情况。同时，也对以内蒙古为例的民族地区社区服务现代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旨在为后续的政策制定提供数据支持和理论依据。

根据以往文献，本研究尝试对社区服务现代化作出如下定义：社区服务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在党的领导下，围绕居民对社区服务现代化的认知、政策措施现代化、体系规划现代化、基础设施现代化、工作队伍现代化五个方面，提升社区服务质量和效率，实现社区服务全面升级，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项重要任务。

二、数据描述与分析

本次调查覆盖了内蒙古12个盟市及其下属旗县，涵盖了城市社区、农村社区和牧区社区，共收回问卷9 642份，以求全面、客观、准确地分析以内蒙古自治区为例的民族地区的社区服务现代化情况。

受访者中，来源地为呼和浩特市的人群居首位，占比为38.14%，其次是占比为9.83%的呼伦贝尔市和8.68%的包头市，其他盟市的比例稍逊其后（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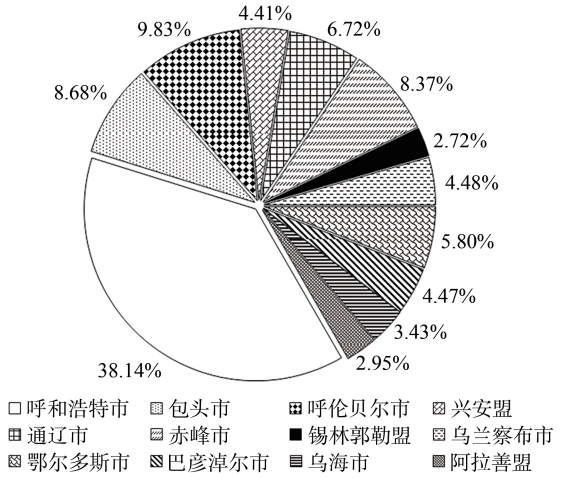

图1　受访者居住地

性别方面，男性的占比为23.94%，女性的占比为76.06%；年龄方面，21—40岁的人群占比最多，为57.42%，41—60岁占比次之，为38.94%，占比最小的是81岁及以上人群，仅为0.20%（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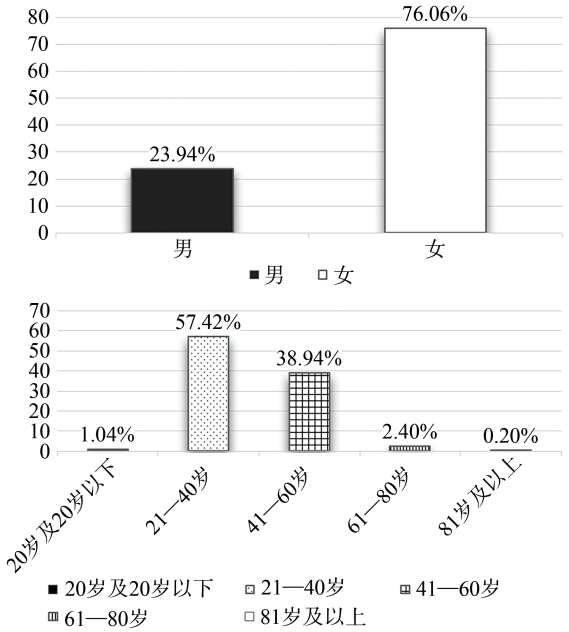

图2　受访者性别和年龄

所属地区方面，受访者大多来自城市社区，占比为84.13%，来自农村社区和牧区社区的受访者所占比例较少（见图3）。

居民身份方面，身份为社区工作者和社区居民的比例相对持平，较为接近，分别为47.80%和49.73%（见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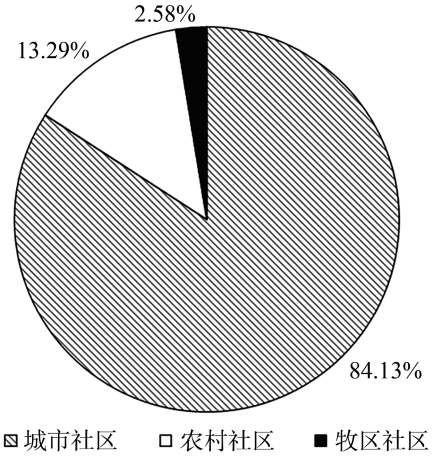

图3　受访者所属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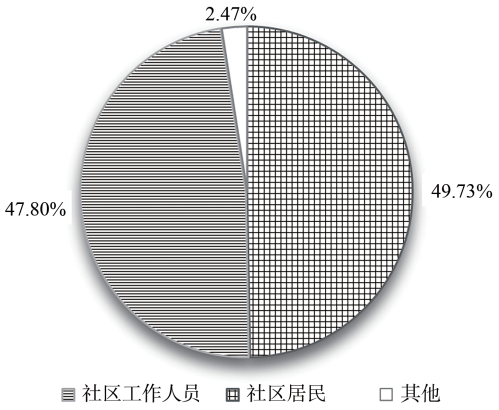

图4　受访者居民身份

调研发现，内蒙古社区服务现代化建设情况总体良好，在体系规划、工作队伍、基础设施、政策措施等几个方面均取得了显著成效，获得了系列优秀成果。

（一）居民对社区服务现代化的认知

本研究从受访者对于社区服务现代化的了解程度、感受程度及参与意识出发，考察了居民对社区服务现代化的认知情况。调查发现，居民整体对社区服务现代化较为了解，且参与意愿较强（见表1）。

表1　居民对社区服务现代化认知情况

操作化维度	选项	比例(%)
对社区服务现代化的了解程度	非常了解	38.07
	了解	33.69
	一般了解	19.63
	不了解	7.55
	非常不了解	1.06
对社区服务现代化建设的感受度	有深刻感受	74.50
	在某些领域有感受	7.03
	没有感受	18.47
居民参与社区服务现代化建设的意愿	非常愿意	59.79
	愿意	31.79
	一般愿意	6.83
	不愿意	1.15
	非常不愿意	0.44

1.居民对社区服务现代化较为了解。数据显示，91.39%的受访者表示了解社区服务现代化，其中表示非常了解的受访者占比最高，为38.07%，了解和一般了解的占比分别为33.69%和19.63%。表示不了解的受访者仅占8.61%。此外，关于对社区服务现代化建设的感受度，表示感受到了社区服务现代化建设的人群占81.53%，表明社区服务现代化已经融入绝大多数居民的生活，并且居民感受颇深。其中，74.50%的受访者表示自己对社区服务现代化建设有深刻感受。

2.居民有较强的参与意愿。大多数居民对社区服务现代化建设有强烈的参与意愿，98.41%的受访者表示愿意为社区服务现代化建设出一份力。其中，持“非常愿意”态度的受访者占比最高，为59.79%，而仅有1.59%的受访者表示不愿意参与，可见居民参与意愿较强。

（二）社区服务体系规划现代化

本文从社区提供的服务是否完备、有无社区服务评价机制、社区服务现代化发展的主要路径、社区提供服务方、社区服务的供给模式、社区服务的资金来源、社区服务现代化建设成效以及完善方向等方面考察了社区服务体系规划现代化的情况（见表2）。

表2　社区服务体系规划状况

操作化维度	选项	比例(%)
社区提供的服务完备度	社区养老、托育、助残服务供给	61.88
	困难群体和特殊人群关爱照护	75.60
	基层卫生、医疗保障服务	66.36
	提供社区教育,助力构建终身学习体系	40.83
	基本公共服务供给	33.18
	以上服务均没有	10.25
	其他	1.63
社区服务评价机制	有	74.98
	无	25.02
社区服务现代化发展主要路径	政府主导	81.71
	社会力量参与	74.83
	居民自主意识提升	73.96
	第三方专业化建设	44.71
	数字化服务网络建设	47.09
	其他	1.29
社区提供服务方	居委会	76.99
	物业	42.95
	居委会+物业	52.81
	群团组织	34.35
	社会组织	39.84
	社会工作者	50.33
	志愿者和社会慈善资源等社会力量	41.80
	其他	1.27
社区服务的供给模式	有完善的线上智慧平台	16.33
	有完备的线下服务体系	24.35
	完善的线上智慧平台和线下服务体系	39.73
	线上、线下服务均不完善	15.18
	没有任何形式的社区服务	4.40
社区服务的资金来源	政府	87.50
	物业	19.04
	企事业单位赞助	31.33
	社区内居民	17.41
	其他	3.16
社区开展社区服务工作的做法	搭建社区服务信息化平台	72.68
	推进社区服务配套设施建设	64.16
	完善社区公共和便民服务功能	71.90
	创新社区服务工作网格化管理	63.57
	重视加强社区服务队伍建设	50.47
	其他	2.30

续表2

操作化维度	选项	比例(%)
社区服务现代化建设成效	节省居民办事时间	80.68
	激发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服务的热情	69.36
	服务特殊群体能力增强	61.11
	社区和谐程度提升	62.94
	促进多民族交流	50.36
	党群、干群关系更加密切	49.03
	其他	2.85
社区服务现代化完善方向	开展安全教育培训和交通安全宣传劝导	70.59
	强化应急和风险防范物资储备保障	64.70
	加强矛盾纠纷化解多元机制构建	61.93
	建立健全发现报告和家庭监护监督制度	49.73
	推进建设各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	48.97
	其他	1.86

1.社区提供的服务相对完备，且有完善的评价机制。大多数受访者所在社区提供了多样化的社区服务，包括社区养老、托育、助残服务供给，以及困难群体和特殊人群关爱照护、医疗保障、社区教育等，且配有相应的社区服务评价机制。此外，社区还开展多样化的社区服务工作，许多社区搭建了社区服务信息化平台，积极推进社区服务配套设施建设，致力于营造完善的线上智慧平台和线下服务体系。内蒙古也不断创新社区服务工作网格化管理，重视加强社区服务队伍建设，促进社区服务现代化发展，符合《“十四五”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要求，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大多数受访者表示，社区服务现代化建设节省了居民办事时间，激发了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服务的热情。同时，社区服务特殊群体的能力也有所增强，促进了多民族交流，党群、干群关系更加密切，社区和谐程度得到提升。许多社区在社区服务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致力于为居民提供丰富多样的服务，以满足居民需求，显著提升了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社区服务供给形成了多元主体格局。社区服务供给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社区工作者、社会工作者、志愿者和社会慈善资源等社会力量辅助的多元主体格局。众多受访者表示，社区服务现代化的主要路径是由政府牵头，动员社会力量参与，依托居民自主意识提升、第三方专业化建设和数字化服务网络建设等，提供多元服务。在“社区提供服务方有哪些”这一多选题中，76.99%的受访者认为所在社区服务提供方包括居委会，52.81%的受访者认为包括居委会和物业，50.33%的受访者认为包括社会工作者，41.80%的受访者认为包括志愿者和社会慈善资源等社会力量，以上几项均达到40%以上。此外，34.35%的受访者认为包括群团组织，39.84%的受访者认为包括社会组织，可见，社区服务供给已形成多元格局。

3.社区服务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社区资源配置的能力相对较弱，无法拓展多元资金供给渠道。数据显示，在社区服务资金来源方面，87.50%的受访者认为资金来自政府，31.33%的受访者认为来自企事业单位赞助，19.04%的受访者认为来自物业，17.41%的受访者认为来自社区内居民的赞助。可见，社会组织和居民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有待提升。

（三）社区服务工作队伍现代化

本文主要从是否与社区以外单位有合作、社区工作人员构成、社区服务工作队伍建设规范度等方面考察了社区服务工作队伍现代化建设情况（见表3）。

表3　社区服务工作队伍现代化情况

操作化维度	选项	比例(%)
社区与社区外单位合作情况	有	10.57
	无	89.43
社区工作人员构成	“两委”班子成员	77.89
	社区工作者	85.69
	慈善组织工作人员	22.46
	社会工作者(有相应证书)	50.18
	志愿者	52.06
	其他	2.95
社区服务工作队伍建设规范度	规范	88.62
	不规范	11.38

1.社区服务工作队伍建设总体规范，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慈善组织等多元主体共治的工作队伍。在“您认为我区社区服务工作队伍建设是否规范”一问中，88.62%的受访者认为是规范的。此外，在社区工作人员构成上，85.69%的受访者表示所在社区工作人员包括社区工作者，77.89%的受访者表示包括“两委”班子成员，大部分社区都有这两类工作人员。相对来看，52.06%的受访者表示社区工作人员包括志愿者，50.18%的受访者表示包括社会工作者，占比相对较少。22.46%的受访者表示社区有慈善组织工作人员。

2.少数社区与社区外单位达成了广泛多样的合作模式。如与包联的企事业单位、医保志愿者服务单位等形成了长效持久的合作机制，但大部分社区与社区外单位仍无合作情况。10.57%的受访者表示与社区外单位有合作，89.43%的受访者认为所在社区与社区外单位无合作。

（四）社区服务基础设施现代化

本文将社区服务基础设施现代化发展情况概括为社区基础设施覆盖率、基础设施种类、社区信息化平台建设三个方面（见表4）。

表4　社区服务基础设施现代化情况

操作化维度	选项	比例(%)
社区基础设施覆盖率	0%－20%	11.45
	21%－40%	16.48
	41%－60%	23.43
	61%－80%	29.38
	81%－100%	19.26
社区基础设施种类	开放停车场地	61.36
	文化体育设施	66.94
	会议活动场地	68.22
	公共消防设备	54.31
	老年服务站	55.81
	社区卫生服务站	60.60
	其他	2.79

续表4

操作化维度	选项	比例(%)
社区信息化平台建设	劳动保障和就业	74.36
	流动人口管理	70.00
	残疾人服务	69.58
	养老托育等社区到家服务	43.33
	链接社区周边生活性服务业资源	40.52
	建设便民惠民智慧生活服务圈	47.27
	其他	3.56

1.社区基础设施覆盖率较高，设有开放停车场地、文化体育设施、会议活动场地、公共消防设备、老年服务站、社区卫生服务站等多种公共设施以满足居民的多样化需求。大多数受访者认为社区基础设施覆盖率高于40%，其中，29.38%的受访者认为基础设施覆盖率可达61%－80%，23.43%的受访者认为达到41%－60%，19.26%的受访者认为达到81%－100%。基础设施种类方面，68.22%的受访者认为所在社区有会议活动场地，占比最高，66.94%的受访者表示所在社区有文化体育设施，61.36%的受访者表示所在社区有开放停车场地，60.60%的受访者表示有社区卫生服务站，55.81%的受访者表示有老年服务站，54.31%的受访者表示有公共消防设备。

2.社区信息化平台服务种类多样。内蒙古积极推动智慧社区建设，社区信息化平台服务覆盖了劳动保障和就业、流动人口管理、残疾人服务、养老托育等社区服务，涵盖了社区周边生活性服务业资源和建设便民惠民智慧生活服务圈等内容。信息化平台方面，74.36%的受访者认为所在社区有与劳动保障和就业相关的信息化服务，占比最高，47.27%的受访者表示所在社区有便民惠民智慧生活服务圈，43.33%的受访者表示有养老托育等社区到家服务，40.52%的受访者表示有链接社区周边生活性服务业资源。这表明社区信息化平台已初步形成多元化服务体系。

（五）社区服务政策措施现代化

本文将社区服务政策措施现代化概括为社区服务现代化政策完善度、社区服务体系规划合理度等方面（见表5）。

表5　社区服务政策措施现代化情况

操作化维度	选项	比例(%)
社区服务依照标准	社区公共服务目录及准入制度	71.60
	社区服务质量综合评价体系及认证办法	63.02
	社区服务法规政策	61.16
	以上均无	10.31
社区服务政策措施完善度	非常完善	35.08
	比较完善	44.71
	不确定	12.31
	比较不完善	4.67
	非常不完善	3.24
社区服务体系规划合理度	非常合理	38.17
	比较合理	43.30
	不确定	14.08
	比较不合理	2.27
	非常不合理	2.18

内蒙古社区服务体系规划科学合理，政策措施较为完善。内蒙古社区服务依照标准主要有社区公共服务目录及准入制度、社区服务质量综合评价体系及认证办法、社区服务法规政策等。数据显示，81.47%的居民表示社区服务体系规划科学合理，79.79%的居民认为社区服务政策措施较为完善。可见，内蒙古社区服务政策措施现代化建设得到了大多数居民的认可。

三、内蒙古社区服务现代化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综上所述，内蒙古在社区服务现代化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形成了规范化的社区服务现代化体系规划以及相应的政策措施，致力于打造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服务模式，基础设施建设也较完备。然而，在全面实现社区服务现代化、尽可能使更多的社区居民享有现代化服务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

（一）社区服务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体制机制不顺畅

本次调研覆盖了城市社区、农村社区和牧区社区，调查发现：一方面，大多数社区没有形成科学、具体、准确、统一的服务标准及成果评估标准，体制机制还不顺畅，党建引领在社区服务现代化体系建设中作用发挥还不充分；另一方面，社区服务在农村、牧区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城市社区服务的基础设施、政策措施和体系规划相对完善，农村和牧区发展则相对滞后，没有形成体系化的体制机制[17]，在信息化智慧社区建设方面也较为滞后。牧区由于地广人稀、人口分散，社区服务组织不便。农村由于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相对落后，许多青壮年为了追求高质量的生活而离开农村去往城市，农村人口空心化问题严重，社区服务发展条件受限，且村民以老人、小孩居多，参与社区服务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不高、能力有限。因此，农村、牧区社区服务的现代化发展不充分，与城市发展形成了较大差距。

（二）社区整合资源能力弱，社会参与程度较低

从调研情况来看，目前内蒙古社区整合资源的能力较弱，社区服务的资金大多来自政府，社区与社区外单位、企事业单位与社区内居民的合作链接微弱，社会参与程度较低。上文所述调研情况虽然可能会因部分社区居民不了解社区情况而产生数据上的误差，但总体可反映出社区整合资源能力相对较弱的情况。在这种状况下，社区受资源限制，难以开展丰富多样的社区服务，包括社区居民需要的居家养老、青少年教育、优抚、救济、精神慰藉、医疗保障、环境卫生等服务，从而导致社区服务现代化进程缓慢。这一问题产生的原因可能在于社区工作理念的行政化倾向，由于社区长期依附于政府的资金、政策支持，习惯有事情找政府，而非主动解决，形成了“等靠要”的思维习惯[18]，因而未能充分与社区以外的组织形成长久的合作机制，资源整合也较为困难。

（三）社区服务总体水平不高，供给多样性和质量有待提升

受资源约束，内蒙古社区服务总体水平不高，服务类型和服务质量有待提升。目前，社区服务集中于困难群体和特殊人群关爱照护、养老供给和基层卫生医疗保障，在安全教育培训、矛盾调解、家庭关怀和各民族交往等方面的服务有待完善与丰富。社区由于人力、物力、财力缺乏，在精细化的安全教育培训、应急和风险防范、物资储备保障以及矛盾纠纷化解等专业化服务的供给上仍有所欠缺。近年来，社会风险事件频发，自然灾害时发，大型公共卫生事件突发。与此同时，社会风险也在加剧，就业形势严峻，大学生就业困难，裁员、失业现象屡见不鲜，居民易产生不安全感和焦虑感。在日益复杂的社会形势下，居民对社区服务需求呈现出多样化、多层次的趋势，因此社区保障供给和质量也亟待扩大与提升。

四、民族地区社区服务现代化发展路径及优化策略

本次调查的样本量充足，能够客观反映民族地区社区服务的发展现状，研究显示，内蒙古社区服务现代化发展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在对调研数据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以下发展路径及优化策略。

（一）健全社区服务体制机制，建立监管评估机制

社区服务体制机制是开展社区服务的关键，其方向引领作用至关重要，起着统领全局的指导作用。而实践经验也为社区服务体制机制的完善指明了方向。社区服务现代化实践表明，建立统一的服务标准及成果评估标准是重中之重，需要健全社区服务体制机制，建立服务监管评估机制，推动实现社区服务现代化建设规范化、统一化。在制定统一的社区服务标准的基础上，应在社区服务标准体系中明确各服务主体的权利和责任，力求条则清晰，形成政府、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社会工作者、社会慈善资源、志愿者和居民等多主体共同参与的多元共治格局，以最大化利用资源，实现资源高效配置。

在社区服务体系建设方面，天津市和平区的创新探索值得借鉴：（1）构建“十大服务体系”，将社区服务的多方力量凝聚起来，形成合力；（2）将物业公司、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以及居民进行权责绑定；（3）明晰社区组织的权责关系，做到“权随责走、费随事转”，进一步细化各个社区组织的具体职责；（4）保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社区文化品质，通过传统文化节目丰富社区文娱生活。[19]天津市和平区从明确社区内各组织的权利和责任着手，细化具体工作，统筹协调各方资源，建立完整的社区服务体系，提升社区服务品质；通过明确各主体权责，凝聚多方力量，为其他地区社区服务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益参考。

（二）加强社区服务专业化、信息化建设，提高社区服务水平

当前，各类社会问题纷繁复杂，在应急保障、特殊群体卫生照护、矛盾调解和心理健康等服务领域，社区往往需要专业化人才以有效应对各类问题，因此，加强社区服务专业化建设刻不容缓。与此同时，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物联网发展如火如荼，极大便利了群众的生活，改变了群众的生产生活方式。而社区作为基层治理的重要单元，理应跟上时代的步伐，运用先进技术手段提供更多便民服务。

加强社区服务专业化建设，应完善和更新社区工作队伍。政府和社会组织可加大资金投入，通过购买服务方式引进社会工作机构和专业人才，并制定服务规范以实现有效监管。例如，太原市探索推出“双工一社”的治理模式，注重发掘社工机构为社区提供的专业服务，以此延伸开展专业化服务。[7]该模式下的“双工站”不仅是为辖区居民提供专业社会服务的工作平台，也是社会工作者的能力支持平台和辖区内社会工作者、志愿者、社会组织的交流、互动与资源共享平台。将社会工作者与志愿者联动模式引入项目管理和实施过程，提升了社区服务工作的成效。社工机构由政府购买其服务，为社区提供专业化人才。社工机构作为社会工作者的能力支持平台，有计划有步骤地对社会工作者、志愿者进行专业培训，探索社会工作者、志愿者、社区自组织的联动性，积累社会工作经验，推进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提高了社区服务水平。此外，社区服务工作队伍还可引进其他专业人员，如专门的卫生服务人员，可借鉴发达国家经验，为社区特殊群体配置专业医疗服务人员并提供资金，定期举办公益卫生健康服务或健康知识普及活动。以澳大利亚为例，其社区医疗卫生现代化服务先进，机构完善，社区通过专门机构组织医生、护士为社区个体、家庭和团体提供全方位服务，政府为社区提供

了充足资金，以满足居民健康需求；社区保健部门为居民定期举办健康教育学习班，提升全民保健意识，如禁烟教育、糖尿病防治教育、遗传病健康咨询等。[20]

加强社区服务信息化建设，大力推进智慧社区建设。智慧社区服务是一种新型的社区管理模式，旨在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促进社区服务可持续发展。[21]第一，应建立智慧社区服务标准体系，推进社区服务规范化，在保障居民隐私权的基础上开展相应服务。第二，应建立完备的线上服务平台，实现社区公共服务、政府信息公示、居民诉求等信息的线上同步。线上服务平台应覆盖助残、养老托育等社区到家服务，以及流动人口等特殊人群的需求。同时，也应关注与居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居民迫切关心的各类事项，政府部门、居民委员会、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可以从平台上及时发现居民的诉求或存在的问题，并进行上报、处理、反馈、督查。[22]

在国内，部分城市在信息化智慧社区建设方面已取得了一定进展，如北京市2017年启动了智慧社区服务标准体系的实施工作，该体系包括智能停车系统、智能垃圾分类系统、智能安防系统等。其中，智能停车系统是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智能识别车牌号码和车辆类型，实现了车辆的自动识别和自动停车，不仅提高了停车效率，还减少了城市交通拥堵和环境污染。[23]在国际上，东京的智慧社区服务标准体系应用也备受瞩目。东京市政府通过建立智慧社区服务中心，整合社区资源和服务，提高服务效率和质量。东京市政府还通过智慧社区服务平台，为居民提供便捷的在线服务，如在线预约医生、在线缴纳水电费，通过智能垃圾分类系统，实现了垃圾分类和回收利用，有效减少了环境污染。此外，东京市政府通过智能停车系统，实现了停车位的智能分配和管理，有效缓解了城市交通拥堵问题。[23]这些措施不仅提高了居民的生活质量，也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作出了贡献。未来，内蒙古在借鉴国内外经验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完善智慧社区服务标准体系和相关法律法规，提高居民的信任度和参与度，进而提高社区服务水平。

（三）明确政府和社区职能定位，提高社区服务社会参与度

随着社会结构的分化和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一方面，不同职业、民族和文化层次的人群有着多样化、异质化的社区服务需求，亟需多主体参与社区服务供给；另一方面，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老年人口规模日益扩大，对于空巢、留守、高龄老人，需提供更为多元、精细的社区服务。因此，要明确政府和社区职能定位，在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提高社区整合资源的能力，提高社区服务的社会参与度，拓宽多元的社区服务供给渠道，扩大服务供给范围，提高服务质量。2022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十四五”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明确指出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要坚持创新发展理念，充分调动群团组织、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志愿者和社会慈善资源等力量，加强市场引导，充分发挥政府作用，激发全社会的活力，坚持完善党组织的领导，不断完善社区服务体系，创新社区服务方式，提高社区服务水平。[1]

为充分调动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志愿者和社会慈善资源的积极性，在政府层面，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引进社会组织为社区服务提供更多的人力、物力资源，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开展多样化活动，并注重对社会组织的规范化建设。例如，深圳市盐田区为有效激发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专门设立了扶持资金，对有意向为社区提供优质服务的组织进行培育；为提升社会组织在社区治理工作中的影响力，建立了专项工作制度，如定期举办宣传活动等；针对社会组织从登记到运营的全过程，出台了具体规范指引，解决了社区社会组织办事效率低下的问题。[24]太原市“三社联动”的本土化实践方式，以政府购买服务为牵引，以社区为平台，以社会组织为载体，

以社会工作者为骨干，以满足居民需求为导向，通过社会组织引入外部资源和社会力量，借助社会工作者的专业力量，为社区提供专业服务，解决单一服务供给与居民多层次需求之间的内在矛盾。实现多层次供给结构，是社会治理、社会服务供给和社会动员的新模式。[7]这种模式的实质并非政府与社会组织简单的互动，而是二者通过有效合作，打破原有的服务模式，形成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即坚持政府领导、社会组织共担，在政府的监督下社会组织引导社区居民参与基层治理，根据居民需要提供有针对性的专业化服务，形成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良好格局。此外，政府还可通过宣传典型案例、提供专门的参与渠道，引导社会组织、居民和志愿者主动参与社区服务现代化建设。

（四）对农村和牧区社区进行专项扶持，推进公共服务社区全覆盖

农村和牧区由于受条件限制，社区公共服务现代化发展相对滞后。因此，应对农村和牧区进行专项资金扶持，在党建引领下推进社区服务现代化建设，确保社区公共服务实现全覆盖。鉴于农村和牧区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限制，政府应当通过资金扶持和经费保障，建立综合的社区服务一站式平台，使村民、牧民通过平台享受到多样化的便民服务，包括学习培训、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此外，社区服务中心也可采用定期上门服务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的方式，进一步优化为民服务，双线并行提高资源利用率。例如，无锡市在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建立并完善了以村民服务为重点的为农服务中心和社区服务中心，有效整合了服务资源，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学习培训、健身娱乐、图书阅览、购物消费等服务内容相对集中，村民可实现“跑一个地方办几件事”，省时又省力。[25]基层干部反映服务中心建成后，村里运动健身的人多了，寻衅滋事的人少了；阅读学习的人多了，赌博迷信的人少了；爱护环境的人多了，乱丢垃圾的人少了。此外，还可通过对农村和牧区给予人才优惠政策补贴的方式，为其引进专业化人才，开展专业化社区服务，从而提高农村社区和牧区社区服务质量。

五、总结

本研究通过对内蒙古12个盟市及下属旗县的9 642份调查问卷进行分析，对地区社区服务现代化情况有了较为客观、具体的认识。研究结果显示，内蒙古社区服务现代化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在居民对社区服务现代化认知、社区服务政策措施现代化、社区服务体系规划现代化、社区服务基础设施现代化、社区服务工作队伍现代化等方面均取得了一定成果，大部分居民对社区服务现代化有着清晰的认识和深刻感受，也有强烈的参与意愿。

内蒙古社区服务政策措施和体系规划大体完备，形成了较为规范的社区服务工作流程和多元的社区服务工作队伍，构成了以政府为主导，社区工作者、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为辅助的多元主体格局。在社区服务基础设施方面，建设了较为完备的线下服务设施和线上服务平台，包括停车场地、文化体育设施、老年服务站和社区卫生服务站等。然而，当前也存在一些挑战，如社区服务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体制机制还不顺畅，社区整合资源能力差，居民参与程度较低，社区服务总体水平仍不高，服务多样性和精细化水平有待提升等。

为此，本文提出四条发展路径及优化策略，一是健全社区服务体制机制，建立监管评估机制；二是加强社区服务专业化、信息化建设，提高社区服务水平；三是明确政府和社区职能定位，提高社区服务社会参与度；四是对农村和牧区社区进行专项扶持，推进公共服务社区全覆盖。本研究认为，通过这四条路径持续优化民族地区社区服务现代化建设，可以实现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需求，增强人民生活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进而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为“十四五”规划顺利完成

奠定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1]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十四五”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的通知[EB/OL].(2022-01-21)[2024-04-24].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2-01/21/content_5669663.htm.

[2]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N].人民日报,2024-07-22.

[3] 夏建中.从社区服务到社区建设、再到社区治理:我国社区发展的三个阶段[J].甘肃社会科学,2019(6):24-32.

[4] 张平,雷洁琼.社区服务、社区建设、社区管理、社区治理的概念辨析[J].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7(1):84-88.

[5] 郑安兴.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逻辑分析与路径选择:以珠海等城市的实验性探索为例[D].长春:吉林大学,2018.

[6] 陈雅丽.国外社区服务相关研究综述[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7(4):173-176.

[7] 任雅兰.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双工一社”模式研究:以太原市L社区为例[D].合肥:安徽大学,2021.

[8] 马晓玲.协同治理视角下城市民族互嵌式社区建设研究:以成都市为样本[D].成都:西南民族大学,2021.

[9] 黄晓星,蒋婕.治理现代化与社会建设:社区志愿服务发展的分析进路[J].中国志愿服务研究,2020(2):63-79+209-210.

[10] 本刊编辑部.加快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2021年度全国基层治理创新典型案例集萃(下)[J].中国民政,2022(6):28-36.

[11] 湖北省民政厅课题组,孟志强.“五社联动”助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J].中国民政,2021(17):37-40.

[12] 郭青,王国宁.外部融接与内部并举:推进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的二重向度[J].领导科学,2022(6):120-124.

[13] 万广明.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考量及制度保障研究:以青岛市M区为例[D].青岛:青岛大学,2019.

[14] 陈友华,夏梦凡.社区治理现代化:概念、问题与路径选择[J].学习与探索,2020(6):36-44.

[15] 彭宗峰.社区治理现代化中服务型政府的理念选择[J].党政研究,2016(1):119-126.

[16] 唐晚词.社会工作介入社区服务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中国管理信息化,2017(4):190-191.

[17] 黄蕾.我国新型农村社区治理研究[D].兰州:兰州大学,2017.

[18] 申丽娟,陈跃.社区治理现代化的结构性障碍及其内源式破解[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118-123.

[19] 张琪.新时代城市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D].西安:西安工业大学,2021.

[20] 张秀芳,张晓.澳大利亚护理见闻:走向科学化、现代化的社区服务[J].国外医学.护理学分册,1999(1):41-43.

[21] 王如鹏.社会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城市社区服务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22(5):73-77.

[22] 王琼.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全国性的城市老年人口调查数据[J].人口研究,2016(1):98-112.

[23] 杨永朗.智慧社区服务标准体系促进城市治理现代化研究[J].中国标准化,2023(19):58-61+69.

[24] 刘家明,蒋亚琴.城市社区服务平台的演化逻辑及治理现代化启示[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19(5):59-64.

[25] 陈正康.强化社区服务 建设现代化新农村[J].江南论坛,2009(8):24-25.

Exploring Pathways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Community Services in Ethnic Regions: A Case Study of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LI Juan

(*School of Ethnology and Sociology,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Hohhot* 010021,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modernization of community services in ethnic regions, using the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as a case study.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9642 questionnaire survey responses collected from 12 prefecture-level cities

and their subordinate counties, this paper evaluates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modernization of community services in five dimensions: residents' awareness of modernization of community services, modernization of policy measures for community services, modernization of community service system planning, modernization of community service infrastructure, and modernization of community service workforce.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while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community services in Inner Mongolia, challenges persist, including imbalanced and insufficient urban-rural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services, weak resource integration capabilities within communities, and a need to enhance the diversity and precision of service provision. To address these problems, this paper proposes four optimization pathways: (1) improving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and establishing supervision and evaluation systems for community services; (2) strengthening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and informatization of community services to elevate service quality; (3) clarifying the roles of government and communities to boost social participation in community services; and (4) providing targeted support for rural and pastoral communities to achieve full coverage of public services.

Key words: ethnic regions; modernization of ethnic regions; grassroots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of community services

（责任编辑：李萌）

对中华文明现代转型之“形”与“态”的当代审视

栾 林 战立群
（东北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5）

[摘 要] 资本主义文明长期对世界各文明行使“形”与“态”的双重霸权，日益暴露出其无法解决的严重矛盾，世界各文明在实践中对全新文明形态产生了迫切需求。在“两个大局”的时代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敏锐地察觉到了时代之声、文明之声，在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正确指引下，创造性地提出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根植于中华文明，继承了中华文明的独特文明基因，沿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发展于我国不断变化的主要矛盾，是对人类文明谱系的丰富，代表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独特之“形”；中华文明在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引领各文明自主探索现代化道路，倡导各文明交流互鉴繁荣发展，坚持各文明和平发展和合共生，明确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引领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必然之“态”。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卓越成就，持续推动中华文明开启新的时代征程，为人类文明开辟了全新道路。

[关键词] 中华文明；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现代转型；文明交流互鉴
[中图分类号] G122;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267（2025）01－0064－11
DOI：10.14129/j.cnki.forwordposition.2025.01.007

当今世界面临着发展赤字、治理赤字、和平赤字、信任赤字等全球性的发展挑战，人类文明发展与现代化进程曲折动荡。一方面，人类文明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加，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另一方面，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式现代化蓬勃发展，我国综合国力显著增强，有能力并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日益重要。在“两个大局”的时代背景下，国家主席习近平发出了“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1]的时代之问。推动中华文明现代转型、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是我们党回答“时代之问”的“文明之答”，内含“形”与“态”的双重含义。文明之“形”指文明存在的具体形式，是文明发展至今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文明之“态”指文明发展的态势，是文明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对人类文明未来发展方向的前瞻性判定。由于文明发展是文明自身历时性演进与各文明之间共时性互动的辩证统一，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海外传播力提升的文化路径研究”(23YJC710074)；辽宁省教育厅高校基本科研重点项目“中国共产党的文明观研究”(LJ112410173078)。
[作者简介] 栾林，博士，东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战立群，东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先进的文明之“形”能引领文明之“态”，进步的文明之“态”同样能裨益文明之“形”。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不但代表着人类文明的全新形态，是对人类文明谱系的丰富，而且引领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态势，指明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对中华文明现代转型之“形”与“态”进行全方位审视，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中华文明的理论意蕴，更好地肩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一、对人类文明“形”与“态”的当代审视

进入新时代，随着资本主义文明的内在矛盾愈发尖锐，其对人类文明的“形”与“态”的霸权也逐渐暴露出来。世界呼唤一种既有利于个体文明发展、多元文明交流，又能摆脱资本主义文明束缚、引领人类文明未来发展态势的崭新文明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时代脉搏，以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审视当代人类文明，提出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崭新文明命题。

（一）资本主义文明对人类文明施加“形”与“态”的双重霸权

文明的发展与人类社会进程息息相关，不仅标志着生产力的提升与社会结构的变革，也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追求。资本主义文明在历史上极大地推动了经济与科技的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社会财富。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资本主义文明的缺陷日益暴露，为了维持自身统治地位，资本主义一方面鼓吹“文明终结论”，试图将资本主义文明定义为唯一的文明形式，掩盖其文明缺陷，阻碍了世界各文明的多样化发展；另一方面宣扬“文明冲突论”，夸大文明之间的利益冲突，企图将资本主义文明对落后文明的压迫合理化，给世界各文明发展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

其一，资本主义文明对各文明发展模式施加“形”之霸权，人类文明亟待新形式的出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维护自身统治地位，推行资本逻辑，在全球范围内宣称资本主义文明是人类文明的“终结”，其中以“历史终结论”为代表。“历史终结论”认为，人类制度将终结于西方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制度，其他文明应依照资本主义文明的“先进模式”按图索骥地发展，并妄言亚洲、非洲文明及其意识形态是“地区性的、工具主义的”[2]387。这种观点来自对文明性质的错误认识，是将西方文明发展模式强加于其他文明的霸权主义，阻断了文明多样化发展的道路。在“历史终结论”的影响下，世界各文明形式走向同质化，人类现代化进程陷入僵局，资本主义文明发展模式导致人类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生态系统失衡、消费主义泛滥。在这样的现实中，世界各国需要一个既能继承自身文明传承，也能融入现代化发展进程，又能有效应对资本主义文明霸权的、适合本国国情的文明形式。

其二，资本主义文明对各文明发展态势施加“态”之霸权，人类文明亟待新态势的出现。资本主义文明在看待各文明发展时，奉行“文明冲突论”，夸大各文明间的差异，试图将文明的多样化发展态势粗暴地定义为冲突对抗，否认各文明存在一个共同的发展目标，忽视文明之间的和谐互动，认为文明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且必将带来无止境的对抗。在这种理念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文明交流的过程中刻意忽视文明交流带来的裨益，将文明之间的交流置于“你强我弱、你优我劣”的二元对立中，借此合理化资本主义文明，以打压其他文明，从而实行文明霸权行径。世界各文明因而被迫处于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孤立主义的阴影下。为了实现和平发展的共同目标，人类渴望构建一个互学互鉴、多元互动、和平发展、美美与共的文明体系。

（二）历史唯物主义对人类文明的“形”与“态”的合理认识

资本主义文明观具有形而上学的特质，其一方面静止地看待文明，否认文明的发展进步，另一方面又孤立地看待文明，忽视文明间的互动，夸大文明冲突，将文明发展引向故步自封和孤立对抗。只有以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对当代文明进行“诊脉”，才能彻底揭

示资本主义文明的“病灶”，引导世界文明迈上和谐发展之路。马克思多次批判资本主义文明观念内嵌的虚伪性，用“文明中的野蛮”[3]69来比喻资本主义“文明世界的根本缺陷”[3]107。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文明”是与“野蛮”相对应的，是表示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性范畴，超越了资本主义文明观形而上学地看待社会形态和历史发展阶段、孤立抽象地理解文明的理性主义。马克思将文明置于历史进程中进行考察，以人类的社会历史实践来理解文明的形式和内涵，既把握了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又解释了文明发展进程中的特殊形式；既肯定了文明发展的客观趋势，又认可了文明发展的多样形态，为解答当代文明困局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引。

其一，马克思从文明与生产力发展的关系中发现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普遍态势及其方向指引。马克思认为，文明的果实就是已经获得的生产力。[4]613而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包括分配方式、交往方式、劳动组织形式等生产关系会进行调整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一切社会形式都会随之改变，文明也得以发展进步。“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5]43-44资本主义文明在创造巨大财富的同时，通过“野蛮的文明扩张”，将无论处于哪个历史发展阶段的文明形态都卷入其发展进程，并在对其他文明的剥削过程中“使人的对象性本质作为某种仅仅是外在的、物质的东西同人分离”[6]102，文明的异化与人的异化问题暴露无遗。为了消除资本主义文明带来的异化问题，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发展共产主义文明、彻底消除资本主义文明的异化效应就成为人类文明的前进方向。

其二，马克思认为文明发展的普遍态势会通过不同的文明形式表现出来。马克思反对将其理论视作“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7]466，强调即使处于相似的生产力水平，不同民族和社会的文明发展情况也各不相同，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文明道路的统一性并不排斥文明形式的多样性，每一种文明形式都是由一个个现实的人的劳动组成的，影响劳动的诸多因素包括文化、地理位置、社会制度、礼仪、习俗体系等，这些因素都会影响文明形式的生成。其中，文化作为民族凝聚力和社会创造力的源泉，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历史实践中凝结成的稳定的精神传承，在文明的历史发展中具有相对稳定性，是该文明的思想、价值、审美追求的总和，成为一个文明区别于另一个文明的关键因素。总之，不同文明在演进中的具体轨迹也不尽相同，甚至“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7]466，从而产生了不同的文明形式。

马克思的文明理论指向了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即文明以生产力的提升为发展动力，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旨归，并依据自身文明的具体情况生成独具特色的文明形式。习近平总书记倡导构建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正是对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在当今世界的继承与发展。

（三）人类文明新形态对人类文明的“形”与“态”的“时代之答”

进入新时代，伴随着国际格局的深刻变革，世界各文明在资本主义文明的长期压迫下，对文明的现代转型及其合理形态产生了迫切需求。与此同时，中国的综合国力日益增强，有能力更加主动地承担起国际责任。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提出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重大命题。

人类文明新形态内含的“新”文明形式来自独特的文明继承与发展道路。一方面，人类文明新形态因对自身独特文明的继承发展而“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化研究中华文明特质和形态，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建设提供理论支撑”[8]。只有立足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未来。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将历史经验与理论创新相结合，对中华文明进行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动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另一方面，人类文明新形态因坚持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发展道路而“新”。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建是“从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发展变化出发，经过审时度势、科学判断、深入思考提出来的”[9]。中国塑造的全新文明形态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契合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实际，指明了文明现代化进程的正确方向，为那些既希望发展又希望保持独立性的文明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为世界各文明的多样化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人类文明新形态引领的“新”文明态势，涵盖文明发展的共同道路、动力、愿景三个层面。首先，人类文明新形态激励着世界各国立足本国国情探索现代化路径，引领着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的全新态势。“希望广大发展中国家都能从本国国情出发，在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基础上，探索实现现代化的新路径。”[10]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独具特色的现代化模式，激励着世界各国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其次，人类文明新形态倡导各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引领文明发展的全新动力。“中国共产党将致力于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人类文明进步。”[11]世界各国皆有独具特色、源远流长的文明传承，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必将为人类文明花园增添色彩，并为世界各文明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全新动力。最后，人类文明新形态维护文明和平发展，代表着文明发展的共同愿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愿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新的发展机遇，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12]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就不仅使自身得到发展，更为世界各文明提供了利益汇合点和发展机遇，中国用实际行动向世界证明了和平才能带来发展、合作才能实现共赢的文明观。

二、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代表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独特之“形”

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是由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其之所以能体现人类文明新形态之“形”，是因为中华文明及其现代转型都深深根植于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进程，成为人类文明谱系中呈现出的一种独特的文明形式。

（一）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根植于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华文明

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保留了鲜明的民族特性。中华文明的长期统一形成了文明的连续性，中华文明浓厚的土地情结升华为文明的和平性，中华文明高度发达的农业经济孕育出文明的创新性，这些特性成为中华文明发展的独特基因，使中华文明在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呈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

第一，中华文明奉行“九州通贯，天下一同”的统一原则，其历史的连续性形成了文明的统一性，使中华文明始终坚持同文共轨、遐迩一体。与同期西方文明频繁的政权更迭和以城邦制为代表的多政治集团分割治理不同，中华文明凭借其优越的地理条件、统一的文化理念、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等因素，长期保持着思想和疆域的大一统，并在漫长的文明演进历程中形成了中华文明的稳定性与连续性。一方面，中华文明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始终能够保持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文明延续；另一方面，五千年一脉相承的中华文明，积淀了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文化底蕴与历史精神。这种薪火相传的文明延续和文化积淀，使中国人民即使在国家积弱、文明蒙尘之时，仍能赓续中华文明；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引领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仍能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绽放文化自信的文明华彩，为推动中华文明现代转型提供了重要的文明基因和价值基础。中华文明的统一性，既让“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13]成为共识，又使全国各族人民坚定团结在党的领导下，汇聚起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力量，为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凝聚起强大合力。

第二，中华文明秉持“地载万物，生生

不息”的土地情怀，由此升华出和平性、包容性，使中华文明始终坚持交流交融、合作共赢。马克思指出，东方“一切现象的基础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这甚至是了解东方天国的一把真正的钥匙”[14]256。在古代中国，土地的控制权始终被统治阶级牢牢掌握。封建时期，中国每一次的政权更迭，统治者都要颁布新的土地政策，重新丈量和分配土地，提高对土地的掌控程度，这反映出中华文明对土地的高度重视。[15]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土地情结升华为中华文明特有的和平性与包容性，形塑了中华文明的包容特质。一方面，中华民族对土地依恋的农耕文化深入人心，并由土地情结衍生出了追求稳定、热爱和平的价值观念，使和平性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特性，为中华文明在现代转型的过程中秉持和平发展理念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中华文明秉持“地载万物”“厚德载物”，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文明交往模式。中华文明以开放胸怀迎接各方文明，展现出极大的包容性，成为中华文明在现代转型过程中吸收借鉴世界各文明优秀成果的鲜明底色。

第三，中华文明受益于“倬彼甫田，岁取十千”的农业成果，依托高度发达的农业经济孕育出卓越的创新性，为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注入了进取精神。同期的西方文明虽然在农业领域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受制于国家的规模和动荡的社会环境，其农业技术的创新和普及程度有限。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华文明的农业生产不但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创新，实现了持续繁荣，而且对各行业的快速发展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早在新石器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便具备了适宜原始农业发展的条件，黍、禾、麦等作物的种植标志着中华民族的农业在当时已处于领先水平。进入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农业需求的增长，种植、水利工程、生铁冶炼等技术的迅猛革新和发展，催生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兴起。从两汉时期五铢钱的广泛流通，到唐代柜坊和飞钱的涌现，铸币技术的提高极大提升了商业贸易和货币流通的效率，促进了商业贸易的进一步繁荣。中华文明以农业生产为基础，不断推动手工业、商业等领域的创新发展，孕育了深厚的创新基因。如今，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为其现代转型提供了内生动力，使其能够立足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不断适应时代要求和现实需要。

（二）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发展于我国不断变化的主要矛盾

近代以来，中国长期“闭关锁国”，与世界现代化进程严重脱轨。中华文明需要融入世界历史进程、完成现代转型，在这个转型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融入世界现代化进程的迫切需求与自身发展水平不足之间的矛盾。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阶段、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四个发展阶段。由于社会发展的复杂性，每个阶段面临的主要矛盾各不相同。这些矛盾不但体现了当时社会的物质和精神状况，而且对社会物质和精神领域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在主要矛盾影响下生成的物质和精神因素，其凝结成的文明必然带有该时代主要矛盾的特征。中华文明现代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矛盾正是不同历史时期社会主要矛盾在文明层面的体现。中华文明现代转型，是中国共产党在深入分析其矛盾的基础上，在马克思主义“魂脉”指引下，结合不同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中国人民自身的实践历程中所完成的。

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西方人用炮火打开了中国封闭已久的国门，中国人民被迫意识到中华文明的发展已经远远落后于世界现代化进程。在此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主要矛盾则体现为封建主义、帝国主义阻碍中华民族融入世界现代化进程的矛盾。中国共产党破解这个矛盾的办法是在以中华文明为本位的基础上，以革命手段扫除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一切阻碍。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初，中国思想界出现了“以西方文明为尊”的思潮，

甚至用“土”“洋”作为划分野蛮和文明的标准。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对这种观点进行了反驳，并指出这只是看到了西方文明的一个侧面，没有看到西方文明“机械资本之用广，其害遂演而日深；政治之不平等，一变而为社会之不平等；君主贵族之压制，一变而为资本家之压制”[16]99的缺陷。中国共产党人在破除思想界对西方文明的盲目崇拜后，坚持以中华文明作为中华民族发展的本位。毛泽东指出：“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17]708同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头脑的中国共产党意识到，推翻封建统治不能只依靠思想解放，必须有效组织革命斗争，把一切力量聚集到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从此，中国共产党将中华文明的发展融入世界民族独立运动的浪潮中，彻底摆脱了西方文明试图同化、阻碍我国现代化道路的狼子野心，中华文明开始走向文明现代化。总而言之，这一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以中华文明为本位，通过革命手段推翻了帝国主义压迫和封建主义统治，扫清了中华文明现代转型道路上的障碍。

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胜利和土地制度改革在全国完成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转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18]134，在文明层面则表现为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实际需求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尚未完全确立之间的矛盾。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结合国际形势，认识到只有坚定不移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才能巩固新民主主义革命成果，使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平稳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就必须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确立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破除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封建土地所有制表面上披着国有制的“外衣”，实际上封建统治者对包括土地在内的所有资产拥有绝对支配权，封建王朝统治者通过高额赋税和人身压迫，将所有财产收归皇家、贵族所有，其本质仍是封建社会的私有制形式。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尤其是土地改造的完成，意味着对封建所有制的彻底清除，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正式确立，代表着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之路与西方被资本裹挟的现代化道路彻底划清界限，正式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在文明层面体现为解放中华文明现代转型束缚的需求与不相匹配的政治经济体制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确立以来，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曲折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曲折。我国在这一阶段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遭遇了一系列挫折，在深入分析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后，中国共产党把工作重心放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同时进行改革开放，破解束缚中华文明现代转型过程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不相适应等问题，为中华文明的时代发展扫清了障碍。改革开放既是中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一次伟大实践，又是中华文明首次将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置于同一维度、摆脱封建思想对中华文明的束缚、革除缠绕在生产力发展上的积弊的重要尝试。新中国成立以来，为实现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建立并发展社会主义，提出优先发展重工业，极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由于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束缚了生产力发展的积极性，邓小平敏锐地认识到了解放生产力刻不容缓，“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19]370，“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19]370。中国共产党以改革开放作为解放生产力的重要法宝。一方面对内改革，正确认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确立多元化市场主体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地位，并提出权力下放、精简

机构，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双管齐下、协同并进。另一方面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加快发展国际贸易合作，融入全球化进程，并吸收借鉴西方文明精华。以改革开放推进全面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中华文明进入了摆脱束缚、全力发展生产力的高速发展阶段。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开启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进一步理论创新与实践突破，此时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文明层面则表现为新时代中华文明现代转型过程中产生的新需求与构成文明的各要素发展不协调之间的矛盾。党在实践中深刻认识到，要解决各要素发展不协调的问题，必须全面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协调推进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其他各方面建设”[20]11，并“按照这个总布局，促进现代化建设各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20]11，在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科技创新、国际影响力提升等诸多领域收获累累硕果，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的崭新局面。“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创造性实践活动的拓展和提升，也是对西方“串联式”现代化线性发展的超越，摆脱了对西式现代化的路径依赖，是我们党推动中华文明现代转型、实现“弯道超车”的理论体现。

三、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引领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必然之“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解决好民族性问题，就有更强能力去解决世界性问题；把中国实践总结好，就有更强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21]340中华文明作为传统文明现代转化、交流融合的成功范例，为世界各文明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代表着人类文明交往、发展的必然态势。

（一）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引领各文明自主探索现代化道路

西方文明首先踏上现代化进程，拥有现代化的先发优势和主导地位，但也暴露出诸多弊端。西方文明建立在资本主义基础之上，继承了资本主义的逐利性特征，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22]871，资本为了增殖，会在全世界自由流通，并在流通的过程中进行暴力掠夺和殖民奴役，导致生态环境失衡、拜金主义流行、贫富差距过大等问题频发。实践证明，西方文明在其现代化道路上，为了维持霸权地位、满足掠夺本性，强制向全世界推行西方现代化模式，这一做法使得西方文明的弊端暴露无遗，并使全世界陷入困境。

文明的现代化路径没有模板可以照搬照抄，唯有自主探索才能带来文明的进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23]10这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根本逻辑，证明了中国式现代化不是任何一种现代化模式的再版或者翻版，而是中国共产党在深刻把握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基础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开创出的人类现代化文明新路。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探索，经历了从模仿到独立、从迷茫到明确、从跟随到引领的飞跃。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的现代化探索从学习苏联转变为以苏为鉴，这意味着中国开始立足本国实际，独立探索现代化模式。在此基础上，结合改革开放时期的时代特点，中国共产党明确目标、有序推进，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制定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握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在总结党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提出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的重大时代课题，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实践证明，中华文明的现代化模式不但在社会治理、绿色发展与和平发展等领域取得了卓越成绩，而且使中国人民摆脱贫困，创造了世界减贫史上的“中国奇迹”，为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走向现代化起到了显著的示范引领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24]西方现代化模式以资本为中心、以掠夺为本质、以奴役为手段、以殖民为目标，而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卓越的文明成果向世界证明，只有文明自主探索才能带来文明进步，为世界各文明发展提供了全新的合理的选择，指明了文明发展的必然态势。

（二）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倡导各文明交流互鉴繁荣发展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中华民族在自身发展历程中，展现出博采众长的胸怀，广泛吸纳和借鉴世界各国和各民族的优秀文明成果，从而塑造了独具魅力的中华文明现代形态。中华文明在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与世界各文明交流互鉴，打破了文明之间的隔阂与对立，破解了“文明冲突论”的谬说，为人类文明的和谐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引领了文明交往新态势。

中华文明在面对各国、各民族的外来文明时，能够始终坚守中华民族本位，在交往互鉴中海纳百川地吸收各文明的精华。从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看，中华文明以杰出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辉煌的农业文明不断吸引周边各民族的关注，在商贸、文化、技术等多领域的交流过程中实现了生产力的双向提升，促进了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形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体系。从中华文明与各文明的交融互鉴过程看，中华文明先后与波斯文明、古罗马文明、阿拉伯文明、古希腊文明有过深入的交融互鉴，促进了各文明的共同繁荣。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华文明在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坚守中华文明本位，坚持洋为中用、取长补短，吸收和借鉴一切外来文明的优秀成果，这使中华文明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实现了自身的繁荣发展。

中华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同样也为世界各文明的多元化发展带来裨益。东海西海，心理攸同，文明的距离并不妨碍各文明拥有普遍的共性，中华文明发展取得的优越成果也为世界各文明发展带来进步。中华文明从多个层面为世界各文明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从技术层面来看，中国的“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25]338，以及其他众多技术发明通过文明交流推动了世界各文明的进步。从文化层面来看，坚持道德治国的儒家思想远渡重洋，成为欧洲启蒙运动时期重要的思想来源，受到西方思想家的高度评价，伏尔泰这样评论：“中国人在道德和政治经济学、农业、生活必需的技艺等等方面已臻完美境地。”[26]323从贸易层面来看，中国的丝绸、茶叶、陶瓷等商品远销海外，深刻影响了西方贵族的生活方式。中华文明在现代转型过程中，注重秩序与自由、责任与权利的平衡，为人类文明发展注入强大推动力，为世界各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可供借鉴的中国样本。

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中华文明因交流互鉴而发展，世界各文明也在交流互鉴中不断丰富和更新。中国共产党认同人类文明的多样性，认识到了文明交流互鉴是世界各文明发展的大势所趋。中华文明始终坚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理念，在与其他文明不断交流、融合的过程中不断发展。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成功引领着世界各文明的和合发展，用自身发展的成就有力打破了“文明冲突论”的谬说，证明了文明交往绝不是冲突与奴役，对话协商、交流共享才是世界各文明交往的必然趋势。

（三）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坚持各文明和平发展和合共生

中华民族是热爱和平的民族，中华文明是

维护世界各文明和平发展的坚定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外交辞令，而是从历史、现实、未来的客观判断中得出的战略抉择。”[27]自古以来，中国的农耕文明使得中华文明形成了“以德抚远”“协和万邦”的“和合”理念，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始终坚持“仁政”思想，使中国从未发动过不义的侵略战争，而是推动人类文明和谐发展的重要力量。从丝绸之路带动整个欧亚大陆发展，到郑和下西洋与途经各国建立起良好的邦交关系；从唐、明两朝“厚往薄来”的朝贡体系，到古代中国与周围各国和平的藩属国关系，无不体现着中华文明的和平性本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28]中华文明在现代转型过程中，继承并发扬了中华民族对和平的追求，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将马克思主义非暴力交往的和平理论与古代中国“止戈为武”的和平观相结合，创造性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新时代，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了世界各文明和谐发展。

中国始终致力于促进不同文明间的和平对话，推动构建世界各文明交流互鉴平台。各文明之间的关系不是粗暴的优胜劣汰或野蛮竞争，而是交相辉映的和合共生。中国通过搭建世界大河文明论坛、中非合作论坛等全领域、多层次的文明对话平台，将文明间的和平对话愿景转化为具体行动。同时，中国践行“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11]的文明对话主张，将各国的切实需求凝练成全球文明倡议，为建立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全球文明新秩序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在中华文明现代转型过程中，中国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推动构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开放共享的发展观、交流互鉴的文明观引领全世界共同利益与全人类共同价值，不仅展现了中国对全球文明发展趋势的深远洞察，也为各国实现互利共赢、让不同文明实现和谐共存提供了切实可行的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精准概括各国价值共识的基础上提倡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这不仅是中国责任与担当的集中体现，更是中国基于文明和合共生对人类文明形态未来发展趋势提出的科学构想。在这种理念下，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推动了人类文明和谐发展，是对“世界之问”的“文明之答”，是多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四、结语

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华民族对世界的贡献远不止于中国制造，更彰显于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中华文明现代转型之“形”向世界展示了“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的文明成果，在现代化进程中保持了自身文明底色，丰富了世界文明谱系；中华文明现代转型之“态”，为世界文明指明了一条和谐发展的全新道路，为后发文明融入世界发展潮流注入一针“强心剂”。对中华文明现代转型之“形”与“态”进行当代审视，更能显现出中华民族在经历五千年的文明进程后，如何建设人类文明的全新形态、如何构建更加合理的世界新秩序、如何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中国价值。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弘扬“上海精神”深化团结协作 构建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0-11-11.

[2] 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50年代政治观念衰微之考察[M].张国清,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7.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十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 习近平.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 推动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J].求是,2022(14):4-8.
[9] 习近平.更好把握和运用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J].求是,2022(13):4-19.
[10] 习近平.深化团结合作 应对风险挑战 共建更加美好的世界:在2023年金砖国家工商论坛闭幕式上的致辞[N].人民日报,2023-08-23.
[11] 习近平.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N].人民日报,2023-03-16.
[12]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强调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团结协作,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N].人民日报,2023-07-05.
[13]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N].人民日报,2023-06-03.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八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15] 于金富,时艳蕾.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中国古代社会的特殊性质[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6):47-54.
[16] 陈独秀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17]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19]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2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2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24] 习近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必然要求构建新发展格局[J].求是,2022(17):4-17.
[2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6] 伏尔泰.哲学辞典:上册[M].王燕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27] 阔步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上 记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推进全方位外交的成功实践[N].人民日报,2016-01-05.
[28]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J].求是,2023(17):4-11.

A Contemporary Examination of the "Form" and "State" in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LUAN Lin, ZHAN Liqun

(*School of Marxism,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Dalian* 116025, *China*)

Abstract: Capitalist civilization has long exercised dual hegemony over the "form" and "state" of world civilizations, increasingly revealing irreconcilable contradictions. Global civilizations now urgently demand a new civilizational paradigm in practice.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wo Overall Situations",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has discerned the call of our era and civilizations. Guided by the Marxist view of civilization, he creatively proposes a new model of human civilization. Rooted in its unique civilization gene,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has evolved along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responding to China's evolving principal contradictions. It enriches the spectrum of human civilization, representing the

distinctive “form” of this new model of human civilization. Through its transformative journey, Chinese civilization inspires autonomous exploration of modernization paths, advocates cross-civilizational exchanges and mutual enrichment, and upholds peaceful coexistence and harmonious symbiosis among civilizations, thus clarifying the developmental direction and heralding the inevitable “state” of human civilization’s new paradigm. Since 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under the guidance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the CPC has led the nation to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propelling Chinese civilization into a new historical chapter and charting an unprecedented path for human civilization.

Key words: Chinese civilization; new model of human civilization; Chinese modernization; modern transformation; civilizational exchanges and mutual learning

（责任编辑：李萌）

桐城派礼学研究发微

林存阳[1] 罗 刚[2]
（1.中国社会科学院 古代史研究所，北京 100101；
2.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2488）

[摘 要] 作为显赫一时的文学流派，桐城派虽以古文享誉学林，却也致力于研究经学，且格外关注礼学。桐城派在建构古文义法的过程中，以阐明经学为目标，以文章为表现形式，将对经学的研究贯穿其中。其间礼学尤为重要，桐城派学人将对礼学的观照融入个人的学术发展，由“研礼”而“通经”，进而“明道”。桐城派学人谨守程朱理学之宗旨，本着“以礼明道”进而“明经义”的治礼旨趣，在对礼学的具体研究中不专究于对名物制度的考辨，在不废考据、训诂的同时长于“以理解礼”，又因学术发展变化而期望“以礼止争”，从而“会通汉宋”。不惟如此，桐城派学人还深谙礼学的经世之功，期望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践行礼学。历来学界对桐城派的研究主要是从文学史的角度探讨桐城派的古文成就，然想要考察桐城派在我国学术思想史上的地位，应从经学、史学、文学等多维度纵观桐城派。

[关键词] 桐城派；礼学；方苞；姚鼐；清代学术思想史
[中图分类号] K892.9；K2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267（2025）01－0075－13
DOI：10.14129/j.cnki.forwordposition.2025.01.008

清代学术思想具有区域性的特征，常以地域名命名学术流派，如“吴派”“皖派”“扬派”“常州学派”等。①桐城派亦因地域而得名，素被冠以散文流派、古文派之名。刘声木以“我朝二百余年文学一大掌故”[1]3评介桐城派，然桐城派的学术成就并不仅限于散文、古文领域，其在经学方面的成就也颇丰，且影响所及也不局限于桐城一地，而是“蔓衍天下”。一般而言，学界多以桐城派立派始于姚鼐。②乾隆四十二年（1777），姚鼐在《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中，借吏部主事程晋芳、编修周永年之语打出桐城派的名号：“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2]114并构建了桐城派早期的发展脉络及师承关系，逐步建构起“桐城文统”体系。清季以来，学界对桐城派的评价褒贬不一：梁启超称此派“以文而论，因袭矫揉，无所取材；以学而论，则奖空疏，阙创获，

[基金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建设“登峰战略”资助计划（DF2023ZD16）。
[作者简介] 林存阳，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清代三礼学史、学术思想史、政治文化史；罗刚，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清代学术思想史。

①徐复尝言：“就流派而言，为学派命名，乃中国学术之传统，或以学派创始者，或以所处时代，或以所在地域，或以学派之特征。”参见《重印〈清经解·清经解续编〉序》，载彭林主编《中国经学：第一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第6页。

②参见吴孟复：《桐城文派述论》，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王达敏：《姚鼐与乾嘉学派》，学苑出版社，2007。

无益于社会”[3]103。李帆则认为“该派作家不仅于古文义法方面多所创见，而且尊崇程、朱，以维护程朱理学为己任”[4]118。近年来，学界对桐城派的研究愈为重视，且已有诸多创新见解，但主要集中在桐城派的古文成就与贡献方面。桐城派学人对经学、礼学的研究亦渐为学界关注，但主要集中于对个人的研究，对桐城派的整体性研究尚显不足，仍有可继续挖掘的空间。①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桐城派学人的礼学研究状况作进一步整体性、宏观性的探讨。管窥之见，敬祈方家指正。

一、“以礼明道”的治礼追求

清代学术以经学为中坚，经学复兴又以礼学为先导。清学开山之祖顾炎武倡“舍经学无理学”之说，断言“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5]109，并建立了“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的治学路径，确立了“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5]127的“通经明道”之法。清初，礼学研究蔚为大观，士人通过探研礼学、践行“以礼经世”的理想，以期解决明清鼎革所产生的社会问题，进而展现自身的复礼追求与“通经明道”的立学旨趣。至乾嘉之际，礼学研究更为兴盛。作为显赫一时的学术流派，桐城派以讲程朱义理的文派之名显著于世，在学术上推崇韩愈“修其辞以明其道”、柳宗元“文者以明道”之旨，强调“文以载道”。桐城派虽然讲义理、倡宋学，却不局限于艺文，而是以文章作为表现学问见解的一种载体，进而展现该派的经疏注解。其研习诗文，意在“通经”，更意在“明道”。刘声木曾总结桐城派治学特点：“桐城文学诸家，本经经纬史，涵泳百氏，不株株于一先生之言以自锢，其为文宗旨，撷经史之腴，简炼肃穆，文从字顺，语必己出，一以义法为尚。”[1]379又说：“归、方生当文运凋敝之际，精心研求，窥见此秘，尽以告人，世遂以古文义法归之桐城，归、方岂能舍经史以别求文章义法？”[1]379所谓“此秘”，即“文者无不知有义法”，刘声木此语所强调的却并非“此秘”，而是指桐城派学人在对经史之学研究的基础上方有古文义法。换而言之，桐城派学人强调的“文以载道”是以“通经明道”为基础的。

作为“桐城三祖”之首的方苞，其治学亦以经学为重，尝对其弟子沈廷芳强调：“师所以传道授业解惑，生欲登吾门，当以治经为务！”[6]880在致友人王源的书信中，方苞表明其治经意在“破旧说之藩篱，而求其所以云之意”[7]667，即通过治经探寻“古义”及“事物之理”，“治经者，求其义之明而已”[8]82。方苞进而主张借“治经”以“经世”，“古之治道术者皆以有为于世者也”[9]5。故方苞“平生心力所竭，惟在别择先儒经义”[7]800。

方苞研经，以礼学为重，且以研究礼学贯彻诸经，著有《周官集注》《周官析疑》《周官辨》《礼记析疑》《丧礼或问》《仪礼析疑》《读仪礼》等礼学经典。方苞尝言：“昔三代受命，相继相因，孔子推之，以为百世可知”[8]50，而“孔子之所谓因者，礼也；天不变，道亦不变”[8]50。然而，“学之废久矣，而自明之衰，则尤甚焉”[8]175，且“昔之蠹学者，显出于六经之外，而今之蠹学者，阴托于六经之中，则可忧弥甚矣”[8]175，而“儒者之学，所以深摈异端，非贵其说之同也。学不明，则性命之理不顺”[8]175。基于此，方苞指出，“欲理之明，必溯源六经，而切究乎

①杨向奎论述了方苞研礼时关注的“刘歆伪窜经书说”，参见杨向奎：《论方苞的经学与理学》，《孔子研究》1988年第3期；冯峰讨论了方苞的礼学成就与时代的关系及其学术思想特点，参见冯峰：《方苞礼学的形成及其特点》，《历史档案》2010年第3期；林存阳对方苞的礼学成就进行了系统论述，参见林存阳：《清初三礼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陈士银指出方苞意在振兴礼学，参见陈士银：《方苞对刘歆窜经的质疑——以〈礼记析疑〉为主要讨论范围》，《中国典籍与文化》2016年第4期。此外，诸多学者对晚清桐城派殿军曾国藩的礼学思想进行了有益探讨。如，林存阳：《曾国藩礼学思想论》，《船山学刊》2006年第1期；武道房：《曾国藩礼学观念及其思想史意义》，《江海学刊》2009年第6期；朱汉民、吴国荣：《曾国藩的礼学及其经世理念》，《中国哲学史》2007年第1期；凌鹏：《“世变方殷”中的“礼学经世”演变史——兼论曾国藩汉宋之学与经世学的融合》，《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等等。

宋、元诸儒之说”[7]581，并以“究极经文所以云之意，而以义理折中”[6]868的态度深耕礼学。

方苞研礼，又以《周礼》为勤，倡“刘歆伪窜经书说”，尝辨：“凡疑《周官》为伪作者，非道听途说而未尝一用其心，即粗用其心而未能究乎事理之实者也。”[8]17在他看来，“世儒之疑《周官》为伪者，岂不甚蔽矣哉！”[8]16这是因为“礼”为“道”的载体，“道不足者，其言必有枝叶，而是书（指《周官》）指事命物，未尝有一辞之溢焉，常以一字二字，尽事物之理，而达其所难显，非学士文人所能措注也”[8]82。而“古之谋道者，虽所得于天至厚，然其为学，必专且勤，久而后成”[8]174，故主张先“穷理”，而后方可“参互众理以尽其变”。通过寻求“礼”的原始含义窥见“先王制礼”的本意与“古书之蕴”[8]81，以此作为诠释“礼”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基于此，方苞提倡“圣人制作说”，并反复阐述“先王缘人情而制礼”[8]179，“先王制礼，皆所以效人情之实而不得不然者也”[10]237。“先王制礼，有迹若相违而理归于一者，以物之则各异，而所以为则者，无不同也”[8]24，“圣人制礼，必随世变而后能与民宜”[10]198。“圣人制礼”意在通过美化三代之治，阐发先哲“礼时为大”的礼学思想，进而重建儒家理想中的纲常伦理秩序和礼乐教化制度。

然而，我们应该看到的是，桐城派以“古文义法”自矜，“义”即“言有物”；“法”即“言有序”，“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8]58。方苞实际上是借治经来探讨义法。方苞自述，其撰《周官集注》意在“发其端绪，使学者易求”[8]83。观方苞《周官集注》和《礼记析疑》二书的序，可知其所求并非经层累构建起的礼制，而是“道”：

盖是经之作，非若后世杂记制度之书也，其经纬万端，以尽人物之性，乃周公夜以继日穷思而后得之者。学者必探其根原，知制可更而道不可异。[8]83

盖《礼经》之散亡久矣，群儒各记所闻，记者非一时之人，所记非一代之制，必欲会其说于一，其道无由；第于所指之事、所措之言无失焉，斯已矣。[8]81

换言之，方苞治经、研礼的根本目的在于求“道”。方苞之徒刘大櫆自述生平“不治他事，惟文史是耽”[11]111。在他看来，“经之为用大矣”[11]323，且“士必通经，然后可以出而友天下之士”[11]323。但是“郑氏以先圣为周公、孔子，既失其旨；而后之议礼者，复加孔子以先师之号，其亦渎慢圣人，而名之不当其实者矣”[11]309-310。刘大櫆师承方苞，也强调要“取义理于经”，充分肯定礼的道德教化作用及对国家治理的重要性，“国无礼则不正，礼之于国，犹衡之于轻重，绳墨之于曲直，规矩之于方圆”[11]44。

桐城派的奠基者姚鼐亦认为，“《六经》之书，其深广犹江海也”[2]60，“圣人之经，如日月星之悬在人上”[2]88，读经者应当“趣于经义明”[2]93，并将之作为“天下学问之事”。姚鼐曾自述其所愧之事在于“功不沈（沉）密，不能专治一经”[12]99，他反复提倡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并存，强调三者“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2]61，并以之作为“前可以继古人，俯可以待后世”的“治经之善轨”[2]61。不惟如此，姚鼐明确表达了义理、考据、辞章虽为文章之法，但更应是“明道”的“文技”，“夫文技耳，非道也，然古人藉以达道。其后文至而渐与道远，虽韩退之、欧阳永叔，不免病此，况以下者乎”[13]291。在姚鼐看来，“道有是非，而技有美恶。诗文皆技也，技之精者必近道”[2]84，“文”与“道”不可相分离，“达其辞则道以明，昧于文则志以晦”[2]89。至此，建立起了由“文”以“通经”，由“通经”以“明道”的“文以载道”理念。为表证自己深于考证、精通经学，姚鼐“以文解经”，将义理、考据、辞章的“文技”运用于《九经说》的撰写，进而展现自身的经学见解。于《九经说》的序目中，姚鼐指出治经的重要性：

经之有传注，古温故知新、博闻精识之

君子，乃善为之，非余力所逮也。寻究其所疑，或考而辨之，摭吾一说，以为古君子拾遗补阙，虽未必其当，而非不可为矣。夫圣人之经，犹国之有君也，坚附一家之言而不变，是所谓予家臣不敢知国者也。以为忠，非忠之正矣；择善而从之，学之正也。均不见其善，则均不敢从。[14]601

六经无失也，不善学之者而失生焉，学之过，非经之过也。虽然，过之生也，必以其类六经之理，通于一而其用之类则不同。务乎仪文度数之繁，而遗礼乐之本者，其失也内荒；究乎心性精微之域，而遗人事之宜者，其失也外悖。故经虽无失，而学者之失，未尝不由经而生。[14]683

借由治经，姚鼐强调礼学研究的重要性。《九经说》凡17卷，礼学部分包括《周礼说》3卷、《仪礼说》1卷、《礼记说》3卷，比重甚大，其因在于“礼者，胥是也。然而不善学之，则其失于他经为尤甚”[14]684。由此可见，礼学问题在经学体系中的重要性。在姚鼐看来，“礼乐之道，皆人所固有也，非强之也”[14]676，然而，“末世为礼者循其迹而谬其意，苛其说而益其烦，假其名而悖其实”[2]29，因而违背了“圣人制礼”的本意。他认为，“礼之为义广矣，不可以一说穷也”[14]682，“习于仪而不达于义，非能知礼者也；协于义而协于礼，可以义起”[14]669。鉴于此，姚鼐指出“礼意”在于“达天道”和“顺人情”，“所谓达乎礼之意者，达天道、顺人情而已”[14]675。

姚门弟子①承继其师的治学路径与主张，姚椿希望借由“征诸经”而“知圣人心”，“学必征诸圣人。圣人之学安征乎？征诸经。经非圣人也，然而圣人之心在焉。知圣人之心，则知圣人之所以为学矣”[15]3。同时，他还强调要明晰礼的功用，“考前代典章制度，以为后人立身之矩矱，而有《礼》也”[15]3。梅曾亮强调治经的重要性，“夫经者，群言之君也。治经而有继往开来之功，以扶微起废者，则君之贵戚大臣也”[16]120。又指出文章之法与治经的关系，“若以文章之道本不可通于治经者，此则学术之异”[16]138。方东树更意在“究古人制礼之意”，遂言“礼义者，天地之所以立心，生民之所以托命，乾坤之所以正位”[17]255。其弟子戴钧衡强调“治经者，格物穷理之大端也”[18]379，且“道术、政事、文艺，皆必由治经而入”[18]379。方东树族弟方宗诚为学极为注重“行义达道”与“明体达用”，强调“学不可不知道，而求道不可以不得其要也”[19]616。在方宗诚看来，对“道”的追寻要“求之六经”，而“六经者，明道之书也”[20]133。他同时认同“礼”于教化的重要性：“论教化之道当以礼为主耳”，“六经”为教明之具，而《礼》于教民尤切要”[21]677。

晚清桐城派殿军曾国藩私淑姚鼐，自称“姚（鼐）先生持论闳通，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22]305，认为其为学“以义理之学为先，以立志为本”[23]456，明言“礼”为“先王之道”的载体，“先王之道，所谓修己治人、经纬万汇者，何归乎？亦曰礼而已矣”[22]305。在曾国藩看来，“圣人非不知浮文末节，无当于精义，特以礼之本于太一，起于微眇者，不能尽人而语之”[22]367。姚莹之孙姚永朴也肯定“礼”于承“道”的重要性，“礼固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者也”[24]22，“礼之用在节人之欲恶，使之讲信修睦，尚慈让，去争夺”[24]22。

桐城派普遍被视为古文流派、散文流派，桐城派学人上尊唐宋八大家及晚明归有光等学者，以构建“古文义法”为立派宗旨，然在其学术背后有着更大的理论关怀。桐城派学人在构建自身学术的过程中并未脱离传统儒家学术和经典的范畴，将对经学的探讨放在了很重要的地位。桐城派虽然贯彻“文以载道”的理念，却是以阐明经学为基本目标，以文章为表现形式，通过研文“明经义”，又借由治经以研礼，意在“以礼明道”，进而“通经明道”，通过研礼践行“道在六经”的价值预设，从而探寻“圣人之道”，并将之作为诠释“礼”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可以说，

①姚鼐弟子以“姚门四杰”为代表，“姚门四杰”所指，各家略有不同，但不出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刘开、姚莹五人。

桐城派对礼学的研究一定程度上是在印证该派“文以载道”的理念。

二、从“以理解礼”到“会通汉宋”的治礼路径

礼、理之别素为学者所关注，中国近代散文学、经学家皮锡瑞以“汉儒多言礼，宋儒多言理”一语概括汉、宋的学术特点。自理学产生后，理学家致力论证“礼即理”，周敦颐言“礼，理也”[25]24；二程主张“礼者，理也”[26]125；张载语“盖礼者理也，须是学穷理，礼则所以行其义，知理则能制礼，然则礼出于理之后”[27]326-327，他们均强调“理”是“礼”的特性。清初，孙奇逢、陆世仪等人更是主张“纳礼入理”。孙奇逢认为“礼者，天地之节义，所以美教化而定民志，故三王不异礼而治”[28]613；陆世仪亦主张“礼者，理也。礼本乎理，理为体，礼为用。故礼虽未有，可以义起”[29]180。

至乾嘉时期，在考据学兴盛的背景下，作为遵奉程朱义理的流派，桐城派学人解经以义理为依归，亦不抛弃训诂、考证之法，探索出了一条“以理解礼”的治礼路径。方苞少时为学“视宋儒为腐烂……未尝涉宋儒书”[8]174-175，康熙三十年（1691）入京后受万斯同等师友的影响“一意为经学”，“始读宋儒书”[6]869。其论学以宋儒为宗，因而多信宋而疑汉，标榜“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介韩、欧之间”[30]906-907，推崇程朱理学，主张以义理说“礼”，强调“礼”经由“理”体现。方苞深刻意识到《礼经》散亡已久且多湮沉残缺，作为记载礼学内容的“礼文”经过层累的构建而愈密，其背后所蕴藏的“礼意”更是经过层累的构建而愈精。因此，他在治礼时虽以程朱之学为宗旨，却也并未完全抛弃汉学之法，征引郑《注》、贾《疏》以解礼，主张“于经传内一字一句，必遍考群书以求尽其义类”[31]42。方苞虽然感慨“注疏之学，莫善于《三礼》，其参伍伦类，彼此互证，用心与力，可谓艰矣”[8]81，却也认为“《注》《疏》及诸儒之说必似是而非者”[32]5，“汉代儒者所得于经甚浅”[8]175，遂欲为之辨正。他断言“六经火于秦，并出于汉，而礼之废，则自汉始”[8]33，借此表达了对汉儒和郑玄的不满，“郑氏以汉法及莽事诂《周官》，多失其本指”[7]599。又在《书辨正周官戴记尚书后》中说：

> 汉儒之治经，莫勤于郑氏；然以莽事训《周官》，而于周公践阼，文王受命称王，皆笃信焉，而益漫其支流，况《毛序》《孔传》之伪杂乎？世俗之贸儒，尚或以经说惟汉儒为有据，而诋程、朱为凭臆，非所谓失其本心者与？[8]34

在方苞看来，“凡人心之所同者，即天理也”[7]599。因此，他主张“礼”寓于“理”，“礼”经由“理”体现，“凡义理必载于文字，惟《春秋》《周官》，则文字所不载，而义理寓焉”[8]82。故方苞力持“刘歆伪窜经书说”，他认为“《周官》晚出，群儒多疑其伪；至宋程、张二子及朱子继兴，然后知是书非圣人不能作”[7]599，《周官》一书之精蕴在于“得其运用天理之实也”[7]599。通过为《周官》辨伪，方苞指出：“理者，天下之公也；心者，百世所同也。”[8]20又强调：“圣人之法，所以循天理而达之也；圣人之经，所以传天心而播之也。”[8]21

方苞的礼学研究与同时代的汉学家有着明显的不同。时人惠士奇打破“以经解经”的藩篱，纳诸子之学以解经，撰《礼说》以倡文字音韵之学，获四库馆臣高度评价。其子惠栋主张“五经出于屋壁，多古字古言，非经师不能辨。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是故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33]362。而方苞的礼学研究却为戴震所批：“方望溪释《礼经》之文，多不似说《礼》语言，其说《春秋》较善。”[34]186四库馆臣对方苞的礼学研究评价亦不高，《四库提要》论及方苞所著《周官集注》一书，道：“（《周官集注》）成于康熙庚子，后苞所著《望溪集》指《周官》之文为刘歆窜改，以媚王莽，历指某节某句为歆所增，言之凿凿，如目睹其笔削者。自以为学力既深，鉴别真伪，发千

古之所未言，而究不免于臆断，转不及此书之谨严矣。”[32]1-2这反映的是在清中叶考据学兴盛的背景下，宗汉学者借礼学领域对宗宋学者的一种批评。

乾隆二十年（1755）秋末，姚鼐欲拜戴震为师却被拒，其学术重心遂由辞章转向考据。①乾隆三十八年（1773），四库全书馆开，姚鼐入馆参与《四库全书》的纂修工作。然而，四库全书馆内“纂修者竞尚新奇，厌薄宋、元以来儒者，以为空疏，掊击讪笑之不遗余力”[35]204。姚鼐因与汉学家存在学术分歧而遭到排挤，遂辞四库馆职。②离馆前，姚鼐撰《赠钱献之序》③，指出“圣人之道”式微，遂有“其敝”，直言“宋之时，真儒乃得圣人之旨，群经略有定说”[2]110。他认为“近士大夫侈言汉学，只是考证一事耳。考证固不可废，然安得与宋大儒所得者并论？世之君子，欲以该博取名，遂敢于轻蔑闽洛，此当今大患，是亦衣冠中之邪教也”[12]18-19。于姚鼐而言，程朱论说“上当于圣人之旨，下合乎天下之公心”[13]268，其可贵之处在于“言之精且大而得圣人之意多也”[2]88。针对汉儒囿于训诂考据之症，姚鼐指出其弊为“去圣久远，儒者论经之说，纷然未衷于一，而又汩于同异好恶之私心，以自乱其聪明，而长争竞之气，非第残缺之为患而已”[2]90。他更是直接斥责毛奇龄、李塨、程廷祚、戴震等人“生平不能为程、朱之行，而其意乃欲与程、朱争名，安得不为天之所恶”[2]102。然而，姚鼐自己却并不完全固守程、朱之法，在他看来，宋儒亦有失：

> 儒者生程、朱之后，得程、朱而明孔、孟之旨，程、朱犹吾父师也。然程、朱言或有失，吾岂必曲从之哉？程、朱亦岂不欲后人为论而正之哉？正之可也，正之而诋毁之，讪笑之，是诋讪父师也。[2]102

正如陈用光评价姚鼐治学，“兼治汉、宋，而一以程、朱为宗”[36]213。

借由针砭汉学与宋学，姚鼐撰《九经说》以探讨治经之法。他在叙述《九经说》的立说之旨时明确表示：“若近世之士，乃以所得之训诂文字讪笑宋儒！夫程朱之称为儒者，岂以训诂文字哉？”[16]119姚鼐虽然称赞程朱之学，又长于以义理推“礼”，但他在《九经说》中亦充分肯定了郑玄之功：“郑氏说经既得其义，而为义疏者不能详，后之舍郑而为说者皆妄也，且多不达周制与圣人之礼意，余因郑说广之，使考礼者无惑焉。”[14]682“康成读经往往改字本音，以后学者每疑焉，而易其训。然康成深于训诂，其音读必有故，未易卒弃之也。”[14]689即使姚鼐尊重郑《注》，他在对具体礼仪的考证过程中也会否定郑《注》，这也彰显了姚鼐审慎的治礼态度，如《以官爵人德之杀说》中称“郑君谓皆为士言，失其旨矣”[14]663；《毕袗立说》中称“鼐谓此亦郑误也”[14]663。当然，姚鼐也强调应层累地辨别《周礼》一书，“吾谓撰《周礼》者，第以存一代之制，杂收东、西周所纪载不计其事之前后本未（按，应作“末”），尝云：是尽周公法也，以为皆出于周公者，后儒欲过尊其书，强为之说，而不免失之诬矣”[14]647。他认为“古礼湮失之余，亦终不能尽晓，然而当于义必多矣”[2]90，所谓“礼也者，古先圣王为之也。而非古先圣王为之也，理义有所未行，人情有所抑遏，古先圣王从而达之”[14]677。

《九经说》著成后，姚鼐即将此书付多名友人呈教，在致友人信中，姚鼐言及撰《九经说》和《三传补注》之意在“破门户偏党之见”[12]26。其弟子梅曾亮亦记述姚鼐自言“不敢背宋儒，亦未尝薄汉儒”[16]119，即在不偏废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的基础上，不违

①参见王达敏：《从辞章到考据——论姚鼐学术生涯第一次重大转折与戴震的关系》，《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②参见王达敏：《论姚鼐与四库馆内汉宋之争》，《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③《赠钱献之序》可看作是姚鼐向考据学家挑战的宣言书。参见王达敏：《姚鼐与乾嘉学派》，学苑出版社，2007，第33-37页；漆永祥：《乾嘉考据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第347-350页。

背汉儒文字训诂之法，又以宋儒义理之法为依归。正如其孙姚莹评《九经说》“以通义理、考订之邮”[35]204，其弟子陈用光评《九经说》“发挥义理，辅以考证，而一行以古文法”[36]212，“不孤守宋儒而兼综郑、马以核其实，不矜言汉学而原本程、朱以究其归”[37]640，遂堪称“正人心而卫圣道”之作。虽然《九经说》为部分汉学家所诟病，但不可否认的是，姚鼐在研经治礼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摒弃门户之见。

嘉道之际，凌廷堪揭橥“以礼代理”说，强调“圣人之道，一礼而已矣”[38]27，“道无迹也，必缘礼而著见，而制礼者以之；德无象也，必藉礼为依归，而行礼者以之”[38]30。“圣人不求诸理而求诸礼，盖求诸理必至于师心，求诸礼始可以复性也。”[38]32焦循、阮元等人发展了凌廷堪的观点以进一步否定理学，渐有“黜除宋学”及“以言理为禁”之势。钱穆先生就曾言：

夫而后东原之深斥宋儒以言理者，次仲乃易之以言礼。同时学者里堂、芸台以下，皆承其说，一若以理、礼之别，为汉、宋之鸿沟焉。[39]547

姚鼐高足方东树对“以礼代理”深感不满，认为汉学家“名为治经，实足乱经；名为卫道，实则畔道”[40]4，并对汉学家“舍理言礼”之说进行反驳：

汉学家皆以高谈性命，为便于空疏，无补经术，争为“实事求是”之学，衍为笃论，万口一舌，牢不可破。以愚论之，实事求是，莫如程朱。以其理信而足可推行，不误于民之兴行，然则虽虚理，而乃实事矣。汉学诸人，言言有据，字字有考，只向纸上与古人争训诂形声，传注驳杂，援据群籍，证佐数百千条。反之身己心行，推之民人家国，了无益处，徒使人狂惑失守，不得所用。然则虽实事求是，而乃虚之至者也！[40]61

方东树又批唐人王元感的礼制考辨“观书未遍，求礼之心不切，议礼之智不精，持辨不坚”[17]247。在他看来，“圣人制礼，必本于天理人情”[17]243，“圣人制礼，其立义精深，制名亲切，文字谨严章书，真有非周公不能者”[17]246。囿于汉宋门户之见，方东树著《汉学商兑》对凌廷堪“以礼代理”说发起挑战。《汉学商兑》以“礼、理之辨”为线索，兼论汉学家治礼之内容、特色及用意，其真实目的在于借“礼、理之辨”，为贬抑汉学、弘扬宋学，恢复程、朱的优势地位制造理论依据。方东树于《汉学商兑》中，针对阮元“朱子中年讲理，晚年讲礼，诚有见于理必出于礼也”及“理必附于礼以行”之说进行诘责：

礼是四端五常之一，理则万事万物咸在。所谓礼者，理也，官于天也；礼者，天理之节文，天叙、天秩云云，皆是就礼一端，言其出于天理，非谓天理尽于礼之一德，而万事万物之理，举不必穷也。周子言理曰：礼者，是就四德分布者言，非以一礼尽四德之理也。盖分言之则理属礼，合论之仁义知信皆是理。虽礼之取数至多，为义至广，宰制万物，役使群动，三千三百，无所不统。[40]88

在方东树看来，“礼”出于“理”，“礼是天理之节文”，自古未有“废理而专于礼者”。汉学家禁穷理又“以礼为教”，已失“圣人制礼”之本意，系“异端邪说”。“理属知边，礼属行边”[40]89，“礼者为迹，在外居后；理是礼之所以然，在内居先。而凡事凡物之所以然处皆有理，不尽属礼也”[40]88。若是以“礼”涵括一切，则难知“礼”，唯有“穷理”方能“隆礼”，进而方可“识礼意”。“理”为根本，而“礼”只是“理”的表现形式，“言礼而理在，是就礼言理；言理不尽于礼，礼外尚有众理也”[40]88。汉学家“欲绌宋学，兴汉学，破宋儒穷理之学，变《大学》之教为考证之学，非复唐、虞、周、孔以礼垂教，经世之本，并非郑、贾抱守遗经之意”[40]89。方东树以天理、节文分辨“理”与“礼”，意在批评汉学、张扬宋学，彰显了“以理解礼”的治礼路径，其论将清中期以来汉宋之争推至顶峰。

姚鼐弟子刘开也指出国朝治礼者未尝抛弃郑《注》、贾《疏》之学，“我朝治教休明，淹

通宏博之士相继而起，一改前代固陋之学。……于《礼》则探贾郑之奥”[41]17，但他更强调要以宋学为依归，“汉学未尝无裨于人也，唯自矜其博，而尽委宋儒一代之书，弃之不观，所以成末流之习，而决裂古先之训也”[41]18。“天下之学皆以躬行实践为先，为士者莫不宗法程朱以砥砺于实用，故学虽不博，而行谊不愧古人。”[41]17在刘开看来，“孔孟之旨，至程朱而始明其要归；学问之事，至程朱而曲尽其纤悉”[41]20，这是因为程朱之学“所论者大，所持者正，切于民彝而裨于实修，可以维持风教于不坠也”[41]18。

陈祖武指出：“至道光中叶，以方东树的全面攻驳汉学为标志，清代学术终在愈演愈烈的汉宋之争中翻过了乾嘉学派的一页。”[42]174随着时代的发展，桐城派学人对礼学的研究逐渐从“以理解礼”转向了“会通汉宋”的路径。晚清陈澧提出“理学即礼学”的命题，黄以周提倡“礼学即理学”，均是倡导融合“理”与“礼”，以礼学会通汉宋之争。曾国藩自言为学“一宗宋儒，不废汉学”[43]250，并以“礼”为尺度评介本朝学者，强调“以礼为归”，从而息诸说之争：

乾嘉以来，士大夫为训诂之学者，薄宋儒为空疏；为性理之学者，又薄汉儒为支离。鄙意由博乃能返约，格物乃能正心。必从事于《礼经》，考核于三千三百之详，博稽乎一名一物之细，然后本末兼该，源流毕贯，虽极军旅战争，食货凌杂，皆礼家所应讨论之事。故尝谓江氏《礼书纲目》、秦氏《五礼通考》，可以通汉、宋二家之结，而息顿渐诸说之争。[44]415

曾国藩还强调要将礼学与儒家仁义道德相统一，突出“仁”“礼”与“内圣外王”的切合点，以及可“息天下之争”的功用：

昔仲尼好语求仁，而雅言执礼，孟氏亦仁礼并称，盖圣王所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争，内之莫大于仁，外之莫急于礼。自孔孟在时，老庄已鄙弃礼教。杨墨之指不同，而同于贼仁。厥后众流歧出，载籍焚烧，微言中绝，人纪紊焉。汉儒掇拾遗经，小戴氏乃作记，以存礼于什一。又千余年，宋儒远承坠绪，横渠张氏乃作《正蒙》，以讨论为仁之方。船山先生注《正蒙》数万言，注《礼记》数十万言，幽以究民物之同原，显以纲维万事，弭世乱于未形。其于古昔明体达用，盈科后进之旨，往往近之。[22]323-324

由此可见，曾国藩意在以“礼”为基础，通过指出圣人“求仁执礼”，强调汉学家和理学家均讲“礼”，由此对二者进行调融，最终以“礼”合“理”，达到“会通汉宋”的目的。郭嵩焘曾评价曾国藩“穷极程朱性道之蕴，博考名物，熟精礼典。以为圣人经世宰物，纲维万事无他，礼而已矣”[45]34。钱穆称曾国藩“其言皆极持平，与当时牢守汉、宋门户互相轻薄者不同。又进而为汉、宋谋会通，则归其要于礼家”[39]649。

作为尊崇程朱义理的学术流派，桐城派学人通过建构文统的形式，在乾嘉汉学大盛的时代背景下尝试对汉学和宋学兼收并蓄，在不废汉学的基础上张扬宋学，以回应训诂考据学风的挑战，从而探索出一条“以理解礼”的为学路径，同时也为晚清的礼学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值得注意的是，桐城派学人研究礼学的路径、方式及后来为学路径的转变蕴含着深刻的内涵，其本质是桐城派学人与汉学家就学术层面争夺话语权的一种表现，也折射了清中后期汉学与宋学之间的关系。

三、“以礼经世”的礼学夙愿

前文已就桐城派学人的治礼路径进行了简要分析，应当指出的是，无论是“以理解礼”，抑或“会通汉宋”，都属于不同的解礼方式，注解经籍并非其目的。以不同视角而言，其目的有所不同：若从学人的为学宗旨而言，其目的在于“以礼明道”；若从学术史的发展而言，其目的在于张扬程朱理学，以在一定程度上抗衡汉学日炽的局面；若以现实关怀而言，其目的在于通过诠释经典阐发经世致用的思想，从而直接或间接对社会产生影响，达成“以礼经世”的礼学夙愿。

经世意为“经理世事”，礼学是以礼经世的实学，而非单纯的辞章考据之学。“礼”在现实社会中有着重要地位，《史记·礼书》云：“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透进以仁义，束缚以刑罚，故德厚者位尊，禄重者宠荣，所以总一海内而整齐万民也。”[46]1157-1158桐城派学人虽以程朱理学为宗，却也深受清初经世致用思潮的影响，深谙礼学的经世之用，合学术、经世为一体，以“礼”作为治世之道，从而融会贯通学术与政治、社会，并积极参与到官方构建礼制的活动中。《礼记·礼运》述“礼”于国家之重要性，“礼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别嫌明微，傧鬼神，考制度，别仁义，所以治政安君也”[47]907。礼制为国家制度的礼仪准则，由官方制定、运行，承担着规范社会人心的作用。在“以经学济理学之穷”学术潮流的影响下，清初的统治者采取“以礼为治”的政治文化策略，以及“所崇者，皆真儒；所重者，皆正道”[48]6679的“崇儒重道”政策。清圣祖颁行“圣谕十六条”，世宗推衍为《圣谕广训》，主张“明礼让以厚风俗”。乾隆元年（1736）六月，值“经学昌明、礼备乐和之会”[49]1，高宗颁发上谕诏开三礼馆纂修《三礼义疏》，以此承继圣祖“阐明经学，嘉惠万世”[50]8459的政治文化抉择，践行《礼经》“切于人伦日用”及“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50]8459的社会功效。经籍的编纂关乎国家政事，《三礼义疏》既为解经之书，更是国家礼治之书，高宗在《御制三礼义疏序》中即已表明编纂《三礼义疏》的目的是“修道设教”及探求“礼意”：

夫礼之所为，本于天，殽于地，达之人伦日用，行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斯须不可去者。……故言礼者，惟求其修道设教之由，以得夫礼之意而已。顾其教之不泯，道之所由传，未尝不赖于经。[49]1-2

三礼馆诏开之际，方苞以原任翰林院侍讲的身份出任三礼馆副总裁，称赞此举乃“汉、唐以来未有之盛事”[7]564，并亲自参与《周礼义疏》的纂修工作。鉴于“《礼经》残缺久矣”[8]178，方苞建议礼馆纂修撰时应“不可以前儒既有是说，而溺于所闻也；不可以经传本无是文，而遂谓古无是礼也”[8]179。又上《拟定纂修三礼条例札子》，初步确定了《三礼义疏》的基本编纂原则，即分“正义”“辨正”“通论”“余论”“存疑”“存异”[7]565六类，各注本节、本注之下。又主张采取“以经解经”之法，“或以本节本句参证他篇，比类以测义；或引他经与此经互相发明”[7]565。

方苞主张“圣人作经，亦望学者实体诸身，循而达之，以与民同患耳”[8]170，而《周官》一书所记实为“经纶天下之大体”的“三王致治之迹”[8]17，探其根源“然后能神而明之，随在可济于实用”[8]84，其意在“圣人制礼，乃从义之所宜，而使民行礼”[31]4。在他看来，“古之所谓学者，将明诸心以尽在物之理而济世用，无济于用者，则不学也”[7]603。因此，“三代之礼，缘情依性，故能经纬人道，规矩无所不贯”[8]41，且具有“以道明民”的社会教化作用，“昔先王以道明民，范其耳目百体，以养所受之中，故精之可至于命，而粗亦不失为寡过；又使人渐而致之，积久而通焉，故入德也易而造道深”[8]89。故方苞强调“躬化”礼学以“化民成俗”，“夫无躬化，则礼不虚行；然有躬化，而不兴三代之礼，亦不足以化民成俗”[8]42。具体而言：

所以养君德，施政教，正俗化，莫急于礼，而礼非天子不能行。礼之兴，然后君德可成，而百官得其宜，万事得其序，和仁信义得其质，宗庙朝廷得其秩，室家乡里得其情。礼之废，则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恩薄道苦，序失行恶，其乱百出，而不可禁御。[8]33

归而言之，研礼不应只从文本层面进行文字的训诂考证，停留在“明经义”的层面，更应注重“经世”的社会实践性，亦即方苞所言“离道德与事物而二之者，末学之失也”[8]109。诚如陈宏谋所言：“望溪经说，不惟经义开明，可以荡涤人心之邪秽，维持礼俗。”[8]901-902

姚鼐亦强调："圣人制礼，其始必因乎俗，故曰礼俗。"[2]101在他看来，"人君达天道、顺人情以为礼，而天下治矣"[14]676，礼制又关系到世俗人心和社会风尚的变化，"盖古帝王之时，民皆有淳德，圣人谓无以持之也，道以仁义，养以礼乐文章，使民始于忠信而成于礼"[2]112，然而"先王之世既远，民俗异而国制屡更，尽用古法，则不可"[13]252。因此，姚鼐建议"酌其所可行，通古人之意，期存人心之正，足以讲伦理、厚风俗而已"[13]252。姚鼐于《九经说》书中强调：

礼者，履也。礼之用，和为贵。周衰，孔子没，七十子之徒尝游圣人之门者，于先王之礼莫不有窥焉，而或未之尽也。盖言先王之礼者，莫笃于荀子，而以人性为恶，以化性起伪为礼，其病亦莫甚于荀子。甚矣，其去圣人之言远也。[14]686

以丧礼为例，姚鼐认为："礼制之衰废久矣，士恣其情，循流俗之鄙陋，诡于义而咎于中者，不可胜道也，而丧礼为尤甚"[13]252；"丧之轻重，非圣人不能断，解经者或疑焉，或谬为说焉，皆未之深思者也"[14]669。在他看来：

祭之有尸，始盖亦出于上古之俗，而圣人因以为礼，此亦仁孝之极思。使圣人生乎今世，天下但有厌祭而无尸矣，固必不更行设尸以祭之礼，然不可因此遂讥古人之为谬也。尸盖废于秦世，秦戎俗也。然则设尸非夷礼，废尸乃夷礼耳。[2]101

然而，

人皆有爱乎死者之心，丧祭之礼所以施也；人皆有患其生不适于道之心，冠昏射御，凡生者之礼所以用也。故从民嗜欲而用之者，所以顺情也；正民之嗜欲而矫之者，亦所以顺情也。[14]676

因此，姚鼐认为，"明道义、维风俗以诏世者，君子之志；而辞足以尽其志者，君子之文也"[2]89，进而言"古今所贵乎有文章者，在乎当理切事，而不在乎华辞"[13]274。其弟子方东树亦强调："文不能经世者皆无用之言，大雅君子所弗为也"[17]344，"君子立言，为足以救乎时而已"[17]179。姚莹也指出："文者，将以明天地之心，阐事物之理，君臣待之以定，父子赖之以亲，夫妇朋友赖之以叙其情而正其义，此文之昭如日月者。"[51]124

曾国藩以"礼"贯通治术与学术，"今日而言治术，则莫若综核名实；今日而言学术，则莫若取笃实践"[44]19。他认为"居崇高之地，总以维持风气为先务"[43]128，亦曾自述道："仆之所志，其大者盖欲行仁义于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其小者则欲寡过于身，行道于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于宗族乡党。"[44]26在曾国藩看来，礼学具有"修己治人"和"经纬万汇"的经世之用。出于补偏救弊的需要，曾国藩于姚鼐所提义理、考据、辞章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义理""考据""辞章""经济"四说。他认为，"古人无所云经济之学、治世之术，壹衷于礼而已"[52]52，又"古之学者，无所谓经世之术也，学礼焉而已"[22]309。继而，他总结道："礼者，即所谓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泰而不骄也；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威而不猛也；持之以敬，临之以庄，无形无声之际，常有懔然难犯之象，则人知威矣。"[53]304曾国藩进一步推动了"天理"转向"经世之礼"，以期复兴古礼：

古之君子之所以尽其心、养其性者，不可得而见，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自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23]400

在曾国藩看来，先王制礼无所不赅，"《周礼》一经，自体国经野，以至酒浆廛市，巫卜缮稿，夭鸟蛊虫，各有专官，察及纤悉"[22]309，经礼方可"经世宰物、纲维万世"，进而窥见"先王之大原"。曾国藩高度评价秦蕙田《五礼通考》一书的"经世"之功：

近世张尔岐氏作《中庸论》，凌廷堪氏作《复礼论》，亦有以窥见先王之大原。秦蕙田氏辑《五礼通考》，以天文、算学录入为观象授时门；以地理、州郡录入为体国经野门；于著书之义例，则或驳而不精；其于古者经世之礼之无所不该，则未为失也。[23]400

然而，曾国藩之意本在“隆礼”，使“人人纳于轨范之中”：

先王之制礼也，人人纳于轨范之中。自其弱齿，已立制防，洒扫沃盥有常仪，羹食肴胾有定位，绥缨绅佩有恒度。既长则教之冠礼，以责成人之道；教之昏礼，以明厚别之义；教之丧祭，以笃终而报本。[22]366

在他看来，“人无不出于学，学无不衷于礼”[22]366，又强调“礼”向礼俗的转换，“修焉而为教，习焉而成俗”[22]367，以期望人人能在社会中践行“礼”。

四、余论

作为有清一代延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文学流派，桐城派的古文创作素为读书人所重视，然桐城派学人在致力古文创作的同时，并未忽略对经学的关注，并积极参与国家的政治文化活动。桐城派在建构古文义法的过程中，以阐明经学为目标，以文章为表现形式，将对经学的研究贯穿其中，其间礼学尤为重要，这不仅是因为方苞、姚鼐等早期桐城派学者关注礼学，更是因为桐城派学人将对礼学的观照融入个人的学术发展，由“研礼”而“通经”，进而“明道”。一直以来，桐城派因其标榜“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介韩、欧之间”的理念而被视为遵奉程朱理学的流派。在乾嘉经学大盛的时代背景下，桐城派学人承清初礼学研究的潮流，虽在治礼时疏于名物度数，但亦不废考据、训诂之法，从而形成了不同于汉学考据的礼学研究路径。

本文从“以礼明道”的治礼追求、从“以理解礼”到“会通汉宋”的治礼路径、“以礼经世”的礼学夙愿三个层面对桐城派学人的礼学研究进行了初步的探讨，然关注点并非仅局限于礼学这单一问题上，而是希望以此抛砖引玉，引起学界对桐城派学人为学内涵丰富性的进一步关注和研究。学界历来对桐城派的研究，主要是将其作为一个古文流派，从文学史的角度探讨桐城派的古文成就，且集中于古文义法、文统谱系等问题上。这样的研究当然有其历史缘由和学科属性，然过于偏重文学性质，不免对桐城派在其他领域，诸如经学、史学、小学等方面的学术贡献关注不够，甚或遮蔽。桐城派在清代学术思想史的发展脉络中究竟处于什么样的历史地位？若仅以文学视角而言，似不能得出一个较为合适的结论，而应从经学、史学、文学等多角度纵观桐城派。本文前述中已指出，桐城派学人所推崇的义理、考据、辞章虽为文章之法，但也是治经之法，更堪称为“明道”的“文技”。由此，我们应当思考：桐城派学人在经学及其他领域的研究与文学研究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关系？经学及其他领域的研究在桐城派学人的诸多研究中究竟占据着怎样的地位？又有着怎样的影响？桐城派学人除了具有自身特性外，与其他学派学人是否具有共性？诸如此类的问题皆有必要予以深究或再思考，以有裨于推进、深化桐城派和清代学术思想史相关问题的研究。

[参考文献]

[1] 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M].徐天详,点校.合肥:黄山书社,1989.

[2] 姚鼐.惜抱轩文集[M]//惜抱轩诗文集.刘季高,标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3]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朱维铮,校订.北京:中华书局,2016.

[4] 李帆.清代理学史:中卷[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7.

[5] 顾炎武.亭林文集[M]//顾炎武全集:21.刘永翔,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6] 苏惇元.方苞年谱[M]//方苞集.刘季高,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7] 方苞.集外文[M]//方苞集.刘季高,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8] 方苞集[M].刘季高,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9] 方苞.方望溪遗集[M].徐天祥,陈蕾,点校.合肥:黄山书社,1990.

[10] 方苞.仪礼析疑[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9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11] 刘大櫆集[M].吴孟复,标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12] 姚鼐.惜抱轩尺牍[M].庐坡,点校.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4.
[13] 姚鼐.惜抱轩文集后集[M]//惜抱轩诗文集.刘季高,标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14] 姚鼐.惜抱轩九经说[M]//续修四库全书:第17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15] 姚椿.晚学斋文集[M]//桐城派名家文集:2.查昌国,点校.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4.
[16] 梅曾亮.柏枧山房文集[M]//柏枧山房诗文集.彭国忠,胡晓明,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17] 方东树.考槃集文录[M]//桐城派名家文集:1.严云绥,点校.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4.
[18] 戴钧衡.味经山馆文钞[M]//桐城派名家文集:8.江小角,点校.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4.
[19] 方宗诚.柏集堂后编[M]//桐城派名家文集:9.杨怀志,方宁胜,点校.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4.
[20] 方宗诚.柏集堂次编[M]桐城派名家文集:9.杨怀志,方宁胜,点校.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4.
[21] 方宗诚.柏集堂余编[M]//桐城派名家文集:9.杨怀志,方宁胜,点校.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4.
[22] 曾国藩.曾文正公文集[M]//李瀚章,编撰.曾文正公全集:七.李鸿章,校刊.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2011.
[23] 曾国藩.曾文正公杂著[M]//李瀚章,编撰.曾文正公全集:七.李鸿章,校刊.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2011.
[24] 姚永朴.蜕私轩集[M]//桐城派名家文集:11.方宁胜,杨怀志,点校.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4.
[25] 周敦颐.周敦颐集[M].陈克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0.
[26] 程灏,程颐.河南程氏遗书[M]//二程集.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6.
[27] 张载.张子语录[M]//张载集.章锡琛,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78.
[28] 孙奇逢.日谱[M]//孙奇逢集:下册.王惠敏,杜效,王宁,杨华,付建萍,点校.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
[29] 陆世仪.思辨录辑要[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24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30] 王兆符.原集三序[M]//方苞集.刘季高,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31] 方苞.礼记析疑[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32] 方苞.周官集注[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1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33] 惠栋.九经古义原序[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91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34] 杨应芹.段著东原年谱订补[M]//戴震全书:第七册.胡锦贤,等,辑校.合肥:黄山书社,2010.
[35] 姚莹.朝议大夫刑部郎中加四品衔从祖惜抱先生行状[M]//姚鼐.惜抱轩尺牍.庐坡,点校.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4.
[36] 陈用光.姚先生行状[M]//姚鼐.惜抱轩尺牍.庐坡,点校.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4.
[37] 陈用光.太乙舟文集[M]//清代诗文集汇编:48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38] 凌廷堪.校礼堂文集[M].王文锦,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8.
[39]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40] 方东树.汉学商兑[M].漆永祥,点校.南京:凤凰出版社,2016.
[41] 刘开.孟涂文集[M]//桐城派名家文集:4.徐成志,点校.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4.
[42] 陈祖武.清儒学术拾零[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
[43] 曾国藩.曾文正公书札[M]//李瀚章,编撰.曾文正公全集:六.李鸿章,校刊.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2011.
[44] 曾国藩.曾文正公书札[M]//李瀚章,编撰.曾文正公全集:五.李鸿章,校刊.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2011.
[45] 郭嵩焘.墓志铭[M]//李瀚章,编撰.曾文正公全集:一.李鸿章,校刊.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2011.
[46]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3.
[47] 礼记正义[M].郑玄,注.孔颖达,正义,吕友仁,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48] 清世宗实录:卷54[M].北京:中华书局,2012.
[49] 钦定周官义疏[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50] 清高宗实录:卷21[M].北京:中华书局,2012.
[51] 姚莹.东溟外集[M]//桐城派名家文集:6.施立业,点校.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4.
[52] 黎庶昌.曾文正公年谱[M]//李瀚章,编撰.曾文正公全集:一.李鸿章,校刊.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2011.
[53] 曾国藩.求阙斋日记类钞[M]李瀚章,编撰.曾文正公全集:一.李鸿章,校刊.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2011.

An Exploration of the Ritual Studies of the Tongcheng School

LIN Cunyang[1], LUO Gang[2]

(1. *Institute of Ancient Histor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2. *School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China*)

Abstract: As a prominent literary school, the Tongcheng School is renowned for its classical prose, yet it also dedicated itself to Confucian classics studies, with a particular focus on ritual studies. In constructing the principles of classical prose, Tongcheng scholars aimed to elucidate Confucian classics through literary expression, integrating their studies of the classics into their writings. Among these pursuits, ritual studies held special significance. Tongcheng scholars incorporated their reflections on ritual studies into their personal academic development, progressing from "studying rituals" to "mastering the classics" and ultimately to "illuminating the Dao". Adhering to the tenets of Neo-Confucianism, they pursued a scholarly approach to ritual studies grounded in "clarifying the Dao through rituals" and thereby "illuminating the meaning of the classics". In their ritual studies, they did not limit themselves to textual analyses of terminology and institutions; while valuing textual research and exegesis, they excelled at "interpreting rituals through Neo-Confucianism". Furthermore, amid evolving academic trends, they sought to "resolve disputes through rituals" and "synthesize Han Learning and Song Learning". In addition to this, Tongcheng scholars deeply understood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ritual studies and aspired to implement it in social practice. Previous research on the Tongcheng School has predominantly examined its achievements in classical prose from a perspective of literary history. However, to fully assess the school's position in China's history of academic thought, a 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 encompassing classics, historiography, and literature is essential.

Key words: Tongcheng School; ritual studies; Fang Bao; Yao Nai; history of academic thought in the Qing Dynasty

(责任编辑:丹萍)

礼乐文明的传统及其现代化

顾 涛
（清华大学 人文学院，北京 100080）

[摘 要] 发掘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优质资源，阐释“中国特色”所根植的深厚基础，把握古今绵延的独特优势，皆离不开对礼乐文明的深度开发。说起“礼”，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礼仪、仪式，然而这只是“礼”的第一个层面。按孔子的教导，对礼仪的研究应当重点探求“礼之本”，而非繁文缛节、礼之末节等，因而礼学研究要逐渐深入自身修养、社会制度、国家治理等更深层次，以及更为重要的、被人忽视的礼教、礼法、礼治等层面，由此形成了一种礼学研究的“冰山模型”。仪礼只是冰山露在水面以上很小的部分，从礼教开始逐渐触及冰山潜藏在水面以下的部分，“礼”这座冰山的结构底层是更为潜在、更为隐性的一整套治理国家的理念、方法、逻辑和内涵，我们称之为礼治。由身外到内心，由制度到观念，经长期积淀与升华，最终形成一整套生活方式，一种思维模式，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文明样态，我们称之为礼乐文明。礼乐的概念已深深嵌入中国人的思维逻辑，当宋代大儒程颐说出“天下无一物无礼乐”，可见其已成为中国人认识世界的方法论。基于此，礼乐复兴必须要从冰山潜藏在水面之下的巨大冰体开始，若局限在礼仪层面注定难收其效。

[关键词] 礼乐文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礼教；礼治；礼仪；礼法
[中图分类号] B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267（2025）01－0088－15
DOI：10.14129/j.cnki.forwordposition.2025.01.009

一、问世间“礼”为何物

有一位美国学者邓尔麟（Jerry Dennerline），他对中国文化极感兴趣，醉心于研究中国历史，于是来到中国问学，这一年是1983年。

据邓尔麟回忆，“1983年7月一个闷热的早晨，我作为一个西方的历史学者，跳下了咔哒作响的公共汽车来到此地，为的是寻找一个标明‘素书楼’的红门住宅”[1]1。这个叫作“素书楼”的红门住宅位于台北的东吴大学校内，是历史学家钱穆（1895—1990）的住所。在邓尔麟心目中，“1949年以后，钱穆成为了海外中国文化传统的代表”[1]3，于是他来中国问学的第一站就选择了去台北拜见钱穆先生。邓尔麟认为，要研究中国文化，需要关注当代学术界最顶尖的学者，从这个典型人物入手，逐步探索中国文化的纵深。因此，他不仅到台北与钱穆本人进行了深入的对话，还来到钱穆的老家江苏无锡，通过钱穆在无锡的故居七房桥考察其出生、成长、生活、发展的人生历程。邓尔麟通过对一个具体的区域进行实地考察，从而进入中国人

[基金项目]清华大学基础文科发展项目。
[作者简介]顾涛，博士，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制度史、古代中国的国家治理。

的生活和思想，进而进入中国的文化传统。这项专门研究最终以邓尔麟的著作《钱穆与七房桥世界》（1989）呈现出来。

可是，钱穆却对邓尔麟说："研究七房桥，表现了你对中国的地方风俗、家庭制度和人们的乡土观念的兴趣。但是，如果你想真正了解中国文化，那就还有偏差，因为你只看到了手指和脚趾。"[2]9在钱穆看来，这样一种西方人类学的文化研究方式对理解中国文化当然是有帮助的，但是无法深入中国文化传统的核心。于是钱穆告诫邓尔麟："要了解中国文化，必须站到更高来看到中国之心。中国的核心思想就是'礼'。"[2]9钱穆不仅道出了他对中国文化传统核心的观点，而且指明了中西方学术研究在方法论上的显著区别。

在中国文化的诸多重要概念中，译成英文最难找到确定性词汇的，大概就是这个"礼"。不管是ritual、rites，还是ceremonial、etiquette，抑或propriety、manners等，都不能完全对应中国的"礼"。①因此，钱穆指出：

在西方语言中没有"礼"这个单词。它是整个中国人世界里一切习俗行为的准则，标志着中国的特殊性。正由于西语中没有"礼"的概念，西方也只是用风俗之差异来区分文化，似乎文化只是影响所及地区各种风俗习惯的总和。[2]8

邓尔麟的思维方式正是西方典型的用风俗（custom）之差异来区分文化，所以他才会去研究无锡七房桥，研究这个江南水乡的地方风土人情。但是，在钱穆看来，这些都只是中国文化的"手指和脚趾"，只能反映中国幅员之辽阔、风俗之多样，并不能等同于中国文化。在中国，无论什么地方、出自什么风俗的人，都有一个共遵共守的东西，那是"整个中国人世界里一切习俗行为的准则"，即"礼"。钱穆告诉邓尔麟："无论在哪里，'礼'是一样的。'礼'是一个家庭的准则，管理着生死婚嫁等一切事务和外事。同样，'礼'也是一个政府的准则，统辖着一切内务和外交，比如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征兵、签订合约和继承权位等等。"[2]8研究中国文化，贵在能否把握住这个"礼"。

然而，"礼"这个中国文化传统的核心在20世纪曾遭受严重的冲击，当时的反礼教思潮让"礼"这个文化观念停驻在了前现代。中国的现代化是不是要在打倒了"礼"的废墟上起家呢？还要不要与"礼"产生关联？如果要，又将如何寻找两者的连接点？不啻邓尔麟在听到钱穆的话后如坠五里雾中，只得如实记录下来，别无他法，直至今日，中国的历史学界恐怕也还没有充分做好回应或"对抗"钱穆之说的准备。

钱穆之说其实是上有所承的。让我们把镜头推前120年，回到19世纪的清同治四年，即1865年。

曾国藩（1811—1872），号称"晚清第一名臣"，他在晚清政治界、文化界的影响不亚于20世纪钱穆在海外的影响，他对"礼"的认识与钱穆之说前后呼应。曾氏认为："盖古之学者，无所谓经世之术也，学礼焉而已。"[3]256"古之君子之所以尽其心，养其性者，不可得而见，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自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3]358这两段话为与曾国藩关系极为亲密的方宗诚（1818—1888）所记录。方氏是桐城派的著名传人，1862年其与曾国藩初次见面，翌年加入曾国藩幕府。方宗诚深感曾国藩对其影响极大，以弟子之礼侍之为先生，其实他只比曾氏小七岁。正是方宗诚在曾国藩幕府期间，两人终日读书谈艺，讨论学术至为精深，曾国藩毫无保留地向方宗诚道出了自己学问的最底层。

曾国藩认为，中国学问的精髓在经世致用，该学问路径可称为礼学，具体展开来，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中国的君子之道。这条大道可分两支：一支往人的内心修养走，一支往安邦定国的外在事功走。因有一以贯之的东西在，两者殊途同归。这

①参见罗伯特·恰德：《西方汉学之"礼"观》，载《世界汉学：第7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个一以贯之的东西，曾国藩言为“一禀乎礼”。若自内言之，个人的修养以德为先，德胜于能力，胜于技能，胜于专长，德之外化由“礼”，无“礼”无以见其德。若自外言之，在家族内，在政事上，在社会中，要做到立己达人、经世济民、无处不见学问，而这个学问的归宿在“礼”。由此，便可以理解孔子所谓的“‘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为政》）亦可理解子路所谓的“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论语·先进》）读书与施政，孝友与社稷，虽然路径不同，但有一个不变的抓手，即曾国藩所说的“学礼焉而已”。

曾国藩的这一思想后为严复（1854—1921）所推崇。严复在翻译法国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鸠的著作《法意》时，称孟德斯鸠与“近世儒宗”曾国藩的理念彼此碰撞，故在《法意》的第十九卷写了很长的一条按语①，抄录曾国藩“古之学者，无所谓经世之术也，学礼焉而已”一言，又摘录曾氏论证之语，比如：“《周礼》一经，自体国经野，以至酒浆巫卜，虫鱼夭鸟，各有专官，察其纤悉”；“唐杜佑《通典》，言礼居其大半，得先王经世遗意”；“清代巨儒辈出，顾氏以扶植礼教为己任；江慎修纂《礼书纲目》，洪纤毕举”；“秦氏修《五礼通考》，自天文地理，军政官制，都萃其中，旁综九流，细破无内”；等等。由此可证“吾国之礼，所混同者，不仅宗教、法典、仪文、习俗而已，实且举今所谓科学历史者而兼综之矣”②。严复以曾国藩的思想观点贯通中西，找到了中国文化中的“礼”与孟德斯鸠“宗教、法典、仪文、习俗”四大块的汇合交融之处。我相信，钱穆必定看过严复所译的《法意》，必定在严复这条按语前三复斯言。

在曾国藩、严复、钱穆看来，“礼”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无疑具有崇高地位，所谓“洪纤毕举”“都萃其中”，所谓“兼综之矣”，所谓“一切习俗行为的准则”，这是中国文化中其他任何一个概念都无以匹及的。然而，正因“礼”高不可及，失去了人世间的情味与温度，五四以来深受反礼教思潮的冲击，百余年来几乎已沦为破瓦颓垣。

对“礼”的研究与认识停驻在19世纪曾国藩时代对“礼”的认识那一站，正如陈寅恪所说：“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曾国藩）、南皮（张之洞）之间。”[4]285对“礼”的认识不清晰，拆解不开这个囫囵模糊的混合体，以及不能用现代学术语言和现代学术话语体系对其进行层次分明的逻辑论证等难题，制约着中国文化传统与中国式现代化的衔接，为使相关研究走出这关键的一步，本文尝试从五个层面对“礼”这个复杂的混合体进行初步解析。

二、探求“礼之本”：从礼仪层面出发

“礼”的第一层，也就是“礼”最显著的特征：一种礼仪、一种仪式。

我们回到《论语》，很容易理解孔子在礼仪层面对“礼”的一系列观点。《论语·八佾》首章：“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这里是说八佾舞这一隆重盛大的礼仪乐舞出现在了鲁国大夫季氏的庭院中。当时的礼乐之舞，以八人为列是一佾，纵横都是八人，共六十四人，称为八佾。按规制，天子八佾，诸侯六佾，大夫四佾，士二佾。也就是说，只有诸侯以上的国君才配使用八佾舞，而鲁国大夫季氏断然没有使用的资格。当时鲁国国君的权力已经旁落，季氏实际上已掌控鲁国政权，故堂而皇之在自己庭院中使用八佾舞。孔子认为，季氏公然使用八佾舞，足见其篡权执政的意图已昭之于众，“是可忍也，孰不可忍”，可见礼仪形式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内心想法。

《论语·八佾》接下来一章曰：“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三家之堂？”古代在祭祀的时候会使用一

①参见孟德斯鸠：《法意：上册》，严复译，商务印书馆，1981，第411页。

②同上。

整套礼仪乐章，包括祭品的上陈、祭祀的全程、祭毕撤回祭品都伴有专门的音乐，仪节与音乐相互配合，且演奏的音乐也是有一定规制的。鲁国当政的三家大夫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在撤下祭品时竟然唱着一首名为《雍》的乐曲。对此，孔子解释说，能用《雍》这首乐曲的是谁？从其乐章唱和的文本中可知助祭的是诸侯，主祭的天子端庄恭敬。在三家大夫的庙堂上，凭借哪一点唱此诗呢？如今却出现在三家大夫之堂，其僭越之心已人尽皆知。古代的礼仪、音乐、舞蹈、诗歌是相互配套的，后来礼仪、音乐、舞蹈的样态均已流失，从《诗经》中尚可窥见当年唱和的文本存有“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八个字，当年这一礼仪的关键碎片，信息量巨大，弥足珍贵。

《论语·八佾》下面两章略显复杂：“子入大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大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粗略地讲，这两章中的“礼”同样指的是礼仪、仪式。孔子入太庙助祭，对每个仪节及仪节的每一个步骤都要问得清清楚楚，这遭到某些人的质疑，孔子回答说“是礼也”。这里的“礼”显然不仅仅指每一个具体的仪节本身。梁代皇侃解释说：“所以云‘是礼’者，宗庙事重，不可轻脱，愈知愈问，是敬慎之礼也。”[5]65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以下简称《集注》）沿用皇说。在皇侃看来，孔子理应熟知一个个具体的仪节，而孔子所言的“礼”，是一整套“活的”祭祀典礼，在具体的行礼过程中，这套礼仪中的各个仪节与步骤彼此呼应、前后联动，仪节因人而异、因时而变，并非固定不变的死规则，所以要“敬慎”。作为古代礼典之一的“告朔”，朱熹《集注》简释之曰：“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颁来岁十二月之朔于诸侯，诸侯受而藏之祖庙。月朔，则以特羊告庙，请而行之。”[6]66这样一项重要的标志性典礼，鲁国的君主已不再亲自前往行礼，只是保留了宰杀羊的行礼环节，并让执事有司代为宰杀。对此，子贡认为徒存其仪已无甚必要，故建议索性取消这个环节。但是孔子非常看重这个典礼，该典礼的存在代表着诸侯、大夫、士乃至庶人对光阴流逝的敬畏，昭示着诸侯受命于国君，其礼义重大，不能轻言废止。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同样在礼仪这个层面，世人理解的“礼”与孔子理解的“礼”存在较大的差异。礼仪不是僵死的仪式，不是外在的仪节，礼仪需要因时因地因人而制宜，需要将内在的礼义彰显出来。因此，当林放“问礼之本”的时候，孔子大为赞赏，“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论语·八佾》）孔子更关注的是“礼之本”，而非繁文缛节、礼之末节。“礼之本”不在形式的繁复、奢侈，正如范祖禹所说：“俭者物之质，戚者心之诚，故为礼之本。”[6]62就丧礼而言，“戚”是指内心是否有诚意，内心对逝去者的悲伤之情，对先辈的“心之诚”才是“礼之本”。孔子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钱穆对此句解释得非常到位：“礼乐必依凭于器与动作，此皆表达在外者。人心之仁，则蕴蓄在内。若无内心之仁，礼乐都将失其意义。”[7]54“仁乃人与人之间真情厚意，由此而求表达，于是有礼乐。若人心中无此一番真情厚意，则礼乐无可用。”[7]54如此，我们也就明白了，礼仪的研究必然导向心性道德论，礼学与仁学一主外一主内，实相辅相成。

由此必然会联想到孔子的另外一则经典语录，《论语·阳货》：“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礼”的第一个层面不应仅停留在仪式本身，玉帛等祭品并不等于“礼”，钟鼓等乐器也不等于“乐”。钱穆说：“遗其本，专事其末，无其内，徒求其外，则玉帛、钟鼓不得为礼乐。”[7]453《礼记·乐记》表达得则更为透彻：“乐者，非谓黄钟、大吕、弦歌、干扬也，乐之末节也，故童者舞之。铺筵、席，陈尊、俎，列笾、豆，以升降为礼者，礼之

末节也，故有司掌之。”这些外在的仪式只是礼之末节、乐之末节。作为礼学的专家，贵在由表及里，要能看到“黄钟、大吕、弦歌、干扬”背后的人心人情，以及“铺筵、席、陈尊、俎、列笾、豆、行升降”背后的精气神。当人心的教化程度、人伦的亲疏关系、人情的厚薄冷暖没有达到所谓的“仁”而只是盲目追求仪式时，是一定达不到“礼”的，能做的只是礼之末节。因此，礼学必定走向君子之学。《论语·雍也》：“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内心的忠诚仁义与礼仪的雍容典雅，二者兼得才是文质彬彬的理想境界。君子的意义就在于“仁”与“礼”的兼修、兼容、兼得，这才是“礼”的第一个层面的完整内涵。

然而，文质彬彬只是理想的状态，殊不易于企及。如果达不到内外兼修，必须要有所放弃的话，又该怎么办？朱熹《集注》引杨时的看法：“文胜而至于灭质，则其本亡矣。虽有文，将安施乎？然则与其史也，宁野。”这个“与其……宁……”的推论逻辑与孔子回答林放“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的逻辑一致，也是孔子追求“礼之本”的基本原则。将这一原则代入实际的情境，就出现了《论语·子罕》中的取舍：“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麻冕是古代一种冠帽的形制，也是一种古礼，初时用绩麻制作，发展到孔子时代，随着工艺提升改用“纯”（细丝）制作，较绩麻制作更加节省、简化。孔子认为这样做很好，因为遵守了从简原则。“吾从众”的意思是说，现在流行用这种简化帽冠，那我就可以从众。然而，孔子在另一个礼仪细节上却不从众。古代士大夫的住宅，进门后先有庭，庭后有堂，堂比庭要高出一些，需要通过台阶登堂，叫作“升堂”。堂的后面是室，属于私人空间，只有比较亲密的朋友才会“入室”。尊贵的宾客在主人的引导下经过庭院，在堂上接见。如果堂上已有重要人物在座，那么在登堂之前，虽还没有直面堂上之人，仍要在上阶之前先行拜礼，以示对堂上之人的敬重，即“拜下”。之后，登上台阶来到堂上，直面了贵宾要再行拜礼，即“拜乎上”。孔子认为，“拜乎上”是有意做给对方看的，较“拜下”显出自己骄泰之气，已失去了对堂上贵宾由衷的真情，故不从众，应执守古礼，坚持在堂下拜。孔子的两次处理，一次“从众”，一次“违众”，投射出孔子内心的那一把恒定的标尺。孔子对待古礼，并非一味墨守，也并非刻意逐新，而是在坚持“礼之本”的原则下形成自己的一套标准。

《论语·子罕》概括了孔子对待礼仪的四项基本原则：“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朱熹《集注》：“意，私意也。必，期必也。固，执滞也。我，私己也。”[6]109-110如何行礼？如何做到内外兼得？首先，不要掺杂私意；其次，不要泥古不化，要懂得变通；最后，行礼不是为了突显自己。礼乐之道，决难轻易得之，难就难在不能绝去以上四者。修己之难，同样亦可由此观人。《论语·为政》记：“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观人因何而做，如何去做，持何心态去做，即观察“其行动之动机与居心”，“其行为之趋向与心术”，“其行为之意态与情趣”，“其人之人格与心地，将无遁形”[7]35-36。如此，在探求“礼之本”的道路上方可算达其一间了。

从这一层面研究“礼”的著作非常多，如清代礼学家江永（1681—1762）有一部《昏礼从宜》①，是研究婚礼礼义的佳作，该书的蓝格抄本现藏于安徽省图书馆。曾执教于清华大学中文系的许维遹（1900—1950）发表过一篇《飨礼考》②，是研究飨礼礼典的重要成果。礼学家沈文倬（1917—2009）曾撰

①参见徐道稳：《江永反朱思想及其对戴震的影响——基于新见文献〈昏礼从宜〉的研究》，《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②许维遹：《飨礼考》，《清华学报》1947年第1期。

写过一个系列的《葑闇述礼》[①]，其中《容礼考》《乡礼参臆》《岁祭绎义》《昏六礼探义》等篇堪称礼仪研究的经典。虽然礼仪研究的成果不可胜数，但从现代学术切入解析仪节礼义，挖掘礼义内核的精品佳作仍比较少见。

三、礼学的“冰山模型”：从礼教、礼法进入礼治

当礼仪的研究触及“礼之本”，就意味着“玉帛”“钟鼓”的盖头已经被掀开，真正步入礼学研究的康庄大道。

《论语·泰伯》有一章：“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曾子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悖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曾子在去世之前，认为自己这辈子有三件事做得最好，那就是动容貌、正颜色、出辞气。至于仪节层面的“笾豆之事”，并不是他最关心的，可以让具体的执事者去做。那么，动容貌、正颜色、出辞气三者属于“礼”的哪一个层面？三者和“笾豆之事”的差别在哪里？朱熹《集注》引尹淳的话“养于中则见于外”，“若乃器用事物之细，则有司存焉”[6]103-104。这个“外”，区别于礼仪，指的是内心修养流露于日常生活之神情、脸色、言语、口气之间者。钱穆对此解释得非常到位，认为这些“容貌颜色辞气，喜怒哀乐之所由表达”，展现出来就是“鄙之与雅，倍之与顺，正之与邪，信之与伪，暴之与和，慢之与庄”[7]204。这便是“礼”的第二个层面，即一种礼教、一种教养。这个层面的“礼”是与“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紧密关联的，区别在于这一层面的“礼”并不只限于行礼仪的特殊场合，而是呈现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过程，以及平时的日常起居。

由特殊场合的礼仪回归到平时的日常起居，也就是由礼仪层面进入了礼教层面。《论语·颜渊》首章记“颜渊问仁”，孔子回答：“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具体而言，即“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克己复礼”之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遭到猛烈抨击，关键在于未能从礼教层面来解读。这个层面的“礼”更多指向一种修身之道，修身是儒家道德范畴的核心，其指向自我内心的修养。因此，这里的“克己”，朱熹《集注》谓为“身之私欲也”。怕读者理解不到位，朱熹又引谢良佐之说：“克己须从性偏难克处克将去。”[6]131-132要修身，就是从自身性格里的弱点着手，对自身性格的弱项、缺陷进行克制，此为“克己”。这个过程是刀刃向内的，是极其痛苦的。同样，“复礼”也是指向自我，是通过自我内心的修明而表现出来的真挚、率真与不逾矩。这里的四个“非礼勿×”并不是要人“只在社会现行礼俗之细节处规行矩步”，而是“天下之大，凡所接触，全与己心痛痒相关，血脉相通”[7]304，是要在日常行为中自我审视、自我反省，发现自己的“性偏难处”，然后“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

《论语》的《乡党》篇记载“孔子燕居”，也就是孔子的日常起居，详细记载了孔子的言行举止。我们从其中记载的“恂恂如也”“侃侃如也”“阒阒如也”“踧踖如也”等可以看到，孔子于乡党，也就是在与人相处的时候是怎样的一种状态。孔子在宗庙朝廷上是怎样的状态，包括孔子入朝的时候与大夫言是怎样的状态，有国君在的时候是怎样的状态等。该篇甚至还记载了孔子独处的时候、躺着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孔子看见穿丧服的人会怎么样；孔子在马车上是怎样站立的，以及怎么样上车、怎么样下车；孔子穿衣有什么讲究、吃饭有什么讲究；等等。为什么要记载这些？是不是要后代的士人们亦步亦趋地按照《乡党》记载的孔子的一言一行生活？不是的。孔子的弟子们据实记录下孔子的言行举止，这是一种从内心生发出来的、直接流露出来的举动，难怪钱穆指出：“惟孔子之

①参见沈文倬：《葑闇述礼》，收入《葑闇文存——宗周礼乐文明与中国文化考论》，商务印书馆，2006。

道，虽极高深，若为不可几及，亦不过在人性情之间，动容之际，饮食起居交接应酬之务，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之常，出处、去就、辞受、取舍。”[7]231这里的“孔子之道”，就是礼教区别于礼仪的地方。特殊场合的仪式性活动，可以去掩饰，可以去伪装，但这些则是孔子的日常状态，一举手一投足很难去刻意修饰，是一种教化的气质的直接流露。

20世纪40年代，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潘光旦（1899—1967）写过一篇名为《论品格教育》①的论文，倡导大学要对学生进行品格教育，他说：“今日社会的病态，大之如种族间的猜忌，邦国间的倾轧，阶级间的斗争，信仰间的排挤，小之如人我间利害兴趣的各不相容。”“大病态”与“小病态”根本上是一样的，缺的“全都是养志与自我裁节的功夫”，严于律己和宽以待人很难达到一个融洽的地步。潘光旦认为：“在待人能放宽一步之前，先得律己收紧一步。放宽与收紧都是一种分寸与裁节的功夫。必须有善自裁节的个人于先，斯能有和谐与协调的社会于后。这原是中国礼教文化的中心精神，也是我们品格教育应有的鹄的。”这种自我裁节的功夫，其关键是向内的收敛，“要形于体外见诸行动而不失诸虚伪造作，必须内心先有一番长久的修养功夫，所谓慎独、不自欺、反求诸己等便是这功夫的所在了”。这就抓住了礼教的基本原则，礼教的核心不是向外的，而是向内的，是要求自己怎么做、做到什么原则，而不是要求别人，要求我之外的其他人怎么做、做到什么原则。礼教的这一核心精神，在潘光旦看来，与西方品格教育的旨趣非常契合。

沿着礼学的康庄大道继续向社会结构的深层推进，将进入“礼”的第三个层面：一种礼法、一种制度。

据《论语·先进》记载，孔子心爱的弟子颜渊去世时，孔子伤心至极，“子哭之恸”，“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然而，颜渊的父亲颜路希望将颜渊葬得体面一些，但因颜家家境贫寒，便向孔子提出“请子之车以为之椁”，想请孔子把车子卖了给颜渊在“棺”外面加一个“椁”，孔子却断然拒绝了这一请求。在孔子看来，颜渊没达到要用“椁”的地位，使用“椁”与其身份不相称。自己是大夫身份，出行就必须坐车以与其身份地位相匹配。继而风波又起，孔子的门人欲厚葬颜渊，孔子阻止，门人不听，子曰：“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论语·先进》）孔子对门人厚葬颜渊的做法不仅不支持，而且非常生气，认为他们不遵从“礼”的社会规则。这里的“礼”，指的不是仪式层面的丧礼，而是社会约定的一套礼制，一套制度安排，孔子认为不应违背这套社会规则。

《礼记·礼器》称“经礼三百，曲礼三千”，刚好就可以对应“礼”的这三个层面：“经礼”指的就是社会群体共遵共守的纲纪法则，对应“礼”的第三个层面；“曲礼”指的就是具体的仪文小节，对应“礼”的第一、二个层面。周公制礼作乐的“礼”就是“经礼”，按章学诚的解释，“古之所谓经，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8]94，就是“大经大法，所以纲纪天人而敷张王道者”[9]746。说得具体一些，就如章太炎之说：“余以为观象授时、体国经野、设官分职、学校制度、巡狩朝觐，皆可谓之经礼。”[10]225这个层面的“礼”就是荀子视域中的“礼”，其外延与“法”的概念重叠，难怪章太炎要说“荀卿隆礼义而杀《诗》《书》，经礼三百，固周之大法也”[11]298，“礼”与“法”共同指向社会法则、制度典章。《左传·隐公十一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一言正界定了礼法层面的“礼”。《论语·为政》有一句最贴合礼法这个层面的“礼”，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皇侃义疏：“孔子举前三代礼法相因及所损益，以为后代可知之证也。”[5]42钱穆进

①潘光旦：《论品格教育》，收入《潘光旦文集：第五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第367-373页。

一步解释："礼，兼指一切政治制度，社会风俗，人心之内在，以及日常生活之现于外表，而又为当时大群体所共尊共守者。"[7]48这个层面的"礼"，我们今天称之为"法"。

胡适在其名著《中国哲学史大纲》(1919)中曾感叹："今试问人'什么叫做礼'？几乎没有一人能下一个完全满意的界说。"[12]99他自己的回答是："礼的第一个作用，只是家庭、社会、国家的组织法（组织法旧译宪法）。"[12]102古代狭义的"法"指的是刑法、律例，这不是今天"法"的全部内涵。胡适所说的"家庭、社会、国家的组织法"对应西方的"法"，因而中国古代的"礼"＋"法"与今天的"法"的范畴方才重合。梁启超在《论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1904）中认为："我国古代，礼与法视同一物。礼者，即规律本族人之法也。故凡礼制之著于竹帛也，皆可认为一种成文法。"[13]8胡适与梁启超关于"礼""法"关系的认识是一致的，他们视域中的"礼"是礼法、制度这一层面的"礼"。马小红的《礼与法：法的历史连接》(2004/2017）是礼法这个领域重要的研究成果，其目的是要把今天"法"的历史连接到中国古代的"礼"。马小红在书中引用获得东京帝国大学法学博士学位的法学家杨鸿烈（1903—1977）的观点，"杨鸿烈作《中国法律思想史》时，卓有建树地指出，研究各国的法制史应该先寻觅到几个总枢纽，然后才能触类旁通，左右逢源"[14]109，"杨鸿烈所说的中国法制史的'总枢纽''贯通整个中华法系的思想'可以用'礼'来概括"[14]109。对应西方law的概念，中国传统法是"礼"与"法"的共同体，这是当代法学研究与中国古代传统结合时需要把握的最关键的接口。

今天，在中国法律史、法学史的研究中，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礼"的价值，但相关研究还比较浅，对"礼"的开发程度还不够。从法理学上究竟应当如何认识这个作为"中国法制史的总枢纽"的"礼"？胡适说相当于宪法，梁启超说就是一种成文法，其后又有学者提出"礼"应当对应自然法，对应习惯法，对应行政法，对应民法，可谓不一而足。可见，从礼法层面对"礼"进行的探索还处在比较滞后的阶段。职是之故，我呼吁文史、政法等学界的学者们联起手来进行"礼""法"接轨的跨学科研究，"要在现代法学的学理框架中来重审'礼'的传统，将这个混合体中具有现代性的资源抉发出来，并给予法理学意义上的合理解释，也就是将传统与现代学术体系找到对应和连接的口，故而可称之为礼法接轨"[15]。这也是"第二个结合"不容忽视的重要学术课题。

随着对"礼"的解析的逐层深入，我们可以看到，礼学的研究形成了一种所谓的"冰山模型"。这里借用美国心理学家麦克利兰（David C. McClelland）提出的素质胜任力"冰山模型"（Iceberg Model）理论，该理论将个体的胜任力比作一座冰山，其中基本知识和技能等容易被感知、提高和测量的是冰山露在水面以上部分，自我认知、内驱力、品质、个性、角色定位等内在的、难以测量的则是潜藏在水面以下部分。①冰山水面以下部分的体量远远超过水面以上可见部分的体量，所以称露在水面以上部分为冰山一角。对"礼"的第一层，即仪礼的研究可对应冰山露在水面以上部分，这一层面也是大多数人眼中的"礼"，一提到"礼"首先想起的就是礼仪、仪式。但这只是"礼"这座冰山露在水面以上的非常小的一部分，从"礼"的第二层，即对礼教的研究开始，逐渐进入冰山潜藏在水面以下部分，水面之下的巨大冰体才是礼学研究的主阵地。由礼教进入对礼法、制度的研究，这是"礼"的第三层，至此已抵达这个巨大冰体的中心区域，这个区域的现有研究相对来说非常欠缺。由礼法的研究进一步往这座冰山的结构底层推进，将进入更为潜在的、更为隐性的"礼"的第四

① McClelland David C.,"Testing for Competence Rather Than for 'Intelligence',"*American Psychologist*, no. 28 1973:1-24. 参见陈霄:《高校中层管理者专业发展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22,第17-18页。

个层面，即一整套治理国家的理念、方法、逻辑和内涵，我们称之为礼治。

礼治的用法，在《论语》中比较典型的是《为政》中的这一章："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有格。'"朱熹《集注》："礼，谓制度品节也。……则有以使民日迁善而不自知。"[6]54 "礼"在这里不仅指硬性的制度，还包含软性的品节。需要注意的是，礼治不等于礼制，礼治所含远大于礼制。钱穆说得非常好："人人蹈行于制度品节中，此亦有齐一之效。然一于礼，不一于刑。礼之本在于双方之情意相通，由感召，不以畏惧。"[7]26 钱穆进而点破《为政》篇的宗旨："孔门政治理想，主德化，主礼治，此章深发其趣。"[7]26礼治是一种"政治理想"，是一种国家治理的观念和方略，在制度以及非制度层面均有渗透。孔子心目中礼治的典范是西周模式，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经夏、商、周三朝累积，至西周时达到礼治的顶峰，其标志是"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馀年不用"（《史记·周本纪》）。少用刑甚至不用刑就可达到"郁郁乎文"，这正是"齐之以礼"的最高境界，即礼治的理想。何谓"文"？钱穆的解释非常独到："文，指礼乐制度文物，又称文章。郁郁，文之盛貌。历史演进，后因于前而益胜，礼乐日备，文物日富，故孔子美之。"[7]67孔子极推崇周公的制礼作乐，西周模式在孔子纂修的《诗》《书》《礼》《乐》中是一种国家治理的理想图景，其中含有"非人人所能知"的所谓的"道"，正如钱穆所言，"孔子毕生崇拜周公，实深有契乎周公制礼以治天下之深旨。盖礼治即仁治，即本乎人心以为治。礼本乎人心，又绾神道人伦而一之，其意深远，非人人所能知"[7]64。这也就构成了此后经学研究的大端。

礼治的研究，自西周以来已成为历史研究的重要主题。在《论语·为政》中，孔子谈到"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还说了下面一句话："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可见，在制度的因革损益中存在着一些不变的规律性的东西，这些规律性的东西突破了制度本身，进入礼治这一层面。钱穆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点，说："孔子论学极重礼，人类社会亦时时必有礼，此乃历史之常。但礼必随时代而变，此乃礼之时。而变之中仍存有不变者，此乃礼之意。"[7]49同样，《论语·卫灵公》篇记载孔子答"颜渊问为邦"，只是说了"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看似孔子只回答了"颁一历，乘一车，戴一冠，奏一部乐"，实则蕴含着礼治的精神。"盖颜渊所问，自是治国大道"，"孔子推本之于虞、夏、商、周之四代，而为之斟酌调和，求其尽善尽美"[7]405，这是一种深邃的历史精神，把握住这样一种"礼之意"，乃可谈治国、平天下。由此，我们也就应当理解，真正的反礼教实际上反的是一种泥古不化的教条主义，一种唯古是从的刻舟求剑式的做法。这种反礼教的主张和理念早在明清之际、魏晋时期，甚至早在战国时期诸子争鸣中就已形成。从冰山一角进入潜藏在水面以下的巨大冰体，寻求变中的不变机理，抓住礼治的规律性特征以鉴往而知来，古往今来，鲜有学者能够企及。

四、求证"天下无一物无礼乐"

深入到"礼"的第四个层面，即礼治层面，也就触及到了中国文化传统的特质。钱穆告诉邓尔麟"中国的核心思想就是'礼'"，"它是整个中国人世界里一切习俗行为的准则"，指的就是礼治这个层面，只有到这个层面才能抓住中国文化传统中那个不变的、规律性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与西方文化比较，钱穆说："中国政治是一个礼治主义的。倘使我们说西方政治是法治主义，最高是法律，那么中国政治最高是'礼'，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是礼治。"[16]180西方的法治传统同样是一个复杂的体系，法治包括法律，但不仅仅指法律；中国的礼治包括礼仪、礼制，但不仅仅指礼仪、礼制。中西方传统背后均

有根植于彼此文化传统中的一整套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治理模式。

曾国藩所说的“一禀乎礼”，指的也是礼治。严复同样看到了这个层面的“礼”，故对曾氏的观点推崇备至。严复曾经踌躇很久，想要用“礼意”为名来翻译孟德斯鸠的《法意》，他在《法意》第一卷的按语中就说：

西人所谓法者，实兼中国之礼典。中国有礼、刑之分，以谓礼防未然，刑惩已失；而西人则谓凡著在方策，而以令一国之必从者，通谓法典。……故如吾国《周礼》、《通典》及《大清会典》、《皇朝通典》诸书，正西人所谓劳士。若但取《秋官》所有律例当之，不相侔矣。[17]7

然而，立足中西方制度和观念上的根本差异，严复最终还是用了“法意”这个词，之后许明龙译本改为“法的精神”。但是，严复担心用了“法意”这个译名，学术界在发掘中国传统资源时会仅取刑法的概念来对应西方的“法”，因而严复特别强调了“如吾国《周礼》、《通典》及《大清会典》、《皇朝通典》诸书，正西人所谓劳士（laws）”。

翻开《周礼》，就其框架便可看出：

天官：64职，掌邦治，总理行政国务，首长太宰。

地官：80职，掌邦教，负责教育和基层管理，首长大司徒。

春官：71职，掌邦礼，负责礼典，首长大宗伯。

夏官：74职，掌邦政，负责军事国防，首长大司马。

秋官：67职，掌邦禁，负责司法刑律，首长大司寇。

冬官：按理应掌邦事，负责工程实业，首长大司空，今亡。按：因《冬官》亡佚，汉人取《考工记》补代，叙民间百工，可分攻木、攻金、攻皮、设色、刮摩、搏埴等类。[18]112-140

《周礼》包含了行政国务、基层教育、军事国防、司法刑律、工程实业等各方面，由此形成了周代礼治的宏大架构。孙诒让曾说《周礼》[①]是“更历八代，斟汋损益，因袭积累，以集于文、武，其经世大法，咸粹于是”的结果，“政则自典法刑礼诸大端外，……若会四枝百脉而达于囫，无或邕阂而弗鬯也”，“其为教，则国有大学、小学，自王世子公卿大夫士之子，洎乎邦国所贡，乡遂所进贤能之士咸造焉”。后学均可“求其道于此经”，在如此宏大的结构体系中，“倘取此经而宣究其说，由古义古制以通政教之闳意眇旨”，自可“通天人之故，明之乱之原”。换句话说，《周礼》中蕴含着周代礼治的运行逻辑，后世的国家治理者可沾溉无穷，若能参悟取用，执一驭万，可收“无为”而治之效。

再看曾国藩、严复举出的第二部著作《通典》，是继《周礼》之后中国制度史上的又一巨著。此书共200卷，包括《食货典》12卷、《选举典》6卷、《职官典》22卷、《礼典》100卷、《乐典》7卷、《兵典》15卷、《刑法典》8卷、《州郡典》14卷、《边防典》16卷。其中，《礼典》占了一半篇幅，可见杜佑对礼制的重视。然此书的宗旨并不在礼制的条目与细节，而在“述礼乐制度之统，究治乱兴亡之由”，故该书另外一半的内容同样事关“经国礼法程制”，同样是“缉熙王猷，至精至纯”[19]2，《通典》全书展现了礼治的汉唐模式。这个意义的礼治就是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一概括的“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他说：“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纪纲哉！”[20]2从天子到三公，再到卿大夫，最后到士庶人，均能在礼治的运行体制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

从礼仪到礼教，从礼法到礼治，从身外到内心，从制度到观念，经长期积淀与升华，最终形成一整套生活方式，一种思维模式，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文明样态——礼乐文明。梁漱溟（1893—1988）说得好，儒家“苦心孤诣努力一伟大的礼乐运动，以求消弭人祸于无形。古时人的公私生活，从政治、法律、

①孙诒让之言参见孙诒让：《周礼正义·序》，王文锦、陈玉霞点校，中华书局，1987，第1-5页。

军事、外交，到养生送死之一切，即多半离不开宗教，所以它首在把古宗教转化为礼，更把宗教所未及者，亦无不礼乐化之”[21]108。当“礼”“乐”成为这一文明体系的核心，其内涵便超越了某个具体的所指，深深嵌入了中国人的思维逻辑，我们将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的“礼”视作其第五个层面。

对《论语·阳货》“礼云礼云”这一章进行集注时，朱熹引用大儒程颐的一段话，并在其基础上进行了充分的发挥：

礼只是一个序，乐只是一个和。只此两字，含蓄多少义理。天下无一物无礼乐。且如置此两椅，一不正，便是无序。无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如盗贼至为不道，然亦有礼乐。盖必有总属，必相听顺，乃能为盗。不然，则叛乱无统，不能一日相聚而为盗也。礼乐无处无之，学者须要识得。[6]178

程颐的这段话出自程门弟子刘安节之手。刘安节（1068—1116），字元承，温州人，是永嘉学派的重要传人，宋哲宗元祐五年（1090）赴洛阳亲炙于程颐，深受其影响。《河南程氏遗书》收录了刘元承手编的两个部分，其中一部分“问仁”，另外一部分“问礼”，这两个部分是程子思想的核心，非常之关键。刘安节有一问：“穷神知化，由通于礼乐。”这句话该怎么理解？这句话实际是从《说苑》中化出，《说苑·辨物》篇记载孔子曰：“既知天道，行躬以仁义，饬身以礼乐。夫仁义礼乐，成人之行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刘安节问的是如何理解礼乐的妙用，程颐首先回答“此句须自家体认（或作玩索）”，意思是不是那么容易就能讲明白、说清楚的。接着他说：“礼乐无处无之，学者要须识得。”要认识礼乐，礼乐在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在其中浸润久了，不期然而可收“穷神知化”之效。刘安节立马想起《论语》“礼云礼云”一章，便接着追问程颐此章作何解，程颐的回答是：“推本而言，礼只是一个序，乐只是一个和。只此两字，含蓄多少义理。”至此，程子由现象触及本质，揭示出“礼”的内在本质是一种秩序，“乐”的内在本质是一种和融。于是，刘安节大胆发问：“礼莫是天地之序？乐莫是天地之和？”程颐最终说出了这句振聋发聩的话：“固是。天下无一物无礼乐。”①朱熹在集注《论语》时将程颐与刘安节上述三段问答串联了起来，并经过自己的加工、排列，最终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论说逻辑。

“天下无一物无礼乐”，这是大学者程颐在11世纪初对中国的文明传统作出的终极判断，之后经另一位大学者朱熹在11世纪末编入《集注》而广为传颂，影响了此后数百年中国知识分子对传统的认识论。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马一浮（1883—1967）同样是这么认识礼乐的，他说：“凡事取一种方式行之者，其方式便是礼，做得恰好便是乐。如作格律诗便是礼，诗中理致便是乐。写字识得笔法便是礼，气韵便是乐。”[22]446程颐以人们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桌椅为例，马一浮以文人每日须臾不离的作诗、写字为例，来说明“礼”与“乐”的对待关系，巧用这两个概念可形成一种认识世界的视角与方法。朱光潜（1897—1986）在1942年对这种思考问题的方法进行了初步概括，他说：“乐的精神是和，静，乐，仁，爱，道志，情之不可变；礼的精神是序，节，中，文，理，义，敬，节事，理之不可易。乐的许多属性都可以‘和’字统摄，礼的许多属性都可以‘序’字统摄。”[23]95他进一步指出：“礼的范围极广。个人的言行仪表，人与人的伦常关系，人与人交接的仪式和道理，政府的组织与职权，国家的制度与典章，社会的风俗习惯等等都包含在内。所以近代社会科学所讲的几无一不在礼的范围以内。”[23]106同样，“和的意义原于音乐，……一曲乐调本是许多不同的甚至相反的声音配合起来的，音乐和谐不和谐，就看这配合有无条理秩序。……就一个人的内心说，思想要成一个融贯的系统，他必定有条理秩序，人格要成一个完美的有机体，知情意各种活动必须各安其位，各守其分。

①《伊川先生语四》，载朱熹编《河南程氏遗书：上》，商务印书馆，1935，第247-248页。

就一个社会说，分子与分子要和而无争，他也必有制度法律，使每个人都遵照。世间决没有一个无‘序’而能‘和’的现象”[23]96-97。朱光潜之说是对礼乐的第五个层面最明白晓畅的解说。

至此，对“礼”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五个层面已简略地进行了一番分疏，同时也对自程颐至朱熹，自曾国藩至严复，直至近现代以来若干位重要学者的礼学研究进行了粗略的学术史梳理。我们庶几可以形成这样一个共识：现代学术的各学科在对礼乐文明传统进行开发时，首先应当建立起一个立论的前提，即你是站在哪一个层面展开论证和言说的。如果没有站在同一个地基上，两个学者之间的对话和讨论、质疑或共鸣也就成了隔空击掌，无的放矢。

五、礼乐复兴的一些尝试

时代赋予我们重大的使命和艰巨的任务，要深入理解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离不开对其所根植的中华文化的创造性阐释和发掘。“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24]“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24]如何更好地发掘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优质资源，阐释“中国特色”所根植的深厚基础，从中把握古今绵延的独特优势，已成为理论界的关键难题。从文明史的脉络来看，这一难题的突破离不开对礼乐文明的深度开发。时至今日，学术界对礼乐文明的理解和研究还非常薄弱，这与“第二个结合”的现实需求殊不相称，与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需求殊不相称。

当然，复兴礼乐已在全国多地、社会各层吹响了号角，但是这个号角的吹奏者们普遍仍立足在“礼”的第一层，也就是礼仪层面。若秉持“礼云礼云”的准则，如今倡导要复兴的“礼”大多数是可以坚持孔子“今也纯”“吾从众”原则的，但“复兴派”的执事者们却偏偏死守“拜下”的畛域。礼乐的复兴若进入不了探求“礼之本”的大门，就走不出一条蓬勃发展的康庄大道，很快就会因其学术之浅而蜷缩到螺蛳壳的道场中去。礼乐复兴必须从“礼”这座冰山潜藏在水面之下的巨大冰体开始，也就是要立足礼教、礼法、礼治三个层面，探索其古今贯通的道路。此路纵有千难万险，我们也不能避趋之。

虽然礼乐的复兴还远未形成气候，但20世纪以来，不乏一些有识之士提出过不少真知灼见。上文已随文涉及几家的观点，这里再略举几例，供当代的礼乐“复兴派”参酌。

章太炎（1869—1936）是当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孔”的先导，但在五四之后很快就发现苗头不对，立即刹车，兴叹当年自己所言为“刍狗”，称“前声已放，驷不及舌，后虽刊落，反为浅人所取”[25]763。20世纪30年代，章氏多次举办演讲，倡导“夫人不读经书，则不知自处之道不读史书，则无从爱其国家。……有史而不读，是国家之根本先拔矣”[10]10。章太炎所倡导之最力者，正在于从国家制度上汲取古制之长，这与章氏对“礼”“法”关系的一贯认识密切相关。章氏的理念是：“法者，制度之大名，周之六官，官别其守，而陈其典，以扰乂天下，是之谓法。故法家者流，则犹西方所谓政治家也，非胶于刑律而已。”[26]68“若夫张汤，则专以见知、腹诽之法震怖臣下，诛锄谏士，艾杀豪杰，以称天子专制之意。”[26]68章氏以周礼为最大的法，商鞅等法家为其流亚，张汤等刀笔吏则得其肤廓，也就意味着法治的资源应在礼法等制度的大脉络中，而不应“胶于刑律”。章氏又说：“法律者，模略格令仪注而为言，此则六典、通礼之流悉包之矣。”[27]77其视域中的法律实际上是“礼”“律”兼综，并以“礼”为主。可惜学术界对章氏批判礼教的赞许不遗余力，而对其“礼”“法”关系的认

识则不屑一顾。

实际上，在五四反礼教思潮的大本营中已折射出一道旨在吐故纳新、由破而立的光。周昌龙是较早明确揭示出这一蕲向的学者，“反礼教的目的，就是要去除礼教中违反情理自然的部分，恢复礼的自然本质”[28]211，“使人猛省，无形中涤除儒学壅塞难通之顽瘀，从而有振衰起颓、再造精魂之机”[28]131。因此，“五四知识分子虽然大力破坏传统中的各种机制，却并非拒绝此传统，而是意在复兴”[28]187。尤其是周昌龙对周作人（1885—1967）的研究，他认为周作人“生活之艺术”“主要是自由与节制的平衡配合，中国传统所说的礼，正是这样一种社会节制”，“反礼教的目的，就是涤除长期附着在礼上的偏激禁欲主义，以回复礼之自然中节的本来面貌”[28]244-245。周昌龙从礼教的层面将周作人思想的底层逻辑抽绎、剥离出来，由此发人深省地指出周作人的主张与礼学传统的精义相吻合。其后贺麟（1902—1992）的研究实际上是沿着这条道路继续的，从而引领风气之先。贺麟在1940年深刻地指出：“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从旧礼教的破瓦颓垣里，去寻找出不可毁灭的永恒的基石。在这基石上，重新建立起新人生、新社会的行为规范和准则。”[29]67贺麟慧眼如炬，敏锐地意识到中国的儒家传统与西洋精神内在有深度契合之处：

> 我在中国特有的最陈腐、最为世所诟病的旧礼教核心三纲说中，发现了与西洋正宗的高深的伦理思想和西洋向前进展向外扩充的近代精神相符合的地方。就三纲说之注重尽忠于永恒的理念或常德，而不是奴役于无常的个人言，包含有柏拉图的思想。就三纲说之注重实践个人单方面的纯道德义务，不顾经验中的偶然情景言，包含有康德的道德思想。[29]65

沿着贺麟的核心主张——“真正认识了西洋文化便能超越西洋文化；能够理解西洋文化，自能吸收、转化、利用、陶熔西洋文化以形成新的儒家思想、新的民族文化”[30]14，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番扎扎实实的中西融会式的学术研究，而这一番扎扎实实的工作，如今还非常不充分。

那位被称为“最后的儒家”的梁漱溟，“试图造就一个真正的中国文化的‘文艺复兴’”[31]5，他所“苦心孤诣努力一伟大的礼乐运动”至少是要在礼治层面作整体性的推进。梁漱溟晚年选择受现代化冲击相对较小的农村，希望通过乡村振兴挽留住传统的礼乐，但最终没能实现。经过20世纪一系列的“运动”，中国的乡村早已不是原来的模样，城市化对乡村的冲击和改造是前所未有的。费孝通（1910—2005）对“礼”的认识与梁漱溟非常接近，费孝通说：“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32]49“礼是合式的路子，是经教化过程而成为主动性的服膺于传统的习惯”[32]52，“长期的教育已把外在的规则化成了内在的习惯，维持礼俗的力量不在身外的权力，而是在身内的良心”[32]55。费孝通揭示出了问题的复杂性和严重性：“现行的司法制度在乡间发生了很特殊的副作用，它破坏了原有的礼治秩序，但并不能有效地建立起法治秩序。”[32]58如果没有先行对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进行破旧与开新，“单把法律和法庭推行下乡，结果法治秩序的好处未得，而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病却已先发生了”[32]58。因此，费孝通花费半生深入乡村，研究农村，理解中国的社会，贴近改革浪潮中的农民。

晚年的费孝通，来到为礼乐的理想而颠沛流离一生的孔子的故乡，“我在孔林里反复地思考，看来当前人类正需要一个新时代的孔子了”[33]18-19，“我希望在新的未来的一代人中能出生一个这样的孔子，他将通过科学，联系实际，为全人类共同生存下去寻找一个办法”[33]18-19。孔子的理想、礼乐的复兴与孔庙香火旺不旺盛关系并不那么大，费孝通期望的是能出现一位“新时代的孔子”。

[参考文献]

[1] 邓尔麟.钱穆与七房桥世界[M].蓝桦,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

[2] 钱穆.一堂中国文化课[M]//邓尔麟.钱穆与七房桥世界.蓝桦,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

[3] 曾国藩全集·诗文[M].长沙:岳麓书社,1986.
[4]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M]//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5] 皇侃.论语义疏[M].北京:中华书局,2013.
[6] 朱熹.论语集注[M]//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
[7] 钱穆.论语新解[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8] 章学诚.文史通义·经解上[M]//文史通义校注:上.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
[9] 章学诚.永清县志六书例议[M]//文史通义校注:下.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
[10] 章太炎国学讲演录[M].诸祖耿,王謇,王乘六,等记录.北京:中华书局,2013.
[11] 章太炎.诸子学略说[M]//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
[12]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M].北京:中华书局,2013.
[13] 梁启超.论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M]//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十六册.北京:中华书局,2015.
[14] 马小红.礼与法:法的历史连接[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15] 顾涛.礼法断层在近代的发生学:兼论礼与法的接轨[J].史学月刊,2023(6):104-118.
[16] 钱穆.中国史学名著[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17] 孟德斯鸠.法意:上册[M].严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18] 张亚初,刘雨.西周金文官制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9] 李翰.通典序[M]//杜佑.通典.北京:中华书局,1988.
[20] 司马光.周纪一[M]//资治通鉴:1.胡三省,音注.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
[21]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22] 马一浮.尔雅台答问续编[M]//吴光,主编.马一浮全集:第二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
[23] 朱光潜.乐的精神与礼的精神:儒家思想系统的基础[M]//朱光潜全集:第九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
[24]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J].求是,2023(17):4-11.
[25] 章太炎.致柳翼谋书[M]//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
[26] 章太炎.商鞅[M]//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
[27] 章太炎.五朝法律索隐[M]//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28] 周昌龙.新思潮与传统:五四思想史论集[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
[29] 贺麟.五伦观念的新检讨[M]//文化与人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30] 贺麟.儒家思想的新开展[M]//文化与人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31] 艾恺.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M].王宗昱,冀建中,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32] 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3] 费孝通.孔林片思[M]//费孝通.孔林片思:论文化自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

The Tradition of Ritual-Musical Civilization and Its Modernization

GU Tao

(*School of Humanities*,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0, *China*)

Abstract: Exploring the fine resources of China's 5000-year civilization, interpreting the profound found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grasping the enduring advantages spanning ancient and modern times all require in-depth engagement with ritual-musical civilization. When discussing "ritual", people often first think of etiquette and ceremonies, yet this constitutes only the surface layer. According to Confucius, the study of ritual should prioritize the "essence of ritual" rather than focusing on trivial formalities. Thus, the proper path for ritual studies must

progressively delve into deeper dimensions: self-cultivation, social institutions, and national governance, as well as critical yet overlooked aspects such as ritual instruction, ritual law, and ritual governance. This forms an "iceberg model" for ritual studies: ceremonial practices represent merely the visible tip, while ritual instruction marks the beginning of exploring the submerged bulk. At the base of this "ritual iceberg" lies a latent, implicit system of governance—encompassing concepts, methods, logic, and connotations, which is called ritual governance. Through external practices to internal cultivation, institutional frameworks to ideological paradigms, sustained accumulation and sublimation, a holistic way of life and a mode of civil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merge: ritual-musical civilization. The ritual-musical concept has become deeply embedded in Chinese cognitive logic. As the Confucian scholar Cheng Yi in the Song Dynasty stated, "There is nothing in the world untouched by ritual-musical civilization", reflecting its role as a methodology for Chinese people to understand the world. Consequently, the revival of ritual-musical civilization must begin with the submerged bulk of the iceberg and confinement to ceremonial forms will inevitably yield limited results.

Key words: revival of ritual-musical civilization;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ritual instruction; ritual governance; etiquette; ritual law

（责任编辑：丹萍）

《仪礼节略》与朱轼的家礼学建构

李文昌
（山东师范大学 齐鲁文化研究院，山东 济南 250014）

[摘 要] 《仪礼节略》是清初理学名臣朱轼在浙江主政期间编纂的一部家礼学著作，该书体现出朱轼重构家礼以施行教化的设想和实践。《仪礼节略》以朱熹《家礼》为纲，又回归到《仪礼》本经，在冠、婚、丧、祭四礼的基础上增加学义、士相见、乡饮酒诸礼，同时倡导冠不可废、婚姻以时、丧葬从俭等理念，体现了轻仪节、重礼义的特点。朱轼将理学的天人性命之旨贯穿到对家礼的研究，以礼释理，缘情制礼，礼俗互贯，充分发挥礼学移风易俗的社会功用。《仪礼节略》上承朱熹《家礼》、丘濬《家礼仪节》，下启乾嘉家礼学研究，展现了宋明以来家礼学的发展脉络，其变通古今以适于用的礼学精神，以及对社会风尚的引导、对去奢崇俭的提倡无疑为当下的家礼学发展和家风建设提供重要借鉴。

[关键词] 《仪礼节略》；朱轼；家礼学；家风建设
[中图分类号] K89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267（2025）01－0103－15
DOI：10.14129/j.cnki.forwordposition.2025.01.010

清代是家礼研究的繁盛时期，这一时期涌现出诸多家礼著作，且在家礼结构、具体仪节等方面呈现出新变化。[①]清初理学名臣朱轼所撰《仪礼节略》变通古礼，务矫时弊，将宋儒的义理之学以行礼的方式贯穿到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在整顿当时婚丧奢侈之风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体现出该时期家礼研究的新特点。学界对《仪礼节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蕴含的礼学思想及礼治实践[②]，而忽略了该书在家礼学史上的地位。《仪礼节略》虽以“仪礼”称名，但实际上是一部典型的家礼学著作，且在家礼的体系建构、教化实践等方面颇多可资借鉴之处。有鉴于此，本文回归《仪礼节略》的家礼学著作属性，重在探讨朱轼家礼学建构的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礼学大百科全书”（22&ZD226）；山东省高等学校青创科技支持计划“明清家礼文化与当代家风建设研究”（2022RW092）。
[作者简介] 李文昌，博士，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清代学术史、三礼学史。
①关于清代家礼著作情况及家礼研究新变化可参见赵克生、安娜：《清代家礼书与家礼新变化》，《清史研究》2016年第3期。
②相关研究有邓声国：《朱轼〈仪礼〉研究探微》，《知与行》2017年第4期；潘斌：《在学问与事功之间——朱轼的礼俗观及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等等。此外，还有多篇涉及朱轼礼学思想的学位论文，如郑晴：《朱轼教化思想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淮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2019；肖娇：《朱轼〈仪礼节略〉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21；郭宇翔：《朱轼礼治思想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2023；等等。

理论及实践，以期对当代的家风建设提供有益借鉴。

一、《仪礼节略》内容举要

《仪礼》针对士大夫阶层制定了一套有关冠、婚、丧、祭、乡、射、朝、聘等的礼仪制度，成为后世制定礼典、传承礼制的重要依据。然在“礼不下庶人”的传统观念之下，《仪礼》对庶民的约束力非常有限，因而朱熹对《仪礼》删繁就简，并参以《礼记》等书，编纂了《家礼》[①]一书。《家礼》涵括士庶行礼仪节，试图在更大范围内推行儒家礼教，该书也成为后世家礼书的模板，在宋代以降士庶社会中形成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因此，清初涌现出诸多以朱子《家礼》《仪礼经传通解》等著作为基础，进一步增删改易的礼书，其中《仪礼节略》是朱轼在推行礼教的过程中，对朱熹《家礼》加以斟酌损益而撰写的一部适合当时实际的家礼著作。

朱轼，字若瞻，又字伯苏，号可亭，江西瑞州府高安县（今属江西省高安市）人，生于康熙四年八月十一日（1665年9月19日），卒于乾隆元年九月十八日（1736年10月22日）。康熙三十三年（1694）中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湖北潜江知县。历官刑部主事、刑部郎中、陕西学政、光禄寺少卿、奉天府尹、通政使司通政、浙江巡抚、都察院左都御史，官至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兼吏、兵二部尚书。朱轼死后，乾隆帝辍朝一日，亲临祭奠，以示哀悼，并御书“帝师元老”匾额，谥号“文端”。朱轼一生为官清廉刚正，克己笃行，诚心实政，化民成俗，尤以浙江海塘治理和京畿营田水利为世所称道。朱轼学宗程朱，以理学名臣的身份崇奖学术，望重学界。同时他还积极提倡礼学，编纂礼书，融礼学于理学，推行教化，著有《周易传义合订》《仪礼节略》《校补礼记纂言》《史传三编》等经典，于一代学术与政治具有推进作用。朱轼在各地为官，将以礼化俗、整顿奢靡之风作为施政首务，《仪礼节略》正是朱轼在浙江主政期间推行移风易俗的一部代表性著作。

《仪礼节略》初名《家仪》，原刻三卷，颁诸祠中，供族人守礼之用。康熙五十六年（1717），朱轼担任浙江巡抚期间着手增订，越二年，增至二十卷刊行，“浙之士大夫莫不承式”[②]。咸丰年间，版毁于太平天国运动，光绪二十三年（1897）重刊。《仪礼节略》收入《四库全书》经部“礼类存目”，有提要一篇，但误作“仪礼节要”。

三卷本今已不可考，二十卷本篇次如下：第一卷《冠礼》，第二卷《学义》，第三卷《昏礼》，第四卷《昏义》，第五卷《士相见礼》，第六卷《乡饮酒礼》，第七卷《丧礼》，第八至十卷《丧仪》，第十一至十三卷《丧期》，第十四卷《丧服》，第十五卷《丧具》，第十六至十七卷《祭礼》，第十八至二十卷《礼图》。卷前有朱轼好友吴隆元、黄利通序，以及朱轼自序、王叶滋识语各一篇，重刻本增雍正五年（1727）李卫序一篇。正文前列《凡例》十条，尽述作书大旨。

《仪礼节略》虽以“仪礼”称名，但实际上是一部典型的家礼学著作，是朱轼在从政期间仿照朱熹《家礼》逐步修订完成的，主要用于辅助其修身齐家、施行教化。考朱熹《家礼》，共五卷，通礼、冠、昏、丧、祭各一。通观《仪礼节略》，虽共二十卷，实则仍以冠、昏、丧、祭为四大纲，又以丧礼尤详。朱轼初撰《仪礼节略》之用意即“念世俗冠、婚、丧、祭，或简野无文，或奢靡逾节”[③]，因而博搜古今诸家礼书，编辑而成。

《仪礼节略》，顾名思义是“节略”他书

①关于《家礼》的真伪，本文不作讨论。《家礼》是否为朱熹所撰，学界尚有争议，如陈来、束景南、彭林、汤勤福等学者均参与了《家礼》真伪的讨论，并未形成一致意见，但《家礼》在宋以后中国乃至东亚社会中产生了深刻影响，这是毋庸置疑的。

②朱舲：《朱文端公年谱》，同治八年刻本，第14页。

③同上书，第12页。

内容编辑而成，但择取的绝不止《仪礼》本经，参考的也不仅仅是朱熹《家礼》，而是囊括了历代有关礼制的重要典籍。《仪礼节略》所引，上自先秦下至清前期，凡有资于经说者，无论官撰、私修皆在采录之列。据粗略统计，《仪礼节略》引书有190余家，按被引用的次数进行分类，被引50次以上者，除郑注、贾疏、朱子《家礼》外，对明代丘濬《家礼仪节》的采录最多，近100次，其次为元儒敖继公，被引60余次；被引20次以上的有唐代《开元礼》及杜佑《通典》，宋代《政和礼》、司马光《书仪》《家范》、《二程全书》、车垓《内外服制通释》，明儒吕坤《四礼翼》《四礼疑》，清儒徐乾学《读礼通考》；被引10—20次的著作、学者有《左传》《汉书》《后汉书》《释名》《白虎通义》，以及马融、张载、陈祥道、吴澄、汪琬等。值得注意的是，《仪礼节略》不仅对历朝研礼之家多有节录，还对历朝法典多采录参考，如《唐律疏议》《明律》《清律》，以及具有法律性质的典章《开元礼》《开宝礼》《政和礼》《明会典》《清会典》等，其中仅对《开元礼》的征引就多达30余次。统观《仪礼节略》，其引书实际上存在主次，郑注、贾疏、朱熹、敖继公、丘濬5家的被引次数远远超过其他诸家，为全书引用的重中之重，而其他诸家多以此5家为参照，或引申其意，或补其不足。《仪礼节略》的引书体现出实事求是的精神，虽以朱子为宗，但又不固守其说，而是兼采汉唐宋明诸家之说予以引申发明，没有明显的汉宋界限，不尚空言，务求实用。

除对仪节逐条辨析之外，《仪礼节略》尚附有余论和附论，这也是全书的精要所在。其中，余论主要是掇拾先儒时贤论礼之语，之所以称为“余”，在于讨论的都是正条未尽之处，即言明行礼时如遇特殊情况应当如何。例如，贫困之家限于财力无法正常举行冠礼，该当如何？朱轼引吕维祺之论曰：“如贫愚不能如礼，亦须请至亲有行一人。告于祖，命以成人之道，俾通俗易晓者即是。若贫家更须简便，只于祖先告拜行之，亦可。”[1]44又引陈祥道之语曰：“丈夫之冠也，父命之。此人人可行者，贫人自率其子，告于家庙，而申命之，则其家虽无力成嘉会，要于冠礼之意，何不可行之有？惟简也，故能遍。”[1]44亦即贫困之家行冠礼可以从简，只需告于先祖即可。不唯冠礼，其他诸礼也是如此。古礼所载本是士阶层之礼，礼之戒宾、礼宾、聘问、陈设、服制等仪节均有讲究，都需要一定的费用。宋代以来，礼经历庶民化之后逐渐进入寻常百姓家，但寻常百姓有心行礼而又力不能及的情况非常普遍。基于此情况，历代儒者于《家礼》改益颇多，为的都是合于时宜，使行礼不致成为空谈。再如，对婚姻彩礼的问题，朱轼引文中子之论曰：“昏娶而论财，夷虏之道也，君子不入其乡。古者男女之族，各择德焉，不以财为礼。”[1]153朱轼引文中子之言，将婚礼论财视为“夷虏之道”，这显然是针对当时婚礼竞相奢华之风而发的。

《仪礼节略》并非全部出自朱轼之手，其中有关“丧期服具”的内容为朱轼的友人王远所述，对王远所述未尽之处，朱轼则“汇辑群论，附以己意”。例如，若丧礼遭遇变故不能如期下葬时，该如何服丧？王氏对此就没有说清楚，朱轼则引用《礼记·丧服小记》认为“未葬不变服”，其论曰：“《丧小记》：‘久而不葬者，唯主丧者不除。其余以麻终月数者，除丧则已。’谓有事碍，不得依月葬者。主人兄弟，虽逾三年，不得祥除，期以下，则麻终月数，不得变葛。盖服麻至服限竟而除之，有除无变也。然必藏其服，至葬而反服之，葬毕即除，虞祔则用吉服矣。《记》：‘三年而后葬者，必再祭，其祭之间，不同时而除丧。’谓未葬其亲。虽当练祥之月，不可除服，必待葬毕而后除。然其除也，又有渐焉。必再祭而后除，不可同时也。故葬而虞，卒哭而祔，次月而练，次月而祥，再次月而禫焉。”[2]743再如，朱轼对“改葬服”的认识，“《仪礼》：‘改葬缌。’谓有故而迁葬，亲见柩，不可不制服以表哀，故服缌，三月而除之。注疏谓臣为君、子为父母、

妻为夫、父为长子，皆情之最笃者也。然则期功以下，将何服乎？曰：服仍缌也，但葬而除之。至乡里亲厚之人来与葬者，去华饰可耳。”[2]744此外，朱轼对王远所述“丧期”重新进行了分目，其言曰：“带存（王远，字带存）所纂丧期，就一人之身胪列，若斩，若齐，若期、功，若缌麻，凡丧服厚薄隆杀之伦，了若指掌。然一服之中，又不无厚薄隆杀焉。予乃分标五目，而汇辑诸为正、为加、为降、为恩、为义、为从、为报诸服于各条下，俾读者比类而观，可思乎服之所以异而同、同而异焉。”[2]553

末三卷《礼图》为朱轼门人王叶滋补纂。《仪礼节略》初成之后，朱轼交付王叶滋，嘱为勘定。王叶滋仿南宋杨复为其师朱子作礼图之举，为《仪礼节略》附纂《礼图》三卷，谓：“昔紫阳授《仪礼》于信斋杨氏，而杨氏为之图。滋也非曰能之，愿学信斋，可乎？”[3]19据王叶滋自述，其纂《礼图》乃“搜辑斋中群书，得陈氏《礼书图》，聂氏《三礼图》，合以《仪礼》《家礼》诸图，参订互考，绘为若干帙，……又删其复者、疑者若干，存图一百有奇，为卷三”[3]19。《礼图》能够直观地展现行礼的具体仪节，对阐发礼义和推行礼教都有很大助益，大大提高了《仪礼节略》的实用价值。

二、《仪礼节略》的家礼学建构

《仪礼节略》以《家礼》为纲，以《仪礼》为归宿，是一部内容详备的人生礼仪规范。朱轼在该书《凡例》中说：“是书以朱子《家礼》为纲，旁及晋、唐、宋、明诸礼书。其近世儒者论说，于礼少有发明，辄随所见采入，至折衷聚讼，以求适合，则必以十七篇为正鹄焉。”[1]21通观《仪礼节略》，先列朱熹《家礼》名目，然不全载其行礼具体仪节，行礼仪节或采录《仪礼》《礼记》，或全录丘濬《家礼仪节》，或斟酌礼俗而损益之，或博采诸儒论说而断以己意。若诸儒之说有歧贰，则折中以求其当，以《仪礼》“十七篇为正鹄”。

《仪礼节略》相较《家礼》，在篇章结构和内容上皆有所突破。在篇章结构上的增益主要有两点。一是于《冠礼》之后附以《学义》一卷。冠礼是成人礼，对于成人之前的礼仪，《家礼》虽不见载，但朱熹曾集先贤论学之语而成《学义》，“自洒扫应对之末，以至天人性命之微”，靡不详贯。朱轼择取朱子《学义》中的23条附于《冠礼》之后，又选取朱子论学数则及朱子论定或撰写的《程董学则》《训子从学帖》《白鹿洞书院揭示》等置于简末。究其原因，朱轼认为既冠，必责以成人之道；未冠，先绳以弟子之则。《学义》一卷是行冠礼之前，也就是童子应当学习的内容和应当遵行的礼仪规范。二是于《昏义》之后增加《士相见礼》和《乡饮酒礼》各一卷。《家礼》探讨的礼仪止于冠、婚、丧、祭，而于士相见、乡饮酒二礼，朱子认为今不可行，故未载于《家礼》。朱轼《仪礼节略》一书虽称事事尊崇朱子，唯此与朱子相左，认为士相见、乡饮酒二礼仍可复之，并在《昏义》之后附此二篇。朱轼说：“《士相见》《乡饮酒》二篇，朱子谓‘何处可行’。今观《相见礼》，严肃简易，何不可行之有？《乡饮酒》献酬烦多，聊存大概，而尊让洁敬之义已具。”[1]22关于增置乡饮酒礼的原因，朱轼还论述道：

> 今乡饮酒礼，非复宾兴之旧。然尊贤尚齿，所以教仁让、兴礼乐，使民观感发奋，而化其浇薄凌竞之习，非细故也。迩来乡先生既少公论，有司亦不复就谋，郡邑率循故事，岁一举行，甚而以饮酒之巨典，为渔利之甘饵，岂徒虚縻廪饩已哉？或曰：世风日下，安所得贤者而宾之、介之？与其滥，无宁缺也。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郡邑有司苟能虚怀延访，实力奉行，但得谨愿无过之人而礼之，亦足以鼓励末俗，且使观乎揖让周旋之仪，而晓然于洁敬尊让之义，孝悌之心，油然生矣。[1]235

由此可见，设置乡饮酒礼的原因在于“教仁让、兴礼乐”，鼓励末俗，使人人知尊让孝悌之义，从而达到化民成俗的目的。《乡

饮酒礼》卷末还附有《吕氏乡约》，《吕氏乡约》本出蓝田吕氏，朱轼“取其他书，及附己意，稍增损之，以通于今，而又为月旦集会读约之礼”[1]269。朱轼参照《吕氏乡约》且融入时俗，为月旦集会读约之礼制定了具体仪节，颇便施行。

在内容上，《仪礼节略》对冠、婚、丧、祭诸礼皆有所更张。首先，就冠礼而言，朱轼倡导冠不可废。家礼莫先于冠，冠礼所以责成人之道。在清政府推行“薙发”“易服”的时代背景下，传统冠礼所附丽的汉家衣冠及其文化象征意义在官方和民间皆日趋式微。赵克生的研究指出，《清通典》《大清通礼》皆不载冠礼，且冠冕之制也被并入“冠服一门”，这标志着传统冠礼在国家礼制层面的式微。冠礼在民间的式微主要表现为“并冠入婚”，即把冠礼作为婚礼的一个环节，表示成人可婚之意。[4]33正是鉴于冠礼久不可行，朱轼倡导冠不可废，他说：“礼始于冠，冠之不可废，先儒言之详矣。或曰：今襁褓稚子，辄加巾帽，一旦律以古礼，其谁从我？窃谓童子若以寒不能不帽，断不可如成人冠。另制一种，或缎或布圈帽，待十五六时行冠礼，盖至此始加冠服。而祝之醴之，使知成人之道，庶不致灭礼而近于禽兽。丘氏谓当于将昏时另行冠礼，亦似可从。”[1]49-50朱轼重申《礼记·冠义》，再三强调冠礼不可废，冠礼是成人礼，乃诸礼之始，男子只有行冠礼，即成人之后才能真正践行君臣、父子、长幼之礼。

在筮宾、字冠者、礼宾、冠者见等冠礼的具体仪节上，朱轼对元儒敖继公、明儒吕坤等人关于诸如冠礼遇丧等情况的主张进行辩诘，并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吕坤认为冠礼是吉礼，丧礼是凶礼，“以丧冠，是凶干吉也”，可以终丧而冠。朱轼则认为“以丧冠者，因丧而冠，冠以丧之冠也。所重乎冠者，盖将责以为人子、为弟，子道也；今遭父母丧，子道终矣，而可不责以尽哀尽敬乎？《丧礼》：‘童子不衰不杖。’假而年二十矣，未冠而遭丧，将仍童子之而任不衰不杖乎？衰且杖矣，而不冠得乎？其为支子，犹之可也；传重者可不冠而馈奠拜宾乎？此丧冠之所为不容已也”[1]53。而“丧冠”的具体仪节与正常的冠礼自然也要有所区别，具体而言：“醴冠、醴宾之仪，杀不待言也。曰以丧冠，即用丧宾可也。三加之辞，戒也，非祝也。吉月令辰、寿考胡福等语，无庸也。字之曰某甫，字之辞，可省也。”[1]53即醴冠、醴宾具体仪节可以减省，“吉月令辰”等吉礼用语可以取消，“字之辞”也可以不用。

其次，就婚礼而言，朱轼倡导婚礼不乐不贺。古代婚礼虽然有一套具体的程式，但并没有举乐和庆贺的仪节。《礼记·郊特牲》说：“昏礼不用乐，幽阴之义也，乐，阳气也。昏礼不贺，人之序也。”《礼记·曾子问》引孔子语曰：“取妇之家，三日不举乐，思嗣亲也。”古人认为婚礼是异姓之间的联姻，目的是繁衍宗族，家家都有，人人必经，因而无喜可贺，无乐可举。但行至后世，情况完全发生了变化，举世用乐，反而以不用为怪，婚嫁风俗竞尚奢靡。因此，朱轼再论婚礼不乐不贺，“末俗之奢侈最甚者，莫如婚嫁。……习尚浮夸，人怀贪黩，遂有嫌贫悔昏者，有厚赂谋娶者，有扳附觊觎，不顾所缔之非耦，卒致反目离异者，有因奁薄而怒辱其妇，致吞声愤郁而死者。狱讼繁兴，不可究诘”[5]146。他批评婚礼用乐：“古无昏娶用乐之事，今举世用之，反以不用为怪，人心陷溺甚矣。”[1]181朱轼还从礼缘人情的角度论证了婚礼不举乐的合理性，认为嫁女之家要经历骨肉亲情的离别，无心举乐；夫家感怀父母已老，年华易逝，也不应举乐。[5]65总之，朱轼认为婚礼举乐于情于礼都不合宜。

由于婚俗尚奢之风盛行，很多贫困之家无法按时完婚，对此，朱轼倡导婚姻以时。所谓“婚姻以时”，一是男女结婚的年龄要合时宜。朱轼引用《大戴礼记》《周礼》等经典，认为男子要在三十岁以前娶妻，女子应在二十岁以前出嫁。二是结婚的季节要合时宜。朱轼引用《白虎通》《诗经》等经典，认为嫁娶应选在春天，“春，天地交通，万物始

生，阴阳交接之时也”。朱轼之所以倡导婚姻以时，在于其在浙江主政期间，目睹百姓为了嫁娶不惜卖田鬻舍，有一经嫁娶而衣食不给者；贫下之户无钱娶妻，往往错过了结婚的最佳年龄。如此种种都造成人心风俗之坏，进而影响社会稳定。尽管如此，朱轼认为古来保存最好或者说施行最好的仍是婚礼，他说：“昏姻虽变古制，犹未大远礼意，故予纂昏礼，未敢矫异。然古有不可尽泥，今有不容姑狥者，又逐条著为论。”[1]164基于此，朱轼对行媒、卜筮、纳采、问名、纳吉、纳征、醴宾、同牢合卺、庙见、请期、蒙头等20余条仪节逐一进行辨析。

此外，朱轼还倡导改革不合时宜的婚俗。古代婚姻“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殊为烦琐，后世在制定家族礼仪时往往有所减省，如《家礼》省去问名、纳吉。朱轼认为，只要于礼义无乖，减省仪节亦无不可，“《家礼》无问名、纳吉，从简也。丘氏问名并入纳采，纳吉并入纳征，于义无碍，从之”[1]139。他还考诸古礼，援以刑律，认为同姓不可为婚，内表不得为婚，尊卑不可为婚[1]179-180；指腹为婚是陋习，也应当禁止。

再次，就丧礼而言，针对清初奢靡的社会风气，朱轼倡导俭葬，力求改变丧葬奢侈之风。朱轼的俭葬主张在清初即很具有代表性，具体而言包括如下几个方面。其一，朱轼反对奢靡的棺饰和丧具。棺饰分内饰和外饰，内饰即刻于棺体之上，外饰是用以障蔽灵车和棺柩的帷盖，棺饰代表着死者身份的尊卑。棺饰自西周时期始趋于复杂，并有专门的官员负责棺饰。《周礼·天官·缝人》谓：“缝人掌王宫之缝线之事，以役女御，以缝王及后之衣服。丧，缝棺饰焉，衣翣柳之材。”朱轼认为，周朝复杂的棺饰“是殆周文之敝，非真先王之礼也”。朱轼认为棺椁、衣被之类应当尽量从简，不宜追求过度奢华，他说：“郑氏谓饰棺以华道，恐人之恶之，陋矣。孝子哀痛迫切，暇为饰观计乎？”[1]479意即真正哀痛的人是无暇顾及棺饰如何的。至于出殡用的丧具，本是为了表达哀思，但恰恰又是哀思不足的表现，所谓“物以表哀，哀不足而物是务。具，物也，具文也，施之他人他事且不可，亲死之谓何而忍出此，尚得谓有心人乎？此则君子之所为耻也”[5]126。意即真正的君子不需要通过丧具来表达哀思。朱轼以阮籍丧母不哭，但饮酒既醉，呕血数升，哀毁骨立为例，认为这才是对逝去至亲真正的哀思。他最后说：“吾愿为人子者，生事死哀，念念不忘父母，毋徒习为具文已也。”[5]127

其二，朱轼主张挽歌、明器、方相均应禁省。挽歌是古人送丧时唱的歌，以表对死者的哀悼；明器是死者下葬时的随葬器物；方相最初是一种官职的名称，当死者棺椁发丧时，方相要在前面给葬礼队伍开路，因而也被称为“开路神君”，唐宋以后，逐渐用纸人偶俑代替真人，成为一种陪葬的明器。在朱轼看来，明器易致墓穴塌陷，风水侵入，“断不可用”。方相则为“古礼之流弊，有心世道者，当思为拔本塞原计”[1]479-480。在《挽歌方相明器说》一文中，朱轼更指出挽歌、方相、明器皆为末俗流弊，“殊乖哀素之义”，为“无益之费”，应当禁省。他说：“世俗送葬，选舞征歌，百戏具陈，是挽歌、方相之流弊也。若夫涂车刍灵，自古有之。今则剪綵缕帛，为楼观、山岳、车马、人物，五色焜煌，张陈道左，殊乖哀素之义。人子‘不以天下俭其亲’，衣衾棺椁之谓也。岂张皇陈设，为无益之费，以涂人耳目哉！吾谓矫末俗之弊，不独挽歌当禁，方相明器俱可省也。”[5]135

其三，朱轼反对停柩不葬。朱轼先指出“停柩不葬，人子莫大之罪也”，然后将停柩不葬的原因概括为三点，并一一予以驳斥：

近世士大夫家，有累世不葬者，有累数柩不举者，诘其所以，则有三焉：一曰家贫不能葬。孔子不云乎：苟无矣，敛手足形，县棺而封人，岂有非之者哉？葬之需俭于敛殡，未闻有家贫而委其亲不敛不殡者，亦既敛而殡矣，何有于葬？一曰不得葬地。古者

按图族葬，未没而葬地已定，夫何择焉？《孝经》言卜地，卜也，非相也。风水之不足信，昔人言之详矣。一曰时日不利。三月而葬，礼也。老聃党巷之葬，日食而返。郑葬简公，毁当路之室，则朝而窆；不毁则日中而窆。是不择日择时之明证也。[1]494-495

其四，朱轼主张居丧不作乐。居丧不作乐，古礼中已有明文规定，如《礼记·杂记下》："父有服，宫中子不与于乐。母有服，声闻焉，不举乐。妻有服，不举乐于其侧。"《礼记·曲礼下》："居丧不言乐，祭事不言凶。"由此可见，古礼中对居丧不作乐规定甚详，居丧期间不仅不能作乐，甚至不能言乐。不唯古礼，律法中也明确将居丧作乐定为十恶不孝之一，如《清律》中记载："民间丧祭之事，凡有用丝竹管弦演唱佛戏之处，该地方官严行禁止。违者，照违制律治罪。"[6]296虽然礼法对居丧不作乐有明确规定，然民间的违制现象比比皆是，守丧期间不仅饮酒食肉，甚而作乐娱尸，居丧违礼的行为屡禁不止，纵然士大夫之家也不能免俗。朱轼对居丧期间作乐的行为痛加贬斥，谓："人即不肖，未有不痛其亲之死者，作乐以自娱，天下必无此禽兽不如之子。"[1]497对于作乐娱尸的现象，朱轼痛斥道："或曰：闹丧送殡，藉兹以娱幽魂。抑思死而无知则已，其有知，能不自悲其死乎？即不自悲，见子孙哭泣，有不恻然心伤乎？幽明一理，丝竹管弦，乐者闻之则乐，悲者闻之益悲，为子者何取嘈杂喧沸，以悲其亲也。"[1]497他认为，为人子者，遭父母之丧，应极尽哀思，谓："《论语》曰：丧思哀。思则哀，不思则不哀矣。亲丧固所自尽也，苟哀慕不至，虽衰麻啜粥，与食稻衣锦何异乎？"[5]72

其五，朱轼强调遇丧不能滥受赙、襚。所谓赙、襚，是指赠送财物帮助别人办丧事。朱轼认为："赙襚虽有知生知死之别，其实皆为送死也。人子因而利之以为家，忍乎？不忍乎？……今人虽平时稍知自爱，至有丧事，则馈无不受，意以为为死者馈受，非贪也。不知为人子不能葬其亲，而待助于人，已可羞已，而又因以为利，尚得谓之有心人乎？"需要强调的是，朱轼所言赙不可滥受，并不是说不能受赙，而是受赙要有一定标准。在他看来，"苟贫乏无措，受赙未尝非礼。然必问赙者何人，情与物果相副否。苟非有通财之分义，相恤之至情，虽贫勿受也。丧礼称家有无，苟无矣，敛手足形，悬棺而窆，人岂有非之者？奈何受非所受，以污所生耶？若夫家有余财，尤不宜滥受。其有义不可却者，则辞多受少可耳"。朱轼认为赙、襚之物是用于办丧事的，不可因以为利，且赠赙之人必须是真心赠赙，不能有所图谋，所谓："赙而不诚，犹不赙也，夫何受焉？"[1]498-499此外，朱轼还反对风水之说，认为卜地以葬的做法既"有违生时依依之至性"[1]501，死者亦不得安。因此，他主张禁绝民间笃信风水的陋俗。

最后，就祭礼而言，朱轼认为"祭物丰俭随宜，惟其诚而已"[2]877。他援引经典及诸家之说，重申"丰俭随宜""遭丧废祭""丧不助祭"[2]876-882等主张。在《祭礼》卷末，朱轼还附以自己家族祭祀所用的《家传祭仪》，对家族祭祀的流程进行了详细说明，包括谕吉、择土、斋戒、设位、冠服、牺牲、备物、陈器、陈馔、撤馂、仪节、交谢仪节、朔日祭等具体流程，充分体现了其礼俗互贯的治礼原则。

除《仪礼节略》外，朱轼的家礼学建构还体现在校刊前代家礼书，如《颜氏家训》《温公家范》《吕氏四礼翼》等，然后利用在地方主政的机会将之应用于社会教化的实践。需要指出的是，朱轼校刊礼书并非只是翻刻旧版，而是悉心校勘，且往往施以句读，这大大提高了经典的可读性。

纵观朱轼的家礼建构，从孩童入学，到加冠、成婚、社交，再到丧葬、祭祀，涵盖了人生的主要阶段。学义弥补了加冠之前的阶段，即孩童时期应当遵循的礼仪规范；士相见礼、乡饮酒礼补充了加冠、成婚之后应当遵循的社交礼仪。朱轼的《仪礼节略》对人生各阶段的行礼规范言之详明，既包含了

朱熹《家礼》的主要内容，又节录了历代名人关于家礼相关问题的看法，对其中不合理之处，则折中古今，礼俗互贯，断以礼经，力图建构一套最为合理合宜的行礼规范。

概言之，朱轼建构的家礼学在前代家礼研究的基础上多具创新之处：一是突破冠、婚、丧、祭四礼的限制，将学义、士相见礼、乡饮酒礼纳入家礼的范畴，丰富了家礼学的内涵；二是重视冠礼，倡导冠礼不可废，试图改变冠礼久不可行的局面；三是尊重乡俗，缘情制礼，经俗互贯，旨在构建一套既合乎仪节又合乎礼义的行礼规范；四是去奢崇俭，对婚丧作乐、做佛事、挽歌、方相、明器、风水诸说加以驳斥，并通过回归经典为丧葬从俭提供理论依据；五是提出新见，如对“大功末可冠”“小功卒哭可昏”等问题的认识，以及对嫂叔无服、异姓为后等问题的讨论皆有可资采鉴之处。

三、朱轼家礼学建构的特点

朱轼的家礼学继承了朱熹融理于礼的治礼精神。朱熹将礼视为“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实际上倡导援理入礼，理、礼双彰，历代尊崇朱子的学者也继承了这一精神。朱轼的家礼学建构仍以理学为宗，从“礼时为大”的诠释理念出发，倡导缘情制礼，试图在古礼与今俗之间达成一种契合。当然，朱轼研礼的最终目的是回归实践，推行教化，这也是朱轼的为学旨趣。

（一）以礼释理

明末以来，理学家托名讲学，不利于世道人心，有碍于政治稳定。至清初，理学家们普遍认识到仅靠空讲“格致穷理”以“自省”的方式不足以教化民众，还需要在具体仪节上有所规范。基于此种认识，朱轼虽谈理学，但不以讲学为能事，而以济时行道为己任，转而提倡“三礼”，试图通过更具践履精神的礼学以修正理学。

作为清初的理学名臣，朱轼即将理学的天人性命之旨贯穿其家礼研究，体现出以礼释理的特点。理学长于义理之阐发，以及对天人性命等抽象问题的探讨，因而对人们日常行为的规范具有一定的抽象性。然如何将理学的纲常伦理推至社会各阶层，恰恰是清初理学家尤其是高居庙堂的理学名臣们面临的首要问题，而礼则能弥补理学在具体仪节上的不足。朱轼认为，礼是人心同然的理义，是必须共同遵守的规则与信条，由礼规定的社会秩序正是理义使然。因此，他对历代礼学著作的刊刻、研究，无不贯穿着其理学观念。

以礼释理的特色从黄利通给朱轼《仪礼节略》作的序言中可见一斑：“今读《仪礼节略》一书，叹先生之留意道学者为最深，因以知口给御人诩诩道学自命者，必非真道学。而道学真种子实不绝于人世矣。孔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孝无违乎礼，事以礼，葬之祭之以礼，此天之经地之义而民之行也。紫阳志在《纲目》，行在《小学》，明伦敬身志行，与孔子不殊。是书一以《经传通解》为宗，而删繁举要，博采诸家，附以独见，所言皆明白洞达，其志居然紫阳之志，其学不愧紫阳之学。”[7]13-14黄氏认为，朱轼通过倡行家礼以发扬程朱义理，“留意道学最深”，是“真道学”。

朱轼作为理学官僚，时时以推行教化为己任，以解决民生问题为重点。由于理学重思辨，在具体仪节上存在不足，于是朱轼把目光重点投向了礼学。在朱轼看来，无论理学还是经学，只要有资实用，皆可采纳。在礼学中，家礼与现实社会的关系最为密切，对士庶日常行为的规范最为具体，故从家礼入手最具可行性，朱轼刊行《仪礼节略》的最终目的正是推行教化，从中寻求治理之道。

综上，朱轼之所以倡行家礼，在于其关注到了理学的不足，欲“以经学济理学之穷”。但是应当看到，朱轼仍将理学提倡的“不偏不倚”“穷理制欲”等观念贯穿其家礼研究和教化实践，以礼释理是其家礼学研究的一大特色。

（二）缘情制礼

缘情制礼是孔孟创建儒学的一个基本观

念[8]34，先秦典籍中对此多有记载，如《礼记·坊记》称："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以为民坊者也。"再如《礼记·问丧》言丧礼，谓："此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实也，礼义之经也。非从天降也，非从地出也，人情而已矣。"朱轼基于上述观念，多次表达了对"先王制礼，本于人情"的认识。他说："先王制礼，以顺仁人孝子之情，而不强其所不能。礼制定，而不肖者亦范围于其中，而不敢过。彼较量尊卑疏戚之伦，为世爵世禄计者，由礼教之不明也，礼明而此患息矣。"[5]104又说："先王制礼，本人情之固有，而达之以经曲之仪，大中至正，无过不及，使人范围于其中，有如是则安，不如是则不安者，有子所谓'和为贵，而小大由之'者是也。"[9]305由此，朱轼认为："上下尊卑之分，秩然而不可逾者，礼体之严也，而民志以此而定。可知礼本人情，其体严，而其用和。"[9]85

朱轼缘情制礼的理念主要体现在其对民众日常礼仪的调整上，如朱轼倡导改"三月庙见"为"三日庙见"，即"本于人情"。他说："父母之于子妇，祖父母之于孙妇，未有不欣喜爱怜、相见依依而不忍舍者。死犹生也，若必迟之三月而后见，此三月中，祖父母、父母有知，悦乎？否乎？予心安乎？不安乎？冠礼：既冠，扫地祭祢，而后见于伯叔父，昏礼何独不然？妇入三月之内，见于宗党亲戚者遍矣。婿见外舅外母矣，而独靳庙中之一扱，事死如生之道，顾如是乎？"[5]116-117又说："古者庙见于三月之后，若除丧而昏，昏之日即庙见，无待三月。况妇入门，虽未成昏，无不见舅姑之理。舅犹可也，宁有期年、九月之久，妇姑隔绝不相见者乎？既相见矣，能不一拜再拜乎？"[1]178由此，朱轼认为三月庙见不合情理，赞成朱子改"三月庙见"为"三日庙见"，其目的正在于方便庶民行礼。

此外，朱轼非常重视对礼义的阐发。礼义乃行礼之根本，而礼义之生，本乎人情。朱轼曾说："礼缘义起，各适其宜，而为之制，而礼得矣。"[5]118注重礼义，正在于回归人情之固有。由此出发，朱轼批评了居丧嫁娶者："或曰：'末俗有丧中嫁娶者，亦皆不得已而为之乎？'曰：'制礼之意，正谓丧中嫁娶，人子之所必不忍，不得已，宁致命而辞。女氏不得已，宁别嫁。所以全人子之至性而防后世隐忍迁就之弊，为万世名教计，至矣。'"[5]120朱轼认为，在《礼记·曾子问》中，孔子和曾子对婚嫁遇丧问题的问答"非为婚姻言之"，言外之意，丧重于婚，应先丧后婚。朱轼从人情出发，不断改良民间不合情理的礼制，为民间的礼俗改良提供了学理依据，彰显了礼学的社会价值。

（三）礼俗互贯

所谓礼俗互贯，即在制礼的过程中要处理好古礼与今俗之间的关系，使二者相得益彰。朱轼从"礼时为大"的诠释观念出发，认为应当在古礼与今俗之间达成一种契合，而不是盲目尊崇礼经。朱轼礼俗互贯的理念通过《仪礼节略》得到很好展现。至于如何贯通古礼与今俗，朱轼认为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要辨正古礼，革除陋俗。对于古礼，朱轼认为要尊古，但不能泥古，"古礼当辨正"。"古道之不复，悖礼者为之，亦泥礼者为之也。腐儒拘牵文义，动云师古，于古人制礼之意，茫然莫辨，至有以手足并行为匍匐救丧者，此与于悖礼之甚者矣。况《士丧》《既夕》半由后儒补缀，未必尽合先王之道。如废床寝地、揲齿缀足，何其忍也？涂殡、鱼腊、重木之制，又近于迂。明器、方相，以及棺饰丧车，抑何易欤！又有经无明文，后人附会穿凿，渐失礼意者，不可不辨与！"[1]471在他看来，"悖礼者"与"泥礼者"皆不足取，应当辩证对待古礼，明确古人制礼之意，以适用于今为宜。朱轼又说："吾辈考礼，但求其是，正不得附会古人。"[1]180即考礼不要附会古人，而应当实事求是。对于今俗，朱轼认为良俗可取，陋俗当革。他说："君子行礼，不求变俗，苟无害道，从众可也。若夫伤情灭理之甚者，乌得不大声争之，

以为世道防？”[1]492朱轼曾经批评乡间的丧葬陋俗，说：“吾乡恶俗，贫家死者，即绝，即敛即葬。其说有三：一谓速葬可不择日，稍缓则卜吉无期；一谓死以归土为安，一日不葬，即暴露一日；一谓人子不忍见亲柩，掩之宜速。凡此，皆巧为辞说，以饰其人死斯恶之意，全无冀望复生之心，此与吴越停柩恶俗均罪也。”[1]300可见，朱轼认为从俗并无不可，其所从之俗是那些既合于古礼又不悖人情的良俗；其倡革之俗乃伤情灭理之陋俗。

其次，要不固守节文，从俗制礼。朱轼认为制礼要通人情，要尊重俗礼，只要符合礼的精神，从俗亦无不可。如朱子《家礼》论婚礼时无礼宾仪节，朱轼根据乡间礼俗补入，谓：“吾乡于纳采、纳币之前一日，设席礼宾，族党亲戚之长者皆与，即为酒食以召乡党僚友之意也。但席不过四五，肴或四或六，酒十行而止。世俗鼓乐演戏，饮食若流，失礼甚矣。”[1]137再如朱轼赞成《家礼》改“三月庙见”为“三日庙见”，其在编定《仪礼节略》的《昏礼》一章，涉及庙见礼时就径用“三日庙见”，谓：“《家礼》自纳采至亲迎俱先告庙，庙见改三月为三日。于义允协，无庸矫异。”[1]170对民间当日或次日庙见的习俗，朱轼认为“于礼无碍”，他说：“今世俗多有次日先拜祖而后见舅姑者，盖宗法既废，人家罕有祠堂，祖先神主，多供于堂中，故先见于祖而后见舅姑，于礼无碍。”[1]150即新妇于次日先庙见，再去拜见舅姑亦无不可。朱轼还多次表达“礼失而求诸野”的理念，在制定一些古礼记载不详或已经失传的礼仪时，往往以乡间习俗为参照。他曾说：“今世古道不讲，同姓为昏者，士夫家时复有之。独吾江西则村野田夫奴隶下贱，亦知其不可。吾谓礼失而求诸野，其必于吾乡乎。”[5]118

最后，要在古礼与今俗之间达成一种契合。关于古今礼俗，朱轼曾指出：“古今礼俗，固有未可概论者。古者风俗淳厚，所重在礼；今世人情反复，所重在信。非谓信行而礼可废，不使不信者藉口于礼之未备也。”[5]86这体现出朱轼贯通古礼与今俗的制礼特色。此外，朱轼折中古今的主张还体现在对《昏礼》的纂修。关于“送嫁”，朱轼认为“女行宜有从者。有力之家，仆婢丫鬟，惟其所遣；贫者或遣老婢，随从三月而归；家贫无婢，不妨于亲邻家借用；庶民家无婢者，亦大可省。……窃意子弟妻妾送嫁，亦属未便，此古礼之不可从者。遣子弟一二人送可耳。今世仕宦送女，仆从如云，供张满路，殊失礼意，且兹扰累”[1]147。朱轼还曾在科举考试中以乡饮酒礼策问诸生，表达了制礼应斟酌古今的主张，他说：“饮酒之礼，郡邑沿习故事，所称宾介者，岂尽贤而有齿？而酬酢揖让之仪，亦未必有当于尊让洁敬之义，何以斟酌繁简，使宜于今，不悖于古，行者必以实，而观者足以感欤？诸生习礼久矣，其各陈所见，毋隐。”[5]181可见，“宜于今，不悖于古”正是朱轼在制礼时遵循的一贯原则。

总之，朱轼虽以《仪礼》为“正鹄”，但《仪礼》《礼记》等儒家经典本身并不是他关注的重点，其纂修《仪礼节略》的出发点是要在古礼与今俗之间寻求一种契合，从而构建一套士庶通行的、合乎礼义的民间礼制。

（四）注重践履

礼学本身就是一门践履之学，历代学者不断改编前代礼学经典，目的在于以礼为教，服务社会，关注的大多都是礼学的社会功能。历代儒者就如何发挥礼学的社会功能进行了颇多有益的探索，“有的试图恢复古礼，建立良风美俗的理想社会；有的则发扬儒家‘礼，时为大’的思想，讲求因时制礼；有的也在‘复古’的旗帜下尝试礼制改良”[10]52。

朱轼曾开门见山地指出：“礼者，履也。纳身于轨物之中，视听言动，无一毫之非礼，斯肌肤固、筋骸束，庄敬自强之道也。孟子言‘浩然之气’‘集义所生’，亦即此意。”[9]191朱轼素来反对空言义理，强调躬行实践，他曾说：“非躬行实践，何以为民之表率欤？”[5]171在朱轼看来，国家科举取士，考察的也是士子施学于用的能力，他说：“士所贵乎读书者，穷理格物明善以复其初耳，非欲

其博闻强记，以资口说、工文词已也。国家以制义取士，虽程朱亦不能废此而不为。然制义之设，所以阐发六经之微言，必于圣贤义蕴研精熟习，体察于身心之间，而实有所得，而后能津津言之有味。此取士之法，所以寓课行于衡文之中，以求得真才实学而用之也。”[5]97-98

朱轼之所以重视礼学的践履精神，除礼学本就是践履之学外，还有如下两个原因。其一，朱轼在地方主政，推行教化是其分内职责，因而其学术研究自觉或不自觉地与社会教化结合起来。这也注定了朱轼的礼学研究不限于章句训诂，而是以推行教化为最终目的。吴隆元为朱轼《仪礼节略》作序，称其书旨在“化民成俗”[11]16，即是此意。其二，理学长于思辨，而弱于仪节。朱轼之所以倡行家礼，正在于可以弥补理学在仪节方面的不足，以此规范人们的日常生活。总之，朱轼强调的是礼学践履的一面。

综上，朱轼建构的家礼学并不十分关注经典文本本身，重点在于弘扬经典所蕴含的践履精神。同时，朱轼将理学精神融入家礼的撰修，讲求缘情制礼、礼俗互贯、因时制礼，将宋儒义理以行礼的方式贯穿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这对清初的礼学复兴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四、《仪礼节略》在家礼学史上的地位

中国古代向来有“礼不下庶人”的传统，礼被视为贵族社会的产物，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礼仪规范大都是为士大夫阶层制定的，对庶民社会的影响力有限。汉末一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士礼被门阀士族垄断，独具特色的家礼或家训成为士族彰显门风的文化符号，世家大族往往各有家法。[12]127-133唐宋时期，是“士大夫之礼”向“庶民之礼”转化的关键时期，《明集礼》载曰：“汉晋以来士礼废而不讲，至于唐宋，乃有士庶通礼。”[13]501究其原因，唐代以来，随着科举取士的兴起，官爵逐渐与门阀士族脱钩，科举新贵的出身趋于多样化，与之相应，礼法文化也为更广泛的社会阶层所接受，也就是说，士族衰落与礼法下移是一个同步的过程。宋代，随着理学的兴起，以及家礼学著作的兴盛对当时业已下移普及的礼法文化完成了一次理论化重建。[14]36-40特别是朱熹《家礼》，以《三礼》为源，以《仪礼》为本，更贴近人伦日用，更具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在古代礼仪从“贵族之礼”向“庶民之礼”的转化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5]101-112作为礼学的重要分支，家礼学的社会功用较礼经更为突出。历经元明至清初，家礼学的影响逐步扩大，并成为士庶行礼的主要依据。成书于清初的《仪礼节略》，在当时社会由乱而治、风俗由奢向简的转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具体而言，其价值至少有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仪礼节略》变通古礼，务矫时弊，充分发挥了家礼移风易俗的社会功用。朱轼在该书《凡例》中开宗明义：“是书务矫时弊，力崇古道。然古礼有必不可行，近俗有必不可废，斟酌损益，颇费研虑。《曲礼》曰：‘礼从宜。’孔子曰：‘礼之中，又有礼焉。’变而通之，触类而长之，又非是书所得尽矣。”[1]21

古礼流传既久，自然有其合理性，但又不能完全适用于当下，因而践行礼仪要顺应时代的发展变化，合乎其时其地的实际情况。变异和更新是礼本身应有之义，唯于时更易，才能长存常新，在不同时代都能发挥其社会功用。故历代在实际行礼的过程中往往于古礼斟酌损益，参以风俗人情，变通而行。《仪礼节略》中，变通古今礼俗而制定行礼具体仪节的例子有很多，如关于行冠礼的地点，朱轼引温公《书仪》，认为可以相宜行事。其言曰：“古礼谨严之事，皆行之于庙。今人既少家庙，其影堂亦偏隘，难以行礼。但冠于外厅，笄在中堂可也。”[1]44即冠礼不必非要在家庙中举行，在外厅、中堂皆可。再如行冠礼时用的祝辞，可以使用俗语，令冠者自晓，如此更能发挥祝辞启导诫勉的作用。对此，朱轼先引朱子之言曰：“冠、昏之礼，如欲行之，须使冠、昏之人易晓其言，乃为有

益。如加冠之辞，出门之戒，若以古语告之，彼将谓何。今只以俗语告之，使之易晓，乃佳。又云：古之祝辞，本为雅妙，若冠者未能通晓，反无以示儆励期祝之意。不若本其旨义，衍为明白通俗之语，且因人而施。如儒生则期以远大，农商则勉以勤俭，而孝弟忠信之戒，则通用之，似于启导为切。”[1]45 又引吕坤《四礼疑》谓：“古人祭祷无事不及福，非不求所为之义。余以为丁宁告戒，望以成人，明切犹恐不喻，况词既文且迂，非士人讲求不能通晓，何能激发童子哉？今拟祝词随便，戒勉各切于童子之身，如有国有家及士农工商之类，戒勉务有警惕，不必泥古。”[1]45 总之，朱轼认为古代行冠礼用的祝辞，文义古奥，不便理解，因而赞成朱子和明儒吕坤的理念，径用俗语即可。

第二，《仪礼节略》上承朱熹《家礼》、丘濬《家礼仪节》，下启乾嘉家礼学研究，为我们展现了宋明以来家礼学的发展脉络。

目前已知最早以“家礼”题名的著作当为唐初杨炯的《家礼》，见于《新唐书·艺文志》，可惜该书已佚，无从知其详情。宋代是家礼学的兴盛时期，司马光《书仪》、吕祖谦《家范》、朱熹《家礼》实现了宋代家族制度和家族礼仪的重建，为后世家礼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和文本参照。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当属朱子《家礼》。明清时期是家礼研究和撰作的高峰时期，诸家通过对《家礼》进行增删改易，以编纂符合各地实际的礼仪规范，为礼学的复兴创造了条件。

朱轼《仪礼节略》正是以朱熹《家礼》为纲，以丘濬《家礼仪节》的行礼仪节为主要参照编纂的一部士庶行礼指南。关于《仪礼节略》对朱熹《家礼》的因袭和改易，我们在前文已作探讨，不再赘述。这里要重点说明的是从朱熹《家礼》、丘濬《家礼仪节》，再到朱轼《仪礼节略》，体现出宋代以来家礼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即《家礼》的仪节化倾向。朱熹《家礼》中对礼仪规制的解释较多，但指导如何行礼的仪节较少，且礼文深奥，不便士庶理解。丘濬《家礼仪节》将朱熹《家礼》约为仪节，将礼目进行了仪节化处理，并综合礼经及诸家论说，以浅近之言“化民成俗”，更具可操作性，这为后世特别是清代的《家礼》撰作提供了重要范本。朱轼《仪礼节略》不唯在形式上与丘濬《家礼仪节》相类，系节略《仪礼》及前贤礼说而成，在内容上更是直录《家礼仪节》中的具体仪节为行礼之规范。如“宾字冠者”一条全录丘濬之书的内容：“丘氏《仪节》：礼生唱。宾主俱降阶。宾降阶东向，主人降阶西向。冠者降阶。冠者降自西阶，少东南向。祝辞，宾祝。曰：礼仪既备，吉月令日。昭告尔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于假。叶音古。永保受之。伯某甫。或仲叔季，惟所当。冠者对辞曰：某不敏，敢不夙夜祗奉。补。鞠躬，拜。兴，拜。兴，平身。冠者拜，宾不答。按《家礼》无此再拜之文，今补之者。盖以下文冠者见于乡先生，有诲焉。且拜而不答，况宾祝之以辞乎？礼毕。”[1]35 其他诸如“宾出就次”“主人以冠者见于祠堂”等冠礼具体仪节，亦俱全录丘濬《家礼仪节》。除冠礼外，婚、丧诸礼或全录《家礼仪节》，或引申其说。《仪礼节略》全录或节录《家礼仪节》者近百条，足以说明朱轼对丘濬《家礼仪节》的重视和因袭。总之，朱轼继承了丘濬《家礼仪节》将《家礼》仪节化和通俗化的特点，将《家礼》进一步向普通民众推广。可以说，《家礼》之所以在明清时期大盛，成为士庶行礼的重要参考，与《家礼》的仪节化有很大关系。

除直接著录《家礼仪节》原文外，朱轼还对《家礼仪节》中仪节不当之处进行辨正。如《家礼》“既绝，哭”一条，《家礼仪节》谓：“废床寝地，楔齿，举哀。至是妇女入，男女哭擗无数。”朱轼则认为“废床寝地”等仪节“断不可从”，他说：“古者废床寝地之义，冀其受气而生也。不知寝之于地，果能令亲生乎？无论疾病垂死之身，奄奄一息，方保护之不暇，而举而委之于地，地气侵沁，是益其病而速之死也。即既绝矣，亦断无藉地气而复生之理。仁人孝子，忍举亲尸而置之地耶？楔齿用角柶，为将饭含，恐死者口

闭也。窃谓饭含之礼固不可废，然以角相楔死者之口，使不得合。人子之心，其何以安？况沐浴而饭含，口未即闭也，至缀足用燕几灶甓，其谬尤甚，断不可从。”[1]273由此不难看出，朱轼对《家礼》的节略更加注重礼义，体现了从重仪节到重礼义的转变。

当然，烦琐的仪节同样也会成为士庶行礼的负担，因而朱轼在继承丘濬《家礼仪节》合理的礼仪规范的同时，也试图改变其仪节烦琐，不便施行的问题。他在《仪礼节略》的《凡例》中指出：“丘文庄《仪节》，敷演明晰，间有舛误及详略未适，悉为增损辨正。惟祭仪烦多，概置不录。”[1]21正是鉴于《家礼仪节》祭仪烦琐，朱轼在编纂《仪礼节略》时，对《家礼仪节》的祭仪部分“概置不录”，而是回归儒家经典，并附以《家传祭仪》，以经过自己家族实践的祭祀礼仪代替丘濬《家礼仪节》的相关内容。这体现出朱轼从民间行礼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制礼态度。

除朱熹《家礼》、丘濬《家礼仪节》外，司马光《书仪》《家范》、吕坤《四礼翼》《四礼疑》，以及清初王复礼《家礼辨定》、张文嘉《齐家宝要》、徐乾学《读礼通考》等经典皆是朱轼撰作《仪礼节略》的重要参考。朱轼还重新刊定《颜氏家训》《温公家范》《吕氏四礼翼》，并施以句读，更方便了士庶阅读，也体现出其对前代家礼研究的自觉继承。可以说，《仪礼节略》是一部集历代家礼学之大成的著作。

《仪礼节略》还影响到乾嘉之后家礼书的编纂和应用。山东举人任跻莘摘抄朱轼《仪礼节略》中有关丧礼的部分而成《慎终录》一书，其自叙：

> 莘才劣学疏，不知所谓礼，安知所谓非礼？但见世俗所行，多不合于心，而不敢出诸口，曾采礼经所载，先儒所论，足正世俗之失者，汇为一册，俟质明礼君子。……后闻内兄张震观言本朝朱高安先生有《仪礼节略》一书，急索而读之。凡余心之不合者，皆已备言之矣。因摘抄丧礼一本，名《慎终录》。至葬先君时，遵依行之，犹有习俗难骤变者。道光庚寅，丁继母艰，始尽革之。（原注：如请客设祭，送亲友孝，大宾点主，荤馔待客等类）惟不能去酒，终觉不宜。特所抄《节略》，因去一时之弊，故只录诸案，不及备载。如嫌太略，自有原本可考。至丧服、丧具，《家礼》有未及详者，王带存所述，亦系高安先生鉴定，有志明礼者，其探取焉。①

任跻莘的受业门人耿曰棠也记述了其师践行丧礼的概况：

> 吾师任虚谷先生性方严，动止循绳尺。……予受业时，见先生著述甚夥，而《慎终录》一编，则尤所加意者。稽诸前经旨所载，参以先正之所论，而要求之吾心之所安，非惟手订之，而且身蹈之。庚寅岁，居太孺人丧，自敛而奠而窆而卒哭而祥而禫，一一皆如礼行，即有与习俗相刺谬，不免一时之骇且怪者，先生亦决然行之，不少恤。而一时之观礼于先生者，亦以先生故，咸信之悦之，而相忘于骇且怪焉。此故由先生之素行孚人，亦可见仁孝之感，自在人心，而古礼之无难复也。②

由此不难看出，《仪礼节略》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颇方便士庶行礼。

《仪礼节略》在后世也获得了普遍好评，徐世昌《清儒学案》谓：“可亭为《仪礼节略》一书，一以《经传通解》为宗，而删繁举要，博采诸家，附以独见，所言皆明白洞达，可谓知本务矣。”[16]1943清末学者皮锡瑞在翻阅《仪礼节略》后，亦对其大为赞赏，同时也对该书不能通行于世表达了惋惜之情。他说：“宜命儒臣定为画一之制，原本《仪礼》，参以《司马书仪》、《朱子家礼》。冠礼、乡饮，古制宜复，并非难行。昏礼、丧礼，今亦有与古合者。惟祭礼全异，立尸、交爵之类，后世诚不可行，其他亦有可仿效者。古礼多行于庙，今士大夫不皆有庙，有庙亦与所居隔越，故宜变而通之，期不失夫礼意

①任跻莘：《慎终录·序》，载朱轼著《慎终录》，任跻莘节录，道光二十九年洗心山坊刻本，第1页。

②参见耿曰棠：《慎终录·跋》，载朱轼著《慎终录》，任跻莘节录，道光二十九年洗心山坊刻本。

而已。朱轼《仪礼节略》，抚浙时尝试行之，未能通行，为可惜也。”[17]303

《仪礼节略》以其仪节之详明、体系之完备，在中国古代家礼学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李卫认为该书“斟酌古今，不泥于成迹，不徇于流俗，贵贱可以通行，智愚可以共晓”[18]17，颇便于施行。该书还得到官方认可，乾隆初年纂修《三礼义疏》，《仪礼节略》是其重要参考，《朱文端公年谱》称“纯皇帝《钦定仪礼义疏》多采其说”①。凡此，皆表明该书在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仪礼节略》虽未能打破朱熹《家礼》的藩篱，但朱轼倡导的冠不可废、婚姻以时、丧葬从俭、祭祀丰俭随宜等理念至今仍具有借鉴意义。

五、余论

中国古代的家礼文化关涉个人、家庭、宗族，乃至国家，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基石。家风正则家道兴，家道兴则国家治。中华民族素来重视家庭、家教、家风的养成，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古至今留下了大量的家礼学著作，积累了宝贵的精神资源。康雍时期，作为清廷尚书、大学士、帝师的朱轼，通过编纂礼书重构家礼学体系，凭借其在政治和学术方面的影响力，积极推行以礼为教，移风易俗，不唯对社会伦理秩序的重建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三礼学的复兴及经学主导地位的确立奠定了重要基础。朱轼通过刊行《仪礼节略》以整顿婚丧奢侈之风的努力，以及对社会风尚的引导无疑为当下的家礼学发展和家风建设提供重要启示。

风俗之坏，莫过于奢靡盛行，正所谓“奢靡之始，危亡之渐也”[19]4025。奢靡之风带来的是贪污腐化及民间财富的浪费，是导致社会危机的重要诱因。因此，历代统治者都将整治奢靡之风作为施政的重点，并试图在儒家经典中寻求治理之道。推行礼教，以礼化俗是整治奢靡之风最有效的手段。朱轼《仪礼节略》之撰作，本以朱熹《家礼》，回归《仪礼》本经，为改革婚丧奢靡之风，去奢崇俭作出了重要尝试。中国素为文明古国、礼仪之邦，文明和礼仪不应体现在奢侈浪费和豪华无度上，而应体现在有条不紊的社会秩序、合情合理地利用有限的资源，以及推动社会持续不断地向前发展。

此外，如何处理好古礼与今俗的关系仍是当代礼学研究和礼仪教化的重要议题。《礼记》有云：“礼之所尊，尊其义也。”朱轼的家礼学建构即体现了轻仪节、重礼义的特点。通观《仪礼节略》，不难发现，朱轼对《家礼》仪节的减省或增益，始终以《仪礼》蕴含的礼学精神为标准，只要合于礼义，无论古礼还是今俗，皆可遵行。朱轼试图在古礼与今俗之间寻求一种契合，是否合于礼义正是二者的契合点。唯其重礼义，故能兼容古今；唯其兼容古今，方能见诸实用。朱轼变通古今以适于用的做法同样值得我们省思。

①朱舲：《朱文端公年谱》，同治八年刻本，第15页。

[参考文献]

[1] 朱轼.仪礼节略：上[M]//彭林，主编.朱轼全集：第二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

[2] 朱轼.仪礼节略：下[M]//彭林，主编.朱轼全集：第三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

[3] 王叶滋.仪礼节略·识语[M]//彭林，主编.朱轼全集：第二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

[4] 赵克生，安娜.清代家礼书与家礼新变化[J].清史研究，2016(3)：25-36.

[5] 朱轼.朱文端公文集[M]//彭林，主编.朱轼全集：第十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

[6] 大清律例[M].田涛，郑秦，点校.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7] 黄利通.仪礼节略·序[M]//彭林，主编.朱轼全集：第二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

[8] 冯达文.中国古典哲学略述[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

[9] 朱轼.周易传义合订[M]//彭林，主编.朱轼全集：第一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

[10] 罗检秋.学术调融与晚清礼学的思想活力[J].近代史研究，2007(5)：42-58.

[11] 吴隆元.仪礼节略·序[M]//彭林，主编.朱轼全集：第二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

[12] 杨华.中国古代的家礼撰作及其当代价值[J].湖南

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6):127-133.
[13] 徐一夔,等.明集礼:卷二十四[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49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14] 张国刚.从礼容到礼教:中国中古士族家法的社会变迁[J].河北学刊,2011(3):36-40.
[15] 毛国民.朱熹《家礼》庶民化及其对清代的影响[J].朱子学刊,2016(1):101-112.
[16] 徐世昌.清儒学案:卷四十九[M].陈祖武,点校.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8.
[17] 皮锡瑞.经学通论[M].北京:中华书局,2018.
[18] 李卫.仪礼节略·序[M]//彭林,主编.朱轼全集:第二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
[19]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〇五[M].北京:中华书局,1975.

Yili Jielue and Zhu Shi's Construction of Family Ritual Studies

LI Wenchang

(*Qilu Culture Research Institute*,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250014, *China*)

Abstract: *Yili Jielue*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Etiquette*) is a work on family ritual studies compiled by Zhu Shi, a renowned minister of Neo-Confucianism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during his governance in Zhejiang. The book reflects Zhu Shi's vision and practice of reconstructing family rituals to implement moral education. Structured around Zhu Xi's *Family Rituals*, *Yili Jielue* returns to the foundational classic *The Book of Etiquette and Ceremonial*, expanding beyond the traditional four rituals—capping, wedding, funeral, and sacrificial ceremonies—to include scholarly ethics, scholar's interactions, and village drinking rituals. It advocates principles such as not abolishing capping ceremonies, timely marriage, and frugal funerals, emphasizing the essence of ritual over formalities. Zhu Shi integrates the Neo-Confucian discours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aven, human nature, and destiny into his study of family rituals, interpreting principles through rituals, designing rituals based on human sentiments, and intertwining rituals with customs to fully leverage their social function in transforming traditions and morals. Bridging Zhu Xi's *Family Rituals* and Qiu Jun's *Family Ritual Etiquette*, while inspiring later studies on family rituals during the Qianlong-Jiaqing era, *Yili Jielue* shows the evolution of family ritual studies since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Its adaptable approach to rituals—balancing ancient and modern practices for practicality—along with its guidance on social customs and advocacy for frugality, offers valuable insights into contemporary development in family ritual studies and the cultivation of family ethos.

Key words: *Yili Jielue*; Zhu Shi; family ritual studies; family ethos cultivation

(责任编辑:丹萍)

政策能有效保障机会平等吗？

黄爱教
（天津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300387）

[摘 要] 政策是保障机会平等的重要方式之一。但是，政策能有效保障机会平等吗？这涉及机会平等的政策保障的有效性问题。以政策为媒介，机会平等可分为政策中的机会平等与非政策中的机会平等。政策中的机会平等是指纳入政策中且被机会主体意识到的机会，通常被认为是形式上的机会平等。政策运行是形式上的机会平等走向实质上的机会平等的过程，也是体现机会平等的政策保障有效性的过程。然而，实质上的机会平等的实现却受到很多因素影响，并形成形式上的机会平等与实质上的机会平等之间的悖论。超越这一悖论，关键在于缩小或者消除形式上的机会平等与实质上的机会平等之间的差距。主要措施为：缩小形式上的机会平等与实质上的机会平等两者的差距，在推进机会平等的政策保障中坚持多元主义理念，坚持交叉性原则，并实施多样性的策略。

[关键词] 政策；公共政策；机会平等；政策保障；政策运行
[中图分类号] F124.7;D6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267（2025）01－0118－08
DOI：10.14129/j.cnki.forwordposition.2025.01.011

机会平等与政策保障之间的关系，是教育学、政治学及管理学等领域讨论的重要话题之一。综观现有讨论，较为普遍的观点认为政策是保障机会平等重要且有效的方式。例如，在教育学领域，彭骏等基于教育代际流动性这一衡量机会公平的重要指标，分析了免费义务教育政策与农村教育机会公平之间的关系，认为免费义务教育政策的实施提高了父代受教育水平在高中以下家庭的孩子相对其父代的教育代际向上流动性[1]；李立国等基于我国倾斜性招生政策分析了70多年来从权利平等、机会平等到发展平等的政策转变逻辑[2]。在政治学领域，鲍静基于社会性别视角讨论了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女性平等参与政治生活机会的有效保障。[3]在管理学领域，胡鞍钢基于机会平等视角对区域发展政策的公平性进行了分析。[4]然而，政策真的能够有效地保障机会平等吗？这一问题的实质涉及机会平等的政策保障有效性问题。实践表明，并不是所有类型的政策对机会平等的保障都是有效的。有些政策可能并不保障机会平等，有些政策可能只保障某种形态的机会平等，有些政策可能还造成社会的某种不平等。这些问题的产生，可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促进机会平等的政策体系研究”（22YJAZH029）。
[作者简介] 黄爱教，博士，天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南开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

能涉及：（1）政策与机会之间的关系；（2）政策视域下的机会平等类型；（3）政策对机会平等的有效保障评估等。就政策与机会之间的关系而言，政策是创造机会还是保障机会？如果政策创造机会，则意味着在政策框架下的机会就会获得平等的保障。如果政策保障机会，则意味着被纳入政策框架下的机会才有可能获得保障；反之，则不能获得政策的保障。政策创造的机会与被纳入政策保障的机会，可称之为“政策中的机会”；除此之外，可称之为“非政策中的机会”。在政策视角中，政策中的机会因政策普遍性成为平等的机会，从而获得有效保障；而非政策中的机会的享有与实现，则完全依靠个人的条件、背景与能力等，也由此形成了社会诸不平等形态。因此，在政策视域下区分对讨论机会平等保障的有效性，具有重要意义。

一、机会平等、政策及政策保障的有效性

机会平等，简单地说是公平竞争和发展机会的全面开放。个人的成就和发展尽管会受到某些不可控制的因素影响，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才能和努力。政策被认为是保障机会平等的重要方式。

（一）机会及其多样性

机会，在汉语词典中，意为“合宜的时机”，抑或为“有利于成长或获得某种成功的机遇和时机”。然而，“作为一个科学概念，机会包含实现条件、时间、主体条件三个方面。当这三个方面得到了统一时，就称为机会”[5]。在马克思主义文本中，“机会”至少表达以下含义：（1）参加某种活动的权利或资格以及行使该权利所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2）有利于达成目标的某种特别的境况、境遇，与契机、机遇近义；（3）达致某种目标的可能性。[6]在通常意义上，机会约定俗成是时机与机遇。那么，何为“机会”呢？某种时机或机遇如何成为“机会”呢？这涉及机会主体、客观条件及机会意识等结构要素。第一，机会主体，是处于一定目的状态中的主体，通常指人。第二，客观条件，是被机会主体意识到并可能被利用的、既可能是早已存在的也可能是新产生的条件。第三，机会意识，是机会主体对机会的认识，认为这些条件对其成长和成功具有重要作用。机会意识是连接机会主体与客观条件的纽带，图1表明机会产生所具备的结构要素及其过程。机会的产生过程表现为机会主体在机会意识支配下使客观条件转变为某种机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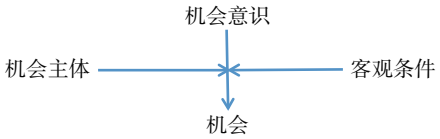

图1　机会的产生

但是，机会主体、机会意识及客观条件会呈现出不同的情况，导致机会以不同形态的方式出现，谓之“差异性”。就机会主体而言，因社会地位、身份及能力之间的差异，导致其对存在的客观条件能否转化为机会意识也具有差异。就机会意识而言，存在着意识到与意识不到两种差异。如果客观条件被机会主体意识到，其就有可能成为机会；如果机会主体意识不到客观条件，就不可能成为机会。就客观条件而言，包括教育、就业、医疗、社会保障等。这些不同领域显示的是机会内容的差异，例如教育机会、就业机会、医疗机会及参与社会保障的机会等。对于机会的差异性，在意义解释上有两个方向：一是正向的，机会的差异性实质上是机会的多样性，这种解释的意义指向在于承认机会的多样性，为追求机会平等的价值提供现实基础；二是负向的，机会的差异性实质上是机会的不平等性。

然而，在现实社会中，人们在讨论机会之时，并不单纯讨论机会是如何产生的，而是讨论抓住机会的能力，或者说如何平等地抓住机会。阿玛蒂亚·森提认为，“如果要全面理解‘真正的’机会平等，就要通过能力平等的角度来审视”[7]230，他从能力角度诠释了机会平等。诚然，能力是影响人们能否抓住机会的重要因素。其主要表现有：一是

能力影响机会意识，机会意识可能是基于机会主体的某种直觉，但是更多源自专业的抑或职业的训练而形成的能力；二是能力受到各种客观因素限制，诸如经济、教育及身份等因素。在讨论如何平等地抓住机会之时，实际上讨论的是如何促进机会平等，即在承认和正视机会的多样性及不平等的情况下，如何创造条件并保障机会平等的价值追求得以实现。

（二）政策与机会的两种类型

有学者认为，平等机会是社会政策的一个前提。[8]2也就是说，社会政策保障每一个人获得同样的对待——机会平等。那么，何谓政策呢？现代汉语关于政策的解释，经常与路线、方针及策略相联系，也与制度互释。《辞海》对政策的定义为："国家、政党为实现一定历史时期的路线和任务而规定的行动准则。"[9]2政策概念被用于不同的领域，呈现出不同概念形态。例如，在公共管理领域，有国家政策、社会政策及公共政策等概念；在法律理论领域，有司法政策、民事政策及刑事政策等概念。如果以政策内容进一步区分国家政策，则有经济政策、环境政策、教育政策、科技政策、文化政策、国防政策及外交政策等概念类型。学者在界定政策概念时存在某些学科倾向性，并赋予其特定的内涵。本文研究主题聚焦于机会平等的政策保障有效性研究，将政策的认识与理解限定于政治学、公共政策学领域内，所以主要是指党和国家制定的政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等同于公共政策。其至少包含以下意义：（1）就主体而言，它的制定主体为党、国家和政府；（2）就内容而言，它涉及内容非常广泛，包括经济、教育、医疗、科技、文化、国防、外交等各个方面；（3）就属性而言，它应属于规范，区别于法律、宗教等规范，是保障机会平等的重要方式。在政策的视角里，以政策为中介，可将机会分为政策中的机会与非政策中的机会。政策中的机会主要是指政策创造与纳入政策保障的机会，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政策创造的机会。政府制定的政策会对某一行业、群体及个人产生影响，形成某些发展的机会。例如，有学者解读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农机发展形成的机会。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推广黑土地保护有效治理模式，推进侵蚀沟治理，启动实施东北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行动计划。该学者认为，这一规定对保护性耕作系列机具的发展是一个机会，这些机具主要包括各种联合整地机、深松机、免耕（施肥）播种机、中耕除草机、高效植保机械、秸秆粉碎还田机和秸秆打捆机等。二是纳入政策保障的机会。[10]例如，国家将ChatGPT发展纳入政策调整中，使人工智能发展获得政策的保障。2023年7月，国家网信办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广电总局公布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其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起规范和促进作用。[11]实际上，这是将人工智能发展机会纳入政策保障中，使其更加规范、迅速地获得有效保障。非政策中的机会主要是指政策以外的机会，即存在于现实社会中被人们意识到的有利于自身成长或成功的契机和时机。显然，政策中的机会是获得政策保障的，非政策中的机会是很难获得政策保障的。确切地说，政策之外的机会是否能获得平等的保障，则是一个未确定的事实。

（三）政策能否有效地保障机会平等？

政策能否有效地保障机会平等？这实际涉及机会平等的政策保障有效性问题，其表述的是政策在促进和保障机会平等的价值实现程度。这也就是说在机会平等的价值实现过程中，预设的目标和现实之间有差距。机会被政策创造或者纳入政策保障后，形成政策中的机会。一般来说，就政策的规范性而言，人人享有政策中的机会，实现了形式上的机会平等。但是，政策中的机会并不等于政策中机会的实现，政策中机会的实现呈现的形态为实质的机会平等。这就是说，实质上的机会平等依赖于政策执行。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我们会发现，一些因素促进了实质

的机会平等，一些因素却阻碍了实质的机会平等，产生了新的不平等。如果政策中的机会在政策执行中完成了实质上的机会平等，则机会平等的政策保障则是有效的；反之，如果仅仅停留在形式上的机会平等，或者与实质上的机会平等还有很大的差距，则机会平等的政策保障效果不佳或者是无效的。

二、机会平等的政策保障有效性评估及影响因素

如何判断机会平等的政策保障是否有效呢？这涉及机会平等的政策保障有效性评估问题。在机会平等的价值实现过程中，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导致有效性存在差异。

（一）形式上的机会平等和实质上的机会平等

判断机会平等的实现程度，最简便的评估方法是引入两个变量进行评估：形式上的机会平等和实质上的机会平等。机会平等是指所有社会成员不分出身环境、家庭背景和自然禀赋，在主体所努力争取的利益面前，只要满足相应条件，达到规定标准，就能拥有相同的权利和资格去争取利益。它强调机会的开放性和全纳性（非排斥性）原则，意味着才能和努力是决定一个人能否得到机会的决定性因素，竞争主体不因任何非个人可控因素而得到或失去某种机会。就机会平等的类型而言，分为形式上的机会平等和实质上的机会平等，它们的重叠程度表明机会到底平等到什么程度——即机会平等的实现程度。如果将政策中的机会视为形式上的机会平等，则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评估政策保障机会的有效性。

如图2所示，形式上的机会平等与实质上的机会平等之间的关系可归结为四种：（1）符合，表明形式上的机会平等与实质上的机会平等一致，完成了政策追求的机会平等的价值目标，机会平等的政策保障有效性达到理想状态；（2）大部分符合，表明形式上的机会平等与实质上的机会平等大部分一致，实现了大部分政策所追求的机会平等的价值；（3）小部分符合，表明形式上的机会平等与实质上的机会平等小部分一致，实现了小部分政策所追求的机会平等的价值；（4）不符合，表明形式上的机会平等与实质上的机会平等不一致，即相背离，政策保障没有效果。

形式上的机会平等 \ 实质上的机会平等	
符合（1）	大部分符合（2）
小部分符合（3）	不符合（4）

图2　形式上的机会平等与实质上的机会平等的关系

在以上四种关系中，第（1）种状态是制定政策时的预设状态，在现实中很难实现，因为机会主体受到各种现实因素的影响，很难达到政策制定的预期效果。政策能否保障机会平等，由于受到现实因素的影响，一般呈现（2）、（3）、（4）种状态。具体而言，第（2）种状态机会平等的政策保障有效性程度是最高的；第（3）种状态与第（2）种状态相较，它的有效性程度低一些；第（4）种状态则显示政策保障是没有效果的。在实践方面，例如，新农合政策保障农民享有医疗保障的机会平等。2002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提出逐步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到2010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要基本覆盖农村居民”[12]。2003年，卫生部等部门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13]2007年，卫生部等7部委局联合下发《关于加快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的通知》。[14]截至2007年6月30日，全国实施新农合政策的县（市、区）达到2 429个，占全国总县（市、区）的84.87%，参加合作医疗人口7.2亿，占全国农业人口的82.83%。[15]从农民参与合作医疗的情况来看，基本上完成了新农合政策的预设目标，也就是说农民医疗是得到政策有效保障的。2016年，《国务院关于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意见》出台，整合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

村合作医疗两项制度，建立了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16]，其价值目标在于“实现城乡居民公平享有基本医疗保险权益”[16]。截至2021年6月底，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超过13亿人。[17]20从新农合政策再到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农民享有基本医疗的权益得到了有效保障，符合形式上的机会平等与实质上的机会平等之间关系的第（2）种状态。

（二）实质上的机会平等的影响因素

机会平等的政策保障有效性问题，本质是形式上的机会平等与实质上的机会平等的关系问题。实质上的机会平等越是接近形式上的机会平等，表明实现机会平等的阻力较小，机会平等的政策保障有效性程度越高；反之，实质上的机会平等越是远离或者背离形式上的机会平等，表明实现机会平等的阻力较大，机会平等的政策保障有效性程度就越低。一般来说，影响实质上的机会平等的现实因素，成为机会平等的政策保障有效性评估的重要变量。就主体而言，主要包括三种因素：个体因素、社会因素及政府因素。机会主体在把握政策中的机会时又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如，个体受到认知水平、教育程度、能力、风险及运气的影响，社会受到社会结构、社会变迁及社会组织等因素影响，政府受到执行主体的素质、结构、能力及各种执行条件的影响。这种情况，谓之实质上的机会平等影响因素的多样性。雅各布认为风险等不可控因素对分配公平具有重要影响，他认为背景公平、程序公平和风险公平这三个维度一起构成了机会平等。[18]雅各布对机会平等的界定，也反映了机会平等影响因素的多样性。

在影响实质上的机会平等的各种因素中，它们之间具有交叉性，呈现为复杂的综合体。就个体因素而言，政策中的机会能否被个体所意识是很重要的环节。没有意识到政策中的机会，其受到认知水平、教育程度等因素影响；已经意识到政策中的机会，其也受到自身能力、风险、运气的影响。通常我们认为在把握机会及把政策中的机会变为实质上的机会方面，个人受能力的影响最大。就能力而言，既有个体性的差异，又受社会影响，同时也受政府影响。例如，当前老年人在实现数字技术政策中的机会程度相对比较低。其影响因素是多样性的，也是交叉性的。就个体因素而言，主要受老年人对数字技术的认知水平、数字技术的掌握程度等因素影响，而个人因素又源于对老年人的数字技术教育程度，数字技术教育程度还受到社会教育结构、社会组织等因素影响。由于一些地区的社会组织介入了老年人数字技术的教育与培训，老年人掌握数字技术程度较高，实现政策中的机会程度也较高。除社会组织介入外，政府部门采取积极措施促进数字技术教育发展也非常重要。例如，政府可制定老年人数字技术教育规划、投入人才和资金等资源。但在现实中，政府部门因层级、财政、人员等方面存在差异，在数字技术教育方面也会产生差异，导致不同地区的老年人实质享有政策中的机会也存在差异。

（三）机会平等的悖论及超越的可能

显然，形式上的机会平等与实质上的机会平等的差异产生了机会不平等。为此，消除机会不平等的直接方法在于消除影响实质上的机会平等的诸种因素。例如，G.A.柯亨认为非选择的偶然因素导致实际所得的不平等就是不公平。社会必须为个人创造相应的条件，让所有人都能够平等竞争。[19]20通常，要实现实质上的机会平等，即为获得结果平等，较多人倾向于赋予每个人不同的权利或者社会和国家应为结果平等提供更多的条件。这与起点公平、形式上的机会平等产生了冲突，因而形成了机会平等的悖论。在政策领域，一方面，政策中的机会应当是平等地赋予每一个人，即制定政策时要做到公平，形成形式上的机会平等；另一方面，在政策执行中，除了应当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还要实现实质上的机会平等，即消除实质上的机会平等的影响因素，这要求赋予机会主体某种特殊性、倾斜性保障。显然，实质上的机会平等的价值实现与形式上的机会平等的预

设价值之间存在了悖论。接下来的问题在于：如何消除机会平等的悖论？就政策而言，就是要提高机会平等的政策保障的有效性，即缩小形式上的机会平等与实质上的机会平等之间的差距。一方面，政策中的机会应当科学、合理且容易被机会主体所享有；另一方面，政策中的机会在走向现实过程中，应使其受到现实因素影响较小，最终使形式上的机会平等与实质上的机会平等在政策运行中实现辩证统一。

三、提升机会平等政策保障有效性的理念、原则与策略

提升机会平等政策保障有效性，实质上在于缩小形式上的机会平等与实质上的机会平等的差距，最终在形式上的机会平等与实质上的机会平等的辩证统一中，促进机会平等的价值目标实现。

（一）多元主义

提升机会平等的政策保障有效性，要对政策实现的价值目标作多元主义的政策评估。多元主义，就其字面意思而言，是事物发展到了一个很丰富的境界，有很多思想观点和主张，同时也有很多分歧。多元主义主要表达的意思在于：在承认、包容和尊重人与人之间多样性与差异性的基础上，强调个体和群体在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多样性和平等性。多元主义反对并拒绝一元化的观点，强调包容性。政策中的机会要获得实现，要从形式上的机会平等过渡到实质上的机会平等，就要坚持多元主义理念。一是强调政策过程的开放性。在西方视角看来，政策过程中的多元主义，主要在于如何看待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多元主义在看待两者之间的关系时，“更关注国家的开放性：立法机构、行政机构乃至于司法机构都有一定的开放性，给予各种利益集团游说的渠道”[20]。政策制定的开放性，在中国语境下，应该是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吸纳多元主体参与政策制定，谓之“集体之智慧”，超越政策制定的一元性，使更多的机会能够被政策制定者发现，从而上升为政策中的机会，成为形式上的机会平等。二是强调政策评估的多元标准。公共政策评估涉及两个重要维度，即价值和事实维度。然而，价值要素与事实要素在政策评估中的作用不同，“对政策评估中事实要素的分析可以帮助评估者理解政策包含的因果关系，从而可以判断政策拥有多大程度的有效性”[21]，而“对政策评估中价值要素的分析可以让评估者更好地了解政策中的价值导向和利益分配，从而可以判断政策中所体现的合理性和适当性”[21]。政策评估，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实质上的机会平等的评估。这就意味着实质上的机会平等最终结果的呈现，也并不是单一的或者唯一的。换句话说，对政策中的机会最终实现的评价，也应当是多维度评价。

（二）交叉性原则

提升机会平等的政策保障有效性，在政策制定、执行及评估过程中，还要坚持交叉性原则。它既是理论上的又是方法论上的一种工具，其承认并且强调社会群体内部以及社会群体之间劣势的相交部分。希尔·柯林斯（Hill Collins）认为：“交叉性是指相互交叠的被压迫的特殊形式，比方说，种族和性别，或性征与民族的交叉部分。交叉模式提醒我们压迫不只局限于一种基本的种类，而且多种压迫会共同造成不公平。”[8]2运用交叉性原则，主要目的在于理解机会平等与多样性之间的关系。在运用交叉性原则分析政策中的机会和形式上的机会平等之时，前提在于承认人与人之间的多样性与差异性。与此同时，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包括政策评估，它的评价因素也是多重的。为此，应运用交叉性概念，分析形式上的机会平等是否已经向实质上的机会平等过渡以及它们之间的差距如何。

提升机会平等政策保障有效性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整体性分析。就社会群体而言，要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如果分割成若干群体看待，就有可能形成某种歧视。就社会个体而言，也要注意社会个体身份的

重合与交叉，考察其是否获得实质上的机会平等，不能依赖于单一标准。二是形成共识性追求。从交叉性概念出发，在讨论机会平等的政策保障中，最终的目的在于对平等的社会的追求，即一个维护和促进平等、自由、机会独立，以及人们能按照自己的价值观选择生活方式，所有人都可以互利共赢、共生共荣的平等社会。“一个平等的社会能够意识到民众的不同需求、处境和目标，并着手于为人们的生活和发展扫清障碍。”[8]47马克思认为，真正的平等意味着人自由而全面地发展，它只能存在于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分工消失、劳动成为生活第一需要的共产主义社会。[22]形式上的机会平等和实质上的机会平等，最终的目标都是促进人自由而全面地发展。

（三）多样性策略

提升机会平等的政策保障有效性，还要采取多样性策略。“多样性概念的产生是由于研究者、政策制定者和政治家们意识到了一个重要事实，即在不同的社会团体之间甚至团体内部会产生不同的弱势体验。”[8]1机会平等与多样性概念联系在一起，实际上，它所表达的背后深层含义主要是：（1）在机会平等框架下，强调对人与人之间差异性的认可与尊重；（2）在追求实质上的机会平等过程中，允许被合理化地差别对待，因而，在具体的操作中，机会平等的政策保障有效性主要在于缩小形式上的机会平等与实质上的机会平等之间的差距时所采取多样性策略；（3）多样性策略最终有一个共识性的价值追求，实际上，机会平等最终的目的也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因此，在提升机会平等的政策保障有效性时，为实现政策中的机会平等，要采取多样性的策略，尤其针对不同形态的机会平等，要采取不同的策略。例如就业机会平等，主要运用的方法为宣传、帮扶及开发更多的工作岗位等。

四、结语

实现机会平等的价值目标，政策保障是重要方式。形式上的机会平等和实质上的机会平等是机会平等的两种类型，它们之间的差距表明政策保障的有效性程度。如果形式上的机会平等与实质上的机会平等之间的差距比较大，则政策保障的有效性较低；反之，则政策保障的有效性较高。提升机会平等的政策保障有效性，其实质在于缩小形式上的机会平等与实质上的机会平等之间的差距，使其趋向一致。为实现这一目标，就要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秉持多元主义的理念，运用交叉性原则，并采取多样性的策略。

［参考文献］

[1] 彭骏，赵西亮．免费义务教育政策与农村教育机会公平：基于教育代际流动性的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2022(2)：144-164.

[2] 李立国，吴秋翔．从权利平等、机会平等到发展平等：基于我国倾斜性招生政策的分析[J]．教育研究，2020(3)：95-105.

[3] 鲍静．政策过程与女性参政机会分析：以社会性别为视角[J]．新视野，2010(5)：72-76.

[4] 胡鞍钢，魏星．区域发展政策的公平性分析：机会平等视角下的实证研究[J]．公共管理学报，2009(2)：14-20+122-123.

[5] 李灼青、黄双福．关于“机会”概念[J]．现代哲学，1987(4)：43.

[6] 徐梦秋，张宽前．马克思恩格斯的视野：机会与机会平等[J]．世界哲学，2023(2)：5-15+160.

[7] 阿玛蒂亚·森．论经济不平等/不平等之再考察[M]．王利文，于占杰，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8] 芭芭拉·巴基海尔．解析平等机会与多样性：社会分化与交叉不平等[M]．王川兰，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9] 陈庆云．公共政策分析[M]．第2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10] 晓琳．政策解读：透过2020年中央1号文件看农机发展机会[J]．农业机械，2020(2)：74-75.

[11]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EB/OL]．(2023-07-10)[2024-03-16]．https://www.moj.gov.cn/pub/sfbgw/flfggz/flfggzbmgz/202401/t20240109_493171.html.

[12]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EB/OL]．(2002-10-19)[2024-03-16]．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2/content_61818.htm.

[13] 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EB/OL].(2003-12-15)[2024-03-16].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4/content_63140.htm.
[14] 卫生部等7部委局联合下发《关于加快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的通知》[EB/OL].(2007-02-07)[2024-03-16].http://www.nhc.gov.cn/jws/s6476/200804/0d9c0506e38c49909f8b78e14b086ca0.shtml.
[15] 新农合2008年基本覆盖全国 目前已有82.83%的农业人口加入[EB/OL].(2007-09-05)[2024-03-16].https://www.gov.cn/wszb/zhibo146/content_737891.htm.
[16] 国务院关于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意见[EB/OL].(2016-01-12)[2024-03-16].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01/12/content_10582.htm.
[17]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与行动价值[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18] 莱斯利·A.雅各布,刘宏斌,方秋明.追求平等机会:平等主义的正义理论与实践[J].国外理论动态,2013(8):57-70.
[19] G.A.柯亨.自我所有、自由和平等[M].李朝晖,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
[20] 张长东.社会组织与政策协商:多元主义与法团主义之辩[J].浙江学刊,2017(1):38-48.
[21] 陈玉龙.公共政策评估的演进:步入多元主义[J].青海社会科学,2017(4):64-69.
[22] 唐子茜,王禹.现阶段机会平等与结果平等的辩证关系[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6(4):38-43.

Can Policies Effectively Guarantee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HUANG Aijiao

(*School of Marxism*, *Tiangong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7, *China*)

Abstract: Policies serve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means to ensure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However, can policies effectively guarantee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This pertains to the effectiveness of policy safeguards for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Through the lens of policy,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in policy and others.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in policy refers to opportunities incorporated into policies and recognized by subjects, often regarded as formal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Policy implementation represents the process through which formal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progresses toward substantive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while reflec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policy safeguards for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Nevertheless, the realization of substantive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is influenced by numerous factors, leading to a paradox between formal and substantive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To transcend this paradox, the key lies in narrowing or eliminating the gap between formal and substantive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Key measures include: reducing disparities between formal and substantive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adhering to pluralistic principles in advancing policy safeguards for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upholding intersectionality, and implementing diverse strategies.

Key words: policy; public policy;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policy safeguards; policy implementation

(责任编辑:米雪)

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内在逻辑、现实梗阻与路径优化

赵美荣[1] 尹江霞[2] 孙天舒[3] 李昕怡[4]
（1.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大学 食品药品工程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7；
2.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大学 高等职业教育研究中心，广西 南宁 530007；
3.南宁学院 数字经济学院，广西 南宁 530200；
4.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大学 发展规划与质量督导处，广西 南宁 530007）

[摘 要] 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是促进科技创新、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建优人才队伍、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载体与平台，形成了产业链、教育链、人才链、创新链融合发展的有效模式。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与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较强的契合性和实践价值一致性，是双向赋能、协同共生的统一体，共同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技术突破、强化要素创新、促进新兴产业发展等构成了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逻辑。但现实中，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主体目标差异化、目标与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建设滞后矛盾、共同体动能转换推进机制不够完善等问题不同程度上影响了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效果。推动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点是通过构建多元主体共建治理机制、重塑和健全利益协同体系、完善资源整合与配置体系，增强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的凝聚力、内生驱动力、发展支撑力，不断厚植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与优势。

[关键词] 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新质生产力；科技创新；要素创新；产业升级
[中图分类号] F279.2；G64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267（2025）01－0126－10
DOI：10.14129/j.cnki.forwordposition.2025.01.012

一、问题的提出

自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时提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概念以来[1]，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成为各级政府、学术界高度关注的重要问题，被作为重要任务写入2024年

[基金项目] 2023年度广西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基于高质量人才培养的农业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构建的研究与实践”（GXGZJG2023B096）；2024年度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大学校级人文社科类研究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产乡教协同共生体机制研究”（XSK2408）。
[作者简介] 赵美荣，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大学食品药品工程学院高级实验师，研究方向：职业教育；孙天舒，南宁学院数字经济学院专任教师，研究方向：数字经济、资本市场；李昕怡，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大学发展规划与质量督导处干事，研究方向：职业教育。
[通信作者] 尹江霞，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大学高等职业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研究方向：职业本科教育、心理健康教育。

政府工作报告[2]。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一系列重要论述、重大部署，深刻回答了“什么是新质生产力、为什么要发展新质生产力、怎样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3]新质生产力作为一种以科技创新为主、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且具有高效能、高效率、高质量特征的新型生产力质态，其“新”体现在新技术、新要素、新组合及由此综合而成的新产业、新模式和新动能上[4]，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彰显了其在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中的引领作用，反映了中国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新方向、新理念和应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与改革的重要战略举措。新质生产力既是发展命题，更是改革命题，其培育和发展既要实现技术层面的颠覆性突破、技能人才队伍的强大支撑，又要构建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社会生产关系，为之提供有力保障。从生产力发展所需要的要素支持和发展条件来看，新质生产力发展是包括教育、科技、人才等在内的融合共促、协同共生、相互赋能的统一体，需要实现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与深度互动，多元要素的顺畅流通与高效整合，以及产业链构建与产业转型升级。

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是一种新组织、新载体和新模式，在推动产业、技术和教育深度互动，促进科技创新，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建优人才队伍，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等方面具有良好优势并发挥着重要作用，承担着人才培养、技术研发和有组织开发教学资源的任务，能够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产业链、教育链、人才链、创新链融合的有力支撑[5]，是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新质生产力与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并非单向发展的平行线，而是紧密关联、相互促进、互为支撑、协同共生的统一体，基于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的现实形态和组织形式探讨其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逻辑，分析其存在的现实困境，提出优化的政策与建议，对于推动产教融合与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进而落实国家重要发展战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的现实形态和组织形式

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是产教融合的一种新形态，由龙头企业、高水平高等学校、职业学校、行业组织、科研机构等合作主体构成，聚集了大量产教资源，有利于增强产教供需匹配度、加强服务对接、促进全行业发展，进而形成跨区域的创新生态系统。[6]经过不断探索和发展，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形成了包括跨区域产教资源整合、产教融合平台载体、混合所有制分校或产业学院、建设实训基地、引入社会第三方评价、校企协同育人等在内的多种现实形态，并以此为途径持续推进科技创新，提高教育水平，促进产业发展。

（一）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的现实形态

根据现有研究成果、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的内涵以及实践情况来看，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的现实形态主要包括以下几个类型。（1）跨区域产教资源整合。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主要通过行业龙头企业和高水平高等学校、职业学校牵头，联合行业组织、科研机构、上下游企业等组建合作联盟或组织，发挥国家财税政策、金融政策、投资政策、土地政策、信用政策的功能，运用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搭建跨区域的市场化、专业化、开放共享的行业共性技术和产教融合信息服务平台，汇聚区域和行业人才供需、校企合作、项目研发、技术服务等信息，整合不同区域的产业资源和教育资源，提供精准化产教融合信息服务，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与创新链有机衔接，为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提供强有力的人才和技术支持。（2）产教融合平台载体。产教融合平台载体是实现教育与产业深度融合、推进协同创新的重要基础设施。产教融合平台载体通过统筹规划、配置和利用产教资源，促进资

源共享，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职业教育系统社会运行成本；通过打造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平台，建设集实践教学、社会培训、真实生产和技术服务功能于一体的开放型区域产教融合实践中心，构建多元化实践中心网络，加强政府、企业和职业院校等的合作联动，提高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积极性。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支持职业院校联合企业、科研院所开展协同创新，共建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技术创新中心、创业创新中心、企业技术中心等创新平台，服务地方中小微企业技术升级和产品研发，并通过建立良好的知识共享平台与合作机制，促进行业内外的交流与协作，支持学术研究项目和科研成果转化。（3）混合所有制分校或产业学院。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支持有条件的产业园区和职业院校、普通高校合作创办混合所有制分校或产业学院。其突破了单一性质办学的局限，实现了多元主体办学，公有资本、私有资本甚至海外资本都可以参与办学。混合所有制分校或产业学院具有办学主体多元化、校企管理协同化、运行模式市场化、产权结构清晰化等特点，有利于实现教育资源与产业资源的深度融合。此外，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的现实形态还包括建设实训基地、引入社会第三方评价、校企协同育人等模式。

（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组织形式

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组织形式是其运行方式、运行机制与运行效果的集中呈现，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类型。一是龙头企业牵头型。龙头企业牵头型的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是指由行业龙头企业引领，联合高水平高等学校、职业学校、科研机构、上下游企业等共同参与的跨区域产教融合组织。这种模式强调龙头企业的引领作用，通过发挥其行业影响力和资源优势，联合学校、科研机构、行业协会等形成利益共同体，通过实体化运作，共同建设合作平台、实训基地、研发平台等，实现教育资源与产业资源深度融合，提高职业教育质量和效率，同时为企业发展提供人才和技术支持。二是理事会领导下的事业部制。理事会领导下的事业部制的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由牵头部门、行业企业、高水平高等学校、职业学校、科研机构等多方参与，产教融合共同体理事会是最高决策机构，统筹和研究共同体建设发展的重大事项，化解发展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同时，还可以设置专门的项目任务，以项目式、目标化管理方式，促进各成员单位协同发展。三是多方参与型。多方参与型产教融合共同体是一种新型的组织系统，由多个主体协同构建，通过有效链接教育与产业两大系统，实现人才培养供给侧改革和产业需求的深度融合。根据产业链上下游分布和教育资源布局，跨区域广泛吸纳相关行业组织、学校（含高水平高等学校和职业学校）、科研机构、上下游企业等单位参与建设，共同体成员单位秉持“产教合作、统筹发展、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原则，共同推动落实教育强国的战略方针和重点任务。

三、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逻辑

新质生产力“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7]。新质生产力作为生产力中的一种能级跃迁，与传统生产力的显著区别在于其并非只是实现技术创新、生产要素优化配置、产业转型升级的单向度提升，而是要实现三者的协同互动、相互作用；也并非仅仅追求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的改进与提升，更重要的是聚焦三者优化组合与功能集聚。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驱动力，通过推动颠覆性、前沿性科技创新，提升劳动者综合技能，优化资源配置并提高其配置效能，促进产业创新、制度创新、合作机制创新和财税金融支持体系创新，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模式和新动能，开辟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新

赛道，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8]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是建立在开放的技术体系、产业体系和教育体系的基础上，通过实现跨区域、跨组织、跨领域和跨行业的优势资源整合与共享，构建产业链、创新链、教育链和人才链相融合的网络体系，在此过程中，需要政府的引导和规范，以及多元协同政策体系的有力保障。

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具有行业龙头企业主导、注重政府搭台和机制保障、高水平高等学校和职业学校参与、主体多元、注重人才培养等多方面特征，突出区域性、互补性、协同性、融合性、组织性，能够较大程度匹配治理目标、协同创新行为、统筹组织创新资源、促进产业互补。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通过跨区域产教资源整合、产教融合平台载体、混合所有制分校或产业学院、建设实训基地、引入社会第三方评价、校企协同育人等方式，整合产教资源，提高科技创新水平，培育新型生产要素，形成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有利条件和环境。由此，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与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较强的契合性和实践价值一致性，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彼此赋能，共同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了可能和空间，有利于畅通“技术—人才—产业”循环，从技术突破、要素创新、产业升级等方面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

（一）推动技术突破，夯实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

新质生产力的本质是先进的生产力。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证明，技术进步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新质生产力作为先进的生产力质态，必须实现突破性、颠覆性、原创性技术的创新，这是其得以形成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其形成后能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技术创新涉及多领域、多环节、多要素，周期长、投入大、风险高、跨界性强，高水平高等学校、职业学校、企业或者其他科研机构均无法单独提供重大技术创新活动所需要的条件与环境。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通过跨区域整合产教资源、建设产教融合平台载体、共建混合所有制分校或产业学院等，汇聚了多种优质生产要素和资源，形成了跨区域的创新生态系统，是技术创新中心、产教融合实践中心，也是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的重要平台和载体，在优化技术创新环境、汇聚技术创新资源、提高技术创新人才供给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从推动技术创新所需要的条件来看，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积累了诸多良好条件并形成了宝贵经验，整合了大量推动技术研发所需要的人才资源、资金资源、技术资源、平台资源等，汇聚起开展技术研发的强大力量，通过发挥促进企业主导创新、场景驱动应用、知识协同治理、资源高效配置、协同创新和技术攻关等多方面作用，推动技术突破和产业升级。

具体来说，推动技术突破需做到以下几点。其一，企业主导创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强调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导作用，企业特别是龙头企业更能催生技术创新和应用需求，聚集丰富的知识资源、人力资源和数据资源，增强自身发展驱动力和保障力，整合多种资源并发挥其优势，有利于促进产业创新，推动产业升级并完善产业链。其二，场景驱动应用。新技术的快速发展催生出新场景，通过促进技术创新、优化资源配置、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全面提升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效能、市场化配置数据要素、提高生产效率，有利于加速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其三，知识协同治理。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有利于强化知识协同治理，促进技术知识的生产、整合与流动，激发知识资源优势，增强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活力。其四，资源高效配置。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通过实体平台集聚优势资源，以人才流动机制激活人力资本，以数字化转型突破行动限制，实现资源高效配置，为技术创新提供根本保障。其五，协同创新和技术攻关。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通过跨区域整合产教资源、共建混合所有制分校或产业学院，瞄准产业和市场需求，

共建技术服务联盟、技术创新中心、创新创业实践平台，打造产教融合试验区、研究院和成果转化中心等，实现产学研一体化发展，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并推出前沿领域的创新成果，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与创新链的有机衔接，孵化新质生产力发展新生态。

（二）强化要素创新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

要素创新是培育和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驱动力，通过促进科技创新、提高生产效率、推动绿色发展、改革生产关系、激发人才活力，推动生产力实现质的跃升，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生产要素包括技术、劳动力、土地、资金、管理，其中劳动力居于核心地位并发挥着关键作用。前文所述的通过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推动技术突破更多是对劳动工具的改进与创新，而劳动力是劳动工具的使用主体，其劳动技能和综合水平对新质生产力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可以通过共建混合所有制分校或产业学院、建设实训基地、校企协同育人等模式推进人才培养，扩大高技能人才供给。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发展、校企合作加深和产业转型升级，必然会催生出大量对创新型和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因此，我们要通过教育链、产业链、创新链的有效衔接，以企业或市场需求为导向，促进职业院校推进专业、课程、教学等改革，优化人才培养模式，完善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合理流动的工作机制，扩大与产业和市场发展需求相匹配的各类人才供给，不断增强新质生产力的劳动力生产要素支撑。

（三）以新兴产业创新丰富新质生产力发展载体

“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9]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产业创新是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推动力和关键载体。“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就是从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到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的生成”[10]，这为培育和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科学指引。从三次工业革命和六次科技革命的发展历程来看，新兴产业在引导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中具有先导作用，将新兴产业培育发展成为主导产业、支柱产业，从而实现科技革命领先，实际上这也是促进新质生产力培育、形成和发展的过程。[11]从产业发展维度来看，新质生产力通常优先产生于运用新技术的新兴产业，即新兴产业是新质生产力的承载主体，是催生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平台。基于这一逻辑与特征规律，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具备通过新兴产业创新催生新质生产力并推动其发展所需要的条件和基础。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教育资源、创新资源、人才资源、组织资源、政策资源等方面的显著优势，形成了创新链、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有机衔接的有效载体和内生机制。我们要通过加强人才培育、强化协同创新和技术攻关，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推动技术升级与科技成果转化，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中，以此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12]，助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进而催生新业态、新产业，构建和丰富新质生产力形成的载体，拓展新质生产力发展空间。

四、推进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现实梗阻

（一）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主体目标差异化影响新质生产力的条件创造

行业龙头企业、高水平高等学校、职业学校、科研院所、社会组织等多主体构成和参与是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与条件，但上述组织如果仅仅是空间组合，并不一定能够促使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作用的有效发挥，还需要实现不同主体之间的有机衔接与深度合作。现实问题是，由于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主体分布在不同领域、不同行业甚至不同区域，不同主体必然会产生利益差异化，即各个主体通常会以各自利益最大化作为自身参与行业产教融合共

同体活动行为及其程度的主要出发点，试图以成本最小化、风险最小化、时间最短化等实现效益规模最大化、时效最长化和状态持续化。不同主体目标的差异化可能会影响其参与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进而弱化各主体之间的合作广度与深度，不利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环境和良好条件的创造。

（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目标与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建设滞后的矛盾

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相较于传统的产教融合具有更高的要求、目标和任务，更加强调不同参与主体之间的协同合作，更加注重创新生态系统的广度、深度，更加注重对人才、资金、技术、信息、设备、管理等创新资源的共享范围和共享程度[6]，因而需要实现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的有效衔接并发挥出其总体效能。特别是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及其在各领域发挥的作用，使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面临诸多新问题和新任务。

新质生产力特别强调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即重点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商业航天、低空经济、基因技术、深海空天开发、量子信息、类脑智能、未来网络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或未来产业[13]，这无疑需要更多高水平的科技创新和更优秀的“新质”人才来支撑，同时也促使一些企业实现转型升级。现实的问题是，一些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由传统产教融合组织组建或改建而来，在管理理念、组织模式、组织机制、人才培养方向与模式、创新方式等方面仍然带有较多传统产教融合的“影子”。同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中的部分主体，诸如高水平高等学校、职业学校等没有及时、全面实现自身定位转型，也没有对学校的产教合作模式、学科设置、课程设计、人才培养模式等方面进行与之相适应的调整，或者调整速度相对缓慢，优势学科专业溢出效应不强[14]，与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合作的深度和紧密度不够，进而可能会出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的基础建设与目标任务不适应的问题，难以建成具有多样性、自主性和开放性的强有力的区域创新生态系统，不利于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与发展。

（三）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动能转换推进机制不够完善

在新质生产力发展背景下，尽管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一定程度上扮演着培育和催化新质生产力的角色，为之构建了平台和载体，但是传统产教融合的合作模式已经难以满足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所承载的使命和任务的需求。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的高质量建设，不能仅体现在其战略定位和建设标准的提升上，更核心和关键的是要在与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配以及支撑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动能转化机制的匹配性等方面进行完善。

具体来说，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存在以下问题。其一，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合作机制不健全。现有的产教融合以项目合作为主体，存在短期性、松散性、方式单一、合作深度不足、协同性不强等问题，不利于培养与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相匹配且适应市场需求的“新质”人才。其二，产教融合衔接机制不完善。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的不同主体由于分属不同行业，其价值取向、管理机制、运行模式、考核评价指标等各不相同，他们参与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既有自身利益的追求，也有政府的引导和推动，必然会对产教融合合作有所影响。事实也是如此，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中的部分主体更多仅是实现了形式进入与参与，但在合作方式、合作内容与合作深度等方面效果不太理想，并且也没有按照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的任务调整和优化相关机制，相互之间的项目合作与推进缺乏有效的机制保障。

五、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路径优化

（一）构建多元主体共建治理机制，增强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的协同性与凝聚力

在新质生产力发展背景下，行业产教融

合共同体对不同主体的参与范围、参与深度和相互之间的协同性有着更高要求，必须打破原来的形式进入而参与不足、各自为政突出而协同不强、注重项目推动而忽视机制有效衔接的局面，解决校企合作“作而不合”、产教融合“合而不融”的问题，推动其由原来的主体分散、力量分散、资源分散转向多元主体共建共享的发展联盟与命运共同体。

其一，构建多主体共同参与、联合管理的决策运行管理机制。我们要发挥好政府的政策引导与激励、统筹规划与组织协调作用，推动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设立联合工作机构，坚持约束和激励同行、权利和义务对等、刚性和柔性并济的原则[15]，制定和完善联合机构的管理办法和规章制度，以制度的方式明确各主体的职能与权利，以及机构内部的议事、决策、运行、执行规则，保障各方权益，促进各方履约履责，确保机构运行的规范性和有效性，提高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的执行力。其二，加强各主体机制与政策的衔接，保证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共建治理成效。我们要同步推进项目开发、平台搭建、人才培养、产业对接、政策衔接事项，避免出现各主体之间分割自治、独立运行、浅层次合作的现象。在此过程中，我们要特别注重解决好不同主体因政策脱节、衔接不畅等制度性梗阻造成的对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的阻碍，应加强政府组织协调能力，推动不同主体根据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和市场需求，聚焦自身的行业优势、技术优势、人才优势和资源优势以及在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中的位置，加强相关机制与政策调整优化，使之形成相互衔接、相互促进的一体化政策体系。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还要利用数字技术加速产业变革、缩短知识迭代周期等实际，建立与数智治理相适应的制度迭代更新机制，增强制度效果评价、反馈、调节、优化的全面性、准确性和时效性。其三，加强政府对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共建治理的政策支持。政府是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的重要环节和推动力量，具有政策赋能的强大优势。各级政府应在政策支持方面持续发力，通过出台和实施“金融＋财政＋土地＋信用＋财税＋投资”等组合式激励政策，补齐企业、高水平高等学校、职业学校、科研院所、社会组织等的短板，打通不同主体政策衔接、运行的“最后一公里”。同时，政府还可以通过项目资助支持、信息服务平台建设、产教融合型企业培育、国际交流合作等方式，为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的共建治理提供更多有力支持。

（二）重塑和健全利益协同体系，增强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的内生驱动力

利益共享范围和共享程度深刻影响着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合作主体的积极性以及共建效果的内生性，也是关键要素之一。在这个过程中，利益错配、利益分配不均和利益分配不可持续都是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利益机制建设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其一，构建多元化的利益分配机制。不同主体的利益诉求各不相同，同一类型利益对于不同主体的满足程度具有差异性，为此，我们应运用多元思维和广度思维建立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科学合理的利益协调、补偿与分配机制，确保不同主体在各自关注的利益之间找到平衡点。比如，通过采取税收减免、资金补贴、土地使用优惠等激励措施，降低相关主体参与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的成本，以此形成间接的利益补偿；通过建立丰富多样的共享平台或专门基金，为不同主体提供包括人才、技术、管理、市场需求、项目、资金等在内的丰富优质资源，解决部分主体资源短缺问题；通过增强利益分配与不同主体需求的适配性，以优化利益分配效能强化不同主体合作。其二，拓展合作平台，深化合作内容，以合作共同体打造利益共同体。利益往往源于自身发展的诉求，存在利益分散与利益壁垒的问题，主要归结于没有形成发展共同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应通过培育更多具有共同发展意愿的合作项目、延长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搭建更丰富和更具有吸引力的合作平台等方式，建立参与主体更

多元、合作领域更广泛、合作程度更紧密、合作方式更多样、合作平台更丰富、资源分享更充分、合作成果共享更公平的发展模式，构建类型更加多样的利益合作载体。比如，可以通过建设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高质量发展联合研究中心、行业共享性职业教育资源库、产教融合高水平实训基地样板平台等方式，构建横向协同、纵向传导、协同联动、多方共进的工作格局，形成以利益驱动为核心的权利与利益分配联动机制，实现共同体利益相关方的权利、责任、收益协调统一[14]，建立利益共同体。其三，制定利益分配反哺机制。利益联结并非是对利益短期的单向获取，而是在利益补偿中激发合作动力、厚植发展优势、培育合作动能、挖掘合作潜力，以此形成更加稳固和完善的协同发展生态，实现更长周期和更深层次的共享发展，构建发展共同体。基于此，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利益分配机制必须充分考虑植入利益反哺环节，以利益反哺培育未来更为长远的协同发展共同体，保证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发展的活力与可持续性。在此过程中，重点是要在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内部，通过整合不同主体的资源或以募集的方式建立未来发展基金或资源池，用于培育优质合作项目、打造合作品牌、建设发展平台，不断厚植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发展的基础和优势，形成良性发展机制，增强合作驱动力和支撑力。

（三）完善资源整合与配置体系，增强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支撑力

资源是推进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的基本保障。其中，优质资源具有稀缺性，多种优质资源的整合与共享可以释放出更强大的动能、发挥更大作用。完善资源整合与配置体系，有利于引导利益主体破除壁垒，拆除相互封闭的藩篱，激发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活力，全方位满足各利益相关者的发展需求[16]，进而增强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的支撑力。新质生产力得以催生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实现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其中必然包括资源创新性整合与配置以及创造性转化。因此，加强资源整合、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增强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赋能新质生产能力发展支撑力的内在必然，这就要求我们要积极探索整合资源、凝聚资源和配置资源的模式。

其一，聚焦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核心需求，打造合作平台联盟，促进资源整合优化。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聚焦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中的龙头企业、政府部门、高水平高等学校、职业学校和科研院所等合作主体的关键技术问题，在政府的支持与指导下，基于各合作主体的优势资源与创新基础，努力建设一批包括科学研究中心、工程技术中心、科技成果转化中试基地、未来技术创新实验室、产教融合型实习实训基地等[8]，发挥各合作主体作用，加强对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外部优势资源的整合，形成内部强联动、内外强联合的资源整合利用格局，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构建更大范围的战略合作联盟，为推动技术突破、要素创新和产业升级提供丰富的优质资源供给，共同推动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和新质生产力发展。

其二，加强人才链、专业链与产业链的对接融合，提升资源共建共享程度。一是制定与产业链动态匹配的人才规划。政府有关部门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的决策机构要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加强对产业特别是优势产业发展方向以及所需人才类型等的分析研判，统筹好人才发展规划，补强合作主体人才资源的薄弱环节，围绕先进产业集群和重点产业链，编制人才图谱和需求目录，前瞻性谋划“人才地图”，深化政府部门、企业、高水平高等学校、职业学校、科研院所等的合作，培养更多战略型、领军型、管理型、技术型人才和能工巧匠。同时，建立开放的人才信息共享平台，完善动态调整的人才需求库，健全人才流动机制，最大限度发挥人才在产业发展中的作用，以人才布局优化和高水平人才供给实现对产业发展的固链、补链、强链。二是健全面向产业链的人才引育模式。

按照“内优存量”和“外引增量”的理念，创新面向产业链的人才引育模式。一方面，加强企业、科研机构与高水平高等学校和职业学校的对接，依托行业和教育优势资源，发挥好高水平高等学校和职业学校的学科、师资、科研、实验等优势，调整和改进学科、课程、教学模式，鼓励开发产教融合课程，创新高水平高等学校和职业学校与企业、行业“校企一体、产学研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提高人才技能与企业、行业和产业发展需求的匹配度。另一方面，制定更加符合本地产业发展和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的差异化人才政策，实行“离岸引才”“飞地引才”“科技特派”等柔性引才政策，通过“揭榜挂帅”“项目引才”“以赛引才”等方式，创新人才引进渠道，并将其精准引进到符合本地战略发展需要的特色优势产业，最大限度发挥人才效能及其对产业、行业发展的促进作用，持续推进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之间的深度融合。[6]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在黑龙江考察时强调 牢牢把握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 奋力开创黑龙江高质量发展新局面[N].人民日报,2023-09-09.

[2] 李强.政府工作报告:二〇二四年三月五日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N].人民日报,2024-03-13.

[3] 王政武,杨俏丽,陈春潮.科技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作用机理、现实困境与政策优化[J].企业科技与发展,2024(3):6-12+19.

[4] 胡莹,方太坤.再论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与形成路径:以马克思生产力理论为视角[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24(2):39-51.

[5] 安培.新质生产力发展背景下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思考[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4(24):38-45+72.

[6] 李玉倩.新质生产力视角下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逻辑与路径[J].南京社会科学,2023(12):122-129.

[7]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N].人民日报,2024-02-02.

[8] 邓小华,卢浩.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赋能新质生产力涌现的内在逻辑与路径选择[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4(24):21-28+37.

[9]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N].人民日报,2023-12-13.

[10] 张来明.聚焦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J].中国信息化,2024(5):5-8.

[11] 沈梓鑫,江飞涛.未来产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创新与新质生产力:理论逻辑和实践路径[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6):115-129.

[12] 刘佳旎.以新质生产力激发高质量发展新动能[N].青岛日报,2024-03-07.

[13] 陈立斌,赵莉莎,王小华.新质生产力视域下高等教育产教融合的实践困境与优化路径[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25(1):111-116.

[14] 胡筱萌.新质生产力视角下高职院校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逻辑与路径[J].航海教育研究,2024(3):23-30.

[15] 施星君.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需遵循三个理性[N].中国教育报,2024-02-27.

[16] 陈磊,朱庆卉,刘夏.利益相关者视角下深化产教融合动力机制研究[J].当代职业教育,2023(2):42-50.

Empowering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rough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Communities: Internal Logic, Practical Challenges, and Path Optimization

ZHAO Meirong[1], YIN Jiangxia[2], SUN Tianshu[3], LI Xinyi[4]

(1. *College of Food and Pharmaceutical Engineering, Guangxi Vocational University of Agriculture, Nanning* 530007, *China*;

2.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Research Center, Guangxi Vocational University of*

Agriculture, *Nanning* 530007, *China*;
3. *College of Digital Economics*, *Nanning University*, *Nanning* 530200, *China*;
4. *Department of Development Planning and Quality Supervision*, *Guangxi Vocational University of Agriculture*, *Nanning* 530007, *China*)

Abstract: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communities serve as crucial platforms for advanc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romoting high-quality education, cultivating high-caliber talents, and driving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establishing an effective model integrating industrial chains, educational chains, talent chains, and innovation chains.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communities align closel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embodying mutual empowerment and symbiotic collaboration to jointly advance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eir internal logic for empower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lies in facilitating technological breakthroughs, enhancing factor innovation, and fostering emerging industries. However, challenges such as divergent goals among stakeholders, misalignment with regional innovation ecosystems, and inadequate mechanisms for dynamic transformation hinder the effectiveness of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communities empower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Key priorities for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communities to empower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clude building multi-stakeholder governance mechanisms, reshaping interest coordination systems, and optimizing resource integration and allocation to strengthen cohesion, endogenous motivation, and developmental support of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communities, thereby consolidating the foundation for empower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Key words: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community;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factor innovation; industrial upgrading

（责任编辑：李萌）

《前沿》2025年征稿启事

《前沿》是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管、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学术中心主办的社科综合性学术期刊，是中国社科院AMI核心期刊扩展版、中国知网CAJ-N网络首发学术期刊，双月刊，136页。《前沿》秉持学术本位、观照时代、理实结合的办刊宗旨，坚持守正创新，为学界搭建高品质的社科学术交流平台。

一、常设栏目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中国式现代化与民族地区发展、青马论坛、传统文化与现代性、治理研究、法学、生态文明建设、社会·调查、北疆智库等栏目，竭诚欢迎海内外专家学者惠赐稿件。

二、征稿要点

1.篇幅1万至1.5万字为宜，论文要素齐备，摘要须为400字左右，开篇须含文献综述。

2.鼓励宏观性、前瞻性、创新性的来稿，尤其欢迎围绕同一学术话题组织的3篇以上论文的研究专题，编辑部择优对专题学术主持人提供必要的策划费。

3.本刊对稿件实行三审+专家双向匿名审理。

4.为支持青年学人成长，开设“青马论坛”栏目，发表45岁以下青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和在读博士生文章。

5.本刊不收取任何形式的版面费，稿件一经刊发即支付稿酬。

6.来稿请通过采编系统（http：//qaya.cbpt.cnki.net）投递相应栏目，不接受邮箱投稿。

本着尊重作者文意的基础上，编辑部有权对稿件进行技术性和文字性修改。我刊历来重视维护作者科研成果的知识产权，凡抄袭、剽窃、一稿多投等行为均视作学术不端行为。承蒙各界作者的热心支持，本刊得以不断发展，于此谨致谢忱。

通信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利民街25号《前沿》编辑部
邮　　编：010010
联系电话：0471-4907289,4921974
邮　　箱：2001qianyan@163.com